

科学技术艺术

第7册

宗教与民俗

第9册

历代文化
沿革
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
制度文化
教化与礼仪
学术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5册

第6册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海外华侨华人
文化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谭天星
沈立新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外华侨华人
文化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藏书章

203
669
0(10)

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 (10—100)

姜义华 主 编

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

谭天星 沈立新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 数 330,000

印 张 13.5

插 页 1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8-02353-0/K·572

141638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FGP1/01211

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

作者简介

谭天星,1963年生。1979—1986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华侨史概述》(合著)、《明代内阁政治》等。

沈立新,1938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上海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中外文化交流史话》、《世界各国唐人街纪实》等。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文化海外传播和移植的历史,是适应当地文化并与之交流的历史,是为所在国文化增添色彩和促进当地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历史。

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是华侨华人维持其民族性的主要表征。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社团组织构成了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基石。他们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宗教信仰与风俗,社区、传媒与交往,绘制了一幅丰富多采、特色鲜明、具有强烈族群凝聚趋向的文化图景。本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华侨华人文化小百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华侨华人文化经历了一种质的演变。“侨民文化”的色彩由浓转淡,一种日渐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一种扎根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并融合当地文化或西方文化而形成的文化,在逐步形成。华侨华人文化较之过去具有更多的新的内涵。它标志着海外华人的发展走向了一个全新的纪元。本志展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华侨华人文化历程之梗概。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紘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玫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玫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	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校对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文化教育	21
第一节 概述	21
一、私塾、义学时期	22
二、近代新式华文教育时期	25
三、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的演变时期	31
第二节 亚洲地区的华侨华人教育	35
一、“东盟”国家的华文教育	35
二、印支国家的华文教育	63
三、日本、朝鲜半岛的华文教育	68
四、印度、缅甸、文莱的华文教育	71
第三节 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华侨华人教育	74
一、美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74
二、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79
三、欧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79
四、非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80

第二章 组织文化	82
第一节 概述	82
第二节 宗族与姓氏组织	86
一、同宗同姓组织	86
二、联宗的姓氏组织	95
第三节 地缘与方言组织	98
一、东南亚、东亚华侨华人的地缘与方言组织	100
二、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的地缘与方言组织 ...	115
第四节 业缘与经济团体	119
一、商会组织	119
二、行业组织	125
第五节 社会文化组织	129
一、慈善、互助组织	129
二、康乐、体育与联谊组织	133
三、青年与妇女组织	138
四、文化教育组织	143
第六节 政治与救国组织	149
一、政治组织	149
二、救国团体	153
第七节 全国性综合团体	156
一、东南亚、东亚华人综合组织	156
二、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华人综合组织	157
第三章 华文报刊与影视广播	161
第一节 概述	161
第二节 亚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164
一、新加坡的华文报刊	164

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	172
三、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报刊·····	180
四、菲律宾的华文报刊·····	183
五、泰国的华文报刊·····	186
六、缅甸的华文报刊·····	190
七、印支三国的华文报刊·····	192
八、日本、朝鲜半岛、蒙古、印度的华文报刊·····	196
第三节 美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202
一、美国的华文报刊·····	202
二、加拿大的华文报刊·····	209
三、拉美各国的华文报刊·····	212
第四节 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215
一、欧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215
二、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218
三、非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219
第五节 华语影视与广播·····	221
一、新加坡的华语视听文化·····	221
二、北美华语电台与电视·····	222
第四章 华文文学与戏剧·····	224
第一节 华文文学·····	224
一、概述·····	224
二、新、马华文文学·····	226
三、泰国华文文学·····	239
四、菲律宾华文文学·····	241
五、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243
六、美国华文文学·····	246

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	250
第二节 东南亚华文戏剧·····	255
一、概述·····	255
二、华文话剧·····	257
三、歌舞剧·····	266
四、华文传统戏曲·····	270
五、木偶戏、影戏和祭祀戏剧·····	278
第五章 唐人街街区文化·····	280
第一节 概述·····	280
一、唐人街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280
二、唐人街的结构与功能·····	283
第二节 亚洲的唐人街·····	288
一、胡志明市·····	288
二、曼谷·····	289
三、马尼拉·····	291
四、新加坡牛车水·····	292
五、加尔各答·····	294
六、日本的三大唐人街·····	295
第三节 欧洲的唐人街·····	299
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唐人街·····	299
二、巴黎的三个中国城·····	303
三、阿姆斯特丹·····	305
第四节 大洋洲的唐人街·····	306
第五节 拉丁美洲的唐人街·····	313
一、圣保罗市·····	313
二、东方市·····	314

三、利马·····	315
四、巴拿马·····	316
五、哈瓦那·····	317
六、墨西哥·····	319
第六节 北美洲的唐人街·····	320
一、美国·····	320
二、加拿大·····	335
第六章 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	344
第一节 宗教信仰·····	344
一、对世界三大宗教和道教的信仰·····	344
二、德教、孔教与三教·····	352
三、民间信仰·····	355
第二节 民俗文化·····	358
一、节令·····	359
二、婚嫁、丧葬及其他·····	361
第七章 华侨华人文献与研究·····	363
第一节 华侨华人历史与社会的研究·····	363
一、二战前的华侨研究·····	363
二、二战后的华族研究·····	369
第二节 华人历史博物馆、史学团体及其他·····	397
一、博物馆及其他纪念物址·····	397
二、史学团体·····	402
参考文献·····	406

译名对照·····	412
后 记·····	416

导 言

3000 万余众的华侨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构成了近现代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奇特而意义深远的现象。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后裔在异域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同时,还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并创造性地融中华文化、当地文化及其他诸文化于一体,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华侨华人文化。

现代意义的华侨系指在海外定居谋生并保持中国籍的中国侨民。华人则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亦称“华裔”、“华族”等^①。所谓华侨华人文化即是以他们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如同一部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当地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华侨华人文化的移植、融合、发展的历史同样具有“三史”的意义,只不过由于文化主体政治价值观的变化,使得这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及意义各有所变异与发展罢了。实际上,任何试图概括海外华侨华人的努力,都必须从华侨华人历史的源头说起。

^① 关于“华侨”、“华人”的定义,因依据标准的不同而存在歧义。如中国台湾学者根据血统主义原则,主张承认双重国籍,将华人与华裔也包括在华侨之列。或泛称具有中国血统者为华人。或认为,应当以“中国人”、“中国血统人”或“中国系人”来代替“华侨”、“华人”的用法。此外,还有“华裔”、“华族”等。本书所指的华侨华人为居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中国侨民和外籍华人及其后裔。

第一节 中国海外移民简史

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上有“唐人”、“华人”、“中华人”、“闽粤人”、“中国贾人”、“华民”、“华工”等多种称呼。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为依据,中国海外移民史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古代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①

一、古代移民时期

古代中国海外移民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生成阶段(九世纪以前)

这时中国人的外徙在数量上星星点点,细水长流,且时常由于多种因素而不断催发。中国人外徙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

探险、求仙而出洋者。如公元前 219 年,徐福征发童男童女 3000 人出海求仙,“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日本终其一生。

政治变故、军事纷争而迁居者。如秦时民众苦于虐政,纷纷逃至朝鲜半岛南部。

商业、文化、宗教等方面动机而外迁者。晋武帝时(265—290 年),原住在百济(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华侨,因擅长筑堤、凿池、掘沟、养蚕和纺织等技术,又相率移居、归化于日本。至刘宋武帝时

^① 华侨史的分期有五种标准,即分别以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关系、交通贸易、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等为分期标准,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

(454—464年)已达1.8万人。隋唐时,日本仰慕中华文化,到中国延聘人才。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的同时,也以“学问僧”身份到日本传授佛教精义。鉴真和尚东渡即为典型例证。

严格地说,唐以前的海外移民属雏形阶段,不同于后来意义上的华侨。

(二) 发展阶段(十世纪至十六世纪初)

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海上交通的发达是影响这时中国人出国的主要因素。日本学者须山卓认为:“到了唐宋之交,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航海便由中国人所垄断了。”^①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罗盘运用于航海,大批商人出洋。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遍历南洋群岛、印度、波斯(今伊朗)以至非洲东部等30个国家。这一壮举,为中国人出海经商,特别是移居南洋,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十世纪,阿拉伯人马素提著《黄金牧地》一书,记载所历苏门答腊,见“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今巨港)区域为多,盖避国中黄巢之乱而至者”^②。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马欢的《瀛涯胜览》等中国文献,留下了许多关于移居南洋的华侨的记载。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其特点也较明显,如成批出国、经商立业、聚族而居。郑肖南《心史》说,宋亡后,“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在明代,广东南海人梁道明雄踞三佛齐,“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

① 须山卓:《华侨经济史》,《世界史研究丛书》第12集,1972年版,第60页。

② 转引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版,第36页。温雄飞将古代中国人大规模的海外避难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因黄巢起义而致广东人逃亡;第二次是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大量宋朝遗臣逃亡;第三次为满族入主中原,大量明朝遗臣逃亡。

《明史·三佛齐传》)。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益、满者伯夷等处各有许多中国人居住。如杜板有广东、福建流居者约千余家。在菲律宾,闽人“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可以发现,闽、粤两地的商人构成了这时华侨的主体。至明代中期,爪哇、婆罗洲、菲律宾、泰国、马来半岛以及越南、柬埔寨、朝鲜、日本等地莫不有中国人定居。华侨在今东亚、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约有15—20万人。^①

华侨之所以能够在异邦立足、发展,还在于所处当地对华侨的欢迎。华侨来自文化悠久、地大力强的中国,带来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他们的智慧与勤俭的品德为当地人所景仰。华侨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真腊(今柬埔寨),依照法律,当地人杀害唐人(中国人)要被处死,但唐人杀死当地人只罚重金,如果无钱,则卖身以赎。“往年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②。周达观发现有在这里生活达35年之久的华侨。

(三) 高潮阶段(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

至鸦片战争,东南亚、东亚等地的华侨人数在100万以上。1820年泰国曼谷就有华侨44万人^③。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呢?除了明末清初因王朝更迭而导致战争难民迁居海外之外,还有这样几方面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内部,十六世纪后期随着“倭患”的平息、海禁开放,私人海外贸易打破了官方以朝贡贸易形式为主体的垄断局面而日趋活

^①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②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第70页。

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出洋贸易成为一种时尚。谚云:“若要富,须往猫里雾(今属菲律宾)”。而在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说明农村自然经济在剧烈分解,市镇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迫于生活的压力,纷纷利用近海之便,出洋谋生。在这支飘洋谋生的队伍中,既有精于锱铢的商人、身怀技艺的手工业者,也有劳力出卖者等形形色色的人。

在外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及其对东南亚的控制,形成了吸引中国人出洋的强大“拉力”。这些欧洲殖民者既需要中国人充当他们的贸易伙伴(即华侨成为中介商),也需要中国人来保持城市的繁荣,还需要中国人成为他们掠夺当地资源、开发矿场的廉价劳动力,以致在中国东南沿海还出现了诱拐华工的现象。

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出国人数骤增,而且私自出国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渐渐成为出国的主力军。移居的地区也进一步扩大。东起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抵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广大范围内,都有华侨的足迹。而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万丹、泗水,马来半岛的檳榔屿、马六甲、新加坡,泰国的北大年、曼谷、宋卡,越南的堤岸、河仙,缅甸的仰光,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日本的长崎等地,都有特定的华侨居住区。以这些居住区为中心,最初的华侨社会开始形成。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侨由于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在东南亚渐渐沦于受西方殖民者剥削的地位。华侨史因此增添了同西方殖民者斗争的篇章。如:1740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侨的红河起义,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1593年、1603年、1639年、1662年、1763年,菲律宾华侨先后五次举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1760年,华人郑信还率领泰国人民和华侨击败了缅甸军队的入侵,建立了吞武里王朝。华侨的这种不断斗争,使华侨之间的群体意识变得强烈起来,对于凝聚华侨的力量产生了较大作用。

这一时期的出国及其在海外的的发展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制约因素,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弃侨”政策。在明清政府看来,华侨是“一群背弃祖庐、一心逐利的逃民”,是“啸聚海道、劫掠商船的罪民”,是“效忠外国的潜在的汉奸”,“不仅对于中国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有害的”,也就无所谓对他们的保护了。当1603年西班牙人对菲律宾2.5万名华侨进行大屠杀时,明朝统治者竟然认为这是华侨咎由自取,并说:“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①清初,东南亚华侨直接参与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运动,因此,清朝统治者视华侨为“政治犯”、“谋反者”和“逆贼”,一方面禁止商民船只私自下海^②,另一方面命令将华侨解回中国处死。雍正五年(1727年)诏令:“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代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愈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还,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怜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③对于华侨出入国的严格限制乃至禁止,使海外华侨社会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澳大利亚学者颜清湟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外华人是两个世界中无所适从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却肩负着两个世界的压力。一方面,他们由于保持着旧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遭受外国人的歧视;他们毫无例外地在文化上被视为不可取的人,在种族上被视为劣种人,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诋毁。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了一些与旧儒家文化不同的新事物,受到些外国影响,因而又被祖国政府视为潜在的危

① 徐学聚:《报取吕宋囚商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三。

② 清初先是颁布“迁界令”,禁止商民下海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颁禁止渡航南洋令,不准内地商船前往南洋的吕宋(今属菲律宾)、噶喇吧(爪哇)等地贸易,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解除此令。

③ 《皇朝通典》卷八〇,刑制。

险分子。”^① 探索华侨的“边际化”矛盾发展,成为我们理解华侨史内涵的重要途径。

二、近现代移民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散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一般估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约有1000万人^②。劳工已成为移民的主体,商业性移民和政治性移民次之,文化、亲属团聚等类移民又次之。这些移民90%是在东南亚,此外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也有大批中国移民。当代世界华侨华人的分布格局基本上随着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移民而奠定的。

这种规模空前的海外移民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的加深,农村自然经济的日渐解体,下层民众日益贫困化,以及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大量劳工需求等内外因素剧烈作用所致。这时的清政府屈于外国列强的压力,被迫同意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别地做工,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一律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在这种背景下,华工出国如浪汹涌。

以契约移民方式为主的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属于经济性质的和平移民。契约工人又称苦力,俗称“猪仔”。“猪仔贸易”也称“苦力贸易”。“猪仔”成了近代契约

① 颜清湟著,栗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导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② 郭梁:《近代华侨出国史概述》,《南洋问题》1982年第2期。关于近代华侨的人数还有1200万、1500万、2000万等几种说法。

华工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猪仔”贸易最为盛行。澳门、香港和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上海等）是国内贩运华工的中心，新加坡和檳榔屿则是转贩世界各地的中心。“猪仔”们被掳掠、诓骗而入“猪仔馆”，即被强制按上“自愿出洋”的手印，以一纸契约而被装上船只，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海上浮动地狱”旅程。迨至抵达目的地，已有半数以上的“猪仔”成了海底冤魂。在种植园里，华工遭受非人的折磨，古巴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竟高达75%，年死亡率约为10%，劳动寿命平均只有5年。^②

由于拐贩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晚清政府采取了打击的措施。1866年与英、法签订的移民公约中规定：凡用暴力或欺骗手段将中国民人贩运出洋者，一经查出，即行正法。国际舆论也强烈谴责这种赤裸裸的苦力贸易。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华工进行限制与排斥。风行的“猪仔”买卖才有所遏制。同时，晚清政府逐渐纠正了过去那种将华侨视为弃民的政策，代之以“护侨”，如在美洲、东南亚等地设立领事馆，帮助华侨争取权益，进行“护侨”外交；派遣舰队巡视华埠，以收华侨内向之心；帮助设立中华商会，创办学校，等等。

此后，大规模的移民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共在中国北方招募赴欧参战华工23万人；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导致了大量外移的战争难民。

① 关于契约华工的形式与性质有几种不同的看法：(1)认为契约华工有“苦力”或“猪仔”和“赊欠单工”两种类型。(2)认为历史上的契约华工有奴隶制、债奴制、雇佣制三种形式。(3)认为契约华工实质上是奴隶。“猪仔贸易是灭绝人道的奴隶贸易的同义语。”(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契约移民实质上是奴隶，只不过形式上是契约劳工。”(杨建成：《华侨史》，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95年版，第93页。)

②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六辑，第203页。

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自发移民南洋之举,如福州籍移民开发诗巫(今属马来西亚),至二战前已有2万人。

近现代移民给海外华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华侨社区或聚居区在世界五大洲的散布。劳工的身份决定了他们艰辛的命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唐人街成了在美华侨的避难所。(2)华侨社团组织的活跃。为了互相扶持,对付来自当地社会的强大压力,华侨纷纷组织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团体来保护自己,如各种宗族组织,或帮派(福建帮、广东帮、潮州帮、客家帮等),或秘密会社,如天地会(洪门会)、三合会等得到迅速发展。(3)华侨经济的发展。华侨从从事矿工、种植以及小商小贩,到经营商行、批发和中介业务,到店主、工厂主,少数还成为大矿业主或种植园主,甚至投资金融业。艰苦的创业,几代人的奋斗,终于积聚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和农业资本。(4)华侨民族意识的加强。随着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日益密切,华侨越来越受到中国政治气氛的感染,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1931—1945年)等,历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引发了海外华侨极大的民族热情,并积极参与其中,谱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三、当代移民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影响海外华侨社会发展的两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六十年代以前,独立后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不再欢迎中国移民入境,有的甚至是禁止。因而除香港、台湾地区的海外移民之外,中国大陆已很少向外移民。七十年代初,情形有所改变,尤其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使许多人通过探亲、留学、劳务、联姻等多种方式移民,形成了一个新的移民潮。据统计,

1979—199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有80万人；1950—1990年间台湾移民海外者也有近80万人。新移民与近现代那种以劳工为主体的移民相比有较大的不同，他们大多具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知识性移民”或“技术性移民”。其中有些人在科技领域已经成为重要骨干，有的取得了重大成就，闻名于世界。

第二节 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是90%以上的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以及在这方面逐步当地化。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正式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自愿加入当地国籍，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作贡献^①。这无疑极大地加速了华人的当地化进程。融入、融合已成为现代海外华人发展的主流。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华人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企业集团和企业家，但这种经济已不再属于侨民经济的范畴，而是当地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人在心态上也已基本完成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海外华人以华侨为主体的时期，我们称其为“华侨文化”；当海外华人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转为外籍华人以后，则称之为“华人文化”。

一、移民方式与文化类型

抚今追昔，千余年间的中国海外移民史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种中国海外移民史与华侨华人文化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① 参阅毛起雄、林晓东：《中国侨务政策概述》第五章，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知道,华侨出国与西方国家以强权相保护的殖民不同,它是一种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和平的、文明的移民^①。从移民的起因、过程及其结果可以将移民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和平的或战争的移民,政治的、商业的或文化的移民,集团的或分散的移民,殖民的或非殖民的移民,主动的或被迫的移民。中国移民通常是和平的、务实的。汉唐盛世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都没有导致大批海外殖民的现象,这正是中国人安土重迁、和平保守思想的表现。这种移民的方式也就决定了他们所拥有、所传播的文化不是什么殖民的或侵略性的文化,而是一种友好兼容、平和温厚的仁爱的文化。

中国移民从走出国门第一步即带去了种族上与文化上的中华民族因子。正是这个因子构成了华侨社会最坚强的纽带,使华侨趋于聚集,形成社区。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南洋华侨中,我们看到了华侨文化的雏形。从整体上说,所谓华侨文化实质上就是移植于海外、保存于华侨中间的中华文化,属于“侨民文化”。到了十九世纪,由于华侨数量猛增,特别是晚清时期,华侨社会中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华侨社团的兴起,使华侨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华侨文化逐渐向华人文化过渡,华人文化日渐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倾向,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是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并融合西方文化或当地文化而形成的文化。不过,直至八九十年代,这种文化仍处于不断融合的过程之中。

二、华侨华人文化的两种趋向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既然华侨社会已经过渡到华人

^① 近代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古代中国人出国看成是“殖民”,如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胡绍民的《中国殖民十六伟人传》,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刘继宣、束世澂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社会,那么,原先的华侨文化也必然演变为有某些新的特点的华人文化。演变是渐进的过程。虽然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但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夜之间所能改变得了的。在此,实际上需要客观地承认这样两种趋势:

第一是变化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日益强烈,以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从华侨到华人的政治归属的转变,对他们的文化形态的影响在一定时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是因为:(1)从效忠中国到效忠居住国的改变,使得传统的侨民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2)当地政府不允许以效忠中国为宗旨的文化移植与传播。如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试图通过取缔华文报刊、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来消灭华人文化,使华人在文化上完全当地化。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虽然政府允许华人保存自己的文化,但要求这种文化只能是当地多元文化的一种,以服务于当地为目标。(3)已归化当地的华人及其后裔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只有在文化上当地化,才能获得更全面的发展。虽然在不同的年龄层及其因教育背景的差异,华人的当地化程度并不一样,但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显然不再为中青年一代所坚持,而代之以当地化或西方化的文化观,或是吸收当地文化的精华、以当地化为价值取向的文化。

各国华人文化认同的当地化是华人的文化适应与融合的最主要特点。由于各地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华人的文化当地化也呈现出地域的特点。在北美、欧洲、大洋洲的那些发达国家,华人的文化当地化主要是指适应、学习并吸收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东南亚、拉美、南部非洲的那些国家,华人的文化当地化则包含他们适应并部分吸收当地原住民文化以及影响当地的西方文化。

在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当地化除了指它的政治归属和文化服务的终极目的之外,还在于越来越多的华人认同于当地文化。例如:在

教育上,华人子女上当地学校,学习当地的语言与文化,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念;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与当地入并无两样。在语言方面,绝大多数华人都会说当地语言。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上,许多华人主动与当地社会汇流,如各国华人衣着、饮食、待人接物等的当地化。在文学艺术上,用当地文字及习惯方式来表达。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华人同化的过程,它在华人作为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不只是较多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只是作为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去寻求发展,它还致力于与当地社会的完整的结合。华人文化当地化的结果有几个明显的方向:被同化,即失去自我,融入到另一民族的共同体之中;成为新型华人文化的主要特色;成为华人文化的一个次要内容。应当说,这几种趋向同时存在,其发展主流依然不太明朗,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华人文化的当地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它主要受到所在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华人自身状况两方面的影响。从国别来看,在实行不同的华人政策的国家,华人文化的当地化进程是不一样的,如印尼、泰国等华人的当地化程度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当地化则相对较浅一些。从华人的年龄层来看,30岁以下、30—50岁和50岁以上,他们的当地化程度很不相同,前者最深,中者处于过渡状态,后者则具有较强的华人文化意识。而年龄层的不同,反映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与中国和当地的关系上也不一样;受华文教育者与受当地教育者之间、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三代移民之间,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是很大的。

由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曾长期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西、荷、法、美等国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对这些国家影响甚深。华人作为一个商业群体,在东南亚社会往往介于西方殖民者和土著民族之间,西方文化对他们影响较大。这里可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是华人皈依基督教的现象。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在菲律宾,许多华人信奉上帝,还有华人天主教徒的组织。1969年,杰拉德·麦克比思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非华青年学生信仰基督教,其中71%为天主教徒,15%为新教徒。1989年,洪玉华、吴文焕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8%的非华人信奉基督教,包括66.6%的天主教徒,11.5%的新教徒,还有9%的华人既信基督教,也信华人宗教(如佛教或其他民间宗教)。^①

一是新加坡华人的西化。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的城市国家,地处东西方交通的咽喉,为了获得更快的发展,执政党推行西化政策,包括国家社会管理与建设的西方化,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加之英式教育的推行,使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日益西化。西方价值观念的时髦成为现代新加坡华人的一大特点。

欧阳春梅女士对近20年来印尼土生华人社会在教育、语言、文学、社会关系、婚姻、宗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总的而言,华人已越来越同化于当地,但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仍不愿向“原居民”认同,相反,他们更愿意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大多数华人并不准备融入到土著印尼人社会,而是寻求融入到更大范围的全球文化之中去。”^②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动向。

北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发达国家的华人则更加致力于当地化。这些国家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但是,华人为了寻求较好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接受当地的教育体制。这种主动的文化适应,使华人文化渐渐地为主体社会的“大熔炉”所吸纳。

① Teresita Ang see,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KAISA, 1990, p. 55.

② Myra Sidharta, *The Indonesian Chinese and Their Search of Identity*. “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年11月,马尼拉。

第二是继承的趋势,是一种对传统文化扬弃之后的新发展。随着现代各国华族的形成,传统文化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下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可能随着这一民族和种族群体的异域发展、甚至归化而很快消失。与此同时,华人之所以还被视为华人,就在于他们具有文化上和民族、种族上的华人特性,只有保持这种特性,华人才能结成具有较多联系、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否则,华人便不可能实际存在。二次大战以后,海外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已成为各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许多国家华人已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华族。华族是海外源于中华民族、分属于不同国家、基于共同的文化与民族、种族认同的共同体。如“马来西亚华人(族)”、“新加坡华人(族)”、“菲律宾华人(族)”、“美国华人(族)”、“加拿大华人(族)”等。即使是在一些实行同化政策的国家,华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民族、种族上都是难以消亡的。例如在印尼,政府的同化政策虽然在客观上使华人与主体社会的结合更趋密切,但是,华人仍然特色鲜明。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然而即使是有些否认泰国华人社会实际存在的学者,也在另一种场合认为:“华人是泰国的最大少数民族。”^①

我们知道,华族的存在是以民族或种族与文化两者为前提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华族发展得越好就越能加强自己的文化特性。各国华人在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这点上是共同的,但在发展的道路上是不一样的。影响各国华族发展的因素,在客观上有:所在国家对华族的政策;当地诸民族与华族的关系;地区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作用;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侨务政策;新移民现象等。在主观上则有:华族政治认同转向的必然;华族的经济实力;华族“落地生

^① [泰国]江白潮:《泰国华侨华人现状》、《二十世纪泰国华侨人口初探》,均见盘谷银行经济参考资料。

根”、全面当地化的发展需要；华族的人口素质；华族与“母族”（中华民族）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华族之间的联系，等等。

这样，华族的发展必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族群意识的发展。所谓族群意识是指作为一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民族、种族与文化意识。而所谓民族、种族意识即是一种源于中华民族的意识。所谓文化意识即是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念。这两者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众所周知，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争取少数民族地位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个要求保留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显然，当一个人的华人文化意识淡薄或消失之时，也就无所谓华人文化的存在。许多华族的有识之士竭力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正是有鉴于华人固有文化的丧失对华族发展所隐藏的危机。七十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特别强调华族文化的保持与弘扬^①，虽然政府努力推动大家树立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形象，但这一场运动并不是以否认华族价值观为前提的，恰恰相反，它是旨在弘扬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从而有利于华族发扬自己的文化。

然而，如同各国华族有别于中华民族一样，海外华人所拥有的文化也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尽一致。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各国华人面临着不同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华人传统文化在异域经历了一个被“扬弃”的过程，这种文化赖以表现的各种形式都在发生变化。例如，在中文教育方面，华文学校锐减、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趋势，以及在教材、教法及教育方针等方面的当地化。在中文报刊方面，数量减少，读者群缩小，内容从“中国化”转变为“中立化”，进而为“当地化”。在社团方面，华人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社团处于向现代转型之中，以学术、科技、文体、宗教、联谊、政治等为纽带的专业性、权益性、福利性社团不断出现。在宗教信仰方面，一部分华人

^① 《李光耀谈新加坡华人社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1年。

在皈依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一部分华人在信仰各种传统民间宗教，如祖宗诸神祇的崇拜；一部分华人则在制造新的信仰，如将儒家学术宗教化，即儒教，或以儒教、佛教、道教为基础糅合而成三教。在风俗习惯方面，作为华人的俗文化如节日、习俗、礼仪等依然得到保留，但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在减弱。此外，华文文学和华人的绘画、建筑、饮食、科技等都不是纯中国式的，而是融汇了其他民族相应的文化形态之长。华文文学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移民文学，而是作为当地文学的一部分而得到发展的；同时，华人还用非华文创作了许多反映自己传统文化的作品。

从国别上来看，各国华人文化发展的道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的程度、华人对自己文化的观点等也不一样。以东南亚为例，一般来说，当地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华人人口较多的地方，华人的文化保持较好，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相反，在政府实行限制或禁止华人文化的国家，华人文化则迅速衰落，如印尼和印支国家。

从变化过程及其程度来看，战后初期（约1945—1955年），华人文化处于空前的兴盛期。华文报刊、华文学校、华人社团等尤为活跃。到七十至八十年代，华人文化才遭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在那些排华的国家，华人文化的损失尤为惨重，有的甚至强迫消灭一切足以保持华人文化传统的标志。即使是新加坡这样华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也由于西化运动，许多人将华人文化视为包袱，致使华人文化江河日下。八十年代以来，华人传统文化又有“复兴”的趋势，在多数国家，华人文化被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对保持自己的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来坚持。

各国华人文化变迁有其相似之处，如：中华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华人文化已作为所在国文化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对主体社会文化的适应；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及华人挽救的努力；年轻一代华人文化

观念的淡化等。而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华人文化都是一种移民类型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移民从出国到侨居、从适应到发展、从归化到更大发展这一过程，并遇到文化冲击与调适、矛盾与适应的共同问题。华人有共同的文化与民族的根。

华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文化的多姿多彩的发展，使得我们难以用一个模式来笼而统之。然而，尽管华人文化变化的趋势是多向的，但其基本内核并未改变。尽管华人文化在其发展中与其他文化形态有碰撞、交融，吸收了它们的一些精华，同时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遗落，但我们所说的华人文化仍然是指建立在华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作为融合了居住国文化的华人文化的发展，是华人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

三、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发展

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华侨华人文化始终遇到这样几种文化关系的制约与影响：

一是华人(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华人(族)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后者予以前者丰富的营养，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是后者在海外的一种发扬；海外华人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种亲近感。其区别在于：现代海外华人文化已是各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融合了其他多种文化。八十年代以来，海外华人掀起了到中国的“寻根热”，这或多或少是对自己祖先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映。然而，总体来说，华人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正趋于疏淡。许多新生代华人对于祖籍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他们的“寻根”在缅怀家史的同时，更多的还是一种兴奋与好奇。在保留传统和“西

化”上,他们或许更愿意选择后者。

二是华人(族)文化与当地主体文化的关系。华人文化是一种内聚性较强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华人由于他们的自尊、自傲或自卑的心理,从而与主体文化之间采取不同的关系方式,并易于走向极端。对于邻族而言,华人由于其文化凝聚性,易于造成一种“不可同化”与“国中之国”的感觉。这样,华人文化与当地主体文化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现代各国华人也在华人文化是融入当地文化之中,还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而保留或发展之间彷徨、求索。消灭华人文化、强迫华人同化于当地文化之中,这种做法虽然照顾了主体民族或统治集团的利益,但它显然有背于人权法则,不符合国际公理。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部分华人文化融合到当地主体文化或原居民文化之中的事例,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华人文化与当地主体文化或邻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华人有权利作出文化上的选择。同时,由于文化并不只是一种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它必然反映出人们的政治倾向。东南亚的华文教育、报刊、文学、华人信仰等方面的变化首先是由于华人身分的变化。华人(族)文化与当地主体文化的关系状态也反映华人(族)与当地多数民族或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情势。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平坦的路可走,它需要相互的宽容与主动。

三是各国华人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其国际化趋向。由于散居于不同国家的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源,以及华人之间国际性文化活动的日渐频繁,华人文化具有国际化的倾向。这种文化上的国际化打破了疆界的藩篱,具有把不同国度里的华人在某种意义上联结在一起的意义。这种同源文化的相互声援与交汇无疑有益于各自的发展。不过,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仍然受到来自“国界”的强大制约。

总之,华侨华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与移植的历史,是适应当地文化并与之交流的历史,

是为华人所在国文化增添色彩和促进当地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历史。本书将从华文教育、报刊、文学、语言与艺术以及华人社团、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区建设、文献与研究等方面,力图较真实地展现散居世界五大洲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的文化历程及其风貌,使人们对世界华侨华人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章 文化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实现文化传承的最重要途径。华侨华人的文化教育从教育语言媒介来看，包括华文文化教育与非华文文化教育两种。在此，主要叙述的是华侨华人的华文文化教育，即以华文为教育媒介、在学校进行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概述

重视教育，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代代相承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最初移居海外主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注意金钱财富的积累甚于对知识的渴求。在十六七世纪的南洋地区，由于中国移民人数的增多与集聚和华侨经商者的实际需要，即形成了最初的私塾教育。最早可考的是1690年在荷印巴达维亚（即巴城，今雅加达）华人甲必丹郭郡观倡议之下兴建的“明诚书院”。这被视为华侨海外创办学校之始。自此以后，华侨华人学校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一、私塾、义学时期(约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

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校从乡庠、县学到太学的教育体系与科举取士相适应而显得十分发达,但广大农村更普遍活跃的还是以私塾、书院为基础的教育。这时海外华侨社会的教育也是以书院形式为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也有珠算等应用知识。教学语言系中国的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这种学习具有较突出的“义学”性质。

十八世纪,东南亚华侨聚居地的华文教育已颇具规模,影响日广。如在婆罗洲,“兰芳大总制”的首领“大唐客长”罗芳伯广设汉文学校,提倡读书识字。在巴城,1775年华人重建明诚书院以及南江书院,后又设明德书院。

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设置学校,如荷文学校、英文学校等,华侨感受到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气息。这时的旧式“义学”教育有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1) 义学、书院的增多。一些殷实之士尤为热心于华侨文教事业,为办学注入了活力。而且学校分布的地区日渐广泛。1819年马来亚槟榔屿华人创办五福书院(1819—1920年),是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1875年,美国旧金山市已有私塾专馆10余间,每间有学生二三十名,学费每月四五元,教授四书、古文、八股和唐诗等。1888年,美国旧金山市开设了第一家华校——中西学堂(后改名“大清书院”)。1893年,法属寮国(老挝)政府对华校采取鼓励的政策。

(2) 晚清政府介入海外华侨教育。自清廷在新加坡(1877年)、旧金山(1878年)、夏威夷(1880年)等地设立领事馆以后,即以推动当地华侨中文教育为要务。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期间(1881—

1891年),倡议设立义学和“会贤社”,以提高侨生的华文水平与修养。旧金山的中西学堂实际上就是在清朝驻美公使张荫桓的主持下创设的。1887年,清朝大臣张之洞在上疏中请求在南洋等地设书院,“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①。清廷摒弃“弃侨”政策,代之以包括关心华侨教育在内的“护侨”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华侨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3) 华侨学校教学与华侨教育的多样化。西人所办学校逐渐对华侨解禁,尤其是一些教会学校较早地接纳华侨子弟;同时,有的华文学校开始采用英(荷)中双语教学。在美国,1859年旧金山教会开办补习学校,吸收华侨学生。1860年荷印殖民地政府取消了禁止华侨入政府开设的荷文学校的禁令,不过,此时入读者大多为华人官员及富商的子女。1880年前后,三位荷兰传教士办了一个较开放的学校,许多华侨子女前来就读,学习课程有圣经、印尼文、写作、算术和绘画,高年级还学荷文,但不教中文。“中西学堂”等则既学中文,也学英文。187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辜鸿铭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是一种新型的华侨受教育形式。

(4) 新加坡办学渐成规模。新加坡是华侨在海外聚居的中心之一。十九世纪初粤闽华侨即创办了三间私塾,每间学生不过20人,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书法和珠算之类。与此同时,教会也办有学校,接受华人学童。1833年第一所容纳华人子弟的英文学校诞生了。有碑刻记载的义学,当推1852年落成的崇文阁。这是在闽籍巨商陈金声的倡导之下,由福建帮华侨集资兴办的设有私塾班的教

^① 《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转引自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三百年》,1992年版,第44页。

育机构。1854年,陈金声等人又创办了萃英书院^①,取“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书院落成后,“无论贫富子弟,咸便入学”,“每岁延师,设绛帐于左右中堂讲授,植桃李于门墙”^②,成为新加坡早期华侨兴学的一大盛举,它充分反映了华侨对子弟享受教育、成为有用之材的厚望。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左秉隆就任新加坡总领事,推广义学,使办学之风蔚然而起。较为有名的有:1885年,颜永成首创中英文并重的华英义学,开两种语文教育的先河;1889年,闽籍陈氏创毓兰书院;以及广肇惠侨商创办的进修义学,华侨公立的乐英书室,章苑生办的养正书屋。“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③ 1890年3月13日《叻报》称:“叻中书塾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多至不可胜言。”

华侨兴办学校主要是考虑其子弟久居异域,缺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濡染,会数典忘祖,成为“化外之民”,因而在置办书院等形式的义学之后,即以传授传统文化为旨趣。他们希望“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德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使华侨群体成为一个教化的社会。他们认为“不闻孔孟之遗,其于义理,茫无所窥,日以逞小忿利私囊为事,习俗如此,则风气安得而不日偷”,兴学“诚以欲求风俗之淳,则非泽其民以诗书,沃其民以礼义不可也”^④。因此,在教授的内容上也大多是儒家伦理思想,辅之以书信与算术等。

华侨义学处境维艰,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办学形式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或不足。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华文新式学堂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

① 到1954年萃英书院才并入由福建会馆主办的学校。

② 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1964年版,第40页。

③ 李钟玉:《新加坡风土记》,南洋珍本文献之一,第12页。

④ 《叻地义学亟宜创设说》,1890年6月27日《叻报》。

二、近代新式华文教育时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这一时期又可为两个阶段,即晚清阶段和民国成立至二战结束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对海外的华侨教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晚清阶段(约 1897—1911 年)

1897 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一起创办中西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这被视为近代海外华侨新式学校的开端。自此海外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南亚诸国的华侨率先进行教育改革,纷纷创办新式学校。最早创设的,在越南为 1907 年的堤岸闽漳学校;在泰国为 1908 年的曼谷华益学校;在缅甸为 1903 年的仰光中华义学;在印度尼西亚为 1900 年的巴城中华会馆学堂;在韩国为 1902 年的仁川华侨学校;在菲律宾为 1899 年的马尼拉中西学堂;在新加坡为 1900 年林文庆创设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该校还是南洋华人创办的采用中英文教学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等等。

北美地区同样加紧新式华侨学校的建立。如:1900 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均设爱国学校;1907 年加拿大的乐群义塾(1899 年设)改为华侨公立小学。

这些学校较之以前的义塾等教育形式,具有显然不同的特点。其一,它是按照新式学堂章程建立起来的。1902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海外华文教育也加以仿效。通过学校教育以灌输知识,培养华侨后代的爱国意识以及健壮国民的体质。其二,有正规的学制,如从小学到中学,1902 年的小学学制,初小为 3 年,高小为 3 年,初中为 3 年,高中也为 3 年。其三,教材与课程设置上有了新的内容,如

开设国文、外语(英文或日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史地、美术、音乐及体育等科目,绝大部分教材是从中国进口的。其四,学校由校董事会管理,比较正规化。

兴学之风一开,各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除了大都市和华侨人数较多的地方之外,在僻壤小镇、工矿垦场,只要有条件,华侨即协力置办学校。如新马地区在1911年前10余年间所建立的华校达100所之多^①。那么,为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侨学校突然蓬勃兴盛起来呢?其主要原因在于:

(1) 中国国内的兴学之风以及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量对海外华侨社会的影响。一方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亡命海外,宣传保皇,鼓吹兴学,以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另一方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遍游檀香山、东南亚各地,鼓励华侨兴学,以造就人才,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南洋诸国、日本、美国的新式华校之初设都是与之相联的。1906—1909年间,马来亚华校由同盟会控制的有30余所,另附华侨阅书报社30余个。

(2) 华侨社会内部的热切需求。民智渐开,华侨认识到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并希望通过教育既能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又使他们在保留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与气质的同时,可有较大的作为。华侨社会经济力量的提升,也使他们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此外,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晚清政府的兴学措施及其对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作用。晚清政府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赢得“侨心”,“维系侨情”,对派出的各类使臣都令他们劝侨兴学。1905年,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张振勋到达马来亚槟榔屿,出资5000元与人创办中

^①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第98页。

华学校,还将御书“声教暨南”的匾额悬挂于中华学校,并带来《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留赠该校。后来,他到新加坡,又邀请华侨殷商商议建立学校。1907年,同职杨士琦赴南洋也倡建学校,“所到各堂均酌给奖赏,以资鼓励。总期为朝廷多布一分德泽,即为侨民多添一份感情”^①。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推进侨校兴办的措施,如:

派遣海外视学专使。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知事刘士骥前往南洋视学,巡历英、荷所属各埠。1906年,学部专遣钱恂、董鸿祜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调查华侨教育,推广学部章程,力图将海外华校纳入到学部的管辖之内。1908年,清廷派梁庆桂为学务专使,往视美国各埠,会同当地华侨绅商组成学务公所,设置学堂。为了经常性地加强对海外侨校的监督与控制,清廷还专设视学员一职,常驻海外;于学部内设置专门管理海外教育的官员。视学员兼有延聘教习,统一各地华校教材,监督学校管理与教学,联络各地华校,以及组织侨生回国升学等职事。

对华侨捐资兴学进行奖励。清廷制定了《报效学费章程》,规定:“凡报效学费者,照赈捐的五成核算”,授予虚衔。南洋各地的许多华商通过捐款助学,取得了朝廷的封赏。1909年,助学奖励办法再次放宽。对于不够授衔者,则由督学之臣奖给牌匾,以光门楣。这种鬻爵兴校的措施,对于那些富裕但出身低微的华侨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

1906年,在江宁(今南京)创办暨南学堂,接受南洋华侨子弟回国求学。暨南学堂初为补习性质,1908年改为中学,附设高等小学。学堂每年将所接受学生的人数、姓名、科目、成绩等列表送巴城中华会馆张贴。暨南学堂的创办和它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吸引南洋优秀生源入学,对于推动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至1909

^① 《政治官报》第6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八日。

年,暨南学堂共收侨生 157 人。

可见,华侨教育的兴起既是华侨社会力量增强,日益走向自觉、成熟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华侨在民族主义热潮刺激下,中国政治归属感不断强化的大势使然。

(二) 民国成立至二战结束阶段(1911—1945 年)

鉴于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突出贡献,以及华侨社会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民国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管理华侨教育的体系。

1912 年,政府颁布《领事管理华侨学务规程》,以中国驻外领事负责指导、考查华侨学校。1913 年,教育部又颁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鼓励并优待华侨子弟回国升学。1927 年,民国大学院特设华侨教育委员会以管理和指导华侨教育。“侨务委员会”成立后,有关侨教事宜归其办理。

1929 年,在上海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确定华侨教育的方针、实施办法等。会议由国立暨南大学召集,与会代表共 78 名,有 67 人分别在国内外侨校任校长或教员,余为侨务工作者。国外代表均来自南洋各华侨学校、学术团体、教育机关及其他与学术教育有关系者。同年,民国政府召开了华侨教育会议,通过有关议案 25 件。教育部对发展华侨教育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全部计划分为 6 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的内容就有:在促进华侨教育行政方面,成立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调查华侨教育状况和华侨教育经费,责成领事兼管华侨学务,督促华侨学校立案;在推行华侨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颁布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办法,奖励华侨捐资办学,提倡华侨民众教育,等等。此后,教育部又陆续设立了一些华侨教育机构,如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南洋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侨民教育函授学校,华侨教育总会筹委会,回国升学华侨学生临时接待所等。

1931 年,政府颁布《华侨中小学规程》,规定:“华侨中小学,应遵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中普通教育之原则,根据华侨特殊环

境,并依照学生身心发育之程序,培养民族意识,自治组织能力,及改良生活,发展生产之知识技能。”

1933年,政府制定了侨民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侨教的方针是:“(甲)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标准;(乙)依各地之特殊环境,实施方式以不受事实之牵制,务达到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及改善生活、增进生产能力为目的;(丙)以文化合作之精神,与各居留地政府共谋侨民教育之发展”^①。1934年,中国侨委会和教育部颁布了三项有关海外华侨学校的条例,即《侨民中小学校董事会组织章程》、《侨民中小学规程》和《侨民学校立案规程》。

凡此种种举措,使南洋华侨社会感受到了强劲的来自中国的兴办教育之风。民间许多进步团体和组织也纷纷派遣优秀人才远涉南洋,开展侨民教育。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南洋华侨社会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南洋一带如印尼、马来亚等地相继成立了学务总会、教育研究会和中华会馆等团体,竭力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1935年,中国侨委会统计世界各地的华校共有1969所,具体分布见下表。

至1947年,海外华侨学校数已达3465余所。不过,民国期间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1911—1926年为第一阶段,设立的侨校有小学、中学,还增加了职业课程和师范班,有的还附设幼稚园,门类渐趋齐备。最先办的华侨中学有:马来亚檳城的中华学校(1904年),印尼泗水的华侨中学(1910年)和巴城的华侨中学(1912年),新加坡的华侨中学(1919年),泰国曼谷的培英中学(1921年),美国旧金山的圣玛丽中文中学(1922年),菲律宾的华侨中学(1923年)。1905年马来亚檳城中华学校的师

^① 转引自张正藩:《华侨教育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5页。

1935年世界各国华文学校统计表

国家或地区	华校 数(所)	占总数的 百分比	国家或地区	华校 数(所)	占总数的 百分比
亚洲	1840	92.9	英属西印度	1	0.05
英属马来亚	658	33.4	美洲	70	3.5
荷属东印度 (印尼)	499	25.3	美国	42	2.1
缅甸	258	13.0	加拿大	18	0.9
泰国	137	6.9	墨西哥	1	0.05
越南	116	5.8	巴拿马	1	0.05
菲律宾	80	4.0	古巴	1	0.05
英属北婆罗洲	60	3.0	秘鲁	5	0.25
葡属帝汶	3	0.1	巴西	2	0.1
日本	11	0.5	欧洲	1	0.05
朝鲜	15	0.76	英国	1	0.05
印度	3	0.1	大洋洲	3	0.15
非洲	8	0.4	法属塔希提	1	0.05
南非洲	7	0.35	澳大利亚	2	0.1

资料来源: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第256页。

范传习所是华侨师范教育之始。1923年,新加坡养正学校附设有四年制的师范班。1912年创于菲律宾怡朗的乙种商业学校,是最早的华侨职业教育。1908年马来亚吉隆坡的坤成女学、1911年新加坡的中华女学是最早的华侨女子学校。与此同时,男女同校也渐成风气。1921年新加坡的星洲幼稚园是最早的华侨幼稚园。

1927—1945年为第二阶段,华侨教育在挫折中奋起,以求生存。1929—1932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华侨经济深受影响,东南亚殖民政府制订限制华文教育的政策,以及1941—1945年南侵日军对华侨的蹂躏等,使华侨教育遭受巨大损失。如新加坡在沦陷前华校数达351所,学生37500人;沦陷后只有21所,学生2081人。

三、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的演变时期(1945年迄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影响华侨教育发展的三大外部因素。由于成为所在国公民的华人及其后裔的力量的壮大,并渐渐取代以老一代华侨为主的族群,华侨教育也已转化为华人教育。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 空前兴盛阶段(1945—1955年)

据统计,1954年海外华文学校总数为4376所。从类别来看,专科以上学校8所,中学357所,师范学校7所,职业学校27所,小学3734所,民众补习学校192所,其他学校51所。从分布的地区来看,亚洲(含香港、澳门地区)4171所,美洲88所,大洋洲73所,欧洲3所,非洲41所。从注册立案的情况来看,已注册立案的华校1975所,未注册立案者2401所^①。较之战前,这些数字均有了较大的增长。

很显然,华校集中在华侨人数较多的亚洲地区。总体而言,华文教育的水平并不高。华文小学占学校总数的85.3%,中学占8.15%,专科以上的只占0.18%,其他(含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民众补习学校等)占6.32%^②。华校基本上只能适应华侨子女初等教育和部分中等教育的需要,如果要获得高等教育,他们不得不到中国或欧美等地。同时,这些华校多为私立学校,在教学内容、师资、教法、学校管理与经费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

^① 台湾华侨志编委会:《华侨志·总志》,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282页。

^② 高信:《华侨的时代使命与努力方向》,台北华侨出版社1967年版,第41页。

战后初期海外华文教育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它主要是由于:(1)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保持中华文化、兴办华文教育的积极性。(2)战后国民党政府为争取华侨,提出了华侨教育方案施行办法,如设立训练所训练海外师资,饬令各使领馆向当地政府交涉给予华文教学上的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5年前,沿袭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和争取华侨子女回国升学。这样,华校对于华侨子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3)战后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无暇顾及华文教育问题,有的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承认华校的自由发展。

华文教育是向华侨青少年灌输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最有力工具,基本上是一种以中国和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它促进了华侨社会的内聚力,甚至使土生华人社会也部分地“再华化”。同时,它对于华族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其文化素质的提高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 危机与衰落阶段(1955年至八十年代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海外华文教育危机日趋严重,使之从发展的巅峰期走向衰落。据统计,全世界(含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华文学校数1954年有4376所,1964年为4901所,1965年为5074所,到七十年代减至3077所。据1970年台湾“侨委会”的统计,在“侨委会”立案的华文学校有1836所,另外的有2515所。其中亚洲地区4240所,约占总数的97.45%;美洲地区65所,约占1.5%;欧洲地区3所,约占0.07%;大洋洲地区7所,约占0.2%;非洲地区36所,约占0.83%。各地侨校老师约5万人,学生120万人。^①

华校数量的下降是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日益不利的环境、华文教育性质的转换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这时华文教育的变化主要

^① 刘真:《华侨教育》,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页。

表现在：

华侨教育对象的变化。1955年，中国正式宣布废除双重国籍的政策，这有力地促使华侨大量加入当地国籍，从而使他们政治效忠的对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政府还鼓励华侨子女入当地学校，而不必回中国深造。从此，海外华文教育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培养中国公民，而是为了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当地公民。这种教育宗旨的变化必然使原类型的华文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如不及时调整思路，华文教育的衰落将加快到来。

占海外华校总数95%以上的东南亚国家对华校采取限制、排斥乃至打击的政策。1949年后，泰国政府即严格管制华校；后来又规定，1957年前后未经注册的华校一律取缔。菲律宾华校迫于压力而推行“菲化”运动。六十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封闭华校，致华校于绝境。缅甸、马来西亚华校实行“国有化”。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华校则全部停办。

华文教育结构的矛盾。诸如师资缺乏、经费窘困、教材与教法的落伍，加之华校内部的分裂等问题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同时，由于“华文教育无用论”的盛行，使华校的生源大受影响。

诸种因素的作用，使华文教育的衰落在所难免。华文教育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支撑着。

（三）“复兴”的阶段（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起，由于东南亚经济的活跃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华文的实用价值大为提高，海外兴起“华文热”，一些国家开始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这些对于华文教育一定程度的复苏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海外华人的华文教育大致有五种类型^①：

^① 周南京：《菲律宾与华人》，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93年，第293页。

(1) 仍能维持正常的华文教育者。如日本、韩国、南非等国华文学校仍合法存在;还有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小学。

(2) 华文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体制者。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课程自编教材。

(3) 华文教育受当地严格管制者。如菲律宾和泰国等。

(4) 华文学校教育被取缔、消灭者。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①

(5) 补习性质的华文教育。如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欧洲等地区。

当然,在有的国家华文教育兼有两三种类型,如马来西亚既有国民化华文学校,又有华文独立中小学;新加坡已无华文学校,但华文教育依然存在。华文教育作为一种民族语言与文化的教育是不会立即消失的,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并发展下去。

(四) 当代中国的华侨教育

1949年以后,中国国内的华侨教育经历了不平静的发展历程。1949—1966年间,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华侨高等学校、华侨函授部、华侨中专、华侨补习学校、华侨中小学、华侨农场学校和侨办学校等组成的分布较广、门类齐全的华侨教育系统。“文革”期间,这一特殊的教育受到冲击。1976年以后才又见春天。

综观当代中国华侨教育,可分为国家兴办的华侨教育和华侨华人捐资兴办的教育事业。在此,主要介绍一下国家兴办的以华侨华人子女为对象的文化教育。

据统计,1949—1965年间中国政府接待的华侨学生有84000余人,1978—1981年间有6万人。前一阶段的华侨学生主要来自印度

^① 八十年代末,印支三国、缅甸的华文教育出现转机,当局允许在学校教授华文,各种类型的华文补习越来越多。

尼西亚、马来西亚(含新加坡)、泰国、缅甸、日本、菲律宾等国;后一阶段则大多是印支难侨学生,以及泰国、朝鲜、日本、毛里求斯等国侨生。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华侨教育事业。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和国家教育部发布通知,指出:“辅导侨生回国升学,是国内教育建设中培养人才工作的一部分,各级教育部门应把它列入教育规划之内。”中侨委在北京、厦门、广州创办了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随后华侨高等教育也得到发展。早在1951年9月,南方大学就设立了华侨学院。1956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海外华侨函授部。1958年,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1960年,在福建泉州创办华侨大学。1963年,创办了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七十年代以来,北京、厦门、广州、汕头等地又兴办了中国语言文化学校。其中,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是两所最重要的“侨”类学校。

第二节 亚洲地区的华侨华人教育

亚洲历来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尤以东南亚地区为多。相对地,与其他地区相比,华文学校创办时间最早,学校数量最多,教学体制正规,教学水平较高,华文教育的热情也最高。下面分国别介绍。

一、“东盟”国家的华文教育

(一) 菲律宾的华文教育

菲律宾的华文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

第一个时期为殖民地时代的华侨教育(1899—1946年)。1899

年,在中国第一任驻菲领事陈纲的倡议和广大华商的支持下,菲律宾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创办开学,初为单一的中文学校,1902年起始授英文,“至是始名副其实,而学生就读者亦日多”^①。该校除设日校外,还开办夜学部,同样分设中文部和英文部,与日间学生使用相同的教材,还增设了簿记班、打字班等技能性课程。1911年中西学校脱离善举公所而独立。1914年,在中西学校校董会的倡议下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教育委员会,旨在推动马尼拉乃至全菲的华侨教育。该会章程规定:凡本埠华侨稠密之区,有设立学校者,本会仍为提倡或设立之;对于所设立或承认之学校,负责筹备经费及监督所有开支责任。这年中西学校的日夜学生已达600余人。1917—1929年间,华侨教育委员会属下有:华侨中学校、第一小学校(原中西学校)、第二小学校(原粤侨公学和爱国学校合并而成)、第三小学校(原普智学校)和第一女校。

1915年,华侨爱国小学创立。此后,菲华社会创办华校蔚然成风。1917年,吕宋岛一年创办华校20余所。1923年设立的华侨中学是全菲最早的一所侨办中学。1939年,王泉笙等人设立的中正中学,是全菲规模最大的侨校。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全菲约有侨校六七十所。1942—1945年,日军侵占菲岛,侨校全部停办。关于1899—1946年间菲律宾先后成立的华侨中小学数参见下表。

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当局对私立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华侨学校可以自由安排师资、教材与教法。师资多聘自中国,课程依中国学制编排,用中国课本。小学加授英文。华侨教育委员会还令所属学校用普通话教学,改变以前用方言教学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华侨学校的设立多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经当地华侨协商而办的。除马尼拉、宿务、怡朗等较大都市外,许多地方是一地一校。吕宋岛以

^① 《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刊》,1949年,第103页。

1899—1946年间菲律宾华侨学校统计表

地 区	学校数(所)			占全菲华校总数的百分比
	中学	小学	共计	
马尼拉区	9	10	19	28.3
北吕宋区	4	3	7	10.4
中吕宋区	2	4	6	8.9
南吕宋区	1	4	5	7.4
吕宋岛米骨区	4	4	8	11.9
西米赛亚区	5	3	8	11.9
东米赛亚区	1	2	3	4.4
南棉兰老区	4	1	5	7.4
北棉兰老区	4	2	6	8.9
总 计	34	33	67	100%

资料来源:① 陈烈甫:《菲律宾华侨教育》,台湾华侨教育丛书,1958年。

② 《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刊》。

外的各地也成立了华侨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当地华校,使之发展井然有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个时期为独立后华文教育的发展期(1946—1976年)。1946年,菲律宾独立,这对该国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菲两国缔结友好条约,规定对相互在对方开设的学校予以合法保障。随之新设华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46—1955年间,新立学校有50余所。其中1947年有华校149所。据统计,1962年有完全中学19所,初中33所,小学173所。1966年,有华文中小学159所,师范专科1所,女子职业学校2所,共计162所,在校学生达6万人。至1969年末,有独立学院1所,中学26所,职业学校2所,小学152所,有教职员工2007人,学生66074人。①

① 以上数据均见朱敬先:《华侨教育》,台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6页。

1955年,马尼拉中正中学创办华侨师专,这是全菲第一所华侨办大专学校。1960年改称中正学院。1965年增为四年制学院,并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两地立案。1969年,该校有学生2884人,是菲律宾各华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设中国语文、历史、会计、企业管理及银行财务五系。

该校外,学生在2000人以上的学校还有灵惠中学、圣公会中学、育仁学校。其他规模较大的学校有:马尼拉的华侨中学、尚一中学、培元中学、嘉南中学、圣军中学、中山中学;宿务的东方中学、圣心中学;怡朗的中山中学;以及纳卯中华中学,东棉省加牙鄢光中华中学,三宝颜中华中学,古达描省中华中学,蜂省达古板大同中学,礼智兴华中学,甘马仁省华英中学,描戈律大同中学等。

菲律宾华侨中学,简称侨中,1923年由菲律宾华侨教育会创办,首任校长周行健。1936年,学制实行三三制,中英课程分立。日军侵占时期停办。1945年,该校首先复校复课,并设英文中小学,旋经菲政府私立教育局核准立案,形成中英课程双轨制。1966年,设加洛干市分校,并附设小学,1983年分校学生达2800余人。1975年改名菲律宾文化中学。1983年重建校舍,学校附设托儿班、幼稚园及小学部。1988年更名菲律宾侨中学院,1990年有学生4500余人,教职员308人。侨中的校歌唱道:“君不见,海水苍茫,云烟飘渺,南洋巨岛间,吾学校于斯造。输旧化,纳新潮,育群材,表率侨胞,勉为中外文明作向导”^①。一部侨中史也是菲华校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华校联合会在组织、联络、协调各华校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如马尼拉市及市郊的华侨学校联合会,以及1949年成立的棉兰老及苏洛区中小学联合会,1950年成立的中吕宋区华侨学校联合会。其他如米骨区华侨学校联合会(1955年成立),南吕

^① 《菲律宾文化中学(侨中)创校六十周年纪念刊》,1983年。

宋区华侨学校联合会(1955年成立),北吕宋区华侨学校联合会(1956年成立)。1957年,召开全菲侨校代表大会,成立了全菲华侨学校联合总会,目的在于规划全菲华校的发展,推广华人教育文化事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

“双轨学制”是这个时期华侨学校的主要特点之一。“双轨学制”即上午依照侨民学校课程标准,上中文课;下午遵照菲私立教育局规定,上英文课。学制小学6年,中学4年。在双轨学制下,一个华校学生同时要读两种课程。中文教材从中国购买,教师多从中国聘请。英文则采用菲教育部编订、美国印刷的教材,教师以菲律宾人为主,有少数美国人。侨校的校长多为华人。中小学的中文课程分别为:小学有语文(国语、文法、书法)、社会科学(公民、常识、历史、地理)、算术、劳美音(手工、图画、音乐)等;中学有公民、国文(读书与作文、文学与文学史)、社会科学(中国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教育学)、数学(算术、代数、几何、解析几何)、自然科学(博物、化学、物理、生物学)、劳音美(劳作、音乐、美术)等。

1955年,菲政府以防范左倾分子渗透为由,更加严厉地监察华校。独立后不受监督的华校华文部,同样也要受菲教育部督察;华校的英、菲文授课时间增加。华校开学前,须将中文课程、上课时间表、教职员名册及所任科目、学生名单等具报菲私立学校教育局核准。于是,一些侨校自动改为专办英文部的学校,附设中国语文课程。

第三个时期为“菲化”以后的华文教育时期(1976年以后)。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建交,接着菲律宾实行华侨学校菲律宾化。早在1973年,菲政府公布新宪法,确定对外侨学校实施菲化政策,规定:“教育机构应完全由菲公民,或由菲公民的资金占60%的社团所有;应由菲公民控制和管理教育机构;不许建立完全为外侨的教育机构。任何外侨学生不得在任何一间学校中占学生总数的三分

之一以上。”^① 并规定以 3 年为过渡期。1976 年华校全部菲化。

菲化的内容包括：学校各部的主持人均由菲律宾籍华人担任；董事会成员 60% 须为菲籍；凡以“中国”或“中华”为名称的学校一律改名；须开设全部英、菲文课程，讲授华文课（含读书、写作、生活伦理与中国史地）每周 10 小时；学校升菲律宾国旗，唱菲律宾国歌。侨校的“菲化”是华文学校的一个质的变化。教育目标从过去的面向中国转为面向菲律宾，培养具有谋生技能，能在当地较好地生存与发展，同时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相对而言，非政府对华校的华文教学采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允许菲华校与中国在教学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华校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仍有所发展。1989 年，全菲仍有华校 127 所，学生约 5 万人。^②

然而，华文教育的水平在急剧下降。1969 年对 2190 名华校生调查发现，能流利讲普通话者占 32.9%。1989 年对 318 名华校生调查发现，能流利讲普通话者占 24.4%，一点都不会者占 17.06%。而他们的英文水准则大有提高。华文教育在课程、课本、教师待遇以及学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亟需解决。有鉴于此，华人社会的传统社团、华文学校及教师组织积极推动华文教育的改革，扶持华文教育事业。如组织专家编写适合当地社会生活环境的教科书，加强与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华文教学的交流，采用第二语言教学法等；或设立各类基金，如“福川基金会”、“华文教师奖励基金”、“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等均支持华文教学。菲律宾华文教育将在改革中获得发展。

（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 40% 以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

①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90 页。

② Lily Thua, *Chinese School—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ulay Vol. 1, No. 1, 1989, p. 19.*

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

1. 独立前的华文教育时期(1957年以前)

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所华文私塾是1819年檳城的五福书院。1884年,海峡殖民地计有115所华侨学堂。1888年闽、粤籍华侨共同创办的南华义学是马来西亚最早设立的华校。1904年,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学堂诞生。1907年,陆弼臣等人创办吉隆坡尊孔学校,首任校长为聂沙云,初有学生70人。1908年,吉隆坡坤成女校成立,首任校长钟卓京,学生20人,开设华文、信札、算术等课程。1911年,沙撈越古晋创办福建义学,这是该地最早的华侨学校。1912年,亚庇设立乐育小学,这是沙巴最早的华文小学。

二十世纪初叶,英属马来亚政府对华文学校采取不干涉政策,任其自生自灭。华校发展较快。1911—1920年间,马来亚联合邦共有华校181所,海峡殖民地有华校313所^①。较有代表性的学校有:

1912年创办的檳榔嶼钟灵学校、华侨中学,吉打的中华学校,双溪大年的新民学校,巴生的中华学校,麻坡的中华学校,峇株巴轄的启蒙学校。

1913年创办的马六甲培风学校,柔佛新山宽柔学校,霹靂古楼南华学校,红毛丹达才学校,芙蓉中华学校,安顺培华学校。

1914年创办的吉隆坡循人学校,波德申中华学校,霹靂和丰兴中华学校,柔佛新山新民学校,太平修齐学校,沙撈越诗巫的竞南小学。

1915年创办的巴生的青年学校。

1916年创办的雪兰莪万撓三育公立学校,马六甲的培德女校,怡保的劝业女校,诗巫的华侨公立光华中学,明德国民学校(1919年易名为中华学校)。

^①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1年,第26页。

1918年创办的巴生中华女校,雪兰莪加影育华学校,居銮中华学校,大山脚日新学校,吉兰丹中华学校。

1919年创办的吉隆坡文良港中华学校,巴生共和学校等。

这些学校多为小学。小学之上增设中学者始于1916年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华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和办学宗旨等多与中国的学校无异。1920年,沙撈越华侨学校一致决定放弃方言教学,采用普通话进行教学。

二十年代兴办的中学有:檳城钟灵中学(1923年)、吉隆坡尊孔中学(1924年)、怡保育才中学(1924年)、吉隆坡坤成女中(1927年)等。另有许多幼稚园及各类职业学校。

1920年,英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董事、教员等注册法令》,规定凡学生在10名以上的学校都要注册,学校教材由殖民当局审定,教职员须注册,凭照从业;当局有随时封闭学校的权力。旨在以此对抗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反帝思想的传入。华校进入了受殖民地政府管制的发展阶段。

该法令颁布后,立即有10余所华校被取缔。1925—1928年间至少有315所华校被取消注册。华校联合组织反抗该法令,但未见预期效果。英政府教育署在1924年、1931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增设副教育提学及华校视学司,专门视察华校事务,英政府对华校施行贴金制度。

1931年,檳城钟灵中学率先创设高中班级。据统计,15岁以上的华人,1000人中识华文字者有407人,识英文字者有37人。1932年海峡殖民地有华校325所,教师1069人,学生22028人^①。1937年,这里的华校有477所,教师1809人,学生40193人^②。同年,海峡殖

①②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教育》第二辑,1984年。

民地和马来亚联合邦华人中,英校生占学生总数的 17.6%,而华校生占 82.4%^①。1938 年柔佛州有 245 所华校,有学生 14423 人。1941 年,日军侵占前夕有华校 370 所,学生 38000 人。^②

这些华文学校的特点是,首先,照搬中国的学校模式,学制、课程仿效中国,课本、图书、仪器购自中国,教师大多来自中国。其次,华侨学校华侨办,由于华校得不到政府津贴,办校经费只好由华侨捐赠。华侨办学被视为华侨社会的一件大事。

1941 年,日军入侵马来亚,华校被迫悉数停办。1945 年才又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1946 年,马来亚联合邦就有 1103 所,学生达 17 万余人。华校主要集中在柔佛、霹雳和雪兰莪三州。有的地方几所规模较小的学校进行联办,名为华联小学或华侨小学。1947 年,在全马华人所受教育中,以华校生为最多,其次为英文教育和马来文教育。1948 年,沙捞越华人有 145019 人,华文学校有 205 所,平均 700 余人就有一所华校,华文教育的普及水平可见一斑。诸如吉兰丹、沙巴等原来华校较落后的地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华文教育的发展情形可参见下表:

1946—1956 年间马来西亚华校情况表

年份	学校(所)	学生	教员	年份	学校(所)	学生	教员
1946	1105	172101	4513	1952	1203	239356	6057
1948	1364	189230	5337	1954	1236	252312	7035
1950	1319	216465	6245	1956	1325	320168	8435

资料来源:转引林水權、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第 309 页。

①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育史》,第 35、39 页。

② 许云樵、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 年》,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1984 年版,第 52 页。

在华校组织上,1946年,吉隆坡尊孔校务委员会主席林连玉发起成立吉隆坡华校教师基金。1949年成立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首任主席余思庆,1950—1960年林连玉任主席。1950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成立。它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应为国民教育的一环,谋求华教界的福利,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该会主席由各教师公会轮值,首届主席为檳城华校教师公会主席陈充恩。1954年,另一华校重要组织——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成立,旨在团结华人社会力量,共谋改善与促进华文教育;代表学校董事会与政府商讨有关华校事务。“教总”、“董总”与马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并称华教三大机构,积极捍卫华文教育。

五十年代初,华文教育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时期。英国人在退出马来亚之前蓄意留下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根源。1951年发表的《巴恩报告书》主张废除各语文源流学校,以采用英文和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学校取代其他民族学校,华语只是学校的一个科目。这对华校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同年,威廉·芬与吴德耀博士受邀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并发表《芬吴报告书》,支持华文教育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有利于促进马来亚国民团结,并促请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华校的津贴。但1952年颁布的“教育法令”,把华文列为第三种语文,华文学校被排斥于国家教育系统之外。有人称之为“独立前最受诅咒的‘1952年教育法令’”。^①

1954年,马华公会和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代表华人社会向政府提呈《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育备忘录》,以示对新教育法令的不满。“教总”也向政府呈交请愿书。此举得到广大华校的支持。次年,马华公会、“董总”、“教总”联合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各族孩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免费小学母语教育;公平对待各语文源流学校;把华文列

^① 王秀南:《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0年。

为官方语文；摒弃国民学校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华人要读中国书，认识中国字。”^①

1955年11月，马来亚联合邦“教总”举行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并发表宣言，一方面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另一方面提倡华文教育，发扬华人的文化。宣言最后指出：“学习华文，接受母语母文的教育，这是马来亚每一个华人应有的权利，同时也是每一个华人应有的义务。”^②

同年，林连玉率“董、教总”代表团与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代表团举行“马六甲会谈”，结果，联盟同意取消1952年教育法令，并重新厘订对各民族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

1956年，政府颁布《拉萨报告书》，旨在建立一个以马来文为官方语文，同时保存和发扬非马来人的语言与文化的国家教育制度。这样，华文小学称为国民型小学，但对华文中学的地位则规定不清。这种国民教育政策，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影响华校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2. 独立后的华文教育(1957年以后)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立法议会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以推行国民教育制，强调华文教育必须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又有《达立报告书》(1960年)和1961年教育法令，迫使华文学校改制。华文小学由国家提供资助，实行免费教育。华文中学或接受政府全部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简称“国中”)，除语文课外，其他课均用马来语或英语教学；不接受政府津贴者成为独立中学(简称“独中”)，继续使用华语教学。此后的华文学校实际上只包括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独中”被逐出国家教育体系。

^① 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马来西亚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1957—1969年间华文教育处于低落状态。华校初中会考和华文中学升学被废止。华校数、学生人数逐年递减。参见下表：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统计表

年份	独中总数(所)	学生总数	年份	独中总数(所)	学生总数
1961	72	17948	1967	59	22221
1963	84	35789	1969	45	18476
1965	73	30470			

资料来源：转引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第312页。

这种限制政策反而刺激了华人社会的民族自尊心。1958年9月和1959年4月，在“教总”主席林连玉的领导下，分别召开了全马华文教育大会（也称“怡保大会”）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也称“吉隆坡大会”），通过了《马来亚联合邦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和《马来亚联合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要求：（1）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2）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1960年以后，林连玉等提出了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可以被剥夺，但独立中学不能不办。

1962年，“教总”召开“独中”校长座谈会，提出“独中”“能生存，有发展”。七十年代初，由“董、教总”及热心于华校的校友组成董总全国华文独立发展工委，配合各地华教人士，积极负起复兴“独中”的重任。1973年4月，从霹靂州开始，开展了一场迅速扩展到马来西亚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由于华侨华人的不懈奋斗，华文教育又有了一定的回升之势。

1974年，“独中”学生有22000人，1978年有29700人，1982年有36200人，1983年有45890人^①。八十年代末，华文“独中”已有60所，学生44656人。参见下表：

^① 林水椽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第313页；刘崇汉：《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八桂侨史》1993年第1期。

1989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一览表

校名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创校年份	创办人
吉隆坡尊孔独中	941	32	1906	陆弼臣等
吉隆坡坤成女中	1775	49	1908	吴雷华
怡保育才独中	936	33	1908	胡士春等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276	33	1911	陈英垣等
江沙崇华独中	412	18	1911	华社
麻坡中化中学	1482	50	1912	华社
金宝培元独中	539	41	1912	吴锡爵等
巴生中华独中	831	30	1912	吴彩玉等
芙蓉中华独中	2229	71	1913	李俊承等
马六甲培风中学	1742	55	1913	陈齐贤等
新山宽柔中学	5352	166	1913	黄义初等
波德申中华中学	847	25	1914	陈事甫等
吉隆坡循人中学	1129	32	1914	惠州会馆等
檳城钟灵独中	800	25	1917	陈新政等
居銮中华中学	3042	78	1918	章文双等
大山脚日新独中	1428	45	1918	朱步云等
吉兰丹中华独中	357	14	1918	黄玉斋等
檳城檳华女子独中	16	6	1920	华社
笨珍培群独中	595	21	1922	余英伟
巴生滨华中学	671	31	1923	陈北平
安顺三民独中	477	21	1929	华社
利丰港培华独中	601	24	1929	蔡敬三
亚罗士打新民独中	510	39	1935	陈登有等
实兆远南华独中	1073	41	1936	华社
太平华联独中	736	31	1937	杜荣和等
吉隆坡中华独中	3253	80	1939	陈仁顺
峇株华仁中学	1772	61	1940	粘东生等
檳城菩提独中	110	8	1941	慈航法师等
古晋中华一中	1887	62	1945	乡团
诗巫建兴中学	64	5	1946	林开臻
巴生兴华中学	1633	56	1947	师生、家长

(续表)

校 名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创校年份	创办人
檳城 韩江 中学	895	48	1950	林连登
新文龙 中华 中学	385	17	1951	郑振中
诗巫 光明 中学	183	9	1952	华 社
诗巫 开智 中学	33	4	1952	江郑铨等
怡保 培南 独中	1438	47	1955	福建会馆
巴生 光华 独中	308	18	1956	郑天祥
永平 华文 中学	700	22	1957	华 社
双溪大年 新民 独中	104	8	1957	林栋臣等
怡保 深斋 中学	884	35	1958	胡曰皆
古晋 中华 三中	455	20	1958	华 社
诗巫 公教 中学	1376	57	1960	教 会
古晋 中华 四中	254	10	1960	陈水皎等
美里 培民 中学	626	24	1962	谢晋新
山打根 育源 中学	651	37	1962	魏亚贵
诗巫 公民 中学	117	9	1962	江仲宵
班台 育青 中学	440	15	1962	蔡允拿
沙巴 建国 中学	695	26	1963	刘养正
斗湖 巴华 中学	1279	54	1964	婆华公会
丹南 崇正 中学	186	10	1965	客属公会
沙巴 崇正 中学	2242	82	1965	沙巴客总
沙巴 保佛 中学	106	9	1965	詹尊华
沙巴 吧巴 中学	76	8	1965	蔡贞瑞等
诗巫 黄乃裳 中学	254	10	1967	刘贤任
石角 国立 中学	135	6	1967	张君光
泗里奎 国立 中学	79	8	1967	华 社
西连 民众 中学	31	4	1968	蔡度固等
美里 廉律 中学	284	20	1968	蔡通宝等
沙巴 拿笃 中学	243	12	1969	涂元贡等
古达 培正 中学	180	11	1969	杨紫峰

资料来源:1990年1月22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华文“独中”学制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独中”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马来文、英文为必修课，“独中”统考文凭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内部改革，如改善办学条件，开设应用性课程，以加强人才竞争能力。华文中学举办统一考试。

“独中”的发展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华文教育权利，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的精神。“独中”的所有经费来自于华人社会。经费、师资短缺，独立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等一些问题仍然困扰着“独中”的发展。

华文小学在独立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80年，政府在各华小实行3M制度，规定华文小学除华文科、算术课本为中文外，其他科目以马来文为主。华社组织立即表示抗议，在提呈教育部的“备忘录”中要求：(1)除了马来文及英文，所有教学与参考资料都必须使用华文书写；(2)除了马来文与英文，其他科目的授课媒介语与考试都必须用华文；(3)道德教育与音乐科目必须反映华人文化特色；(4)增加英文授课时间。1980年国民型华文小学有1312所，学生581696人。

据统计，1984年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有1296所，学生588836人，正规教师20588人，临时教师4689人。在这千余所华小中，西马有981所，东马的沙撈越有229所，沙巴有86所，其中90%以上是1957年独立前由华人社会创办的。华小的地产权有50%属华校董部，36%属于政府，其余由私人或其他机构拥有。详见下表。

(三)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华文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与良好的基础。十九世纪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私塾性质。1905年，吴寿珍、陈楚楠等人发起成立的养正学堂(后改为崇正学校)是最早的新式学校。接着有广肇，1906年成立的应新、启发、端蒙，1907年成

1984年马来西亚各州华文小学校数和学生人数表

州	学生人数	校 数
霹 雳	100368	190
柔 佛	96099	217
雪兰峨	67944	99
檳榔嶼	60413	90
沙撈越	57811	229
吉隆坡	50164	40
吉 打	31031	90
彭 亨	30288	75
森美兰	29268	82
沙 巴	29115	86
马六甲	23231	65
吉兰丹	6195	13
玻璃市	3731	10
丁加奴	3178	10
总 计	588836	1296

资料来源：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第556—557页。

立的道南，以及1910年成立的育英等学堂。民国初，这些学堂均改称“学校”。这些学校的校舍，有的租赁店铺或住宅，有的借用会馆。

由于中国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华侨社会对女子教育也开始重视，先后有培根（1910年）、中华（1911年）、崇福（1915年）、崇本（1916年）、南华（1917年）、南洋（1917年）等女校成立。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在陈嘉庚任该校总理期间，致力于废除方言而采用普通话教学，成为新加坡第一所以普通话教学的小学。中国“五四”运动后，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学校采用新编教科书，课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文教育的发展情形可参见下表：

1929—1938 年间新加坡华文学校统计表

年 份	学校(所)	学生数	教员数
1929	204	14531	636
1930	209	14642	684
1931	190	12326	644
1932	215	13315	698
1933	240	14231	705
1934	269	16693	814
1935	286	18610	943
1936	285	21821	1047
1937	308	24092	1119
1938	329	28411	1299

资料来源:王秀南:《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 1970 年,第 157—158 页。

1940 年,新加坡华校有 351 所,学生有 34947 人;1941 年,华校有 370 所,学生 37500 人,教员 1563 人^①。学校的类型已比较完备,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和师范班以及各类职业教育、女学等均有。华文小学在各类学校中数量最多。1912—1941 年间成立的华小有 300 余所,其中受政府津贴的不过 40 余所。

华侨幼儿教育相对发展较晚。1921 年成立的星洲幼稚园为第一家幼儿园,此后又有崇福女校幼稚园(1932 年)、南洋女中幼稚园(1934 年)、建国幼稚园(1938 年)等。

1919 年,陈嘉庚等倡办的“星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揭开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的光辉一页,华侨教育开始由初等走向中等,并打破了帮派界限。陈嘉庚任该校总理(后称主席)达 13 年。李光前于 1934 年继任,达 21 年之久。此后相继成立的有南华女中、中华女中、南洋女中、育英、端蒙、光洋、公教、德兰、树群、中正、圣婴、圣尼各拉等中学 13 所。1930 年,南洋女子中学扩改为三三制高初级中学,是第一所增

^① 参阅唐志尧:《新加坡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 1950 年印行。

设高级中学的华文中学。嗣后增办或创立高级中学的有：华侨中学（1938年）、中正中学（1939年）、公教中学（1940年）等。

1929年，道南学校代表参加上海暨南大学召开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发表提案要求：（1）中国教育部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增设国语学校；（2）南洋各华侨学校应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为了打破地方帮派观念，提出了发挥南洋各地教育总会的作用的建议。同年，福建会馆属下的5所华校全部用普通话教学，并于1930年推行中小学会考制度。

1935年，胡文虎独资办民众义学。学校没有接受政府津贴，也不收学生的学费和杂费，经费由胡文虎个人负担，每月约2500元。所开课程相当于小学程度，学制6年。至1939年，有教员35人，学生1600人，全校设40个班。

日军侵占时期（1942—1945年），华文学校备受摧残。1945年狮城光复，华校复办。1946年，旨在研究、健全华校教育、管理，改善教职员福利的华校联合会成立；新加坡还成立了以李光前为主席的马来亚华校复校委员会。终五十年代，华校呈逐年递增之势，参见下表：

1946—1958年新加坡华校、英校与华、英校学生数量统计表

年 份	华文学校 (所)	英文学校 (所)	华校生人数	英校生人数
1946	124	52	46312	23847
1948	184	83	58096	33214
1950	287	131	72951	49690
1952	279	148	74104	63386
1954	277	204	81605	84062
1956	291	269	108490	112575
1958	283	336	129155	145362

资料来源：原引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46—1948。见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67页。

在这些学校中,较重要的有:

华侨中学,简称华中,是南洋最早的华侨中学。1918年陈嘉庚倡办并任首届总理,从上海聘请校长和教师。首任校长涂开舆。1934年李光前任总理。1940年有学生382人,教职员26人。1946年开办简易师范班。1976年有学生2093人,教师79人。

南洋女子中学,前身为1917年创办的南洋女校,1929年增设初中后改今名。1930年开办高中师范班,旋改为三三制高初级中学,1934年附设幼稚园。创办人为张永福、陈楚楠、庄希泉等,首届总理陈楚楠,首任校长余佩皋。1940年有学生580人,教师33人。1976年有中学生1196人,小学生944人,教师74人。

中正中学,1938年由林文庆、王景成等建议创办。1939年开办高初中,有学生300余名,教师18人。1976年学生共5500人,是此时新加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学校。首任董事长胡文虎,首任校长庄竹林。

公教中学,系天主教会办华文中学,前身为圣伯多禄圣保禄小学,1937年公教华英中学成立,设初中班,1939年更为今名。1940年有学生470人,教职员17人,并设高中。1974年全校学生2056人,教师68人。首任校长姚国华。

此外,还有师范教育。1911年中华女校就附设师范班,1941年又增高师。1941年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成立。等等。

1954年是华、英校学生人数平衡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华校学生人数逐年减少。1964年,华校生有17万余人,英校生有25.6万人。1959年华文小学新生2.7万余人,占各校新生总数的45.9%。1968年华小新生1.8万余人,占各校新生总数的33.6%。1978年华小新生仅5289人,占各校新生总数的11.2%^①。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政

^① 1979年3月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府限制华校、发展英校的政策相联系的。

1950年以后,殖民政府推行“十年教育计划”和“五年补助教育计划”,对华校严加管制。1956年立法议会委托九人华文教育调查委员会发表《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建议政府予各语文源流学校以平等待遇,尊重各民族文化。同年政府发表《教育政策白皮书》,贬抑华校。政府对华校实行津贴金制,条件是:(1)学生须具有应用华文与英文的能力;(2)学校须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新加坡意识的良好公民。1959年,人民行动党组织民选自治政府,颁布新的教育政策,以培养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的新加坡人为目标。1966年始,规定第二语文为必修科。

华校地位的降低引起了华社人士的焦虑。中华总商会与华文三大教育机构(华校联合会、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教师总会)决定从196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促进母语教育宣传日,内容有:(1)发表告学生家长书;(2)发动各华校教师进行家庭访问;(3)呼吁全社会重视母语教育;(4)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中进行有关宣传。他们强调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值得人们去继承与发扬;华人应先受母语教育,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华校既教授华文,也学英文,学生通晓多门语言;华校注重德、智、体、群教育,铸造完美的人格等。但“英文至上”的社会环境制约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华校组织还重视改编华校教科书以适应新的环境。1952年,华校教科书委员会公布了公民、历史、地理、卫生、博物、理化、工艺各科课程纲目。改编的中学史地,当地化色彩较浓;中文课本除了中国文学作品外,还有描述新、马历史与文化的作品。

1956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值得骄傲的一年。从此时开始,政府注重介入华校运作体系并进而施加其影响,政府置办华文中学显示出华校力量有了新的加强。最早的政府办华文中学是立化华文中学,

旋更名为新加坡政府华文中学,1968年有学生1936人,教师56人。还有1956年成立的华义政府华文中学、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前者1967年有学生2211人,教师75人,后者有学生2274人,教师80人。1961年成立的黄埔中学,1974年学生有1172人,教师55人。此外还有教会办的圣公会、海星、三育、海星女中、礼函等中学,其中海星中学在1975年有学生1682人。民办公助的有新加坡女子职业中学等。

1956年,南洋大学创办。这是新、马地区华侨集资创办的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它标志着新加坡华校教育系统的最终完成,无疑也是海外华文教育的一大盛举。早在1953年1月,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办一所华侨大学,并首捐500万元。2月,新加坡、马来亚的297个华人社团代表推举陈六使和12个华侨团体共组筹备委员会,决定建立“南洋大学”。为筹款项,从殷商巨贾到劳动大众,从城市到乡村,纷纷捐款,各尽所能。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致辞:“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令广大华侨扬眉吐气,倍感自豪。

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为林语堂。该校初设文、理、商三院,学制4年。文学院设中国语文、历史地理、现代语文、教育、经济政治等五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共四系。注册新生共573名。1965年增为15个系,学生2126人,教师113人。南大的学生60%来自马来亚联邦。1975年,该校除中国文学语言系某些课程外,其他均改为英文授课。1980年,新加坡政府将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南洋理工学院。但南大精神却激励了一代代人。

义安学院(后改称义安工艺学院)是1962年由潮州人组织义安公司创办的。主要课程为工科和商科。学制4年。初时教学用语为华语,后改用英语。1967年改为公立。首任院长为(前)南大教育系主

任刘英舜教授。

八十年代初,仍实行英文学校与华文学校双轨制。1983年英校生占学生总数的93%,华校生只占7%。1985年,政府将华校停办,改为英文学校,独立的华文学校遂成为历史。尽管如此,华语仍为四大官方语言之一,官方还成立了“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每年举行“华语运动月”,旨在使新加坡华人使用共同的语言而非方言。

(四) 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

十九世纪末,荷印华人的私塾发展甚速。1899年,荷印华侨学塾有369所,学生6622人。其中爪哇、马都拉有学塾217所,学生4452人;外岛152所,学生2170人。

1901年,荷属东印度第一所正规的华侨学校——巴城中华会馆中华学校成立。首任校长为清朝秀才卢桂舫,教员2人,学生35人。该校仿效当时清朝的“学堂新制”,教普通话与中华文化,课程有汉语、算术、地理、体操、修身等。学校推崇孔子,规定孔子诞辰之日学校放假一天,校门内悬有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学生每天上课、放学都要向孔子像行鞠躬礼。后巴城会馆义学并入中华学校,并开设女生班,主要学习中文、印尼文、缝纫、刺绣、家政等课;还有英文部以培养商业人才与职员。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04年附设中华幼儿园。该校对于推动荷属东印度尤其是爪哇岛的华侨学校教育具有积极作用。

1903年,荷印有华侨学校13所。1908年增至44所。^①

爪哇华侨学校的发展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重视。1906年,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到爪哇查学,接着又派林文庆去爪哇劝学。刘士骥到万隆后,召集华侨官员玛腰、甲必丹和中华会馆中华学校的董事等开会,商讨如何办好华侨学校,建议增加“读经”课。同年,在巴城设

^① 乐天:《东印度华侨国民教育概论》,《〈新报〉廿五周年纪念刊》,1935年。

荷属东印度华侨劝学所,制定《爪哇华侨学校章程》。中华总会宣告成立,作为所有侨团和侨校的中心组织,由巴城、三宝垄、泗水三大城市的中华会馆轮流主持会务,任期一年。1907年,该会改为爪哇学务总会,专门负责爪哇华人教育事宜。该组织的宗旨是:(1)促进会员团体(各地华校)之间的联系,加强团结;(2)统一和提高各地华校教学质量;(3)聘请若干名视学员以“管学生总董”名义监督各地华校;(4)筹募基金,作为各项教育事业的费用。至1911年,该会团体会员达93个。1907—1911年间,巴城中华会馆还选派了约200名侨生回中国暨南学堂学习。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荷印华侨文教事业的发展。据统计,爪哇学务总会所属学校,1912年有65所,学生5451人;1913年有75所,学生6411人;1914年有79所,学生6545人。爪哇岛华侨学校,1916年有103所,学生7433人;1918年有118所,学生9035人;1919年有128所,学生10771人;1926年有173所,学生达17440人^①。外岛的华侨学校也发展较快,1914年有87所,学生5319人;1926年增至140所,学生达14001人^②。至1940年,荷印华侨学校发展的情形参见下表。

1911年,爪哇学务总会更名为荷印华侨学务总会,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荷属东印度。1912年,该会创办了第一所华侨中学,初有3个班,40余人。1917年,在泗水举办教育研究会,通过了12项决议,制定了《南洋荷属华侨学校课程标准》,确定国民学校为初级小学统一名称;废除预科制度;加强小学一年级的华语教学,以《三国演义》文体为国民学校适用文体;组织教材调查部,负责编写教材。同年组织华侨学生成绩展览会,有54所华校参加,展品达7015件,以此探

^① ^② 参见蔡仁龙:《印尼的华侨教育》,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教育》第二辑,1984年。

1912—1940年荷印华侨学校统计表

年份	学 校 数			教 师 数			学 生 数		
	合计	爪哇	外岛	合计	爪哇	外岛	合计	爪哇	外岛
1912		65						5451	
1914	148	83	65				10840	5924	3916
1915	280	175	105	640	346	294	16499	10010	6489
1918		118			360			9035	
1920	282	153	129	477	410	67	14242	12472	1770
1924	394	197	107	813	487	324	21697	13774	7923
1926	507	262	245	1092	645	447	32668	20554	12614
1934	450						45638		
1940	502	241	261						

资料来源：《荷印华侨教育鉴》，1928年。据同书第488页统计，1926年有华校313所，其中爪哇173所，外岛140所，教师1105人，学生31441人。

讨华校教材与教法是否恰当。1921年该会停办。1925年，荷印华侨教育界于日惹举行教育研究会，确定华校的教育宗旨是：养成健全的华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培养植根于南洋的充实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注意职业教育，培养华侨青年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改变了过去荷印华校“校自为政，人自为教”的混乱局面。1926年总会恢复，次年因经费原因而停止活动。

二十年代开始，荷印的华侨中学才有了一些发展。其形式有二：一为单独成立的华侨中学，如巴城中华中学、八华中学，泗水华侨中学、励志中学，万隆华侨中学，苏岛棉兰的苏东中学，万鸦老中学等，尤以巴城中华中学(1939年)最为著名。二为小学增办初中班，如孟加锡、坤甸、山口羊、万鸦老、梭罗、直葛、玛琅、先达、巴东、邦加、勿里洞、巨港等地均有这类学校。1934年，全荷印有21所华侨中学。这时的师资力量也因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大量南下而提高。1930年华侨学校的教师有1200余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72%。

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在巴城创办第一所荷华学校,属欧式学校,以荷兰语为教学媒介。学校不讲授中文和中华文化,吸收华人子女。次年又允许私立荷华学校的存在。以此来排挤中华会馆的华侨学校。1915年,荷华学校有29所,其中公立的27所,私立的2所。1922年,荷华学校有51所,其中公立的34所,私立的有17所。1926年,荷华学校有81所,其中公立的45所,私立的36所。1928年,荷华学校有104所,其中公立的53所,私立的51所^①。越来越多的土生华人将其子女送至荷华学校。参见下表:

1915—1926年间华文学校和荷华学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年份	学生总数	华 校		荷 华 校	
		学生数	百分比	学生数	百分比
1915	24559	16499	67.2	8060	32.8
1920	27859	14242	51.1	13617	48.9
1925	48783	29401	60.3	19382	39.7
1926	60470	32668	54.0	27802	46.0

资料来源:转引廖建裕《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第74页。

华侨学校的分化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郭恒节和郑坚成等人主张将中华会馆学校改为荷华学校,以荷文教育为课程基础,使学生能在荷兰或荷印政府办的学校里继续深造。一些受过荷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创办了荷华学校,课程中有一科是中华语文与文化。以新客华侨为主的华侨领袖们认为,华侨学校主要应进行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同时也需要结合华侨社会实际进行改革。印尼华人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对教育的态度也不一样,如富裕和中等阶级的土生华人想继续留在荷属东印度,他们热衷于高等教育;贫困的土生华人满足于子女学习马来文;土生华人民族主义者认为华文教育是必要

^① 玛丽·萨默士,《印尼土生华人政治》,纽约,1964年,第51页。

的；重实际的土生与新客华人希望保留华人身份，但对华校的前景感到怀疑；新客华人，尤其是客家人和广府人，热衷于华文教育。由于新客华人的增多和对荷印华侨教育领导权的掌握，使得华文学校发展更快。新客华人开办自己的学校，如广肇会馆的广仁学校，福建会馆的福建学校，客家会馆的义成学校等。新客华人还在一些无条件开设学校之处，从土生华人手中接收了中华会馆的学校。不过，这些学校都曾遭到荷印殖民政府的限制与迫害。1935年颁布《取缔私立学校条例》，许多华校教员被取消教职，取缔华校的语文、历史、地理、常识等华文教科书。华侨学校在逆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

1930年，苏门答腊棉兰市成立华侨教育总会，属下敦本、华商、养中、神州、通俗、福建等学校分别被编为棉兰第一至第八小学。1941年，荷印有华校502所，学生65000人，具体分布：爪哇241所，苏门答腊172所，邦加15所，勿里洞8所，新几内亚（今西伊里安）3所，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27所，婆罗洲（今加里曼丹）36所。

1945年印尼独立后，华校激增。如司徒赞等创办联合中学，1946年改名巴城中学，后又改为雅城中学，学生最多时达3900人。至1949年12月荷兰将政权移交给印尼人之前，荷兰人转而鼓励华校的建立，规定华校可享受政府津贴。1949年荷兰统辖的联邦区内有华校816所，其间中学43所，有319所受联邦政府津贴，学生176607人。在印尼人控制的共和区内，有华校92所，学生55000人。^①

1950年，印尼政府不再资助华文学校，但华裔印尼公民仍可念华校。1952年，又规定所有华校必须在教育部注册。1952—1953年间注册华校与学生数分别为1371所和254730人。

1957年，印尼政府更严厉地控制华校，规定印尼公民不准入读

^① 李全寿，《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史》，《南洋学报》第5卷第1期，1959年。

外侨学校(即华校),华校及学校教师须取得教育部的新准证,教科书须经教育部批准,不准成立新华校。这年底,印尼华校有2000所,学生425000人,其中25万人为印尼公民;次年7月,华校减至850所,15万名学生全部为华侨,1100所华校改为印尼国民学校。国民学校课程与政府学校一样,不过仍列华文为一个科目。华文教育迅速衰落。

1965年,印尼的华文学校被查封,印尼国籍协商会所辖的国民学校和共和大学也为政府所接管,许多华人子女失学。

1969年,特殊计划国民学校在华人社区创办,接收外侨和印尼公民的子女,按政府正规学校上课,设有华文科。这类学校初有8所,两年后有35所,1974年被取缔,均改为私立国民学校。从此,印尼华人只能上印尼学校,华文学校被彻底取消了。

(五) 泰国的华文教育

1908年,在中国同盟会会员的促进下,泰国华侨创立了华益学堂,为华文学校之始。兴学之风渐起,新民学堂(1908年)、大同学堂(1908年)、中华学校(1909年)、培元学校(1912年)等相继问世。1911—1916年间,潮州、客属、广肇、福建、琼州等帮华侨创办的学校有20所。

1920年,潮侨办的中华学堂、新民学堂、南英学堂和联合学堂四校联合而为培英学校,初有学生五六百人。1921年有华校30所,均为小学,学生多者二三百人,少则四五十人。其中包括1917年设立的第一所女校——坤德女校。此时,除曼谷之外,各府华校次第成立。

1921年以后,泰国经济形势较好,政府对华校采取优容政策,华校迅速增加。1925年,培英学校在泰国始办初中。1930年,侨领黄佰治创办商业中学(1933年改为华侨中学),泰国始有正式的华文中学。1934年,中华总商会创办中华中学,该校是泰国华校中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一所。至1933年,泰国有华校300余所。1926—1933

年间,在曼谷新成立的华校有 57 所,内地新成立的华校有 41 所。学校用普通话教学,学校规模也扩大了,如育民学校有学生近千人,黄魂学校有五六百人,还附设师范班。有的学校为集中人力而合并,如广属明德女校、洁芳女校、南华学校和坤德女校合并,设广肇公学。二十年代是泰国华文教育史上较活跃、成效较大的一个时期。

1933 年以后,政府要求华人子女修习泰文,对华文学校加以严格管制,使华文教育转趋低落。《强迫教育条例》规定:凡 7—14 岁的华生每周须习泰文 25 小时,华文教师须有教小学四年级泰文的程度方许执教。一时华校被停办或改与泰教育部合办者达百余所。不过,有落也有兴,新的侨校数量呈上升之势,如 1936 年有华校 191 所,学生 7562 人;1937 年有华校 224 所,学生 9124 人;1938 年有华校 233 所,学生 16711 人。^①

1939 年,泰国銮披汶政府推行“大泰族主义”政策,以“办理不善”、华校进行中国救亡工作等有违泰国外交政策为由,查封华校达 285 所。至 1941 年日军入侵时,几乎没有华文学校存在。数千华文教师失业,每人只领到一个月左右的遣散费;所有适龄华侨子弟被迫接受泰文教育。

1948 年 8 月,华校恢复达至高潮,仅注册的华校即有 426 所,学生 6 万余人。泰政府深以为忧,遂通令各侨校必须遵守《私立学校条例》,还规定:侨校中文课程上至初小四年级止,每周不超过 10 小时;校长须为泰人;教师须通过泰文考试及格;使用泰教育部编订的中文课本,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风俗等不许提及。此后不许再新设华校,华侨中学不准申请立案。1951 年华校减至 230 所,1955 年为 217 所。

^①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 1979 年版,第 464—465 页。

为了补救华文,华人又设立华文私塾(学生7人以下);或于小学入学前加设预备班,初小四年结业后加设补习班;或办夜间补习学校(下午3时以后上课)。但随着华侨教育泰化的加强,较多华人子弟转而入泰文学校,致使华校生源见绌,仅曼谷培英、普智、进德、育民、广肇和中心学校等,在潮州、客属、海南、广肇和福建等会馆的支持下,才保持了较多的生源。

1970年,泰国华校仅有177所。1975年中泰建交。此后随着中泰关系的密切,泰政府内外政策的开明,华文教育有所转机,取得了与其他外语平等的地位。1978年5月,泰政府调整了教授外文的政策,包括准许在校教授外文课(含华文),泰国小学一至四年级在每周上25小时泰文外,每周可增5小时华文,初中以上可以选读华文。当时泰国有华文学校150余所,按规定除原来教华文的夜校可继续存在外,此后不准再开新的华文夜校。

华人仍有着强烈的学习华文、重振华文教育的意识。在潮侨集中的曼谷,设有养正公学,吸收四五岁儿童入学,以训练潮语。各种补习中文班此落彼长。华商郑午楼倡办华侨崇圣大学,为泰华教育中的一大壮举。1979年,泰国华文教师联谊会成立,为华文教师谋福利。1988年,福建会馆倡议“发扬中华文化,振兴华教工作”,得到泰华各界的响应和支持。1989年,泰华教师福利基金等主办“泰国华文教师教学研讨会”,认为华文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同年,政府允许华校办幼稚园,小学讲授华文至五六年级。泰华教育又见曙光。

二、印支国家的华文教育

(一) 越南的华文教育

1908年,堤岸闽籍华侨谢妈延、林联庆等假霞漳会馆创办闽漳

学校,为越南华校之始。旋又有中法学校(1908年)、穗城学校(1911年)、时习学校(1911年)之设。1913年还设有坤德、振华等女校。1921年以后,华侨学校渐渐在越南全境设立,尤以堤岸为多。1929年约有华校35所,学生5000人。

起初,法国殖民当局并未在意华校的发展,后渐渐设法进行控制。1924年,当局颁布《南圻中文学塾规则》,共6章15条,将华侨学校分为私塾和普通小学两类,对这两类学校的设立、校长和教员资格作了规定。1933年,又颁布了《南圻外国人教育条例》,规定申办华校要经当地政府同意,学校可用学生原籍方言教学,课程须每周学6小时法文、4小时越文,试图藉此限制华校的发展。

1931年,堤岸设立暨南中学和中国公学二校,此为越南华侨办中学之始,1941年停办。1934年,全越有华文小学100余所,其中南部有82所。1937年,有华文学校168所。1938年增至191所,学生12128人,其中南越侨校152所,学生8659人,中越侨校15所,学生552人,北越侨校24所,学生2917人。^①

1939年,中国教育界人士及侨眷避乱入越,接踵而至,并创办中学,计有西堤的中山、岭南、知用、逸仙、国民、南侨等7所中学。知用中学设高中、初中及附属小学等部,成为越南最早办高中部的学校,学生在1000人以上。

1946年,西堤华侨教育会成立,初任会长王贯一。该会旨在促进该地区华校的发展。1953年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共有团体会员79校,1955年增至88校。

1954年,越南分裂为南越、北越,南越华侨骤增。一些已停办的学校如诚志、英德、中英、振中、南洋等中学相继复办。1956年,南方侨校有228所,学生54000人。1957年,自由太平洋书院设立。但此

^① 周胜皋:《越南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时华校的越化在紧张进行。如规定：华校低年级每周学 5 小时越文，高年级每周学 8 小时越文。1958 年又规定华侨学校集会不准唱中国国歌。次年，通令所有侨校名称越化。1961 年，华校各科教学以越语讲解，只有初中列华文为选修课。至此，公立华校基本绝迹，私立华校有所增加。1961 年，南越有华文小学 728 所，教师 5126 人，学生 177171 人^①。同年南越西贡、堤岸华侨中学的情况参见下表：

1961 年西贡、堤岸华侨中学情况表

校名	原 名	隶 属	学生人数
福德	堤岸福建中学	福建帮	8000
明德	城志中学	西贡福建帮	2500
同德	义安中学	堤岸潮州帮	850
开明	广肇中学	西贡广肇帮	1900
越秀	穗城中学	堤岸广肇帮	5000
文庄	三民学校	堤岸海南帮	1600

资料来源：转见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

北方的华侨教育也有所发展。1954 年，河内中华中学复校，学生 2700 余人。1956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该校时题词：“好好学习”，“爱护越南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1959 年，河内华侨师范学校成立，设 3 个初师班，2 个中师班，学生 100 余人。1962 年，北方华校有 127 所。详见下表：

1955—1963 年北越华校发展统计表

学 年	学生人数	学 校			教师人数	大学肄业 或毕业生	留学生
		师范	中学	小学			
1955—1956	5000		2	43	146		
1959—1960	13000	1	3	110	500	80	20
1962—1963	18242	2	14	111	720	210	30 余

资料来源：《越南华侨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刊》，河内 1963 年，第 19 页。

^① 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5 年版，第 108 页。

1962年,中越双方达成谅解,北越华校悉由政府接管。华校被同化的过程加快,华文学校为越南学校所兼并。1975年,越南统一,政府对华侨进行迫害与驱赶,并禁止华人学习华文。至1988年才又准华人办华文教育。然遭前次大劫,华文学校元气大伤,恢复并有所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二) 柬埔寨的华文教育

1901年,柬埔寨磅湛省三洲府潮州籍华侨陈创丰等创立了新民小学堂,这是近代该国最早的华校。此后,相继设立的华文学校有:1914年金边潮侨的公立端华学校,1917年皮罗勉省的冠华学校,1919年马德望省的中华学校,1921年喷呖市的广育学校。在金边,1926年设有焕文小学和中华小学,1927年有民生学校,1928年设振侨小学,1929年设南华学校,同年粤帮广肇惠籍华侨设广肇惠学校,等等。在1938年,柬埔寨计有华侨学校95所,学生4057人,教员123人。

1941年,金边的琼帮和客帮华侨分别设集成学校和崇正学校。至此,金边五帮华侨均有学校。

华校之中大多为小学,初中较少,没有高中。1934年端华学校增办初中补习班,为侨办中学之始,1936年停办,1946年正式设初中部。其他增设初中部者唯民生学校(1941年)和广肇惠学校(1955年)。迄1970年,办中学者还有国光、广育、中山、华校等共计7校。学生升学,或返中国,或赴南越西贡。

学校多为华侨社会公立,私立者占少数。在课程上,规定要学柬埔寨文,独立后初为每周5节,后又增为10节、20节。柬政府对华校进行严格的检查与监督,在注册侨校中有校主与立案校长。前者为学校名誉上的永久所有权人,后者为适合当地规定资格的校长,两者之外,还有实际校长负责学校行政。

1956年,柬政府组织“尊重柬埔寨中立局势教科书研究委员

会”，原则上全部废弃华校教科书，改用新加坡“联营版”课本，不准华校教育涉及政治。同年，颁布《柬埔寨王国有关私立学校总条例之法令》，对华校加以限制。法令规定：开办私立学校，小学、初中教师需具有相应的法文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凭，高中师资需有法文学士文凭；学校需获柬王国政府教育部批准；必须按教育部规定讲授柬埔寨文；每学期末，校长要将学校状况及开办情形向教育部呈一报告表，等等。1957年又颁布规定：华校初中、高小、初小各班每周讲授柬文10小时，开学须经柬文考试。同时，还向私立学校征收牌税、营业税、滥利税等。凡此种种，实则是对华侨学校进行严格控制。

华侨学校仍然在压力中艰难地得到发展。1960年，全柬有华侨学校170所，学生有25705人，教师约700人。其中金边计有华文学校27所，诸如端华、广肇惠、民生等校的学生超过千人，规模可观。

1970年柬埔寨朗诺政府成立，对华侨采取仇视政策，下令将境内173所华文学校全部封闭。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地区局势的缓和，中柬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华文的升值，华文教育又有少量显现。

（三）老挝的华文教育

老挝华校之设始于1929年客家华侨的百细华侨学校，初有学生30余人。此后相继设立的华校有：川圻华侨学校（1932年）、素望崇德学校（1933年）、寮都公学（1937年）、他曲寮东学校（1939年），銻巴拉邦海南、潮州二帮华侨各设华侨学校1所（1930年）。是时全国华校生不过二三百人。

寮都公学于1943年增设初中，为老挝创办华文中学的先驱。次年又设幼稚园。1946年法军重来，校舍被占，物资被劫一空。1947年，华侨领袖陈柳芳、陈盛泉、江生、林新发等人努力复校。

素望崇德学校初设时学生50人，教师3人。1941年始聘请校长，教师4人，学生约60人，废潮州、广州方言教学，改用普通话教

学。二战时该校停办。1943年复办,因泰国华人子弟南来,学校规模扩大;次年有学生280人,并增办初中。1945年,法军重来,学校被夷为平地。1947年又恢复。后在中华理事会的努力下,聘用能人,购置校舍,至1957年有学生450人,教师9人。

1953年越南入侵,华校成为废墟。此后又次第恢复。1965年郑培龄等捐献给寮都中学教室40余间。1968年,寮都中学有学生3500余人,百细华侨学校有学生1700人,其他学生在百人以上者有素望崇德学校、奎巴拉邦中正学校、他曲寮东学校、川圻华侨学校、康埠新华学校等。1970年全老挝有华校14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初中3所,小学10所。老挝的华文教育较为自由,但因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有限而显得薄弱。

三、日本、朝鲜半岛的华文教育

(一) 日本的华文教育

日本华侨创办近代新式学校起步较早。1897年,横滨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在孙中山支持下设立中西学校。因当时革命党人缺乏师资,兼与维新派关系尚未决裂,故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主持该校。又因梁启超正主编《时务报》,便由康有为弟子徐勤、陈默庵等赴日办学。旋改校名为“大同学校”,为日本第一所华侨学校,初有学生400人,用广州话授课。该校遂为保皇党所把持。

1905年,革命党人于横滨又设华侨学校,用广州话授课,学生约200人。同年,横滨浙江三江公所郭外峰等人创办“中华学校”,用上海话授课,学生约100人。

1923年关东大地震,大同、华侨、中华等三校被毁,后合并为“中华公立小学”。1945年,该校又毁于盟军空袭的战火。“二战”后改称横滨中华学校。1947年增设初中,1955年办高中部。

神户的华侨学校始于 1899 年的华侨同文学校。1914 年创立华强初等、高等小学校,首任总理为董礼初,校长关惠荃,还设有中文夜学和英文夜学,每晚 7 时至 9 时上课,以方便在职华侨青年补习的需要。1919 年又设中华公学。1928 年,为了节省经费和加强华侨之间的联系,华强学校与中华公学合并,改称为神阪中华公学,校长刘振谦。1939 年该校与华侨同文学校合并,更名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943 年李万之继任校长,迄 1982 年。1945 年学校毁于美机空袭。1959 年建成新校舍,理事长为陈德仁,设有小学、初中。1988 年该校 90 周年校庆时,有学生 664 人,教师 39 人。

在二战以前神户私塾也引人注目。如 1928 年吴恒秋所设的碧梧书舍,有学生 50 人,教材选用《古文观止》、《初等学生尺牍》、《高等学生尺牍》、《秋水轩》、《清代骈文》等。1933 年教授科目增设算盘、数学、英文和日文等。1936 年停办。

东京华校始于 1899 年的高等大同学校,后易名为东亚商业学校、清华学校。1929 年,杨习曾等人创设东京华侨学校,1935 年更名为东京华侨小学校。1948 年增办初中,改称东京中华中学。1957 年又设高中部,建现代化的教室和大礼堂,成为日本华侨名校之一。

长崎华校始于 1905 年的华侨时中学校。大阪中华北帮公所和中华总商会也曾办有小学。1946 年,关西中华国文学校成立,旋更名为大阪中华学校。其它如京都静冈、岛根、北海道、函馆等地都有过小学程度的华校。为保持与推动华侨教育,华侨成立了诸如东京留日华侨教育会、福冈侨教委员会等组织。

二战后,日本华侨在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及静冈等地重建的华文中小学有 12 所,学生有 2500 余人。

1977 年,全日本有华校 7 所,其中中学 3 所,小学 4 所。其学制、课程与中国相同。小学有汉语、会话、日语、算术等 8 门课程,主要以汉语讲授。初中则主要以日语讲授。华校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希望进

日本的高中和大学。华校高中学制三年,原则上用汉语授课,开设数学、化学、物理、日本史、日语、汉语、中国历史、汉语翻译、美术、音乐、体育、英语等课。其教材有4种情形:(1)日本文部省规定的日语教科书,分别用中、日两种语言讲授。(2)将日本的教科书由学校译成中文。(3)使用从香港进口的教科书。(4)学校自己编教科书。其语文教材内容包括:介绍中国;宣传中国革命领袖和革命斗争;中国的寓言、童话和成语故事;中国名作家的作品;汉语语法等。旨在使学生熟悉中国、热爱中国。

(二) 朝鲜半岛的华文教育

1902年,仁川华侨学堂创办,为韩国华校之始,初有学生30人,中华民国初年,该校改为中华学校。1909年,又设汉城华侨学堂。1915年,汉城共有华侨小学4所,学生117名,多延聘中国教师,全部用汉语教学。

1930年华侨小学共有8所,即汉城、仁川、元山、新义州、海州、镇南浦各1所,平壤2所。其中汉城华侨学校为一所完全小学,学生160余人,校址在中国总领事馆内,经费由校董会捐助、募集。1939年该校增设中学部。1941年,该校学生达360人,教员9人,小学学制6年,初小4年,高小2年。学生以山东籍为多。

1942年有华侨学校17所,其中公立学校6所,私立学校11所,教职员68人,在校学生2360人^①。学校的设置、组织、学制、课程、教科书等,均依照中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规章办理。主课为国语、算术和日语。

1945年,朝鲜分为南北二部。

北部的朝鲜,在旅朝华侨联合会的组织下,1949年初,各地创建的华侨小学有50余所,学生3000余人,教师150人。平壤和新义州

^① 《侨务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12月。

市还各办了一所华侨中学。同年4月1日,华侨教育由朝鲜政府接管,学校经费、教师工资与配备,均由朝鲜政府负责。华校改为中国人人民学校(即小学)和中国人中学校(即中学)。1953年平壤中国人初级中学校成立,校长王建智,学生来自朝鲜各地。1955年平壤中国人高级中学校成立,该校发展成为朝鲜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的中等学校,拥有2万余册图书,所属平壤中国人函授师范学校解决了中国人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1960年,在华侨较为集中的咸镜北道、平安北道和慈安道分别设立清津中国人中学校、新义州中国人中学校、江界中国人中学校等。华侨教育为一时之盛。从1963年开始,华校朝鲜化,朝鲜普通教育省规定华校必须改用该省编印的朝文课本,并用朝鲜语教学,只有每周5节的中国语文课用汉语讲课。1972年,华校由朝鲜全面接管。

在南部的韩国,1954年有华侨小学44所,学生3900余人,还有两所华侨中学:汉城华侨中学和韩国华侨中学。1970年有华校57所,含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2所,小学52所。其中汉城华侨中学有学生2600余人,教师100余人。学校注意培养民族精神以及进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育。用普通话授课,教师都具有高等教育的学历。

四、印度、缅甸、文莱的华文教育

(一) 印度的华文教育

印度的第一所华校是1920年加尔各答梅县籍侨胞在嘉应会馆所设的印京华侨小学,次年改为梅光学校。嗣后创设的华校有中华学校(1922年),中华商会办的商会学校(1922年)、振华学校和中兴学校(1926年),中山学校(1933年),华人天主教徒办的圣心小学(1936年),西孟省大吉岭的中华学校(1942年),孟买市的华侨学校

(1942年)等。

1943年,振华、中山和民众三校合并,成立建国小学。后来还设有华侨中学(1946年)、加华学校(1950年)等,但仅持续几年,即因经费见绌而停办。

1948年,又先后建立了兴华中学、中国小学以及达达、西浪和马金三地的华侨小学。

1970年,印度有华校7所,包括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1所,小学5所。

(二) 缅甸的华文教育

1904年成立的仰光中华义学是缅甸华校的先驱,学生60余人。同年,华侨陈甘泉、庄银安等设立“益商夜学”,次年改为日学。受中国革命思潮影响,华校渐次设立,1909年更有福建女学的创设。

1911—1921年间,约有华校50所。其中设于仰光的有林振宗中西学校、育德学校、育新学校、中华国民学校、平民学校、挽华中西学校、中国女子公学、培正学校、求真学校、粤秀学校、培元学校、立本学校等。这些学校有华侨社会公立的,有福建帮、广东帮、云南帮等创立的,有教会创办的,也有个人设立的,多采用本帮方言教学。

1918年杨子贞、张永福等倡办华侨中学,1921年正式开学,为缅甸华侨中学教育之始。同年,粤侨成立“学务统一委员会”,合力推动华校的发展,首先就是将粤侨所办的育德、培正、求真、粤秀等小学合并,改为粤侨公立育德学校和育德女校。

1926年,仰光成立了第一所华侨女子中学。其他中学有仰光中国女子中学、勃生华侨中学等。此时,全缅有华校74所,华小占总数的94.5%。1931年,福建女学改为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以急当地师资之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全缅华校有250所,其中中学5所,而中学中有3所为女子中学。缅甸华校教育进入鼎盛期。“二战”期间,

华校 90% 以上停课，迨至中国驻缅远征军反攻缅北，每克一地，即办华夏学校，如密支那、八莫、南坝、南渡、杰沙、摩谷等地的华夏学校，腊戍的中华学校，孟拱的耀湘学校，八莫三英里的华强学校，等等。

战后，华侨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复办学校。华侨各帮之间消除隔阂，合力办校。1945 年底，全缅复办者达 45 所，学生 6680 人。为了解决复办学校课本奇缺的问题，仰光 7 所华校的校长集会，共组教科书供应委员会，由各校垫款翻印《国语常识合订本》。华校设立校董会，如董事长为闽侨，则校长为粤侨。

早在 1915 年，仰光即有缅甸华侨学务总会以推进华侨文教事业。该组织后于 1930 年改为缅甸华侨教育会，1937 年改为华侨教育会缅甸分会。

1963 年起，缅甸政府对华校加紧管制，规定外侨学校须重新登记，且每日只准教外文 1 小时，其它时间皆授缅文。1965 年，颁布《私立学校国有条例》，实行私立学校国有化，校长与教师一律由缅人担任。次年，所有华校完成国有化。华人为了学习中文，只好有赖于不足 20 人的补习班。

（三）文莱的华文教育

1912 年力利中华学校的设立是文莱新式华文学校之始。之后设立的华校有：禾郊的中华小学（1918 年），宜姑山的宜华小学（1921 年），柳隘的柳中学校（1923 年），满都督的满华小学（1923 年），华都岭的华新学校（1926 年），等等。

二战后，文莱华侨创设的新校有：以里美拉的南美学校，文埠的文华小学，亚达沙维的维华小学，麻里窝的麻华小学，乐斯巴拉的乐华小学，维鸠格的维德小学，等等。几乎每一地区都有华校。至 1959 年，共有华校 21 所，其中完全中学 1 所，小学 20 所，学生 1692 人。以力利中学、禾郊中华小学学生为多。

依照当地政府的规定,华校的设立要呈请地方政府同意并转呈总督核准。政府规定,华校小学5年级以上,每周须读四五小时的葡萄牙文。此外并无限制性规定。1955年,文莱政府发布有关华侨中、小学校教育的修正政策,自1956年1月起,每年补助华侨中、小学经费之半数,并强调学校课程必须经教育部长或其代表人批准,华校课程应特别注意中国语言及保存中国文化;华校教职员待遇应依照政府人员的薪金发给等,极大地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1956年,文莱政府实行新津贴条例,所有学校经费,均获政府津贴,教师待遇提高一倍。

1970年以后,华校校舍大为改观。华人社团对华校在经费上继续予以支持,华校校董会成员多为华人社团人士。文莱华文教育在较宽松的环境里发展。

第三节 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华侨华人教育

一、美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一) 美国的华文教育

美国华校的创办有三种情形:(1)中国政府支持下办的学校;(2)当地华侨自办的学校;(3)华人教会组织办的华文学校。

1867年,旧金山15岁以下的华裔适龄儿童有500余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学塾应之而起。此类私塾有10余所,多属识字班性质,也有程度高些的,如陈馨甫所办专馆设置文史专科,讲授四书、古文、八股、唐诗等。

1888年,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和中国驻美公使的支持与策划

下,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华侨学校中西学堂。不久,更名为大清书院,学生约60人,分两个班,设正、副教习2人。正教习或为从中国聘请的秀才、举人,或为各会馆轮流选派,或由会馆主席兼任,负责讲授主课。副教习负责学生的辅导。每日下午和晚间、星期天上课。授课内容有四书五经和《左传》、《故事琼林》等。1898年,该校改称大清侨民高初两等小学。民国初改名中华侨民公立学校,校舍在中华会馆的二、三楼。1922年增设初中班。1921年扩充校舍,改称中华中学。1933年设高中班。学校采取小学、初中、高中六、三、三正规学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该校在中国教育部备案,成为全美一所较完备的中等华文学校。

旧金山的华校还有华文学校(1908年)、晨钟学校(1918年)、南侨学校(1919年)、协和中学(1924年)、阳和学校(1924年)、孔教学校(1924年)、建国中学(1937年)和圣公学校(1956年)等。这些学校,有华人宗教组织所办,也有会馆所办。晨钟学校是由晨钟剧社所办,设有华文、译文、珠算、修身、唱歌、国画、体操、信札、历史、地理、乡土史等课程,一度有学生200人,终因经费问题而于1924年停办。

在纽约,1908年在梁庆桂劝学的影响下,设有大清侨民学堂,学生20人,民国初年改名为华侨公立学校。1922年始由中华公所出资购置校舍,学校才迅速发展。1933年有学生100余人,教师5人。二战后,纽约华侨华人增多,生源扩大,校董会有17名常务董事,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并于1953年扩建校舍,使学校规模不断壮大。1949年,莫其鑫任校长,有小学6个班,中学6个班,学生230余人。1969年,幼儿园至高中共92个班,学生2669人。七十年代,有学生3000余人,另设暑假班,有学生500余人,教师120余人,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的一所华文学校。此外,纽约华人还办有孔教学校、立群学校,美国华人安良工商会还设有安良学校。

夏威夷华文学校始于1899年的中西学校。数年后因经费支绌而停办。1910年孙中山抵檀香山,成立华文学堂,1928年易名为中山学校。1931年明伦学校扩办初中,1936年又设高中,改称明伦中学,有学生1348人,教师33人,校舍从开办时的1幢扩建到5幢。盛时夏威夷有华校20余所。1933年举办檀香山华侨教育会议,与会侨校有12所,决定授权中华会馆为华侨教育总机构。1948年,华侨教育委员会成立。

其他城市也曾办有华校,如波特兰华文学校(1901年),大清侨民学堂(1909年设,1921年更名为中华学校),美洲华侨航空学校(1931年);加州萨克拉门托侨民学堂(1908年设,民国后改称中华学校),奥克兰华侨刘兴等人开办的华侨学校(1913年),斯托克顿中华学校(1913年),萨利纳斯中华学校(1937年);波士顿广教学校(1916年);菲尼克斯华文学校(1919年);洛杉矶业勤学校,明德学校,美以美教会华文学校,中国学校,中山学校;华盛顿华文学校(1930年),中华基督教会设建国中文学校(1937年);等等。

1970年,全美有华校36所,含完全中学2所,初中1所,小学33所。华校常于下午4时至晚8时上课,每天约2小时,每周上课5天。学生在美式学校学习后再入读华校,学生压力较大。

实际上,在美国华侨华人子女中,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陆有12000名5—14岁的华人儿童,进华校的仅3000余人,占总数的25%。华文学校是一种补习性质的学校。

(二) 其他美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在加拿大,1885年有华文教师4人,属私塾先生性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维多利亚有私塾八九家。1899年,维多利亚华商李梦九等于中华会馆设立乐群义塾,分两班,甲班授四书、经史、千家诗,乙班教三字经、百家姓等。1907年改为华侨公立小学,是为加国华校

之始。

1909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创办中学堂。1917年,温哥华华侨公立小学成立。三四十年代,全加共有华校26所,分布在11个地方,如温哥华有华侨公立小学和文疆、文华、广智、云林、培德等小学以及协和幼稚园、大公义学等8所;维多利亚有华侨公立学校、菁莪、禹山、协和、圣公、长老等小学以及神圣幼稚园等7所。1941年,华校学生约有1500余人。学生下午4时以后到华校学习。华校教授中文和中国史地知识。华校属于公立学校的补充。

1970年,全加有华校10所。在西部地区多由中华会馆主办,在东部地区多由教会主办。

中南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加而言,华侨华人数量较少,故华校也相对不多。清朝在美洲设立使馆后,即推动侨校之设。1886年古巴侨校开学,学习中文和西文,“文字既通,即分门学习武备、制造、算学、律例等事”^①。这是美洲最早的华校。此后,华校散布在中南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

在秘鲁,1924年中华通惠总会主席谢宝山等人倡议设立了中华学校,借利马市南海会馆为校舍,初有学生65人。1935年,中国国民党驻秘鲁支部创设三民学校。1947年,该校与中华学校合并而为中华三民联校。后发展成为中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校,设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部,有中、西文教师40余人,学生500人。1961年,天主教徒丘先觉办若望廿三世学校,拥有校舍12座,学生500余人。

在巴拿马,1934年设有中国国民小学,由当地中华会馆办理。

在墨西哥,1936年设有中华小学,1964年因经费原因停办,1969年才恢复。1941年、1948年又分别设有华侨学校。1976年提华纳华

^① 《朱批奏折》,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张荫桓奏章。

侨协会复办华侨小学,学生 10 余人,教师由从中国大陆移入的华侨家属担任。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43 年设有中华学校,1951 年停办。

其他如:在萨尔瓦多,1943 年办有华侨夜学,1948 年停办,1958 年设中文补习夜学班,后改为华侨小学。在洪都拉斯,1944 年办有华侨小学。在苏里南,1945 年设华侨小学,1954 年改为义校;1968 年又设有一所华侨学校。在智利,1946 年设有培英学校。在牙买加,1946 年设有中华小学。在危地马拉,1955 年办有华侨学校,1969 年办华文班,学生 140 余人,每周授课 4 小时。在巴西,1956 年中华会馆办有中华国语补习班,每周六下午上课 2 小时;1958 年设圣保罗市第一中文学校;1964 年设孔圣小学、孙逸仙小学;1970 年华侨吴环吉设私立巴西华侨中文函授学校。在厄瓜多尔,1947 年设中华小学校。在哥斯达黎加,1958 年设有中华小学。在乌拉圭,1959 年设有旅乌中华侨胞子弟学校。在阿根廷,1963 年设立东林书院。在多米尼加,1964 年设有华侨小学。在尼加拉瓜,1969 年设立中华小学。

中南美洲的华侨学校基本上属于补习性质,学习中国普通话与历史、文化。由于师资缺乏、经费不足、生源少等原因,华校多时办时停。各国对于外侨学校的管理也不甚严格。华校学生须学习当地官方语言,如在智利,侨校每周只准教授中文 6 小时,英文 6 小时;在厄瓜多尔,华校每日授中文 2 小时,英文 2 小时,其他课均以西班牙文等讲授,因华侨为谋取在当地的理想发展,故多自觉学习官方语文。据统计,1942 年拉美有华侨小学 14 所,另有 5 所民办辅导学校。1965 年拉美国家有华侨学校(均为小学)22 所。^①

^① 高信:《华侨的时代使命与努力方向》,台北华侨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222—226 页。

二、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大洋洲的华侨华人居住较为分散,华校的设立困难较多。为了保持华人文化上的“根”,他们尽可能地学习中文,甚至建立华校。

在澳大利亚,华人较集中的地方设有华文补习夜校,墨尔本有一所华侨学校。

在新西兰,政府对华侨子女学习华文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但华校只有一所。

在塔希提,民国初年设有4所侨校。先为夜校,后改为日校。1919年,中华会馆成立,即设办夜校,后改称中华小学。1922年设有中山小学。法属当地政府规定,华校每日须读法文一二小时,对于教师的聘用及课程的安排则概不过问。1964年,政府规定学生须年满14岁或法文小学毕业者方可入华校学习,华校改为“华文补习班”。1969年,第二三民学校分日间青少年班和夜间成人班授课,前者有55名学生。

三、欧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华侨华人,但华校则是凤毛麟角。“二战”前,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曾设有华侨小学。战后葡萄牙、法国曾设有中华学校等,均因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而停办。

1970年,欧洲华校有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华侨中山学校,德国汉堡的华侨子弟学校,科隆的中华学校,每所学校有学生二三十人。

1985年,德国波恩、巴伐利亚分别建有2所华文学校。

1987年,英国约有96所华文学校或华文识字班,大多为补习学校性质,用粤语教学。因师资、语言等方面的原因,发展困难较多。

荷兰最早的华文学校是“旅荷华侨福音布道会”。至1990年,全荷有30所华文学校。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土生华人母语教育。

四、非洲国家的华文教育

华侨华人聚居较多的非洲国家,如毛里求斯、留尼汪、南非、马达加斯加等,也有华文学校的设立。

毛里求斯的华侨主要是客属,如广东梅州,次为广府帮。1911年有华侨3662人。1912年即创办新华学校,以便华侨子女“读唐书”,习中文。1937年已有华文学校六七所,其中路易港有2所,一所为广东梅县人创办,一所为广东南海、顺德人所办。其学生如要升学,只有回中国念中学,或补习法文、英文,考当地的英、法文中级学校。1949年,毛里求斯有华校18所,其中初中2所,即中华中学和新华中学;小学16所,即新华、培英、中华、华侨、育侨、中山、星华、自由、侨民等。此后,华校采用当地学制,初中3年,高中2年,课程中英文占75%,中文占25%,中文课每天2小时,每周5天。1973年,新华中学停办,八十年代初复办,设教汉语的幼稚园、周末班和夜课班。学校从中国聘请教师。学生学习普通话、广东话,学习中国的音乐和舞蹈。

留尼汪在1927年设有第一所华文学校,1930年停办。1943年设光华小学。1944年设圣丹尼华民学校。同年,全国有华校12所。1951年,法国天主教组织与中华商会协力兴办中法学校。1958年,留尼汪华侨教师联谊会召集热心华文教育之士决议,学校应中、法文并重,因此,华校得以延续。

在南非,1928年中国国民党驻南非支部创办华侨学校。1930年,当地华侨又设国定学校。后来两校合并。1950年该校增办初中。另

外还有卑拉华侨小学(1929年)、开普敦中华小学(1942年)等五六所华小。

在马达加斯加,1938年设有兴文学校,后发展为拥有初中、小学的规模,学生多时达500余人。1944年以后设立的华校有:中山小学、京华小学、华侨小学和中正学校等。1956年全马岛有华校10余所。1970年设立志高华侨小学校,有4个班,星期四、六下午设中文专修班,招收在当地语言学校就读的华侨子弟学习中文。

第二章 组织文化

第一节 概述

华侨华人社团被视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宝”之一（另二宝为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这种社团不仅是维系华侨华人在各住在国作为一个具鲜明特色群体的重要力量，而且本身也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文化史。从这种组织的形成、结构及其功能来看，都是华侨华人文化的一种反映。

华侨华人组织主要包括社团、党派和秘密会社等，其中社团组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华侨华人社团有不同的类型^①，综合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社团的情形看，主要有这样几种：（1）宗族与姓氏组织；（2）

^① 香港人类学家谢剑根据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情形分为八类，即：（1）宗族与姓氏团体；（2）地域与方言团体；（3）职业与商业团体；（4）行业与专业团体；（5）文化与娱乐团体；（6）福利与互助团体；（7）宗教团体；（8）其他。参见谢剑：《志愿社团的组织原则：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载李亦园、郭振羽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李亦园根据马来亚华人社团的性质和范围，将华人社团分为：A. 非全社区性社团：（1）地方性或方言群社团；（2）宗亲会与地区性宗亲会；（3）职业公会；（4）俱乐部及娱乐文化社团；（5）宗教及慈善社团。B. 全社区性社团。参见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社团生活调查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版。这是两种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团分类。

地缘与方言组织；(3)业缘与经济组织；(4)社会文化组织；(5)政治组织；(6)全国性综合组织。每一类属下又可分成许许多多小的类型。如：地缘与方言类组织主要有广东籍(广府、潮州)社团、海南籍社团、福建籍社团、广西籍社团、江(苏)浙(江)籍社团、台湾籍社团等；社会文化类组织主要有慈善、互助组织，康乐、体育及联谊组织，青年与妇女组织，文化教育组织等。

从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史来看，随着二战后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的演变，该社团的组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前的华侨社团以方言、地域、血缘宗亲组织为多，还有一些行业性、政治性组织。战后的华人社团则实现了传统组织的当地化转变，专业性、权益性、福利性组织增多。七十年代以来，再移民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新移民也纷纷建立组织，不同于老移民团体。

毫无疑问，华侨华人社会的组织文化是十分发达的。华侨华人所在之处，莫不有其组织。而且从华侨群体形成之时即有各种组织的存在。早在十七世纪初，日本华侨的兴福寺，马来亚华侨的青云亭，就是作为管理当地华侨内部事务的组织而存在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地域、血缘为基础的宗亲和同乡组织以及洪门团体迅速崛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民族斗争刺激了华侨华人组织的活跃与壮大。为了应付共同的生存环境，协调华侨之间的力量，华侨的经济性团体与政治性团体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华侨传统组织经历着发展、转换的同时，新的社团，如文体、福利、联谊、学术和综合等类社团不断兴起，而且影响日广。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社团增长速度较快，东南亚地区则由于当地政府的不鼓励，乃至限制、打击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团体有衰落迹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华侨华人社团，由于移民来源、所在国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显出不一样。总体而言，战后华侨华人组织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当地化趋势。二战前华侨组织多是以中国为中心和以维护、激发华侨民族主义为旨趣,但在二战后,这种组织的政治归属已从中国转向了当地。一方面,作为华侨华人之间的组织仍然起着联络感情,共谋会众福利,促进彼此信任和团结,互助与合作等作用;另一方面,它还不断致力于使华侨华人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友好和文化繁荣等作出贡献。

第二,族群性的不断强化。战后海外华人的发展是一种逐渐演变为各所在国少数民族之一(新加坡例外)的发展。多元文化格局成为华族努力争取的目标。华人社团竭力争取华族在所在国的正当权益。如加拿大“平权会”呼吁为华工“人头税”案平反;美国的“全美华人政治促进会”、“华人权益促进会”等促进华人参政;马来西亚“董总”与“教总”维护华文教育、保留华人文化的斗争等。许多国家华人形成了力图代表该国华人整体利益的组织或政党。华人的宗乡组织已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跨行业、跨地域的华人也有不断联合的现象。

第三,类型及功能的多样化。在地缘、血缘、业缘组织之外,还有其他诸如文化、宗教、联谊、政治等类型组织,以及多元性组织。传统组织在革新其内部结构的同时,仍然在华人社会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不同类型社团的功能侧重点不一样。华人社团的功用主要表现在:团结族人,敦睦族谊,扶贫济病,支持合作,有利于华侨华人的内聚;维护华侨华人的平等、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文化;沟通族人与居住国和中国的关系;推动族人融入当地社会;重视青年,奖掖优秀;提倡健身运动和正常娱乐;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改良,等等。在诸团体的发展中,以职业性团体增加较快。

第四,地区特色明显。华侨华人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在客观环境上,如所在国的华侨华人政策,邻族对华人的容忍与合作程度;来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在主观方面,有华侨的来源背景,华侨华人人口数量,华侨华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及

其自我觉悟的程度,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使得不同地区华侨华人组织的类型比重也不同。如北美华人的政治权益类、文化学术类组织多,而东南亚华人的宗乡、经济(商会)类组织多,欧洲、中南美洲的华人联合类组织(如华人协会)多。在东南亚,菲律宾的华人社团以福建人(尤其是晋江人)所建立者为多,泰国的华人组织以潮州人所建立者为多,等等。印尼、缅甸和印支三国的华人社团则因被当地政府取缔而为数寥寥。

第五,社团的经济意义渐趋浓郁。传统社团在扶助乡人适应新环境和获取经济成功方面起过较大的作用。同乡会、宗亲会注重联络乡帮的经济力量以开拓更大的事业。如国际性的华人宗乡盛会也以“沟通贸易,促进文化,繁荣经济,相互交流”相倡导。同业公会或商会在集聚华人经济力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六,政治、帮派对立情绪的淡化。二战前的社团乡域帮派观念严重,轻者相互排斥,结怨不断,重者刀枪相见,至死不休。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受其影响,往往壁垒分明。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当地化,为了更好地在当地谋求生存与发展,社团领袖们意识到应当加强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实行跨越乡帮和政治鸿沟的联合。这种淡化社团的乡域观念,摆脱政治影响的做法,为越来越多的华人所认同。

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数量,1935年有1069个,1951年有4872个,1955年有4926个^①,1988年有8900个^②。在近9000个

① 《华侨志·总志》,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6年,第379页。同书第380页“华侨团体分类表”载,1955年各类华侨华人团体有4620个,其中亚洲3815个,美洲559个,欧洲29个,大洋洲147个,非洲70个。同书第387页“华侨团体统计”载,有华侨华人团体5637个,其中宗族团体367个,同乡团体849个,社会团体1655个,职业团体1374个,文教团体184个,“救国团体”163个,综合团体331个,康乐、青年、慈善团体714个。三者有所不同。

② 张龙吟,《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的成立》,1988年2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

华侨华人社团中,分布在亚洲的最多,其次为北美洲、欧洲。如马来西亚有各类华人社团近 5000 个,美国有华侨华人社团 1075 个。

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是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虽然有曲折险难,但仍然发展下去,因为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与承诺。

第二节 宗族与姓氏组织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家族(或宗族)是由各种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家庭组成的。以家族为基础、以亲属原则为准绳的宗亲组织,是海外华侨华人各类组织中起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中国的亲属制度具有连续性、包容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即使无谱系可寻,也可以因为虚拟的关系使姓氏相同的人发生联系。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为了能在异域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相互扶助,排忧解难,老有所终,纷纷成立宗亲组织。富裕的华人也希望藉宗亲组织而获取名望与影响。海外华侨宗族与姓氏组织基本上是中国同类组织的翻版。

这种组织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同宗同姓组织;二是联宗的姓氏组织。1955 年,海外宗族团体约有 367 个。^①

一、同宗同姓组织

这是宗亲组织的基本类型。它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血缘乃至地缘、方言纽带的地域性宗亲组织,其成员认同某一相近的

^① 《华侨志·总志》,第 387 页。

祖先,他们来自同一村县,讲同一方言。第二种是以较大范围的亲缘为纽带的非地域性同姓宗亲组织。换言之,一种是真血缘关系组织,一种是虚拟血缘关系组织。

(一) 菲 律 宾

菲律宾华人人口中约有 85% 来自(祖籍)中国福建, 15% 祖籍广东, 而福建籍中又以泉州的晋江、南安和惠安三县为主。施振民教授认为:“这种不平衡的分配使地缘组织变形,以大地域结合的会馆变为小地域以乡村为单位的同乡会。因此,地缘组织也失去其重要性,血缘组织的宗亲会地位无形中提高”^①。在菲律宾的五大华侨团体中,菲华各宗亲会联合总会(简称“宗联”)即为其一。“宗联”在 1958 年成立于马尼拉,由各宗亲会推选固定代表 1 人,出任当然理事,再从中推选常务理事 11 人(后改为 5 人)组成常务理事会,负责推动联络菲华社会各宗亲会的感情,发动全菲华人力量,谋求合法权益,排难解纷,宣扬中华文化,加强文化交流,推行传统道德,促进社会福利,等等。该会采取团体会员制,各姓宗亲会为会员单位。它规定每月第三个星期五举行各宗亲会首长联谊聚餐会,由各宗亲会轮流负责,以此推动会务的发展,议决一些会内纷争或提案。为了宣扬中华文化,该会常举行书法、普通话、音乐等比赛活动。经常参加总会活动的约有 35 个宗亲会。“宗联”成为菲华宗亲会组织中的权威组织。

由于闽南的单姓村多,故许多同乡会具有同姓氏的特点。同时,因同一姓氏来源于不同地区,又有多个同姓组织。1976 年,“宗联”属下的闽籍同姓宗亲组织(不含分会)有 23 个,粤籍同姓宗亲组织有 17 个。

^① 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的发展》,台北《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42 期,1976 年。

菲律宾华人同姓宗亲会一览表

姓氏	闽籍组织	成立年份	粤籍组织	成立年份
王	旅菲太原王氏宗亲总会	1930		
	菲华开闽王氏联谊会	1969		
朱			旅菲朱沛国堂	1919
伍			旅菲伍胥山堂	1906
李	旅菲陇西李氏宗亲总会	1933	旅菲李陇西堂	1903
吴	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	1909	旅菲粤侨吴延陵堂	?
余	旅菲雁门余氏宗亲会	1961	旅菲余风采堂	1900
周	旅菲周氏宗亲会	1960		
林	旅菲西河林氏宗亲总会	1908	旅菲林西河堂	1923
	旅菲临濮堂	1911		
	旅菲钱江联合会	1927		
	旅菲浔江公会	1958		
孙	菲律宾乐安孙氏宗亲会	1968		
马			旅菲马金紫堂	1922
	旅菲宾有坊堂总堂	1908	旅菲粤侨陈颖川堂	1900
	旅菲永春仙川陈氏宗亲会	1968		
	旅菲惠安颖川陈氏宗亲会	1973		
	菲律宾深沪颖川陈氏宗亲总会	1958		
庄	旅菲锦绣庄氏宗亲会	1929		
	菲律宾许氏宗亲会	1936		
许	旅菲汾阳郭氏宗亲会	1940		
梁			旅菲忠孝梁氏宗亲会	1911
			旅菲张风度堂	?
张	旅菲江夏黄氏宗亲总会	1930	旅菲粤侨黄江夏堂	1904
黄	旅菲弘农杨氏宗亲会	1920		
杨	旅菲南阳叶氏宗亲会	1947		
叶			旅菲廖万石堂	?
廖	旅菲荥阳郑氏宗亲会	1940		
郑	旅菲潘氏宗亲会	1956		
潘			旅菲邓氏宗亲会	1957
邓	菲律宾宝树谢氏宗亲会	1937	旅菲谢宝树堂	?
谢			旅菲谭宏阳堂	1902
谭	菲律宾苏氏宗亲会	1937		
苏			旅菲司徒教伦堂	1918
司徒				

最早的宗亲团体是福建人的“四知堂”，约成立于1877—1879年间，由华人甲必丹杨尊亲等人发起组织。首任总理杨瑞霞。会所设于马尼拉。1915年改为“弘农俱乐部”。1884年粤籍所属龙岗公所成立。多数粤籍宗亲组织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建立，闽籍宗亲会则多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立。陈、林、吴、许、黄、蔡是闽南大姓，相应地这些姓氏的宗亲会建立较早，地位较重。它们的宗旨是敦睦宗谊，促进团结，共谋福祉，贡献于国家。如让德吴氏宗亲总会的宗旨为：“对内以敦宗睦族，团结互助；对外以促进社会公益福利，维护国家民族权益，联络同侨及友邦人士之感情”。它们的主要活动有：(1)举办慈善事业，救济贫寒族人。有的设立了福利基金，不仅用于同姓之需，而且还资助当地社会公益事业。(2)奖励优秀族生，补助贫寒族生就学。如太原王氏宗亲总会每年奖助学生在350人以上。(3)调解族内外的纷争。(4)利用四时祭祀，举行聚餐联谊大会，以联络感情。(5)联络各地宗亲，组织“寻根”，扩大会务，等等。

宗亲会多建有会所。1974年落成的济阳大厦，富丽堂皇，冠甲全菲诸宗亲会所。会所均设置有中式神龛供奉祖先牌位或画像，类似中国的祠堂。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祭祖大典，祭祀由宗亲会理事长或族中前辈主持，仪式隆重，与会者拈香致祭。祭毕设宴，还伴有摸彩、文娱等节目以增加欢乐的气氛。

“二战”后，诸宗亲会纷纷设立分会。如王氏宗亲总会属下有宿务分会(1936年)、怡朗分会(1939年)、西内格罗斯省分会(1970年)和棉兰老岛分会(1971年)；让德吴氏宗亲总会属下有三描礼智分会(1948年)、宿务分会(1950年)、三宝颜分会(1969年)等；临濮堂属下有宿务分堂(1962年)、怡朗分堂(1973年)；江夏黄氏宗亲总会属下有7个分会。

1984年，菲律宾聚书丁氏宗亲会成立。该会是一个丁姓回族宗亲组织，多数会员祖籍福建晋江陈埭十三乡，俗称“陈埭万人丁”。首

任理事长丁玉郎,监事长丁子枝。下设总务、中西文书、福利、文教、调解、建设、职业介绍、组织、青年运动、文牍、稽核、审查、奖惩、监事等部。1989年该会组团回福建晋江陈埭寻根。

宗亲会最大的福利事业是奖励和资助族中子弟受教育:(1)优秀族生奖学金,奖给每年各华校各年级获前三名的族生,各华校在期末编造名册送给宗亲会。(2)清寒族生助学金,由家境贫寒或子女众多的族人申请。有的宗亲会建立了永久性助学基金。这对于推广华校教育和鼓励华族子女好学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各宗亲会是独立的单位,财政自己维持。每逢大型活动,如周年纪念、会所落成等,总会或其他分会要派人参加,每年祭祖或聚餐则限于当地会员。二战后,宗亲会仍然活跃,甚至全菲性宗亲组织聚会也日益增多。如1953年柯蔡宗亲会在怡朗召开柯蔡济阳埠际会议,马尼拉总会和各分会均有代表参加,以后每年由各分会轮值举行。1965年,江夏堂举行全菲江夏黄氏宗亲联谊大会,初为两年一次,后改为一年一次,粤侨黄江夏堂也被包括进去,1967年还增设了全菲江夏黄氏宗亲会常务理事会,由总会与各分会组成,每三个月开会一次。1970年,蚬汭五姓联宗总会在马尼拉召开舜裔联谊会,该联谊会后成为一个常设机构。1972年,举行了全菲六桂宗亲常年大会和张颜同宗埠际会议。这种同姓的组织在努力走出小圈子,进行更大范围的联合。一般说来,由于马尼拉华人社会被视为菲华人社会的中心,因而各宗亲会的总会常设于马尼拉。

(二) 新加坡

新加坡的宗亲血缘组织名称不一,如“社”(如符氏社)、“宗祠”(如韩氏宗祠)、“堂”(如潮州江夏堂)、“馆”(如曹家馆)、“会馆”(如四邑陈氏会馆)、“公会”(如南洋连氏公会)、“总会”(如南洋潘氏总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公所”(如宋戴公所)、“同乡会”(如四邑李氏同乡会)和“联谊会”(如尹氏宗亲联谊会),等等。

较早创立的宗亲组织主要有：曹家馆，1819年设；四邑陈氏会馆，1848年设；台山黄家馆，1854年设；林氏九龙堂，1857年设；濂溪别墅周家祠，1860年设；潮州江夏堂，1866年设；保赤宫陈氏宗祠，1878年设；符氏社，1887年设，等等。由广东台山人曹亚志创立的曹家馆是新加坡最早的宗亲血缘组织，初名曹府大公司，1853年兴建馆所，馆内中央神台写有谯国堂三字，相传为曹操灵位。迄至“二战”前的新加坡宗亲社团情形，参见下表：

1900-1941年间新加坡华侨血缘组织情况表

名 称	创办年份	创办者	名 称	创办年份	创办者
龙氏公会	1903	龙其章	南洋方氏总会	1935	方松柏
陕西李氏公会	1907	李清渊	邓氏总会	1935	
平阳汪氏公会	1908		琼崖许氏公会	1936	许文华
广东吴氏书室	1910	吴胜鹏	琼州吴氏公会	1936	吴升春
琼崖黄氏公会	1910	黄有渊	琼崖郑氏公会	1936	郑尊五
杨四知堂	1911		顺德黄族同乡会	1936	
荃阳堂郑氏公会	1921	郑永隆	西河别墅	1937	林太意
琼州梁氏公会	1924	梁安琨	太原王氏公会	1937	王溪水
琼崖王氏祠	1926	王绍经	南洋江氏总会	1937	
琼崖朱氏祠	1926	朱儒焕	琼崖林氏公会	1937	林献瑞
延陵联合会	1928	吴清浩	颍川公所	1937	陈诗宗
苏氏公会	1929	苏文溪	琼崖翁氏总会	1938	
刘氏公会	1930	刘木荣	南洋洪氏总会	1938	洪实植
南舜同宗	1932		琼侨邢氏公会	1938	
南洋赖氏公会	1933	赖大章	张氏总会	1939	
琼崖陈氏公会	1935	陈行琼	星洲梁氏总会	1940	
云氏公会	1935	云茂悦	潮州弘农杨氏公会	1941	

资料来源：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2册；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附录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1974年,新加坡华人约有陈、李、张、黄、王、吴、林等102个姓氏,有宗亲团体200个,其中仅陈氏的宗亲组织就有22个,林姓有18个,黄姓有16个;约有10.5%是1911年以前成立的,约一半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约占34.5%。^①

1975年以前新加坡华人注册姓氏组织发展情况表

数 量 名 称	年 份	1900年以前	1901 1910	1911 1920	1921 1930	1931 1940	1941 1950	1951 1960	1961 1970	1971 1975	共 计
姓氏社团		2	1	3	4	28	46	45	56	0	185

资料来源:转见谢剑《志愿社团的组织原则: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

1975年新加坡各类注册华人社团有985个,血缘组织约占其中的18.8%。而在这些血缘组织中,地域性的宗亲集团占有优势。这类宗亲集团的会员仅限于来自中国的同乡或同县的族人,即使是来自同县,也会由于出自不同的支系而存在隔阂,以致各组会馆。四邑陈氏会馆是新加坡第一个非地域性的宗族组织,其会员来自广东“四邑”(台山、新会、恩平和开平)的陈氏族裔,他们的语言与习俗相同。宗亲会设理事会,并组织常务委员会,设族长(或称家长)、副族长(或称副家长)以及荣誉秘书、司库和审计员各一人。宗族首领的遴选主要取决于资深年高、社会名望与品德。宗亲会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持宗族世系长存,促进宗族的团结以及培植诸如孝悌、忠贞、行善、和睦、敬老和重视教育等传统价值观。其活动内容包括:祭祖及崇祀保护神;纪念传统节日;扶助贫困会员;仲裁纠纷;关心族人婚姻和促进教育事业等。人们认为,在新加坡,“一般而言,血缘组织的会员人数少,

^① 参见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财力单薄,除团结同宗邑人外,对华族的社会贡献不大。”^①

(三)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最早形成的华侨宗亲组织,是1825年由原籍福建的黄温成、黄隆成等在马六甲所创的江夏堂黄氏宗祠。1828年,槟城也设有江夏堂黄氏宗祠。

此后至1900年间,槟城设立的宗亲组织有:龙山堂丘公司,1835年设;霞阳植德堂杨公司,1842年设;伍氏馆,1848年设;许氏高阳堂,1849年设;李陇西堂,1854年设,颍川堂陈公司,1854年设;宝树堂谢公司,1854年设;林氏勉述堂,1863年设;林公司敦本堂,1863年设;九龙堂林公司,1866年设;太原堂王公司,1900年设。在吉隆坡成立的有:叶氏宗祠,1892年设;陈公司,1897年设。在马六甲成立的有:陈颍川堂,1875年设;王植槐堂,1896年设。

二十世纪,这些社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八十年代,全国各类社团约有5000个,其中以区域性(各省属、府属或县属)社团和职业性团体较重要,姓氏组织影响有限。

(四) 其他国家

宗亲组织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地区,欧美地区则相对较少。在东南亚,除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泰国、缅甸的宗亲组织也为数不少。

缅甸的陇西堂,为李姓宗族团体,1860年建于仰光,1894年李懿桃为首任族长,以“尊祖敬宗,敦亲睦族”为宗旨,其活动包括:帮助本族贫苦人家度阴历新年;每年举行敬老会;春节团拜、祭祖和举办聚餐会等。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曾停止活动,1945年又恢复活动,族长为李文珍。在曼德勒、勃生、毛淡棉设有分堂。成员约500余人。

^①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65页。

旅欧文氏宗亲会,1976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旨在联络文氏宗亲,增加聚会机会,兴办各种宗亲福利。该会购置会所,举行庆贺新年、文娱康乐活动;每年秋季,组织返港扫墓团。

旅欧邓氏宗亲会,1984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旨在联络邓氏宗亲情谊,互相合作,促进宗亲福利事业。该会设置会所供会员休息,举办文娱康乐活动。会长之下设秘书、财政、监察、公关、康乐、福利等组。

全美黄氏宗亲总会,1875年成立于旧金山,初名黄江夏堂。在美国其他大城市设有20个分会,会员万余人。旨在互助互利,争取权益福利,联络乡谊,扶助同宗发展。该会存《黄氏祖训》云:“策马登程出异疆,任从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是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宜荐祖宗香,愿言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永炽昌。”该会还致力于推动世界黄氏宗亲之间的联系。

加拿大黄江夏总堂。1885年以前维多利亚即有黄江夏堂,初无固定会所。该堂奉祀汉代尚书黄香(文强)为祖先,每年举行祭祀,族人聚会。后于温哥华设总堂,在维多利亚、多伦多、卡尔加里、蒙特利尔等城设有17处分堂及通讯处。在温哥华还办有文强学校;对于中国与当地的慈善事业较为热心。

加拿大李氏总公所,设于温哥华,为全加李姓华人宗亲联合组织。1885年以前,维多利亚建有李陇西堂,后改为李氏公所。总公所成立后,在维多利亚、多伦多、卡尔加里、蒙特利尔、温尼伯等城市设有15处分所。办有《李氏月刊》,以沟通族众感情。在加拿大东部设有三益会,以扶持宗亲经济,还倡办敬老慈幼会、体育会、郊游会与奖学金等,以强化宗亲情谊,共谋族胞福利。

同姓宗亲组织逐渐加紧区域性、世界性活动与组合。如世界郑氏宗亲总会1988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第9届恳亲大会;世界谢氏宗亲总会1989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6届恳亲大会;世界黄氏宗亲总会1990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第5届恳亲大会;世界梅氏宗亲总会1988

年在中国台北举行第5届恳亲大会；世界伍氏宗亲总会1987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3届恳亲大会；世界许氏宗亲总会1990年在新加坡举行第5届恳亲大会；世界符氏宗亲总会1986年在吉隆坡举行第3届恳亲大会；世界钟姓宗亲联宗会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第4届恳亲大会；世界林氏宗亲总会1990年在中国台北举行第3届恳亲大会；此外还有世界林氏宗亲总会（1982年）、世界潘氏宗亲总会（1989年）、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1991年）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海外许多姓氏宗亲组织陆续回中国大陆寻根并举办大型祭祖活动，如叶、郑、谢、陈、林、许、赖、方、宋、杨、黄、钟、梅、朱、郭、王、李等姓。这种活动为宗亲社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联宗的姓氏组织

由于华侨华人中强烈的宗族观念以及宗族力量对于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同姓组织之外，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姓氏往往通过追溯共同的历史渊源而结成团体。这种联宗的组织有时还是几个小姓对抗大姓而获得理想社会地位的需要。供奉的多非他系的始祖，而是诸姓同源的始姓祖。

联宗组织以菲律宾最为突出。同姓宗亲会的发达也刺激了联宗组织的兴起，迄至1975年，主要的联宗组织有：

旅菲宋戴宗亲总会。系祖籍福建宋、戴二姓组织，创于1945年。1967年于棉兰老设分会。

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系祖籍福建柯、蔡二姓组织，创于1909年。相传南宋的河南济阳府固始县三兄弟相率入闽，分别入辛、柯、蔡三姓；又传宋时蔡十郎入赘安平柯家，长子及五子承继柯姓，而蔡十郎数传至叟公为塘边蔡氏一世祖。故柯、蔡同宗，但该会祭祀的

是周蔡叔度之子蔡仲和文王七世孙柯卢。总会下设怡朗、宿务、西黑人省、棉兰老等分会。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系祖籍福建张、颜二姓组织，创于1947年。奉祀黄帝第五子挥、周延鲁公和唐颜真卿。堂号河源系张姓祖籍清河和颜姓祖籍桃源（今永春）两地而得名。在宿务、怡朗和纳卯设有分会。

旅菲董杨宗亲总会。系祖籍福建泉州董、杨二姓组织，创于1950年。相传宋朝董世兴官于闽，以子附养杨家并承杨姓，后世有发迹者称“董杨公”。1946年福建泉州董、杨二姓建立董杨氏家族联谊会，轮值祭祖。旅菲董、杨族人据此传统而创宗亲总会，又有宿务、三宝颜、纳卯等分会。

其他联宗组织还有：旅菲曾丘同宗会（1909年设），旅菲版筑傅赖同宗总会（1940年设），菲律宾刘杜宗亲总会（1931年设），菲律宾溯源堂（雷、方、邝三姓，1951年设），旅菲至德公所（吴、周、蔡三姓，1945年设），菲律宾龙冈公所（刘、关、张、赵四姓，1884年设），旅菲烈山五姓（吕、卢、高、纪、许）联宗总会（1936年设），旅菲清真五姓（金、丁、白、马、郭）联宗会（1951年设），旅菲咸阳五姓（魏、庞、梁、万、郑）联宗会（1965年设），旅菲妫汭五姓（陈、田、胡、虞、姚）联宗总会（1935年设），旅菲六桂堂宗亲总会（洪、翁、方、江、龚、汪六姓，1930年设），旅菲六兰堂宗亲总会（肖、章、叶、林、尤、沈六姓，1953年设），等等。

根据《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和“古城会”的故事而组成刘、关、张、赵四姓的联宗会是非亲属关系姓氏组织的典型代表之一。据传，龙冈组织发祥于广东开平单水口的“龙冈古庙”。1866年，新加坡华侨刘大就、关亚乐、张士煜和赵以仁等创立了刘关张赵古城会馆。在美国旧金山，初有父老组织龙冈公所，负责议决大政；后生组织亲义公所，负责执行。1911年，龙冈公所建龙冈楼；1925

年,又与亲义公所购进新楼;1928年,两公所合而为龙冈亲义总公所,并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设分公所。1948年,第二次恳亲大会议决进一步扩大组织,成立美洲龙冈亲义总公所,会员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家。编印龙冈条例以沟通信息,联络感情。1967年成立世界龙冈总会。

菲律宾清真五姓联宗会也是渊源于“结义兄弟”的组织。唐时大将郭子仪为平边患,与金祝捷、丁浑城、白元光、马磷设盟立誓,拜为兄弟,共赴国难。旅菲金、丁、白、马、郭的联宗会即源于此。这种拟亲属关系是联宗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联宗组织还有:陈、胡、袁三姓的至孝堂、笃亲堂,蔡、吴、周三姓的至德堂、三德堂,雷、方、邝三姓的溯源堂、原宗公所,薛、司徒二姓的风伦公所,谈、谭、许、谢四姓的昭伦公所、联义公所,江、何、黎三姓的三益公所等。这些堂号组织是介于最初级的堂口和规模较大的会馆之间的华侨团体。“任何一个美国华侨都加入这一个或那一个堂号。”^① 堂号以保护其成员为最重要的义务。

联宗组织的活动已趋世界化。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至八十年代末已举行7次年会。世界龙冈亲义总会1988年在中国台北举行第8届恳亲大会。世界昭伦宗亲总会1989年在加拿大举行第7届恳亲大会。世界至德宗亲总会成立于1974年,1990年在曼谷举行第8届恳亲大会。世界柯蔡宗亲总会1978年成立,1989年在马尼拉举行恳亲大会。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1982年于菲律宾成立,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第4届恳亲大会。世宗烈山联宗总会1991年在美国举行第2届恳亲大会。世界庄严宗亲总会1990年于新加坡成立并举行首次恳亲大会。1990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地区六桂恳亲大会,系洪、江、方、翁、龚、汪等六姓的盛会。

^① 李春辉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第三节 地缘与方言组织

基于地域乡帮观念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是华侨华人社团的主要类型之一。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中国人籍贯观念强烈主要是受方言、儒家讲究孝道的礼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①。近现代中国本土的同乡会十分发达。海外华人移民将中国的会馆文化移植到海外,因方言的隔阂而形成不同的帮派,构成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特色。通常地域组织与方言组织的形成原则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因来自中国同一地区移民数量的增多,在地缘组织的范围内分化出宗亲组织,从而使地缘与血缘组织的特性合而为一。

基于地域原则的华人社团,与清代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地方行政体系相吻合,即依次以省、府、县、区、乡(或镇)为单位组成。其中以县级社团最为活跃,府级社团最为庞大。低一级的乡团往往从属于高一级的地缘组织。省级会馆多兼容多种方言。如新加坡的广东会馆包括了广府、潮州、琼州(海南)和嘉应等四大群体组织,还有跨省的地域组织,如两湖会馆、三江会馆,日本的北省(中国北方诸省)公所等。最常见的地域乡帮与方言群体有:

福建帮,以漳州、泉州府的闽南人为主,操厦门语系。

福州帮,以福州府含闽侯、闽清、永泰、古田、屏南、长乐、福清等县人士组成,操福州话。

兴化帮,以福建的莆田、仙游等县人组成。

潮州帮,以广东潮州府的八邑(汕头、潮安、澄海、潮阳、普宁、揭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9页。

阳、饶平、惠州)人士组成,操潮汕语系。

广府帮,以讲广州话的“五邑”(南海、顺德、东莞、番禺和中山)人士为主,加之“四邑”(台山、新会、恩平与开平)人士构成。

海南帮,以琼州即今海南省籍人士组成,讲海南话。

三江帮,泛指闽粤以外的各省帮,一说指江苏、浙江、江西。

客家帮,以讲客家话的方言群体,包括嘉应州的五属(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潮州府的丰顺和大埔,惠州的十属(惠阳、博罗、龙川、河源、紫金、海丰、陆丰、和平、连平、新丰),闽西(连城、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和赣南(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大余、南康、崇义)等地区人士组成。

客家语系形成的客家社团跨越地缘原则。如新加坡的南洋客属总会。这种方言团体有依据地缘原则的,如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也有依据亲缘原则的,如客属邓氏公会、客属林氏公会等;还有地缘与亲缘结合的,如嘉应五属李氏公会等。

因各国华侨华人移民背景及移民群祖籍构成的差异,使得各国华人的地缘组织的比重与地位大不相同。以东南亚为例,各国势力最强的乡帮分别是:泰国为潮州帮,马来西亚为福建帮与广府帮,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为福建帮,越南为广府帮,柬埔寨为潮州帮等。占优势的地缘组织往往掌握着该国华侨华人社会的领导权。据统计,1955年海外同乡团体约有849个。^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缘与方言组织的国际性活动日见频繁。世界客属总会1971年成立,1990年在马来西亚沙巴举行第10届恳亲大会。世界广东同乡总会1990年举行第16届恳亲大会。国际潮团联谊会1981年成立,1989年在澳门举行第5届联谊年会。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1983年成立,1991年在泰国曼谷举行第5届联

^① 《华侨志·总志》,第387页。

谊大会。还有世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1983年),世界台湾同乡联谊会联合会(1988年),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8年),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1989年),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1990年),山东省海外侨团联谊会(1990年),世界龙岩乡团联络中心(1991年),亚洲惠安社团联谊会(1989年),亚洲晋江社团联合会(1990年)以及世界仙游同乡会等。通过这种国际性的活动,既联络了乡谊,也沟通并加强了同乡之间的经济扶持与合作,还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传统,慷慨捐献,创设基金,发展宗乡文化事业。

一、东南亚、东亚华侨华人的地缘与方言组织

(一) 新加坡

会馆初称“公司”。如客属的梅州众记公司、永丰大公司;潮属的义安公司;广属的南顺公司等。“公司”成立之初,“以旅客茆墓之处理,最为迫切。故华人社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而组织会馆”^①。1822年台山籍华侨曹亚志所创宁阳公司(后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个地缘性组织。此后各帮纷纷创建会馆。十九世纪六大帮(广府、福建、潮州、客家、海南、三江帮)除三江帮外均建有会馆。

广府帮的地缘组织有:香山公司(1838年设,后为中山会馆)、南顺会馆(1839年设)、冈州会馆(1843年设)、东安会馆(1876年设)、番禺会馆(1879年设)、肇庆会馆(1879年设)和三水会馆(1887年设)。

客家帮的地缘组织,以1823年原籍广东嘉应州的刘润德所创星洲应和会馆为最早。后又有茶阳会馆(1857年设)、丰顺会馆(1873年设)、惠州会馆(1870年设)和三和会馆(1883年设)等。

福建帮的地缘组织,以1860年由陈金钟创立的福建会馆为最

^①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1969年。

早。后有永春会馆(1867年设)、浯江孚济庙(1876年设,后为金门会馆)。

此外,潮州帮组织初以义安公司之名出现,成立于1845年,由余有进召集澄海及海阳12姓氏人士组成。1857年,海南帮韩旺彝、王志德创立了琼州会馆。三江帮的组织直至1908年才成立,即三江会馆。

二十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加坡华侨创立的地缘组织参见下表:

二十世纪上半期新加坡华侨地缘组织情况表

年 份	会 馆 名 称
1900—1910	三江会馆、福州会馆、福清会馆
1911—1920	碧山亭公所、永定会馆、晋江会馆、上海公所、花县会馆、芦山会所、兴安会馆
1921—1930	漳州总会、中山榄镇同乡会、南海同乡会、安溪会馆、温州会馆、惠安会馆、清远会馆、兴宁同乡会、潮阳会馆、南安会馆、禾山公会、南洋客属总会、潮州八邑会馆
1931—1940	同安会馆、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诏安会馆、江西会馆、沙港同乡会、高明同乡会、南洋华北同乡会、龙溪会馆、南洋普宁会馆、厦门公会、南洋福宁五邑公会、蓬州同乡会、福州瀛州同乡会、东山励志社、高阳会馆、新兴会馆、中山海州会馆、潮安联谊社、茶阳励志社、广东会馆、泰家南旅同乡会、武吉班让客属公会、龙岩会馆、宁波同乡会、南洋东山会馆、鹤山会馆、高要会馆

至 1975 年,在新加坡注册的地缘及方言社团有 152 个,占各类社团总数(985 个)的 15.4%。八十年代,此类会馆有 245 个,而血缘组织为 173 个。^①

二战前地缘与方言组织的功能类似于血缘与姓氏组织,主要有:四时祭祀,初期会馆多附设神庙,仿家乡的著名神庙;经营公益慈善事业,如医院、公墓等;排难解纷,仲裁争端;捐款汇回中国,赞助家乡的建设和福利文化事业;兴办学校,奖励优秀,资助贫寒;发动各种运动,如爱国、救乡与护侨等。通过会馆以达到乡人之间团结、互助和共同发达的目的,所谓“毋分族姓之强弱,毋论人数之多寡,相视当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重建宁阳会馆石碑文)。

这时的地缘会馆具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

(1) 闽粤之外,其他地域的移民组织纷纷构建。如三江会馆(1908 年设)、上海公所(1919 年设)、温州会馆(1923 年设)、江西会馆(1935 年设)、华北同乡会(1936 年设)、宁波同乡会(1938 年设)等。

(2) 省、府级会馆的建立。如福州会馆(1909 年设)、潮州八邑会馆(1929 年设)、漳州总会(1929 年设)、南洋客属总会(1929 年设)和广东会馆(1937 年设)等,实现了更大范围内华侨之间的团结。

(3) 会馆组织管理的健全。废除领导权的终身制和世袭现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会馆的领导称“炉主”,选举“炉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会馆的领导权多控制在少数富有的家族手里。如义安公司原由余有进和他的儿子余连城、孙子余应忠一家三代所掌握,1928 年林义顺等反对世袭,组织“潮州八邑公产维持会”,次年成立潮州八邑会馆。1927 年,陈嘉庚等组织“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公开征集会员与基金。1929 年福建会馆通过选举,选出委员 40 名,

^① 彭松涛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 1982 年版。

实行委员制,设常务委员与监察委员,下设经济科、教育科、总务科、建设科和慈善科。1930年,该馆又设特务委员会,下设周报委员会、演讲委员会、产业信托委员会和剧务委员会,使福建会馆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强有力的团体。

(4) 重视华校教育。如1929年福建会馆改组后,统一闽侨教育,接办道南、爱同和崇福三校外,还津贴闽侨所办光洋、益励、中华、丹绍、崇正、兴亚、华南和彰德等学校。其他各会馆创办或接办的学校有:潮州会馆的端蒙学校(1906年),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1906年),宁阳会馆的宁阳学校(1906年),福清会馆的培青学校(1918年),永春会馆的鼎新学校(1918年),福州会馆的敦本学校(1920年),兴安会馆的宏文学校(1920年),东安会馆的东安义学(1922年),三水会馆的三水义学(1924年),碧山亭公所的碧山亭学校(1926年),冈州会馆的冈州学校(1930年),南顺会馆的南顺义学(1931年),温州会馆的侨南学校(1937年),禾山公会的禾山公学(1939年)和义安公司的义安女校,等等。

(5) 爱(中)国爱乡热情高涨。福建会馆等地缘组织联合其他侨团,在中国遭受外侮内乱之时积极作出爱国的表态,或组织力量济助乡梓。如漳州总会的设立是“上以促(中国)政府之建设,下冀保郡邑之安全。”

二战以后华侨华人地缘组织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期,但至七十年代明显呈日趋式微之势。诸如相互之间的不团结,新一代华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传统功能的落伍,社团领袖的老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984年,九大会馆联合主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与会社团185个,代表600余名。普遍认为,宗乡会馆应开放门户,接纳来自不同籍贯、宗族的同胞;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工作;应积极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各会馆之间要加强联系与合作等。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旨在加强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

间的理解、联系与合作；推动和赞助各种文教与社交活动，发扬华族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华语文学习使华人认识并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源”；协助年轻一代培养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鼓励与赞助对华人文化传统的研究。总会设中央理事会，黄祖耀（福建会馆）为主席，张泗川（潮州八邑会馆）副之，委员包括其他5大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琼州会馆和三江会馆）的最高负责人，下设工作委员会，分为行政、文化、学术、出版和资料5组。总会拥有团体会员98个。负责开展的活动包括：举办迎新年活动、华人传统文物展览、会馆文化周演出，赞助推广华语运动，举办中华文化讲座，出版会刊《源》和《华人礼俗手册》、《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华人传统》以及描述华族历史的《抚今追昔》录像带等。该总会的成立是新加坡华人社团走向大团结、传统社团加速当地化与复兴的标志。

这种地缘总会或宗乡联合组织包括了各类华人团体。如在1983年，潮州八邑会馆已拥有6个县属会馆，7个同乡会，28个氏族宗亲会，6个潮人商业团体，5个儒（潮）剧社，3个俱乐部，10个善堂及德教会等，共65个潮人社团^①。它们都热衷于发扬华族传统文化，如开办美术班、书法班、古诗词班、中华文史讲习班；举办中华文化的专题演讲；主办琼剧、粤剧、潮剧、芗剧和高甲戏剧等演出和华乐演奏会；资助出版反映华族文化传统与更新的丛书，等等。

（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第一个地缘性组织是1801年成立于槟榔屿的仁和公司。它是檳城嘉应会馆的前身，会众来自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和平远诸县，据会馆地契所证，其创始人为傅上璋、黄文添和李采瑜等人。在马六甲，最早的地缘组织为1805年客家人李振发所

^① 方雄普、谢成佳主编：《华侨华人概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创惠州会馆,会众来自广东惠州十属即惠阳、博罗、龙川、河源、紫金、海丰、陆丰、和平、连平和新丰诸县。同年,檳城的广东中山籍人程世帝、鲍志和鲍华等创立了香邑馆,即后来的中山会馆,它是马来亚地区第一个以单一县份为吸收会员标准的地缘组织。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英国在马六甲以及海峡殖民地统治的确立,华侨的增多,华侨会馆组织迅速增加。其中客家人、广府人对于创设方言组织甚为积极。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森美兰创立了地缘组织梅城会馆。此后,吉打、沙撈越、霹靂、雪兰莪、柔佛、沙巴、彭亨等地相继建立了华侨地缘会馆。马来西亚华侨在十九世纪所创地缘性会馆主要有:

在檳城,客家方言群先后设立有嘉应会馆(1801年)、增龙会馆(1849年)、五属会馆(1899年);广府方言群先后设立有广东暨汀州(福建)会馆(1801年)、中山会馆(1805年)、番禺会馆(1819年或更早)、五福堂广州会馆(1819年)、汀州会馆(1819年)、南海会馆(1828年)、宁阳会馆(1833年)、顺德会馆(1838年)、肇庆会馆(1860年)、新会会馆(1873年)、东安会馆(1892年);海南方言群先后设立有琼州会馆(1870年);潮州方言群设立有潮州会馆(1864年)。

在马六甲,客家方言群先后设立有惠州会馆(1805年)、茶阳会馆(1820年)、应和会馆(1821年)、增龙会馆(1860年);广府方言群先后设立有宁阳会馆(1828年)、古冈州会馆(1887年,含广东新会、开平、恩平、台山和赤溪县)、雷州会馆(1890年)和五邑会馆(1898年);福建方言群先后设立有福建会馆(1843年)、永春会馆(1875年);海南方言群设立有琼州会馆(1869年)。

在古晋,有广府、客家二方言群的广惠肇公会(1853年);潮州方言群的潮州会馆(1864年);福建方言群的福建公会(1871年);客家方言群的嘉应五属同乡会;海南方言群的琼州公会(1898年)。

在吉隆坡,有客家方言群的雪兰莪惠州会馆(1864年)、雪兰莪

茶阳会馆(1878年);广府方言群的雪兰莪东安会馆(1882年)、广肇会馆(1886年);福建方言群的雪兰莪福建会馆(1886年);海南方言群的雪兰莪琼州会馆(1883年)。

在太平,有福建方言群的福建会馆(1859年)、仁和会所(1883年)、兴安会馆(1898年);海南方言群的琼州会馆(1869年);客属的惠州会馆(1877年)、增龙会馆(1878年);广府方言群的古冈州会馆(1881年)、广东会馆(1887年)。

在芙蓉,有客属的森美兰惠州会馆(1870年)、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1895年);福建方言群的福建会馆(1895年);广府方言群的东安会馆(1896年),含广东东莞和宝安。

另外,吉打有广府、福建二方言群的广东暨汀州会馆(1850年)。安顺有客属应和会馆(1872年)、惠州会馆(1877年)。日叻务有客属嘉应会馆(1880年)。麻坡有海南方言群的琼崖会馆(1882年)。新山有琼州会馆(1883年)。山打根有客属人和会馆(1886年),潮州方言群的潮州公会(1889年)。关丹有琼州会馆(1891年),广府方言群的广肇公馆(1899年)。瓜拉立卑有客属公会(1892年)。怡保有霹雳嘉应会馆(1900年)。永平有琼州会馆(1900年),等等。

在这些组织中,至今有100年以上历史的有80余个。此外还有一些历史悠久但成立年代不详的地缘组织,如:吉礁福建会馆、芙蓉海陆会馆、檳城三水会馆、马六甲肇庆会馆、柔佛陈厝港琼州会馆和雪兰莪福建会馆等。这些会馆基本上是福建、潮州、客属、广府和海南等五大帮系所创立的,绝大多数是以府或县为基础的,倾向于与另一个语言更接近的地缘组织联合。会馆首领常称“炉主”。有趣的是,地缘、方言组织与业缘组织常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些为某一方言、地缘的业缘组织或大多数会员讲某一方言的业缘组织。这反映了地缘组织的职业特点,他们聚合力量,共同扶持。

进入二十世纪,地缘组织日益增多。“华侨到处便有会馆的组

织”。一方面闽、粤之外的华侨地缘组织相继建立,如广西人在文冬创设广西会馆。彭亨州文冬广西会馆成立于1910年,发起人为广西容县的浦旺亨。另一方面闽、粤各方言群属会馆趋于联合,如1934年由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发起成立的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首任主席林连登,属下有8个团体会员;1933年成立的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后改称海南会馆联合会。

二战后,地缘组织走向当地化,为了集中华人力量,维护华族的传统文化,争取华族的平等社会地位,社团的联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八十年代地缘性的社团联合会有20多个,较为重要的有: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简称马潮联),旨在团结潮籍人力量,共谋同乡福利,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与进步。1974年设青年组联合委员会。1982年设常务委员会,年会主席由各州潮州公会主席轮任,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早在1959年即已设大学贷学金(后为大学助学金);1964年成立大学助学金信托委员会,筹措资金百万元,以维护与推进华校教育和潮籍学生的成才。1983年成立马潮控股有限公司。时有团体会员46个,在马潮联的推动下召开了东南亚潮州社团联谊座谈会,后扩展为国际潮州社团联谊年会。

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系广东嘉应五属(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平远)华人宗乡组织,1950年成立。采用嘉属各会馆轮值制,凡值年会馆即为联合会的办事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1958年设贷学金理事会,资助乡族贫寒子弟上学。1986年有团体会员22个。所属青年团有18个团体会员。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57年成立,首任主席吴桂庭。旨在联合福建社团,团结同乡,共谋福利,促进华人文化、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下设青年团,设有大学奖贷学金和文学出版基金等。出版会讯,沟通会众之间的联系。1977年举办各国土风舞蹈晚会,促进华族文化及其与当地文化的交流。

马来西亚广西总会，原名马来亚桂侨联合会。1946年马六甲广西同乡会的《告广西同乡书》称：“单刀匹马赤手创家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吾人欲发展桂侨海外事业，非集中力量，严密组织，绝难幸致”^①。1957年改为今名，并确定本会宗旨为：加强马来西亚各地乡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扶持与发展同乡的文化福利事业。有团体会员34个。设立奖学金委员会，使“桂籍莘莘学子受惠，造就更多人才”。组织中国书法比赛。设醒狮团，以发扬中华文化艺术，联络乡人感情，提倡健康的文体活动。1978年成立青年团，以培养后继人才。

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1978年成立，有团体会员49个)、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1947年设)和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会(1966年设)等。

(三) 菲 律 宾

菲律宾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闽南，他们的地缘组织地位不如宗亲组织，闽南人的地缘团体规模不如广东人的地缘团体，多以县中几个乡或村为基础，以县为单位的同乡会仅有福州、永春、安溪、南安数县，晋江侨胞有100多个以“乡”为单位的同乡会，却无晋江同乡会。闽南的村落单姓十分普遍，从而使得许多同乡会与宗亲会交织在一起。几个乡结成的联乡地缘组织成为在菲华侨地缘组织的一大特色。

在地缘组织中，成立最早的是马尼拉的广东会馆(1850年设)。粤籍华侨主要集中在马尼拉与怡朗，从事饮食、制鞋业。怡朗的广东会馆成立于1870年左右。它的功能主要在于照料粤籍新移民，如提供临时住所，给予贷款和介绍职业，也排难解纷。1950年菲律宾广东会馆总会成立，1963年改称菲律宾广东侨团总会，所属有全菲

^① 梁初鸿等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

17个广东会馆、旅菲中山同乡会、旅菲潮州会馆等。粤人同乡会多属传统的以州县为单位的组织。这说明同地缘、同血缘或同方言移民人数少则易于组成较大范围内的地缘、血缘、方言或跨越这三者的组织。

在菲闽人乡族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援家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壮大国内乡人的声势。据施振民教授所列迄至1976年闽籍华人成立的123个同乡组织中^①,单姓或以单姓为主的同乡组织有105个,占总数的85.4%,而多姓同乡组织仅有18个。如蔡姓同乡组织有旅菲南安锦亭同乡会、旅菲(桐城即泉州)五乡水头蔡氏同乡会、旅菲(桐城)古浮同乡会、旅菲(晋江)玉埔同乡会、玉湖同乡会、雁塔同乡会、锦江同乡会、龙渊同乡会、丰山同乡会、瀛海同乡会、鹏山同乡会等11个。施姓同乡组织有旅菲(泉州)大埔同乡会、旅菲晋江石厦同乡会、(晋江)衙口同乡会、福田同乡会、鲁东同乡会、观岷同乡会、西浔联乡会、华峰同乡会和尊道学校董事会等21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的断裂,规模较小的同乡会渐渐失去其作用,联乡组织开始兴起。参见下表。

1958年成立的深沪乡颍川陈氏宗亲会是规模较大的以乡级地域为基础的血缘组织。由于菲华人宗亲会势力的增大,以致将一些同乡会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有的甚至建立类似各地宗亲会分会的从属关系。如1971年济阳柯蔡宗亲会属下有直接联系的同乡会即有29个,该会章程规定:“若系济阳衍派之同乡会或团体组织,均可附于本会内。”“会中会”的现象使同乡会的领袖多数在宗亲会中也担任一定的职务。地缘附属于血缘,血缘又分割地缘。血缘和地缘依然是传统华人社会两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① 《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台北《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2期,1976年。

菲律宾闽籍华人联乡组织一览表(1951—1974年)

名 称	成立年份	主要姓氏	备 注
菲律宾大霞浯同乡会	1972	吴	晋江大霞浯、南安霞等乡吴姓
旅菲石狮五社同乡会	1951	多姓	
菲律宾五乡华侨联合会	1947	多姓	
旅菲晋江南安五宝同乡会	1972	杨	社庄、潭头、塘上、新墟、布厝五乡
旅菲石狮睦邻联乡总会	1972	多姓	石狮头、下四乡联合组织
旅菲西浔联乡会	1949	施	
旅菲秀山联乡会	1964	许	
旅菲洋山宝塔同乡会	1974	李	
旅菲洋埭联乡会	1967	林	
旅菲茂峰三乡联乡会	1964	陈	茂亭、后厝、山后三乡
旅菲马坪林氏联乡会	1960	林	
旅菲华峰同乡会	1936	施	
旅菲塘市上郭同乡会	1949	柯	南塘、上谷两乡
菲华槩湖永黄氏联乡会	1974	黄	槩谷、玉湖、永康三乡黄姓
旅菲龙岱凤池联乡会	1965	李	洋埭、池店两乡
旅菲龙塘四乡联合会	1964	王	
旅菲阳溪校董会	1945	吴	南吴八乡
旅菲尊道学校董事会	1911	施	钱江

(四) 印度尼西亚、泰国及其他

印度尼西亚 印尼的地缘组织也是依照祖籍省、府、县三级建立的。省级的如山东公会、江浙会馆和福建会馆等；府级的如泉州会馆、福州会馆和潮州会馆等；县级的如大埔同乡会、永定会馆等。1956年，印尼有同乡组织78个，而血缘组织仅17个。雅加达的三大侨团，1865年设客属公会，1909年设广肇会馆，1912年设福建会馆，后改称华侨公会，均为地缘性组织。1965年后，纯地缘性团体被取缔。

泰国 泰国的地缘组织在华人社团中地位较高。1877年广肇会馆的成立为泰国华人社团之始。广肇帮王晋卿、钟超灼等人以本帮人

少力弱,唯有团结才能图存谋发展,遂购地兴建会所,称广肇别墅,后又开办慈善性的广肇山庄和广肇医局,创立广肇学校。其他各帮相继成立规模宏大的会所,如潮州会馆(1938年设)、客属总会(1908年设)、海南会馆(1946年设)、福建会馆(1911年设)、江浙会馆(1924年设)、台湾会馆(1946年设),连同广肇会馆,合称七大会馆,成为泰华社会组织的支柱。后又有云南会馆(1966年设)和广西会馆(1981年设),总称九属会馆。旨在救国救乡、排难解纷、兴办学校和举办各类慈善活动。潮州帮在泰国势力最大,潮州会馆之下又有潮安同乡会、潮阳同乡会、揭阳会馆、澄海同乡会、普宁同乡会和大埔公会等10个同乡会。二次大战后,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倡导周末举行七属会馆首长联谊聚餐会,后演变为九属会馆首长常月聚餐会制度,以共商侨社福利事业。

潮州会馆,1938年由潮人侨领陈景川、方公圃和蚁光炎等发起组织,很快以其会众、财雄等而成为泰华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会馆。它创办了多所华文学校,如普智、培英、弥博等校;购置越隆、北标、北榄等四个坟场山庄;设有“文物馆”,以收集与研究中华文物和泰国文物。设常委会,有主席1人,副主席8人,并设永远名誉主席、副主席、名誉顾问等职。分财务、庙产、调解和福利等15个委员会和多个股、组。如文娱股设国乐组、舞蹈组、歌唱组、剧务组,文教股设灯谜组、诗学组、书画组、影艺组,康乐股设象棋组、太极拳组、羽毛球组等。组织华人及华文学校师生参加象棋、太极拳、中国诗歌、中国歌舞等比赛或演出。

江浙会馆,系祖籍江苏和浙江的华侨团体。1924年由沪籍华商孙纪云、张福堂等人倡议创立,以促进同乡情谊,敬老扶幼、救灾恤难、社会福利和中泰文化交流。因江、浙籍华侨较少,会务停滞不前,张杰陵任第11届主席时修改会章,接纳各省籍华侨入会,以致会员包括中国各省籍人士。1955年成立山庄和福利委员会。1962年设青

年社。1964年设平剧社(1970年后改称国剧社)。1968年江浙山庄内设安老院,收养孤寡老人。会馆领导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下有交际、会员、康乐、文教、山庄和福利等组。

越南 十七世纪中叶一批明朝遗民逃亡越南,归顺越王,获允建立村社,时有会安的明香社和顺化的“大明客属清河社”。这是越南、也是东南亚各地成立最早的华侨团体。1777年,清河社并入明香社,华侨在堤岸建立明香会馆。1802年阮氏统一越南后,明香社增多,1826年改称明乡社。1807年,阮朝政府将华侨划分为广州、潮州、琼州、泉州、漳州、福州和宁波(后改为徽州)七府,设七府公所,各推一殷商为众首,附设于七府武庙内。并令华侨分帮自治。初有福建、潮州、广肇、海南、客家五帮,各由帮民推选正副帮长,负责本帮内外事宜。华侨分帮自治之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二战后,帮公所改名中华会馆,设中华理事会以掌其事。1945年成立中华理事总会,以协调各帮关系,每年召开一次帮侨代表大会,商讨越华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与解决方案。在各帮会馆之外,还有一些范围较小的会馆,如福建帮的霞(浦)漳(州)会馆、三山(屏山、乌山、于山)会馆、二府(泉州、漳州)会;客家帮的丽朱公馆、明乡会馆、福安会馆、宝山会馆和义润会馆等。各帮及会馆都拥有本帮的学校、医院和公墓。如广肇帮的穗城学校、广肇医院、穗义祠;潮州帮的义安中学、六邑医院和潮州义地;福建帮的福建中学、福善医院;海南帮的三民学校、海南医院;客家帮的崇正学校和崇正医院,等等。以县为单位的同乡会多至数十,如南海同乡会、顺德同乡会、新会同乡会、中山同乡会、兴宁同乡会等。

缅甸 缅甸华侨多来自中国闽、粤、滇三省。闽籍华侨地缘组织以温州会馆(1904年设,含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和安溪)为最早。此后相继成立的有:三山会馆(1912年设)、安溪会馆(1920年设)、永定会馆(1921年设)、惠安会馆(1923年设)和同安会馆(1927年设)等。安溪会馆内供奉安溪县蓬莱镇清水祖师塑像,每年正月初六日举行

清水祖师诞辰聚餐联欢会。会馆内有黑板报,摘要报道当地和中国的大事,还备有供外地同乡临时借宿的住房。该会主要活动有:参加当地佛教界及爱国团体举行的活动,救助贫寒,协助同乡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粤籍华侨分为广肇、客家、潮州和海南四帮。1865年宁阳会馆(台山)成立,此后又有冈州(新会)会馆(1885年设)、韩江公会(1898年设)、琼州会馆(1901年设)以及客属永和(嘉应州)书院(1904年设,后改称应和会馆)、肇庆会馆(1910年设,含开平、恩平、高要、鹤山诸县)。滇籍华侨自陆路入缅。1890年缅甸曼德礼(今瓦城)建有云南会馆,1912年仰光也设立了云南会馆。1956年,缅甸的华侨同乡组织有57个,宗族组织仅9个。在这些组织中,较重要的有:缅甸福建同乡会,原称福建公司,1867年前就已存在,邱台根、陈九笃等任大董,1894年改由杨、曾、邱、林、李、陈、苏轮流执理会务。活动有:设病厝医院,免费为华侨治病;禁止“花会”赌博;资助中华学校、华侨中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中国女子中学;创建福建公冢;主办节日庆典。1934年改名福建公会,1947年更为今名。至八十年代,属下有44个宗亲会。还有云南会馆、广东公司等。1983年缅甸晋江公会成立,旨在为同乡谋福利,参与会员的婚丧事,开展春节福利、灾难救济、华文教育等,会所设有乒乓球、象棋、电视等文体娱乐设施,起到了敦睦乡谊、团结互助、关心桑梓的作用。这也是缅甸华侨地缘组织所共有的一些特点。

日本 日本华侨的地缘组织较为发达。明清时期旅日华侨所建“唐四寺”(崇福寺、兴福寺、福济寺、圣福寺)实际上也是地缘性团体,因为它们分别与福州帮、三江帮、漳泉帮、广东帮相联系。福建帮(以福州、漳州、泉州人为多)、广东帮(以广州、肇庆人为多)、三江帮(江苏、浙江、江西及安徽等)是二十世纪以前日本华侨的三大地方帮派,后来还有华北帮。福建帮主要在长崎、神户,广东帮主要在横滨和神户,三江帮则散居于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函馆各地。参见下表:

十九世纪旅日华侨地缘组织情况表

年 份	名 称	地 点
1868	会议所	横滨
1870	八闽会所(后为福建商业会所)	神户
1874	荣远堂岭南会所(广东帮)	长崎
1878	和衷堂三江公所	长崎
1882	三江公所	大阪
1884	广东公所	长崎
1884	三江公所	神户
1887	三江公所	横滨
1892	星聚堂福建公所	长崎
1895	大清北帮商业会议所	大阪
1895	大清南帮商业会议所	大阪
1896	大阪广帮公所(神阪广东公所)	大阪
1898	同仁会(广东帮)	横滨
1899	三山公所(福建帮)	长崎

二十世纪前期,旅日华侨地缘组织中较有影响的有:大阪中华南帮公所,会员籍贯为上海、浙江、湖北等;大阪北帮公所,1916年取得社团法人资格,会员籍贯为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二战”后地缘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如:东京留日广东同乡会,1945年成立,旨在促进中日友好,增进同乡亲睦及福祉,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内设福利、文化、外交、会计、总务等组,该组织注意弘扬中华文化,培养民族意识,如庆祝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召开敬老会,举办广东语讲习会和中国书画展览,组织会众回国观光或扫墓等。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1961年由林同春发起成立,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同乡聚会,共商华侨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就业乃至婚姻等问题,联络乡谊,交流信息,促进团结,已成为影响较大的旅日地缘组织之一,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福冈、长崎等地的福建同乡会都在该恳亲会的直接影响之下。其他如山东、浙江、江苏、江西、温州、宁波、台湾、

广东和东北等籍华侨都有同乡会。这些地缘组织多为战后成立的,这与日本华侨社会相对稳定发展的特点相联系。

文莱 1989年该国华族人口44400人,占文莱总人口的17.8%^①。文莱没有宗亲组织,地缘与方言团体显得比较重要。这类组织主要有:马来奕琼侨公会,初为1939年所创琼侨公所,1963年成立中西乐剧社,1979年又组青年团,设有奖学金、敬老金、助葬金和特别援助金,以“敦睦梓谊,造福人群”。还有马来奕福州公会、马来奕客属公会、文莱琼州会馆、文莱广惠肇公会、文莱大埔同乡会等。七十年代以后这些团体纷纷成立青年团,增添新鲜血液,如1983年文莱广惠肇公会青年团成立,设康乐、福利、学术、体育等组。

二、美洲、欧洲及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的地缘与方言组织

(一) 美 洲

美国 十九世纪旅美中国人主要来自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因而这里早期的华侨地缘组织基本上是属于广东人的。1849年在旧金山成立的网州会馆是最早的华侨会馆。至二十世纪已形成七大会馆。

如三邑会馆,1850年成立,初由广东南海、番禺和顺德三县侨民组成,后来又有花县、三水、清远、高明、高要、四会等县侨民加入。会馆内有三邑人的三善堂和其余六县人的同善堂。1901年,除花县外,六县中的五县脱离三邑会馆。三邑会馆在旧金山设总馆,另有分馆10余处。馆设司事一人,主持会务,对外代表会馆办理与各方交涉之事,对内负责调解会员间的纠纷;通事主管对外联络与翻译工作;庶

^① 饶尚东:《文莱华族会馆史略》,第33页。

务员负责照料新到来的侨民；值理负责管理中财务，协助司事料理馆务。会员注册费为 10 美元。凡从三邑来的侨民，该馆负责迎接、安顿吃住、寻找工作、协调关系以及死后的安葬或运送尸骨回故里等。

他如：四邑、冈州会馆，1850 年成立，会众初来自广东台山、新会、开平和恩平诸县，后有鹤山等县侨民加入；阳和会馆，1852 年成立，会众来自广东香山、东莞、增城和博罗四县；人和会馆（初名协吉会馆），1852 年成立，会众含阳和会馆所属四县以及宝安、惠阳、梅县、赤溪等县客家侨民；宁阳会馆，1854 年由原四邑会馆中台山籍华侨组成；合和会馆，1862 年由未加入宁阳会馆的余姓台山人以及邓、胡、谢、朱、潘、利、区等姓开平人组成；肇庆会馆，1876 年成立，初由脱离合和会馆的开平和恩平人组成，后有肇庆所属高要、高明、清远、四会及三水、阳江、阳春等县侨民加入。

七大会馆的领导层注重才学、品德，如三邑会馆，1881—1927 年间的 14 任主席中有进士 13 名。会馆的主席或按区域顺序轮流担任，如三邑、阳和等会馆；或按姓氏次序轮流担任，如宁阳会馆领导层由台山县 26 个姓氏组成；或由某县人担任，如肇庆会馆由开平人担任。七大会馆均从属于中华会馆。1956 年，美国有华侨华人同乡团体 55 个。

加拿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 9 大地缘组织，即台山宁阳会馆、开平广福堂、新会福庆堂、香山福善堂、恩平同福堂、番禺昌后堂、南海福荫堂、顺德行安堂和客家仁和堂。最初这种团体与宗亲团体一样，主要是接送先侨遗骸回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兼办属下华侨的福利，救济失业困苦之人，在家乡兴办学校。1947 年以后华侨纷纷加入当地国籍，传统社团走向衰落。1956 年，加拿大有同乡团体 28 个。

在中南美洲，华侨也尽可能地组织会馆，以保护乡族侨民的利益。如十九世纪末秘鲁有中华、同升、南海、番禺、冈州、香山、潮

州等华侨会馆 13 所。1915 年墨西哥墨西哥卡利市成立了第一个华侨地缘组织中山会馆。其它国家也有大小不一的地缘性侨团。其功能主要是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为同乡新移民提供栖身之所；解纷纾难；谋求同乡福利。秘鲁利马的古冈州会馆，会众来自新会、开平、恩平、台山和鹤山，内供奉关圣帝君，两旁有金字对联：“浩气凌云千秋义勇无双士；丹心拱日万古精忠第一人”。中堂门两旁的对联为：“秉公心自然侃谈公道；敦本业尤须默念本源”。据统计，1956 年秘鲁有 10 个华侨同乡团体，巴拿马有 8 个，墨西哥有 5 个，古巴有 6 个。

（二）欧洲及其他地区

欧洲、非洲、大洋洲的华人相对来说较为分散，地缘组织不如东南亚那样兴旺，同时成立也较晚，较有影响的如：

浙江青田籍华侨华人在欧洲的组织：（1）旅荷浙江青田同乡会，1986 年成立于荷兰鹿特丹，旨在同乡之间联谊与互助，并多次募捐支援家乡。（2）旅比（利时）、卢（森堡）青田华侨同乡联谊会，1988 年成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众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青田籍侨胞，约千余人，他们主要从事餐馆业。以上两个组织属于新老移民相结合的地缘团体。另外还有旅法浙江同乡会，1948 年成立。

客属组织：英国客属崇正总会（1987 年设），欧洲崇正总会联合会（1990 年设），旅法崇正总会（1984 年设），毛里求斯应和会馆等。

广东籍组织：（1）英国伦敦五邑同乡会，1987 年成立，旨在联络伦敦五邑乡亲，“守望相助，声气相求”，设会长、副会长 8 人，下有英文秘书、华文书记、财务、康乐、公关、总务及法律顾问等。英伦四邑总会馆，1906 年成立于英国利物浦。（2）法国潮州同乡会，1986 年成立，旨在团结潮州籍华裔，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发展福利，加强团结，推进中法文化交流，积极融入法国社会，对后代进行“根”的教育，领导机

构为理事会、监事团,设有公关、财会、秘书、文教、福利、佛事、青年、宣传、国术、舞蹈等小组,出版会刊《法国潮讯》。旅法广肇同乡会,1989年成立。(3)澳大利亚悉尼四邑会馆(1898年设)、墨尔本四邑会馆(1854年设)、墨尔本冈州会馆(1854年设)等。(4)新西兰四邑会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设)、东(莞)增(城)会馆(1926年设)、番禺会馆(约1864年设)等。

还有旅法海南同乡会,1982年成立,除海南籍华人外,其他籍贯的华人也可入会,常举行的活动有:开办免费华文教学班,帮助年轻华裔学华语;设图书处,出借各种华文图书、报刊;每年妈祖诞辰前后举行庆典和祭祀仪式,等等。全法闽台乡亲联谊会,1987年成立。

另外有这样几种团体也值得注意:(1)印支华人移民组织。有的是纯印支华人移民组织,有的还吸收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人移民。如:奥地利的旅奥中南半岛华裔难友互助会,1980年成立。法国的旅法崇正总会,1984年成立,成员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华人外,还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移民;旅法广肇同乡会,成员包括来自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广东肇庆籍人士及家属。他如1987年成立的英国印支华裔理事会;法国里昂越棉寮华裔联谊会(1981年设)、湄江联谊会(1980年设)、法华青年会(1982年设);荷兰越南华裔联谊会(1986年设);瑞典瑞京华裔联乡会(1980年设);瑞士华人联谊会(1981年设),巴赛尔联友互助会(1981年设)等。(2)台湾省籍移民组织。主要有:法国的台湾同乡会(1968年设);英国的华侨协会(1960年设);西班牙台湾协会(1987年设);德国的旅德台湾同乡会(1971年设);比利时的欧洲台湾乡亲联谊促进会(1980年设),等等。(3)荷兰的印尼华人组织,主要有印尼华人联谊会等。这些地缘性社团同样具有敦睦乡谊、团结互助、发扬传统文化等功能。

第四节 业缘与经济团体

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文化层次低,主要是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多从事经济活动,因而对于同行业或同工种之间的联合尤为重视。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在古代即已十分发达。早期华人移民多是投亲靠友、依赖同乡关系的“链式移民”,以致在职业上常是“萧规曹随”,多从事相同的行业。例如,近代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多从事锡矿生产;广府人多从事建筑、伐木、黄金首饰业;潮州人多从事捕鱼、杂货和餐馆业;海南人则垄断了咖啡、饮食业。新加坡的闽南人多从事商业、银行业和橡胶业。这种特点必然反映在其组织上。正是这种联合及其组织避免了他们之间无谓的竞争或倾轧,而使之和衷共济,共存共荣。

基于业缘而形成的组织通常是以一行一业划分的,但也有以籍贯划分者。为了维护同行业职工的利益,还有各类职工团体。

一、商会组织

华侨华人因其在理财、经商方面的能力及其成就而被人视为一个商业民族。商会组织也就成为业缘团体中最突出的一种。商会有行业商会如树胶公会、米商公会等和总商会两种。

从晚清起,华侨聚居较多的国家相继成立了总商会,以协调、统一华侨之行动步骤,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促进华侨商业之发展。由于总商会克服了地缘与血缘组织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其本身组织严密、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甚至还有来自中国政权方面的支持,因而迅速发展起来,使之既是华商的最高组织,也是华侨社会的代言人。全

国性总商会与地方性总商会或商会构成了一个华商组织网络。

1. 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1904年马尼拉中华商会成立,初名“小吕宋中华商务局”^①,系旅菲侨商邱允衡等发起组织的,“以发展华侨商业为唯一的谋求,以华侨福利为当然的努力,至于对内外感情联络,更是不能须臾忽视”^②。1927年重订章程规定其宗旨:(1)保持菲岛华侨利益;(2)发展菲岛华侨商务;(3)联络华侨团体感情;(4)增进华菲国际贸易。实际上,中华商会成为华侨商业和整个华侨社会的中心,起着领导全菲律宾华侨华人事务的作用。初期的中华商会会员有三类:同业公会会员、商店会员和个人会员。1911年李清泉任会长,改组商会,会务迅速发展。全菲各省成立的总商会也自动接受马尼拉中华商会的指导。中华商会一方面展开国民外交,向中国驻菲总领事、菲律宾政府和公众转达华侨的意见,增进中菲友谊,同时维护菲华社会的合法权益,对菲政府、议会所加于华商的种种限制措施、立法以及对华人的歧视等进行抗争,如反对菲政府的《西文簿记法案》,协助消弭1924年的排华风潮;另一方面以服务于菲华社会为原则,推行各种慈善事业,如它维持着一个华侨学校系统,一家现代化医院(崇仁医院),一座公墓(华侨义山),还主持善举公所,二三十年代组织华侨商业救济委员会,展开华侨商业复兴运动,设立会员纠纷调解委员会,等等;另外,还支持中国家乡建设与民族事业,1938年至1940年间,曾筹募菲币1000余万比索汇回中国,支援抗战。

1954年,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成立,取代了马尼拉华商会的地位,成为全菲华商最高的综合性经济团体。1956年改称菲华商联总会,简称商总。其章程几经修改,规定其宗旨为:(1)协调全菲华工

① 1906年改名为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1927年改名为菲律宾中华总商会,1931年更名菲律宾马尼拉(岷里拉)中华商会。

②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5页。

商团体的活动,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仲裁争议,促进合作。(2)真诚与菲律宾政府合作,支持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3)致力于华菲友谊,鼓励华人融入当地政治社会之中。(4)协助发展菲律宾的工商业,鼓励对农业的投资。(5)努力增进会员的福利。(6)维持和推进教育、文化、体育、慈善与社会福利方案,等等。商总成立后,团结各华侨社团,切实落实各项计划,对于组织全菲华侨华人,发展华人经济力量,促进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商总每年举办暑期华文教育师资讲习会,以提高华文师资水平。八十年代末商总有团体会员 150 个,以其组织的庞大与严密、影响的巨大而成为菲律宾五大侨团之首。在组织上,它是由马尼拉和全菲各地华商会构成的,每两年举行一次全菲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推举正副理事长和常务委员。马尼拉的理事约占三分之二强。商总对外保护华人社会权益,对内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是华人社会存在的具体象征”^①。1968 年马尼拉中华商会加入商总,1991 年宣布退出,使商总的实力受到削弱。

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06 年成立,初名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首届总理为吴寿珍。它是在清政府的推动下,由闽、粤各帮华商所组成的。从创办到 1912 年间,最高领导层与清政府关系密切,是海外保皇派的重要力量。1912 年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组织新商会,称华侨总商会。次年,新商会与中华商务总会合并,1915 年易名为中华总商会。1914 年前商会采用清政府农工商部制定的商会法,实行总理制,任期一年,设总理 2 人,协理 10 人,议员 40 人。名额依帮进行分配,分帮进行选举,正总理由福建帮轮流担任。1915 年起,采用民国商会法,改总理为会长,议员为董事,每届任期两年,职员总数为 32 名,计

^① 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李亦园等《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台北正中书局 1985 年版,第 156 页。

福建帮 13 名,潮州帮 9 名,广府帮 5 名,客家帮 3 名,海南帮 2 名,另有特别会董 6 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诸社团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织,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1)它是所有华商的总机构和权威组织,起着团结华商、保护华商的作用。正如首届总理吴寿珍曾指出的:“如有商会,则可令坡中潮、闽、粤、客、琼籍诸人结成团体不致如前之散漫。如果彼此有所缪犗,可由会中公议善为调处以剂其平。又如各号或遇生理不前,恐遭倒闭,也可将其原故陈诸商号以凭公同查核。若其亏折系由天数非人之咎,则彼此可以通融体恤或更有相助,俾免倒闭之虞。若其有意侵吞,则又可以秉公挖究。且商会既设,则可以与内地各商号联成一气,若各商号中或被奸商亏侵逃回原籍,则可由本商会照请内地商会将亏逃者拘究勒偿。种种便宜,其益我商人者,实非鲜浅。”^① (2)扮演华侨社会最高领导机构的角色,起着连结华侨社会与殖民当局或中国政府的桥梁沟通作用,还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纷争,赞助与推进各种社会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积极号召华侨支援中国的抗战、救乡事业。甚至对于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产生过影响。

1964 年总商会建成 11 层的大厦,致力于促进当地华商之间的联合及新加坡民族经济的发展。1984 年拥有 5900 余名会员,包括个人、公司和商团三类。每两年出版一本会员名录,并出版《经济季刊》。设立奖学金,各族学生均可申请。它还积极推动世界各地华商之间的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1991 年),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华人工商企业家和其他社会名流 800 余人汇聚一堂,交流了各国华人企业家的成就、经验,并就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3.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1947 年由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同

^① 转引自杨进发:《陈嘉庚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86—87 页。

长李孝武等发起成立,初名马来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址在吉隆坡,1963年更为今名。旨在联络全国各地的中华商会;振兴和维护商务;协助工农矿业;联合其他各族商会,促进经济繁荣,共谋社会福利等。它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工商团体的最高机构,多次与其他华人社团联合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与权益,如实行免费教育,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等。属下有18个团体会员。

马来西亚各地也有总商会或商会,作为一方华商的联合组织,如檳榔嶼中华总商会、马六甲中华总商会、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霹靂中华总商会、彭亨华侨总商会、文冬中华商会、玻璃市中华商会、柔佛峇株巴中华商会、居鑾中华商会、文律中华商会、吉打中华商会和吉兰丹中华商会等。

4. 泰国中华总商会,1909年成立,系泰国华人工商企业家的全国性最高组织,旨在联络、团结泰华工商界,协助发展工商业务,为侨商服务。二次大战前,由于中国没有驻泰国的外交官,中华总商会具有代表全体泰国华侨利益,沟通泰国政府与华人的桥梁作用。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举会董、会长(后改为主席)及秘书、财政等,组成常务董事会。首任会长高学修。历任会长或主席都是著名华人富商、著名企业家与社会活动家。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该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董多为在泰国出生的泰籍华人。每月举行同业公会聚餐会,沟通信息,协力建设泰国,繁荣泰国经济,致力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泰华福利和华文教育,促进中泰两国友好等,并重视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华商组织之间的联系。

5. 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简称印尼商联会,系印度尼西亚各地中华商会的联合组织,1948年成立。实行监理事会制,设正副理事长、财务、常务监事、监事。首任理事长郭美丞。会址在雅加达。商联会设农园产品整理委员会和售糖公会。出版商联会报,后改为日报。1949年后该会领导成员和中华商会成员有所分化。创办印尼华侨公

立高级商业学校。1953年又创办《中华商报》，曾出版《印尼商业年鉴》。1954年该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曾决议向印尼政府呈交备忘录，指出华侨资本实等同于印尼资本，希望政府勿予歧视，使之成为印尼经济发展作贡献。1958年该会及所属学校、报社均被印尼政府取缔。

6. 南越中华总商会，为越南统一前南越华商团体的最高组织，1904年成立。初名为南圻华侨商务总会。首任会长郑昭明。1910年，商会改组，重订章程，规定：凡属华侨地主或工商业家均可加入为会员，按其营业牌税等级缴纳会费，并由会员选举董事23人，组成董事会，选举正副会长、财政、稽核、书记各1人。董事名额的分配为广府帮7人，福建帮和潮州帮各5人，客家与海南帮各3人。1923年更为现名。1949年改为理监事制，由同业公会产生五组协会，即银行保险运输协会、出口商业协会、入口商业协会、本地商业协会和工厂商业协会，再由五组协会代表产生理监事。

此外，各国的华商总会还有：

日本中华商务总会（1908年在神户、大阪、长崎、横滨等商务总会基础上成立），韩国汉城中华商会（1899年设），缅甸华商商会（1909年设）。

加拿大多伦多华商会（1972年设）和温哥华中华总商会（1909年设），美国旧金山中华总商会（清末设）和纽约中华总商会（1904年设），古巴中华总商会（1897年设），玻利维亚中华工商总会（1990年设），墨西哥墨京中华商会（1922年设）。

留尼汪中华总商会（1916年设），毛里求斯华侨商会（1908年设），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1908年设，前身为南顺会馆）。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华商会（1913—1965年）和维多利亚中华商务总会（1912—1965年）。

二战前，各国总商会领导层的构成通常是与当地华侨华人的来

源组成相联系的,理事名额依帮势力的大小分配,如汉城中华商会的22名理事中,北帮占10席,广帮占8席,南帮占4席;长崎中华商务总会(1907年)的总理与协理根据广府帮、福建帮和三江帮的人数比率选出。随着畛域观念渐渐淡化,领导层名额的分配代之以新的形式,如以主要行业协会来划定。在商会的活动范围上,主要在于团结华商,共谋在当地经济事业的发展。1926年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发表宣言,公布该会历年来所做的七项工作,包括交涉不平等事件、抗议苛例、排难解纷、挽回利权、联络感情、办理公益和振兴商务等。但商会也涉及到华侨华人社会经济之外的其它各项事业,如毛里求斯的华侨商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查移民档案,安置新移民。

二、行业组织

华侨华人在他们所涉及的领域建立自己的组织,以加强本行业内部的沟通,团结协作,共同发展。这是他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柱。所有加入行业公会的人都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在异域的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更感到了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华侨华人的行业组织有各种各样,与整个华人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在地区上,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华人多从事饮食业,北美华人从事于文化科技领域者多,而东南亚的华人则多从事生产与流通领域的职业。在时间上,二战以后,华人渐渐从职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和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行业。相应地,他们的业缘组织也反映了这些变化。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在十九世纪期间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如木工、建筑、打铁、制革、制鞋、裁缝以及加工和贸易诸行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如1900年前新加坡的业缘组织主要有:演剧业的梨园堂(1857

年设),甘蜜胡椒公司(1867年设),硕莪贩卖商行会,广帮木匠的北城行(1868年设),饮食业的姑苏慎敬堂(1876年设),轩辕洋服商会(1880年设),建筑业的鲁北行(1890年设)、文华行(1891年设),广帮客栈行(1900年设)等。

由于存在着某一行业以某一方言群为主或为其所垄断的现象,因而,业缘组织也具有方言地缘的色彩。如广府帮的北城行、鲁北行、姑苏堂、轩辕馆、广帮猪肉行、广帮藤器商公会、广帮熟食行等;潮州帮的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鱼业公局、孵卵公会、潮侨汇兑公会、潮州旅业公会、潮州梨业公所、潮州客栈行等;海南帮的琼侨汇兑公会、琼南客栈行、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等;福建帮的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福州商业公会、福州木帮公会、星华女衣工友联合会、闽南汇兑公会、福建建筑工业社、福建理发店公会等;客家帮的星马布商公会、华洋百货公会、当商公会、钻商公会、茶阳京果商务局等;三江帮的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华侨干洗公会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加坡的华侨行业组织有近100个^①。如:布行商务局(1907年设)、星洲杂货行(1908年设)、糖商公会(1908年设)、鱼商公益所(1909年设)、中华印刷业公会(1912年设)、同乐革履行(1914年设)、树胶公会(1919年设)、当商公会(1920年设)、成顺行船馆(1922年设)、牙科公会(1923年设)、华侨茶叶进出口商公会(1928年设)、中医中药联合会(1929年设)、屠商公会(1934年设)、果菜同业公会(1937年设)、华人司机互助会(1938年设)、华侨建筑公会(1938年设)和瓷商公会(1939年设)等。三十年代后期,一些具有现代组织形式的工会出现了,如黄梨工友互助会、火锯工友会、星洲码头工友会、电车工会、建筑工会、华人司机互助会、星洲人力车工友互助会和星洲驳船业工友联合会等,以争取改善工人的劳

^①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第69页。

动环境和生活待遇。五十年代以后,传统的行会走向衰落,新的职工会和专业组织在增加。如1975年新加坡的旧式行会仅余24个,而职工会和专业组织则有160个。

南越的堤岸、西贡曾是华侨的聚居中心之一,人数近百万。同业公会是中华总商会的基层组织,较大的行业如布商、米商、杂货、药业、铁器、电器、酒楼饭店、旅社、鞋业、首饰、印务、戏院、面包、海产等,较小的行业如木炭、旧家器、椰油、漂染、麻包、鱼干、颜料、旧铜铁器、造船等,均有公会组织,至1970年有近百个组织。1924年成立的南越华侨总工会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职业性组织,以团结、互助、增进共同福利为主旨,所属工会有20余个,拥有会员1万余人。1946年该会还创办了中正工人子弟学校,接收贫寒工人子弟入学受教育。

泰国华侨同业公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火砬公会和火锯公会。火砬即电力碾米厂,遍布于泰国产米区的众碾米厂几乎都为华侨华人所掌握。火锯即电力锯木厂,丰富的森林资源使锯木厂十分发达,也多为华侨华人所举办。

缅甸华侨无中华总商会,以职工会最为发达。缅甸华侨从事技术工种如矿工、铁工、木工、泥水工、皮革工等的较多,他们多来自中国广东和云南。1883年即成立了木工组织鲁城行,后有利城行。铁工和泥水工组织有敬德行,鞋工组织有革履工会,成衣工人有维轩工会,还有酒楼茶室职工同业工会。缅甸闽侨经商者多,有缅华店员联合会、仰光华侨米黍业职友联合会。仰光华商商会(1911年)和约50个同业公会基本上掌握在闽侨之手。

菲律宾华侨的同业公会在十八世纪早期就已形成。1720年即有米商同业公会,会长称“米店甲黎司”。十九世纪有华侨马车运输同业公会,1888年木材商组成崇宁社,十九世纪末布商组织了福联益布商会和义和局布商会,1903年两者合并为中华布商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职工团体形成,如华侨工人联合会、华侨工人东庆堂

(1920年)、华侨洋衣工团(1926年)、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1926年)和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1937年,简称“劳联会”)。劳联会成员包括全菲华侨各业工会,如铁工、餐馆、酒厂、糖厂、拖鞋、洋衣、理发、店员等37个工会,在该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店员救亡协会、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创办了《建国报》和建国中学、民族夜学以及国防剧社。

美国华侨初期除组织商会外,也有一些行业工会,如在旧金山有西福堂(洗衣工人工会),同德堂(制雪茄烟工人工会),履胜堂(制靴鞋工人工会),锦衣堂(制造工人、服装工人工会),炯衣行(制造白衬衫工人工会),鲁班公所(木匠工会),华英阁(翻译工作者工会),调元会(厨师工会),同业堂(西装裁缝工会),联和堂(旧票行工人工会)和合益堂(新票行工人工会)。在行业工会之外,还有华人中小企业主的行会,如洗衣、服装行业等。他们在白人为主体的世界里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由于种族偏见和受美国行业工会(劳联)的排挤,华工一般都参加了七大会馆组织、洪门会(致公堂),在很长时间里华人工会无多大作为。1937年加省华工合作会成立。该会帮助建立各行业工会,支持工人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斗争,还举办为华工服务的项目,如帮助失业工人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介绍工作,代办孤寡老人的丧事,向华工进行宣传教育等。1933年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成立。二战后美国华人的业缘组织有了新的变化,如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8年设)、新中国研究会(1949年设)、(纽约)中国语言文化教师协会(1958年设)等。

其他各国也有名目繁多的华侨同业组织。以餐饮业为例,如:荷兰中国饮食业公会,前身为荷兰中国餐馆同业工会,1964年成立,1985年改今名,旨在维护同行利益,争取各项优惠待遇,帮助同行了解荷兰的有关法律、税务及管理。英国京菜业同业联谊会(1980年设)和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1988年设),旨在提高华人饮食业的

水准,争取合法权益,团结互助,交流经验。据统计,英国有中餐馆3000家以上。德国有不来梅中国餐饮者公会(1988年设),等等。

第五节 社会文化组织

华侨华人的社会文化组织包括慈善、互助、青年、妇女、宗教、康乐、体育、社交、联谊、艺术以及教育等类团体。这些组织更使华侨华人形成了一个属于各所在国同一民族的文化圈子。

一、慈善、互助组织

中国海外移民秉承中华民族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建立了慈善、互助类团体,以帮助族胞摆脱初到异域的陌生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寻求健康、稳定的发展。起初,这些工作是由寺庙和乡族团体兼办的。后来,各地渐渐有了慈善社、善后社、医疗院、养老院、慈幼院、收容所、保良局、兼善公所、善举公会等。还有仿照或近似帮会的互助组织,如美洲的秉公堂、协胜公会、安良工商会;南洋地区的互助社、金兰社、盟心社、青莲堂和利胜堂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华人创立各种慈善性质的基金会,以扶助同胞,利益社会。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华侨秘密会党是影响华侨社会的重要力量。这种组织多源于中国的一些秘密结社或反政府团体。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秘密会党即源于中国的天地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的义兴会派生出广府帮、福建帮、潮州帮、客家帮和海南帮5个义兴会。1876年,新加坡和槟榔屿仅登记的秘密会党就有72个^①。

^① 可儿弘明:《从新大陆转向东南亚的“猪花”》,《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

会党成员多为下层华侨民众。华侨会党成为他们互助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封建、神秘和破坏等缺点,形成了帮派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华侨整体的不团结。1890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危险社团镇压法令》,取缔秘密会党,新加坡的六大秘密会党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和广肇惠宣布解散。

洪门会一致公堂是华侨秘密结社互助的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洪门组织名目繁多,如洪字会、洪门会、洪顺堂、金兰群、义兴、海山、(洪门)致公堂、大伯公、协胜堂、竹林山房等。它源于中国的天地会,特点是超越地缘与血缘,会众经济地位低下,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十九世纪后期,洪门组织在美洲、后来又在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全美活动的有协胜公会(1970年设),在美国西部和西北部活动的有秉公堂(1878年设),还有安良堂和英瑞堂。1907年,美国华侨有7万余人,而“名列会籍者十之八九”。凡入会者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遵守会规,会员之间情同手足,讲究义气,且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帮助洪门组织进行改革,重订致公堂会章:本堂义务在于“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周恤同人”,“光复祖国,拯救同胞”^①,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进步组织。还通过洪门致公堂的组织使之成为华侨社会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络。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了全球洪门代表大会,改致公堂为中国民治党。1925年在纽约召开全美洲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比较有影响的组织如:(1)美国洪门致公堂,总堂在旧金山,各埠有分堂。(2)加拿大温哥华美洲洪门民治党总部,属下有7个分会。(3)澳洲致公堂,初为澳洲义兴会,1912年改称华人共济会,1919年更为现名,

^① 转引自俞云波:《美洲致公堂与辛亥革命》,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总部在悉尼。(4)新西兰洪门致公堂,初系广东籍华侨在惠灵顿、奥克兰等地设立的堂口,旨在保护会员的正当权益,免受当地黑社会集团及流氓的欺凌,并开展社会福利活动,1926年以后渐趋衰落。(5)菲律宾洪门有五大体系,即菲律宾洪门进步党,其前身在1850年以前即已出现,后有洪顺堂(1899年)、义英堂、义福堂(1902年)等,1910年成立总部,在北吕宋、米骨、宿务、棉兰老等地设有分会,成员多为闽南人,以“忠心义气”为党训,对内精诚团结、谋求党员福利,对外致力于社会慈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菲律宾洪门致公堂,1900年成立,以粤籍华侨居多;洪门秉公社(1932年);洪门竹林协议团(1922年);洪门协和竞业总社(1928年)。(6)缅甸洪门和胜公司,原为1826年成立的风山寺,属下有10余个团体,如群忠社、群义社等,在各埠有20多个分公司,会员为福建籍下层华侨,举办迎神赛会,代会友操办红白喜事,救济贫苦会友等。二战以后仍然存在的洪门组织已褪去了它的政治意义,成为纯社会性组织,专注于社会福利、文化善举,同时也促进当地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华侨医院是维系华侨社会团结、救死扶伤的有效手段。如在亚洲,1881年叶观盛创办了马来亚第一所中医院,即培善堂,供锡矿工人就医,对去世的贫寒华侨施棺助葬。1885年,粤侨何道生、梁炯堂等发起集资建立同济医院。1910年,粤籍侨商黄亚福等创设新加坡广惠肇留医院,初期只收广东籍华人,1974年向社会开放。

1903年,泰国广肇籍华侨创办广肇医院,旨在解决旅泰贫寒乡亲求医就药的问题。1905年,刘继宾等在曼谷创设天华医院,以帮助贫困病人、施医赠药为旨趣。

1909年,闽侨在越南西堤设立福善医院。1916年,潮籍华侨又创西堤潮州六邑医院。1926年,客家华侨创立堤岸崇正医院。

1891年设于马尼拉的菲律宾中华崇仁总医院,是非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医院。1985年,菲律宾加洛干菲华商会等六大华人社团联合成立加洛干菲华义诊所,旨在为病人免费诊医和赠送药品,等等。

1924年,印度尼西亚华人柯全寿发起创建养生院,旨在为广大下层华侨提供保健服务,“医治病人及为产妇接生,尤注重救治贫困病人。诊费从廉。训练女护士及助产士,定期对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及养育婴儿方法”等等。

在美洲,有美国纽约、旧金山的华侨医院,即东华医局,分别创于1887年和1900年。1885年,加拿大华侨开办维多利亚中华医院。1921年,牙买加华侨创办了华侨医院。

实际上,除了专门性的福利、慈善、互助组织外,大多数华侨华人社团也都具有这些功能,能否为公众办实事、谋福利,是社团发展的一个关键。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是非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此类机构中十分典型。1877年它创于马尼拉,初名菲律宾中华总会善举公所,由华人甲必丹掌管。1898年易名小吕宋华侨善举公所闽粤总会,由中国驻菲领事馆领导。1906年组织董事会,自行管理。1932年更为今名,作为一个纯慈善、救济、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组织。属下有菲律宾中华崇仁总医院、华侨义山、护士学校和华侨收容所。既为华侨、华人服务,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

有关华侨华人生老病死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有相应的互助机构,使受惠者感到了族人的亲切与温暖。还有一些组织资助贫寒子弟入学,如印尼三宝垄新友社(1945年),1946年创办“国语讲习班”,次年又办新友义校,招收贫侨子女免费入学。二战后,这些组织渐渐面向更多的华人,甚至面向当地土著社会。

二、康乐、体育与联谊组织

以娱乐心志、保健体魄、联络情感为旨趣的组织在华侨华人社会也是较普遍的。早期华侨因忙于生计或财力有限,不太注重文体活动。二战以后才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在华侨华人较集中的国家或地区。

(一) 康乐、体育团体

新加坡有娱乐、联谊并举的俱乐部组织,二战前较有名的俱乐部有:醉花林俱乐部(1849年设),潮州华侨所创;怡和轩俱乐部(1895年设),会员无籍贯之限,但以闽籍居多,多数是殷商,社会地位较高,陈嘉庚曾为该俱乐部主席;威基利俱乐部(1896年设),为新加坡华侨富商组织,创办人李俊源,主要成员有胡文虎、宋旺相、余东璇、林文庆、陈祯禄、李光前、邵仁枚兄弟等,胡文虎曾为俱乐部主席,每周聚会一次,以英语为通用语,热衷于在华侨中推广英文教育,1960年才吸收讲华语的商人入会;吾庐俱乐部(1907年设),初名“古寄乐”,后改“吾庐”,即“吾爱吾庐”之意,会员均为闽籍;海天俱乐部(1918年设),后改名海天游艺会,多为粤籍华侨,该会附设白话剧团,有时演戏筹款,热心公益;联商俱乐部(1923年设),均为海南华侨。其他还有华侨俱乐部(1926年设)、景源俱乐部(1936年设)、银同俱乐部(1923年设)、嚶嚶俱乐部(1936年设,为戒烟、戒嫖、戒赌同盟)、同仁俱乐部(1911年设)、中兴俱乐部(1938年设)、乐间俱乐部(1937年设)、闽庐俱乐部(1936年设)、桃源俱乐部(1922年设)、南声俱乐部(1910年设)、志仁俱乐部(1926年设)和振华俱乐部(1920年设)等。1937年各类大小俱乐部有七八十家之多。

新加坡的体育组织有:爱群体育社(1937年设),中华国术研究会(1938年设),南华体育会(1935年设),维扬体育会(1933年设),

醒狮体育会(1934年设),星华足网球队联合筹赈会(1938年设),中华体育促进会(1939年设),华侨篮排球总会(1934年设)以及新加坡精武体育会(1922年设)等。精武体育会系新加坡华人最早的武术团体,历任会长为林义顺、胡文虎等,1923年设女子部,先后设华语班、商业簿记班、艺术科、歌剧团、太极拳班、粤乐科、歌咏队和篮球队等,二战后又增设摔跤队、互助善后部、羽毛球队、武术师资训练班、京剧团、武术艺术训练班和安老院等。

马来西亚精武总会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体育团体,有13个地方分会,以1921年成立的雪兰莪精武会为最早。1978年起各地精武分会每年轮流举办嘉年华会,进行武术、乒乓球、羽毛球和绘画比赛,以体现“乃文乃武”的精神。

菲律宾的康乐、体育团体主要有:(1)旅菲鸣谦柔术社,1935年陈家鸿等为弘扬中华武术(五祖拳法)在马尼拉发起创办,以温良恭俭让为社训,林天水为首任社长。1937年改名为中华鸣谦国术社,社务发展,会员增至三四百人。这年该社倡议中华武术世界大团结,举行全马尼拉中华武术联合表演,除本社外,有青年会国术队、尚武国术社、群英国术社和侨界武术名宿参加,轰动一时。1945年后该社还建立了羽毛球队、舞龙队和舞狮队等。(2)菲律宾光汉国术馆,1937年由福建泉州南少林传人、旅菲华侨卢言秋于马尼拉创立,在菲各省市设有6个分馆,拥有会员1300余人。主要传授少林拳和刀、枪、剑、棍、戟等32种兵器,秉承扶危济贫的武德,多次筹款赈济菲律宾灾民。1982年该馆馆主卢庆辉率队赴中国参加比赛;1988年组织金禧访华团赴福建泉州南少林寺寻根。(3)菲律宾中国气功学会,1986年成立于马尼拉,旨在推广传播中国气功,增强菲律宾人和华人的体质,加深华、菲人民之间的感情,共同建设菲律宾。通过报刊向华人介绍气功原理、功法、中国医学;聘请中国教练,传授气功。(4)菲律宾武术协会,1987年成立,旨在把优良的中华武术技击体育介绍给菲律

宾人民,以加深华、菲感情。该会加入了亚洲武术联合会。通过新闻媒介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武术训练,在各地进行武术表演,还与各学校合作,把武术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并加强与世界各地武术团体的交流。(5)菲华联合田径会,为唯一的全菲性华人田径体育团体,每年举行一次田径运动会。(6)菲华异尔国术学院,1972年洪来成等成立于马尼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鼓励和培养华裔青少年健身,定期训练赫派太极拳,并教导气功、空手道、狮阵、舞龙、高跷等民俗体育。(7)菲华体育总会,1988年成立,会长陈永裁,旨在振兴和发展菲华体育运动,培养体育人才,促进与国际体育活动的联系。凡从事体育运动的菲华体育团体、学校、宗亲会及其它社会团体或个人均可入会,实行理事会负责制,下设足球、篮球、田径、象棋、网球、游泳、乒乓、保龄球、排球、羽毛球、武术、举重、健美、手球、自行车运动等委员会。

越南的各类华侨体育会较为发达,以西堤为多。南北统一前,西堤即有南星、精武、广肇、义安、崇正、励志、华侨、福华和中青等10余个体育会,开展各项球类和田径运动,提倡国术,还邀请泰国、菲律宾等地华人体育团体进行比赛。如越南精武体育会,1922年成立,是堤岸华侨重要的体育团体,首任总理叶伯行,初期会员80余人。后改为学校制,称越南精武体育学校,旨在提倡体育,发扬智、仁、勇三德,完善自我。学校主授中国武术,并设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象棋、弦乐及西乐等组。1929年会员达700余人,处于全盛期,1947年采用理监事会制,下设各项目委员会,训练中华拳术,开展各项体育竞赛,出版体育杂志等。

其他国家或地区较有名的华侨华人体育组织有:

印尼华侨体育促进会,1954年于雅加达成立,为各华侨社团与学校所属球队组成的统一机构,旨在发展华侨体育,发扬民族精神。体育项目有球类(包括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田

径、游泳及其他。曾在雅加达、三宝壟和泗水举行三次全印尼性的华侨运动大会。以后因华侨入籍当地，处境日艰而会务渐荒。

缅甸华侨体育总会，1934年于仰光成立，旨在推进全缅华侨体育运动，发扬互助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该会定期举办全缅性华侨运动会，至1961年已办过20届此类运动会。平日它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地侨团、侨校的体育活动，举办或组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进行体育宣传，培训体育干部。1965年以后停止活动。

美国华人体育会，1985年于纽约成立，旨在发展华人体育运动，增强华人体质，促进华人体育文化的交流。该会组建了篮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

旅荷(兰)华侨武术协会，1986年成立，旨在弘扬中华武术，强健身体，增进荷中友谊。经常举办各类武术、太极拳和气功训练班。

法国中华国术总会，1984年于巴黎成立，旨在推广中华传统武术，健壮体魄，促进法中民间体育文化交流。实行理监事会制，设有财务、交际、福利、旅游、康乐等机构。下有六合拳、太极拳、螳螂拳、长拳、莫家拳、蔡拳、醉拳、白眉、精武会等武术组。举办武术表演和比赛。1986年在里昂设分会。

法华国术协会，1987年由法亚文化友爱会、谢卓贤洪侠拳国术总会和竹溪太极螳螂国术同学会等筹组而成。旨在团结法国各中华武术团体，消除门户之见，切磋武艺，增进友谊。每年举行一次武术观摩大会，广邀法国及世界各地的武术团体参加，使中华武术在世界生花。

此外还有(法国)岭南文娱体育会(1982年)、法华体育协会(1989年)、法中古典气功研究协会(1987年)、(柬埔寨)金边柔道会(1951年)、(秘鲁)利马华侨体育会(1918年)、全荷(兰)华人体育运动大会(1985年)、汉堡华人文娱体育会(1988年)等。

(二) 联谊团体

有各种联谊会、校友会、同学会等，不具有政治性质，旨在联络会

员之间的感情。校友会的目的在于沟通与联络感情,并对母校的改革、校友的福利提出建议或提供赞助。

新加坡的校友会,分为当地华文学校校友会和毕业于中国学校如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等诸校校友会两大类。至1942年,已成立有南庐学友会和端蒙、崇正、工商、爱同、养正、育英、同民、集美和同文等校友会。各有几十人至二三百人不等。南洋大学在新加坡、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等地成立校友会。

马来西亚的校友会,以檳城为例,至1942年已有同善、陈民、丘民、钟灵、中山、时中、台校、三民、中华、圣事济和慕义等校友会。1974年,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留学中国台湾校友会组织联合总会,有18个团体会员,旨在促进各校友会之间的联系,推动校友会的福利工作,积极组织有益的教育、娱乐和福利活动,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和交流。该会附设合唱团、舞蹈团和戏剧组,多次举办书画艺术作品联合展、华校中学生短篇文艺创作选集征文等活动。

越南在独立前有中法同学会(1927年),1947年更名中法校友会,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该会除联欢交谊、举办音乐和体育活动外,还创办了一所远东中学、一家图书馆,同时进行职业介绍。

美国华人的同学会颇具影响。中国各大学如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校许多毕业生前往美国深造,后有些留居美国,组成校友会,不时聚会,交流信息,加强与母校的联系,促进中美民间文化交流。

法国端华校友会,系1987年由来自柬埔寨端华华文学校的校友组织,旨在联络各地端华校友,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团结从事教育与学术的华裔人士,发扬中华教育精神。该会实行理事会制,设有财务、交际、康乐、文化、福利等组。

这些同学会或校友会具有较强的凝聚性。即使在华文学校被取

缔或限制的国家(如印尼),华人同学会仍十分活跃。此外,还有一些跨行业的华人联谊会,如:

加拿大渥太华华人联谊会,1970年成立,旨在发展华人的福利与互助合作,开展华人社区的文化活动,增进当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加中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初期会员多为老一代华人,后逐渐吸收华裔青年和科技人员入会。

法国蓝色海岸华人联谊会,1989年成立,系包括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尼斯、戛纳、圣·托贝等城市的华人组织。旨在促进相互团结,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加速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福利,组织各种文教体育活动。

此外还有由印度支那华裔组成的瑞士华人联谊会(1980年设),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联谊会(1971年设),由来自越南西贡的华侨在法国巴黎组织的旅法湄江联谊会(1981年设),英国爱丁堡华人联谊会(1980年设),英国莎里华人联谊会(1978年设),英国丹地华人联谊会(1984年设),由香港、广东籍华人组成的荷兰华人联谊会(1976年设),荷兰台湾乡亲联谊会(1989年设),意大利都灵华侨华人联谊会(1986年设),意大利罗马华侨联谊会(1985年设),丹麦华人友谊会(1978年设),瑞士日内瓦华人联谊会(1983年设)等。这些联谊会大多旨在促进所在国家或地区华侨华人的团结,增进会众福利,发扬中华文化,沟通与中国的联系。这些联谊会普遍存在于西方国家,且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华人新移民世界范围的移动而不断增多。

三、青年与妇女组织

妇女是华侨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年则是华族发展的生力军。青年与妇女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华族全面发展和社会地

位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华侨华人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青年与妇女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高潮: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全民动员,抗日救亡,青年为先,男女老少,不甘为后,纷纷成立组织。青年组织有青年会、青年协进会、青年建设社、青年协会、学生总会和青年社团总会等;妇女团体有妇女会、妇女互助会、妇女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妇女联谊会等。二是二战后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土生华人社会的发展和华侨华人社会新旧更替进程的加快,青年与妇女组织日见活跃。

(一) 青年组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马华侨组织了一种旨在砥砺青年德、智、体、群四育修养的“励志社”,如青年励志社(1910年设)、茶阳励志社(1934年设)、韩江励志社(1939年设)等。青年励志社提倡青年四不主义: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创办夜校与月刊,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包括演话剧、办演讲与展览会,进行球类比赛,举办音乐会和文艺会。二战后,传统宗乡组织多附设青年工作部,进行多种适合年轻人特点的活动,鼓励青年一代保持华族文化传统。

在菲律宾有:(1)菲律宾华侨青年学社,1937年由庄杰浩、蔡俊华等发起成立于马尼拉,旨在团结广大华侨青年,深入开展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其成员或组织文艺队伍,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救国戏剧,或奔赴抗日前线杀敌。1975年更名菲华青年学社。1987年该社社长蔡宗炳强调发扬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文化,为促进中菲文化交流作出贡献。(2)1942年中国国民党系统的华侨青年在马尼拉成立“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3)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7年于马尼拉成立,系菲华青年创办的社会团体暨学术研究、文化宣传机构。该会主张视菲律宾为自己的国家,华菲融合,以菲律宾民族和菲华社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反对党派政治,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菲律宾的民族文化,推动菲华社会的改革,树立俭朴的新

风尚等。出版会刊《融合》。

在缅甸有：(1)中国反帝大同盟缅甸流通社，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缅甸华侨文艺界组织的第一个抗日救国进步社团。旨在传播马列主义，团结缅华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界师生，抗敌救国。创办《南国生活》和《南国导报》杂志；支持《椰风》、《芭雨》和《黎明》等文艺副刊。并帮助建立了缅华青年学会。(2)华侨青年团，1923年成立于仰光，系由华侨报人和华校教师发起，会员多为青年。该会倡导正当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排演话剧、歌咏，开展乒乓球赛，开办义务夜校，设国语（中国普通话）、英语、尺牍等课程，还创办了图书馆，收藏“五四”运动前后出版的书刊。会员参与了戒绝放荡、赌博、饮酒等运动。(3)缅甸华侨学生联合会，1949年成立，主席之下设财务、总务、社会、学术、康乐和组织等股，旨在团结缅华学生，谋取学生福利，共同推进学习，协助学校进行教育改革，追求民主与自由。主办《缅华学生周刊》，设暑期补习班，办夜校为缅甸华侨社会服务。(4)缅甸洪门青年联合会，1954年成立，旨在团结友爱，发扬洪门优良传统，遵守当地政府法令，爱国救乡。主要从事华侨社会福利工作。建立乐队，每逢节日举行文艺演出。此外还有缅华自由青年总社、缅华爱国青年协进会等。

在印度尼西亚有：(1)印尼苏岛中华青年协会总会，系苏门答腊岛华侨青年组织，1950年成立。该会设正副主席各1人，下置总务部、财政部、组织部、交际部、福利部、康乐部、宣传部、教育部、童军部、女青年部、少年部。康乐部内设游泳、乒乓、羽毛球、篮球、歌咏、舞龙、游艺等团队。宣传部内设图书馆、书刊发行委员会。(2)印尼华侨学生联合总会，1956年成立，参加者系华文学校学生。随着这些学校被取缔，该组织也宣告解体。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青年组织有：暹罗华侨青年会，1945年由泰国曼谷的力群社、互励社和海外抗日青年团等合组而成，在全国有20多个分会。西堤华侨青年会，1946年在越南西贡成立，会员

每周集会,学习讨论,进行文体活动,出版《青年周刊》,1949年被迫解散。墨尔本少年中国会,1911年由澳大利亚华侨刘月池等发起而成立,主张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领导《警东报》同《东华报》论战,反对保皇,支援革命。棱镜旅法亚裔青年会,是1988年在法国成立的以华人青年为主的组织,旨在促进相互了解,融入法国社会,并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为此多次举办有关哲学、社会、经济等题材的报告会,组织适合年轻人的文体和旅游活动,还办有各种展览会、文化补习班、电脑班、儿童绘画比赛等。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华人青年会,1985年成立,倡导青少年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如举办保龄球赛、舞会、聚餐和滑雪团,推动互助团结精神,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英国伦敦华人青年学友会,1973年成立。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华侨青年会,1937年成立,初为支援中国抗日救国,二战后,先期会员后裔虽多不谙华语,但仍参加该会活动,如举行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表演狮舞和龙舞等。

美国华人青年组织十分发达。随着土生华人数量的日增,面对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希望建立反映土生华人利益的组织以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合法的公民权利。1895年,旧金山土生华人青年成立了土生华人子弟会,即同源总会。该会旨在联络土生华裔感情,互相支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至1917年,已在奥克兰、洛杉矶、斐士那、纽约和芝加哥成立了分会,1921年波士顿、匹兹堡、底特律和波特兰等地的分会相继成立。同源总会成为全美性土生华人组织。该会创立了抚恤金制度,增进会员福利,尤其注意对华裔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如组织作文比赛、歌咏队、夏令营以及周末舞会等。还据理向美国各级政府交涉,要求废除歧视华裔的移民法令。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华侨华人青年团体很活跃。如旧金山华侨民主青年团,演出反映华侨华人社会生活的剧目以及中国的《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创办中文期刊,使用简体汉字,1958年开办用汉语拼音授课的国语

班,帮助入美的中国青少年学习科技知识,次年该组织解散。旋又有海燕社、浪潮社、群星社等青年团体。

(二) 妇女组织

新、马地区在1900年即有南洋第一所女子学校,女权运动随之兴起,但华侨妇女组织兴起较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华侨妇女不甘落后,各类团体应之而生。如泰国华侨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有侍女等;西堤华侨妇女救灾会,1937年成立,会员多为工厂女工;缅甸华侨妇女联合会,1935年成立,旨在改善并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等等。

华侨华人妇女地位的真正改善是二战以后逐渐得以实现的。东南亚各国华人女性接受正规、完整的教育,进入经济领域,取得成绩;北美华人女性在政治舞台上渐渐崭露头角。主要组织如:(1)暹罗华侨妇女会,1945年在曼谷成立,旨在寻求妇女解放,普及妇女教育,协助建国救乡等。1953年解散。(2)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妇女协会,1945年成立,旨在团结华侨妇女,提高妇女地位。设有文教部、人事部、组织部和家政部。其主要活动有创办妇女识字班和妇协小学,成立歌咏队,教唱爱国进步歌曲,保护女工合法权益,反对包办婚姻,聘请华裔医生驻会门诊,为会员及家属免费医疗等。(3)菲华妇女会,原为1937年成立的中国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1952年更为今名,旨在参加菲华各慈善机构及协助菲华社会福利工作,如救济灾民,开办烹饪班及职业、婚姻辅导中心,1972年建妇女养老院,1987年建妇女之家和康乐中心等。(4)缅甸仰光华裔妇女协会,1948年成立。会员包括女工、主妇、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该会开展多种文化活动,改善福利与精神生活,解决婚姻纠纷,开办夜校和缝纫合作社。(5)西堤华侨妇女互助社,1947年成立于西贡,社员多为中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女工,举办读书会、歌咏队、时事座谈会、识字班、缝纫组。(6)美国华裔妇女会,1977年成立,旨在团结全美华人妇女,谋求福利与平等。

1987年有30多个分会。该会帮助新移民寻找工作,教授英文,每年例会探讨华裔妇女与当地其它民族通婚及代沟等问题。(7)英国华侨妇女会,1981年成立于伦敦。(8)英国塞锡斯郡中华妇女会,1983年成立,旨在联络英国华侨华人妇女感情,互相扶持,发扬中华文化。开设烹饪、美容、编织、插花、书法、国画、裁剪、英文、西点和运动健身班。(9)泰华妇女联合会,1987年由泰国潮州会馆、客属总会和福建、广肇、台湾、海南等会馆妇女股主任及泰华妇女界名人发起创建,为国家妇女院会员,旨在沟通情感,提高泰华妇女社会地位与福利,促进各族妇女之间的了解。(10)德国汉堡中华妇女合唱团,系在德华人女性文化联谊团体。(11)澳洲中华妇女联合会,1954年成立。

华人妇女之间联系的加强,亲睦友善,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华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文化教育组织

纯文化教育组织主要包括书报社、文化供应社、励志社、校友会、同学会、研究会、戏剧及音乐团体和教师会等。1956年,海外各地文教团体约184个,其中以印尼为多,有44个,余则依次为马来西亚30个,菲律宾22个,泰国19个,缅甸13个等^①。这里重点介绍书报社和教师会。

(一) 书报社、图书馆与文化中心

书报社是二十世纪初盛行于南洋华侨中的一种文化组织,类似图书馆,华侨可以随时阅览书报,交流信息,也是中国革命力量借重的地方。

在新马地区,1903年至1911年间成立的书报社有60多个,以

^① 《华侨志·总志》,第364页。

星洲书报社为最早(1903年设)。此后又兴起一大批。如:檳城阅书报社,1908年由中國同盟會檳榔嶼分會潘兆鵬所創。新加坡同德書報社,1911年由中國同盟會會員張永福、陳楚楠等17人創設,初為革命宣傳機關,民國建立後為純華僑文教社團。孫中山親筆題寫該社社名。該社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選舉產生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下設總務、財務、圖書、慈善、教育、演講、體育、劇務部門。另有星洲書報社、沙撈越啟明書報社、山打根中華書報社、(新加坡)志同書報社、平民閱書報社、愛群書報社、樂英書報社和冠南書報社等。書報社以傳播三民主義、启发華僑為主旨,並提倡國語,改良華僑風習,廣置書報供華僑披閱。

繼新馬之後,東南亞其他地區如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等紛起響應。印尼有雅加達華僑書報社、大亞齊書報社、泗水明新書報社、巨港華僑書報社、三寶壟樂群書報社等。緬華閱書報社,也稱覺民書報社,系中國同盟會緬甸分會的別稱,1908年於仰光建立;緬甸各地分會組織計30餘處,其中曼德勒分會稱振漢書報社,毛淡棉分會稱漢聲書報社,勃生分會稱漢興書報社等。民國初年美國舊金山有平民書報社,以閱書讀報、談話演說、研究學理、交換知識、輔助社會教育、聯絡僑胞感情為宗旨。

民國肇始,書報社致力於開展多種活動。印尼馬辰中華書報社擴展為中華總商會,蘇門答臘的明德書報社還辦有小學。菲律賓馬尼拉普智書報社亦有《公理報》。泰國曼谷聯合書報社舉辦中華學校,普通書報社曾改辦初步學堂,後又聯合各幫辦新民學校。馬來亞檳城益華學校附設於益智書報社內,檳城書報社還創有鐘靈中學。它們對於華僑社會文化教育的普及起了積極作用。

1940年新加坡六一社倡組華人公共圖書館,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入侵而告停。二戰後,一些正規的華僑華人圖書館建立,或獨立,或附設於會館與華文學校之內。如:(1)緬華圖書館,1956年於仰光

成立,旨在提倡大众文化,增进知识技能,促进中缅文化交流。藏书 1.3 万册,经费来自华侨捐助,由华侨团体代表及各界名流组成 135 人委员会,再选出 15 人委员会进行管理。(2)南越中华图书馆,1954 年由南越中华总商会联合华侨社会各界租地兴建,内藏《四库全书》珍版初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中国历史典籍以及各种华文杂志,以 21 人董事会为行政管理机构。(3)菲律宾华侨图书馆,1953 年于马尼拉建立,旨在提倡华侨社会读书风气,提高文教水准。内设华侨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负责选购华、英文图书,聘请职员,编目保管。1955 年改由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的福利委员会接办,约有中文图书 1.3 万余册,英文图书 3500 余册。(4)三藩市(美国旧金山)美洲图书馆,1961 年由华侨李庆增创办。据统计,1969 年海外各国华人图书馆和书报社有 87 个,其中亚洲占 70 个。^①

此外,各类文化中心、文化协会也是一种新型的华人文化传播机构。如:(1)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华文化中心,1983 年由雷镇宇创办,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图书阅览室。(2)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华文化中心,1973 年注册为慈善团体,根据最初设计,内有博物馆、图书馆及档案室,以收集、整理和保存加拿大华人历史文物,提供华人社区所需的华文史籍和资料,使华裔青年了解他们的“根”。该中心多次举办书画和摄影展览、华人历史文物图片展览、讲座、艺术(国画、书法、西洋画)和语言(普通话、粤语、英语)学习班、运动会、节日(圣诞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庆祝会。(3)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1965 年成立,旨在弘扬中国和华裔文化。(4)秘鲁华秘文化中心,1981 年于利马成立,旨在不分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增进华侨华人及其后裔的友谊、团结和互助,传播中华文化传统。(5)阿根廷中国文化中心,1980 年由该国华人王铮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旨在弘扬

^① 朱敬先:《华侨教育》,台北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237 页。

中华传统文化。举办易经、太极拳、少林拳、中国烹饪、中国画、针灸、推拿等班。(6)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1988年于路易港成立,内设图书馆、阅览室、录像放映厅和电影厅。阅览室藏书1万余册,报刊杂志三四十种。举办华语班和中国武术班,以及中国美术陶瓷、工艺、电影、书画展览和学生华语作文比赛等活动。(7)法国巴黎华侨文教服务中心,1988年创立,设有图书馆,华侨华人可免费借图书和录像带等。(8)英国中华文化中心,1988年于伦敦成立,旨在推动本地华人的文化活动,促进华人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开办有关中国书法、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烹饪和武术等课程与讲座。(9)英国曼彻斯特中国教育文化社区中心,1980年成立,旨在促进华人团结,提高其子女的教育与文化水平,设有华文、英文、书法、康乐、音乐、戏剧等兴趣小组。(10)意大利探索文化中心,1987年由华侨青年孙子系于米兰创立,旨在帮助华侨青年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保存自己的“根”。经营华文书店,举办中国电影周。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华社资料中心、新加坡宗乡总会资料中心等。

(二) 教师会、教育会

教师会系华文学校教师联合组织,旨在联络感情,促进华文教育;教育会、文教促进会系华校联合组织或领导机构。凡是有华文教育的国家,就有相应的华校或教师组织。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1)新加坡华校联合会,1946年由新加坡养正、南华、端蒙、崇正等校发起成立,初名新加坡华校校际联谊会,旨在健全华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和改善教职员福利。并负责选编教材、拟定教学时间,吁请政府向华校提供津贴。(2)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49年由林连玉等17位华校教育家发起成立。首任主席余思庆。常务理事会内设主席、总务、财政、秘书、研究、调查、交际、查帐等职。(3)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51年由吉隆坡、檳城和马六甲三个华侨教师公会发起并在吉隆坡成立。旨在谋求华教福利,发扬中

华文化,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总会主席由各教师公会轮值,首届主席为陈充恩。(4)马来亚雪兰莪华校董事联合会,1953年成立,旨在联络本州各华校董事,以促进华校的发展;团结马华社会,共谋改善华文教育,代表本州华校与政府商讨有关华校的事宜。1954年即有团体会员50个。1958年联合召开全国学校社团大会。1983年与教总联合召开全国华文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

在印度尼西亚有:(1)爪哇学务总会,1907年由荷印中华总会改名而成,负责爪哇华侨教育事宜,旨在促进会员(各地华校)之间的联系与团结,提高各地华校的教育质量,聘请若干视学员监督各地华校情况,筹募教育基金。1911年所属会员有93个,并改名为荷印华侨学务总会。1917年举办教育研究会,到会的各地华校代表有78人,研究如何提高教育质量。1918年出版中印尼文《教育月报》,刊登有关学校研究和调查等文章。1919年召开荷印各华校董事代表大会。1923年、1926年两次在爪哇日惹举行教育研究会,确定华校的教育宗旨。1926年出版学务总会半月刊和《荷印华侨教育鉴》。1927年该会解散。(2)1923年泗水华文教育工作者组织教员联合会,出版《教育与儿童》杂志。(3)棉兰华校教育总会,1930年由棉兰中华总商会和糖米公会倡立,将本市6所华校的董事会合而为一,以统筹办理华校。下属有棉兰华侨教育研究会,内设研究、总务、编辑、图书、演讲、体育及娱乐等7个部,出版《教育曙光》半月刊。总会下属8所学校均为会员。

在菲律宾有:(1)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总会,1957年成立,旨在规划全菲华校的发展,推广华人教育文化事业。(2)菲律宾华侨教育会,1914年于马尼拉成立,以统筹管理与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为宗旨。首任会长陈迎来。1918年管理中西、普智、爱国、闽侨、华侨公学等校。1923年办华侨中学校。1924年特设学务部,以各校校长为部员,统管马尼拉侨校。(3)菲律宾华文教师协会,1984年于马尼拉成

立,旨在促进菲律宾华文教育,促进华文教师的团结与福利。凡菲岛各地华文学校教师均可入会。

在缅甸有:(1)缅甸华侨教育总会,初为1915年成立的缅甸华侨学务总会,1919年更为今名。为缅甸华校最高统筹机构。1937年作为中国华侨教育总会缅甸分会,旨在加强各华校之间的联系,培养师资,推动华侨学生的课外活动,以培养热爱祖国、互助团结的精神。该会主办缅华公立师范学校,每年举办全缅华校运动会、学生成绩和工艺展览会、节日游行和游艺会,代表华校同缅甸政府交涉有关校务。(2)缅甸华侨教师联合会,1949年于仰光成立,系缅华中小学教师组织,旨在团结华校教师,推进教学工作,维护教师的正当权益,执行“面向当地”的教育方针。下属有勃生、勃东掸和缅西等3个分会。(3)缅甸华侨文化教育促进会,1951年成立,实行监理事会制,设秘书处、总务组、财务组、文化组、教育组、康乐组和服务组。“以发扬我中华民族固有道德文化及和平精神以及促进中缅文化交流,提高华侨教育为宗旨。”^①还推行成人教育,出版《文教通讯》。

在越南有:西堤华侨教育会,1946年成立,1953年举行首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选举监理事会。旨在推进华侨教育,加强华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提高教职工福利,沟通与当地政府主管教育机关的联系,指导侨生回国升学等。凡西堤的华校及教职员,不分帮派,只要遵守本会章程,均可入会。1955年拥有团体会员(西堤华校)88个,个人会员1268人。1958年因南越当局排华而停止活动。

在泰国有:泰国华文教师公会,1984年成立,初名泰国华文教师联谊社。该会举办华文师资培训班、歌舞训练班,为华文学校推荐教师,旨在提高华文教师福利,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

^① 《华侨志·总志》,第361页。

在美国,1921年就有了统一的旨在加强各华校之间联系和提高华文教学质量的组织。1931年于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华侨教育会,旨在联络侨校,共谋美洲华侨教育的发展,1945年因经费困难而解散。

此外,还有旅韩华侨教师联谊会(1955年设)、印度华侨教育研究会(1951年设)等。

第六节 政治与救国组织

华侨华人政治组织发轫于秘密帮会团体,特别是洪门系统的组织,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然而,其真正的发展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康、梁改良派和孙中山革命党在海外的活动,纷纷建立政治组织。先有保皇党,后有同盟会乃至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建立支部。1946年美洲致公堂一律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计有该党组织54个。二战以后,随着华侨华人日益融入当地,华人为争取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平等地位而建立权益性、政治性组织,且在各国华人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五十年代,海外华侨约有政治团体879个,其中亚洲590个,美洲183个。^①

救国组织是海外华侨为了支援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而涌现出来的团体,以抗日救国团体为最多。

一、政治组织

华侨华人政治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组织到以当地国家和华人自身为中心的政治组织的演变。

^① 《华侨志·总志》,第365页。

（一）“中国化”的华侨政治组织

它们主要包括中国国内政治组织在海外各国华侨中的分支和一些自愿以中国为中心的华侨政治组织。

在檀香山建立的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兴中会（1894年）以及后来分布在日本和东南亚、北美各地的同盟会组织，基本上是以华侨为群众基础的组织。1900—1905年间，日本华侨中政治性社团如雨后春笋，一类是奉行改良主张的，一类是主张革命的，后者有勵志会、国民会、广东独立协会、青年会、共爱会、三点会、新华会、革命同志会、华兴会等多种。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关注着中国的命运。

新、马地区是华侨革命组织的重镇。1897年马来亚柔佛州有“救国十八友”的爱国团体，痛恨晚清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宣传革命救国。1901年兴中会领导人之一尤列在新加坡建立中和堂，团结华侨中下层和知识分子。1906年，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首先入会的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尤列、许子麟、黄耀庭等14人，以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次年，诸如黄乃裳、许雪秋、林受之、林文庆、陈嘉庚、何心田等400余人入会。此后，吉隆坡、檳榔屿、芙蓉、怡保、瓜捞庇拉、麻坡、关丹、林明、马六甲和沙捞越等地相继设立同盟分会。南洋英属各地，“大抵有华侨车辙马迹之地，几无不有同盟会员矣。”^①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胡汉民为支部长，统辖南洋各处分会和通讯处，并订立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16条及通讯办法3条。依章程，各分会均仿照革命军队编制，编成营、队、列、排，以此使“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长坚固，不致如散沙。”^①他们创办报刊，与保皇派进行论战；创立书报社，宣讲革命道理。这些团体的兴起不仅予中国的反清斗争以坚强的支

^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4页。

持,而且有力地刺激了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也是华侨社会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民国肇始,海外同盟会多改为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继续对华侨华人社会施加影响。以中国国民党驻檀香山总支部为例: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当地华侨何宽、李昌、邓荫南等人创立兴中会,议定规章,发表宣言,号召侨众革命救国,是为檀香山华侨政治组织之开端。为争取华侨民众的支持,他们以隆记报馆为基地,鼓吹革命,1903年孙中山还亲自撰文发表敬告同乡书,驳斥保皇论调。1907年创办《自由新报》,1911年倡立华文学校。1910年,孙中山指导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1912年,檀香山同盟会改为中国国民党檀香山支部(下有希炉、茂宜等分部),隶属于美国旧金山总支部;1924年改为檀香山总支部。该部创办《中华公报》,开设国语训练班,与中华会馆和总商会一起策动、组织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救灾。

(二) 当地化的华侨华人政治组织

争取华侨华人合法权益并参与当地政治的政治组织,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不断增大。

马来西亚:(1)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1968年成立,首届主席为林苍佑,大多数成员为华人。主张实行非种族主义、温和社会主义和民主;承认马来族特权,要求保留华文中学。主要力量在槟榔屿。参加马来西亚国会,1978年与联盟党合组槟榔屿州州政府。(2)马来西亚华人公会,1949年成立,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初为福利机构,1952年成为政治团体。后与其他组织合组马华联盟、马华印联盟。1974年加入马来西亚国民阵线。该会旨在保障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福利,促进各民族的亲善。1981年有党员约50万。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下设州联络委员会、区部和支部。此外还有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1948年)等。

印度尼西亚:荷属印尼的华人可分为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两大

集团,他们政治活动积极,形成过多种政治团体。如:(1)新报集团,系“二战”前以《新报》为核心,由政治上倾向中国的华侨华人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洪渊源、朱茂山、侯德广、郭恒节、郑坚成、柯全寿和郭克明等。他们主张华侨保留中国国籍,反对成为荷兰籍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华侨的靠山,反对参与当地政治和服兵役;主张华侨子弟同时接受华文教育和荷文教育,中华学校要当地化;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发动和领导反对荷兰国籍法运动,促进了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觉醒。(2)荷兰中华会,1911年于荷兰莱顿成立,系土生华人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多数成员为留荷的土生华人学生。后来该组织成员多数回到荷属东印度,联合受荷兰教育的华人知名人士、商人和官员,于1928年成立荷属东印度中华会。简福辉为会长。旨在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善荷属东印度华人的处境,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该会政治上倾向荷兰,鼓励华人儿童接受荷文教育。1933年该会在爪哇有12个支部^①。1932年中华会分裂,蔡锡胤、陈舜如等另组印尼土生华人联盟,认为印尼是他们的祖国,支持印尼民族主义。(3)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1954年于雅加达成立,首任主席萧玉灿。该会旨在使不同种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人都成为印尼真正的公民,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机会。它鼓励华裔加入印尼国籍,但反对全面同化于印尼主流社会,主张保持华人的民族特性,并寄希望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1955年该会属下的青年协商会成立。1965年在全印尼有65个分会,50万会员。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被印尼政府取缔。

美国:华人通过选举等途径努力参与当地政治。1983年,美国华人参政促进会在洛杉矶成立,首任会长为陈李婉若,旨在促进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此外还有:鼓励华人参政委员会,1985年于纽约成

^① 廖建裕:《爪哇土生华人政治》,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7页。

立,强调不分党派,不计私怨,同心同德,支持华人参政;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1972年成立,会员多为华裔青年知识分子,致力于谋求华人的正当权益,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出任政府官职等,还出版中英文版周报《东西报》;等等。

二、救国团体

为了支援祖国和侨居国的民族斗争而成立的团体,这在海外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之前普遍存在,尤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最为发达。从地区来看,又以东南亚为多,北美次之。这类组织,在如下国家较为突出:

菲律宾:(1)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1937年成立,为菲律宾华侨各界抗日、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组织,主席李清泉,杨启泰、薛芬士任副主席。设常务委员会,下有总务、募捐、抵制、宣传等组。各省市侨社设分支组织。(2)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1937年成立,旨在抗日救亡。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由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财政部和外交部组成。属下有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等团体。该会举办理论学习班,创立美范印务馆、建国中学、民族夜校和国防剧社。1939年出版《建国报》等。鼓励会员参加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组织回国慰劳团。1941年成立菲华抗日护侨委员会。1947年该联合会解散。据统计,在非先后建立的华侨抗日救国团体达143个^①,如怡朗华侨救亡协会(1936—1941年)等。

新加坡、马来西亚: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团体活跃地区,影响最大。1928年,日军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新、马122个华侨团体的

^① 转引自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1000 余名代表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同侨大会,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陈嘉庚为主席。该会有 33 名理事,其中闽帮 12 人,潮帮 10 人,粤帮 5 人,琼帮 2 人,嘉应帮 2 人,大埔帮和三江帮各 1 人。各主要埠镇也建立了筹赈组织。筹款活动深入到华侨社会各阶层、各帮之中,起到了团结华侨、爱国爱乡的作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各类救国团体层出不穷,如: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1932 年)。新加坡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 年由新加坡文化界协会、文艺作家协会、学生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店员联合会等发起成立。该会致电中国国民党,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同时,发动民众,积极募捐;组织锄奸团;联络各地抗日救国组织等。还有马来亚华侨各国救国联合会(1937 年)。“七七”事变后,8 月 15 日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陈嘉庚任主席。新加坡各地有 200 多个分支会^①,马来亚各地有筹赈会 207 个^②。同年还成立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以及各行业的抗援会,如学生抗援会、各业华工抗援会和青年抗援会等。各地筹赈会特设宣传部门,组织文艺、联谊、演讲、话剧、歌咏等队伍以促进下层民众的觉悟,提高对抗战意义的认识。华侨还成立中英物产联合研究会、国货研究部、肃清劣货委员会和国货宣传会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938 年 10 月 10 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成立,大会有来自香港、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 168 名代表。该会为统一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总机关。会址在新加坡。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

① 黄奕欢:《赤子丹心照汗青》,《回忆陈嘉庚》,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7—80 页。

② 柯木林等:《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1972 年。

律宾)。该会号召海外华侨团结一致,为保卫祖国、维护国际盟约和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并动员华侨慷慨贡献于国家,争取最后的胜利。总会下设 702 个分会。开展筹款,组织回国机工服务团、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等,支援中国的抗战。该会标志着南洋华侨的空前团结。在总会的推动下,还相继组织了东江华侨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南洋各埠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1939 年)、南洋英荷两属琼崖华侨救乡总会。1942 年总会停止活动。

此外,在其他各地成立的抗敌救国团体有:

缅甸的缅甸华侨救济总会(1937 年设)、华侨抵制日货总会(1937 年设)、缅甸华侨救亡联合会(1939 年成立,1940 年改为缅华店员联合会)、缅华文艺界救国后援会、缅甸华侨救亡歌咏团、缅甸华侨救护队(1938 年设)和中国反帝大同盟缅甸流通社(1939 年设)。流通社系华侨文艺界的抗日救国组织,曾创办《南国生活》、《南国导报》杂志,支持《椰风》、《芭雨》、《黎明》等文艺副刊。

泰国的暹罗反帝大同盟(1928 年设)、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938 年设,简称抗联)、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1945 年)等。参加“抗联”的组织有华侨工人抗日救国会、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华侨妇女抗日救国会、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华侨商界抗日救国会和华侨抗日先锋队等,遍布全泰各地,会员 10 万余人。

越南的越南华侨抗敌后援会(1935 年设);越南华侨救国总会(1937 年设),该会拥有 35 个分会,77 个团体会员;越南南圻华侨缩食救济兵灾慈善会(1931 年设);越南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1938 年设);越南华侨青年话剧队(1938 年设);南圻华侨救国总会(1938 年设);南圻华侨抗日救国同盟(1941 年设)等。

美国的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1934 年设)、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1931 年设)、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1936 年设)、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37 年设)、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1931 年设)、

美洲华侨航空协会(1934年设)、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1937—1948年)。

此外还有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抗日救国会(1931年设)、温尼泊抗日救国会(1931年设)、温哥华义捐救国总会(1937年设)、多伦多救国总会(1938年设);古巴的美洲华侨拥护工农革命大同盟(1928年设)、旅古华侨抗日后援总会(1931年设);牙买加的华侨抗日救国会(1931年设)、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委员会(1940年设);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设);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1937年设);旅英华侨抗日救国会(1936年设);旅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设);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1936年设)等。

以上抗日救国团体在“二战”后大多停止活动。

第七节 全国性综合团体

综合性华侨华人团体具有这样几种特点:(1)跨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联合;(2)全国范围;(3)通常是该国华侨华人团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华侨华人群体性不断增强的表现。由于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有些国家华侨华人的领导性团体通常又是地缘性或业缘性组织的联合,如泰国中华总商会,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等。“二战”以后,综合性团体日见增多。1955年,海外各地华侨综合团体有331个。

一、东南亚、东亚华人综合组织

除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泰国的中华会馆,新加坡的宗乡会馆联总会之外,其他起到对该国华侨华人的领导作用的

综合性组织有：

越南统一前，南越有西堤中华理事总会，1954年由七府公所重组而成，领导机构由西堤十帮正副理事长组成，内设总务、财务、稽核、福利、调解和调查等组。它对西堤广肇、潮州、福建、海南、客家等五帮中华理事会起着协调作用，并举办教育与救济事宜。每年举行一次的帮侨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1959年在河内成立越南北方华侨领导机构——越南华侨联合总会。

缅甸的缅华联合总会，1951年于仰光成立。属下有缅甸华侨工商总会、五邑会馆、江浙同乡会、缅华文教促进会、中山中学等团体会员30余个。在茂礼、勃生、毛淡棉等地设有分会。

老挝的万象中华理事会(1948年设)、万象中华会馆(1959年设)。

日本的中华联合会，初名全日本华侨总会，1946年在东京成立。此前日本华侨在日本42个县先后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总会系在此基础上建立。1951年更名日本华侨联合总会。总会设会长和执监各委员，分总务、内务、联络、文化、社会 and 会计等。该会旨在“联合日本各地华侨总会，实现侨民之相互团结，敦睦其感情，促进其福利，加强其对祖国之联系，协助政府推行侨务政策。”(章程第2条)1973年更名日本中华联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7人，其中5人由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福冈中华总会会长充任，余2人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韩国华侨协会总会，1962年在汉城成立，初为韩国华侨自治联合总会，至1979年统辖全韩52个华侨协会。该会对内负责联络各协会，促进华侨社会的团结与福利，对外负责同韩国官民改善关系、救济灾民等。

二、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华人综合组织

欧美地区的全国性华人联合团体形成较晚，多为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后出现。主要有：

美洲的巴西华人协会,1980年在圣保罗市成立,为巴西最大的华人社团。旨在团结巴西的华侨华人,增进广大侨胞的感情与乡谊,为华人社会服务。该会负责协调各侨团之间的关系,沟通与当地政府的联系。还开展妇幼保健、文娱体育等活动。每逢年节,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表演中国民族舞蹈、粤剧清唱、京剧清唱等,还有各类球赛。开设中华文化学习班,教授华文。

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1884年设);温哥华中华会馆(1906年设),1949年改称全加中华总会馆,1978年确定其宗旨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平等合法权益,加强华人社区的联系与团结,促进华族与其他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支持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中加文化交流,所属团体会员有40余个;全加华人协进会,1980年在多伦多成立,有25个分会。旨在维护和争取加拿大华人的平等权利,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和民族和谐,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该会致力于争取华人的人权与民权,支持华人参政,围绕加拿大华人人头税事件、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采用辱华词语等进行斗争,维护华人的正当权益。轮流在东加、西加举行主题年会。另有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1985年由24个华人社团组成;维多利亚华人社团联合会,1979年由香港会、冈州会馆、民治党、中华青年会、中华协会等10个华人社团组成。^①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1886年由清朝驻秘鲁公使郑藻如创设。旨在全面负责秘鲁华侨的慈善公益事业。之后扶贫济弱,创办中华学

^① 1992年,成立了全加华人联合会,总部在多伦多,这是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全国性统一机构,属下有180多个华人社团。该会由全国5大区域的代表组成53人理事会,再由此产生执委会。首任主席为陈丙丁。该会旨在团结全加华人,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争取华人平等、合法的社会地位,并代表全加华人与政府沟通,反映华人的意见。

校;输饷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积极与秘鲁主流社会沟通;促进中秘友好等。1986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驻秘大使前往祝贺。

美国华人的综合性团体有全国性的、地区性的,有历史上遗留的,也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成立的。地方性的有华人社团联合会和中华会馆,如屋仑华人联合总会,1972年由加州奥克兰市黄氏宗亲总会、李氏公所、退伍军人会、同源会等10个侨团组成;俄亥俄州中部华人联合会(1983年);旧金山中华会馆(1853年),成立最早,1958年全美有31个华埠建有中华会馆。1947年纽约60个侨团组成纽约中华公所,旨在“组织侨众,团结侨群,发展侨务,排解侨界纠纷,增加华人福利,提高华人地位,沟通中美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提倡公益,举办慈善事业”。这60个侨团包括安良工商总会、中华总商会、洪门民治党、中山同乡会、黄氏宗亲会、大鹏慈善总会、华人洗衣馆协会、华侨餐馆会、华侨妇女会、美国退伍军人会、华人基督教长老会、民智白话剧社、华人海员工会、自由大众励进社等。新成立的全国性华人综合团体有:美华协会,1979年成立,会员多为中青年华裔,有40多个分会,每年举行年会,旨在加强华人团结,参与美国政治。全美华人协会,1977年成立,总部在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等10余个城市有分会。会员大多是在文教、科技、卫生、工商业中较有成就的华人,旨在努力提升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的社会政治之中以及推动中美友好等,吴家玮、李耀滋、潘毓刚、李秀兰等先后任该会会长,1984年该会设有公共事务、联络宣传、华人生活、文化活动、经济合作、教育、财务等委员会。

欧洲的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1983年在马德里成立。全荷(兰)华人社团联合会,1987年由旅荷华侨总会、荷兰华人联谊会、荷兰浙江青田同乡会等17个社团在阿姆斯特丹联合组成。英国苏格兰华人联合总会(1986年)、英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1960年)和英国侨团联合总会(1980年)。法国中华总会,1986年由旅法海南同乡会、旅法涓

江联谊社、法国华人协会、中华会馆、印支青年会、荣光联谊会、自强协会等组成。1992年,为了加强欧洲各国华人社团间的团结协作,提高各国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争取各国华人的总体利益,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21个华人社团的代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首届主席林德华,永久会址设在巴黎。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澳中华会馆,1971年在阿德雷德成立,旨在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正当权益,弘扬中华文化,开展慈善福利活动,促进澳中友好;南澳华联会,1979年成立,会员多为新移居的印支华裔,附设醒狮武术团。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1937年在惠灵顿成立,以12个地区的华侨联合会为分会。

总之,各国华侨华人社团之间的联合越来越多,并成为一种趋势。随着各国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华人寻求在当地的全面发展,他们更有可能以华人群体利益为最高利益,打破地域的、血缘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背景的隔阂而走向联合。只是这一趋势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的、传统的诸因素的制约。

第三章 华文报刊与影视广播

第一节 概述

海外华文报刊是指华侨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与刊物；海外华人影视在此则主要指用华文创作、以华语演播的影视媒体。海外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真正最早由华侨创办的华文报纸当推1856年12月粤籍华侨司徒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沙加缅度（今萨克拉门托）所办的《沙加缅度新录》。

海外华文报刊的发展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

战前的华文报刊系华侨创办的商业性和政治性传播媒介。华文报刊初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方教会向华侨传教的需要而形成的，渐渐地为了“便于商贾，广资见闻”，也登载商业、文化方面的内容，进而向商业性报刊转变。1880年闽侨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是由华侨独资办的早期商业性华文正规日报的代表。十九世纪末，商业性华文报刊还有日本的《开智录》，新加坡的《星报》，槟榔屿的《檳城新报》，菲律宾的《华报》、《岷报》和《益友新报》，美国的《隆记报》、《丽记报》、《文宪报》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了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和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各自在海外创办华文报刊,进行笔战,势同水火。康梁阵营的报纸有日本横滨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孙中山亲自办的报纸就有 12 家,如日本的《民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美国的《檀山新报》、《少年中国晨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和槟榔屿的《光华日报》等。先后卷入这场论战的海外华文报刊约有 80 余家,遍及亚、美、欧、大洋洲四大洲。受中国政治与民族斗争以及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影响,海外华文报刊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海外流亡壮大了华文报刊的阵营,使华文报刊在编辑水准、印刷技术、发行量以及宣传效应等方面均有迅速提高。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所到之处,侨报备受摧残,一些反日的华文报刊被迫转入地下,如泰国的《真话报》、《中国人报》和《全民报》,菲律宾的《华侨导报》等。

战后,1945—1959 年间华文报刊蓬勃发展,华侨对时局的关心,华侨族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建立初期对华侨政策的相对宽松,为华文报刊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时在五大洲的 28 个国家和地区约有华文报刊 423 种,其中亚洲的缅甸、泰国等 12 个国家就有 336 种^①。从类别来看,华文日报约 200 种,期刊在 220 种以上。六十年代以后,华文报刊有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1)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转变,如在东南亚国家均有非当地公民不准办报的规定,华侨入籍当地,华文报刊的宗旨已不是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在海外的一种延伸,而是更密切地成为当地新闻媒体的一部分,弘扬中华

^①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 页。

民族文化,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为华侨华人服务。(2)在地区分布上,北美的华文报业崛起,成为与东南亚并重的华文报刊较多的地区。如1960—1969年间,北美有华文日报15家,期刊21家,计36家;1970—1979年间,北美有华文日报23家,期刊99种,计122家。一些东南亚国家经历了程度不等的排华,华文报刊首当其冲,其数量与影响较之战前明显降低。如1960—1969年间,华文日报有150家,期刊140家,共290家,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刊较之战后初期减少了140家。八十年代以来,华文报刊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据统计,1982年海外华文报刊有439家,其中亚洲346家,美洲75家,欧洲9家,非洲5家,大洋洲4家^①。1985年,海外华文报刊有日报70家,期刊233家,共303家。1988年,海外华文日报72家,期刊258家,共330家,其中以美国为多,有127家,次为马来西亚55家,新加坡37家^②。(3)在内容上淡化政治色彩,趋向中间立场,立足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报道面丰富多采,仍然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4)报刊种类繁多,报纸有日报、周报,期刊有二日刊、周刊、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在1988年的330家华文报刊中,约40%为综合性报刊,30%为娱乐性消遣刊物,20%为专业性(经济、文艺、青年、妇女、儿童、大中小学生)刊物,10%为政党和社团机关刊物。(5)编排、印刷技术不断改进。纽约《中报》、《世界日报》的海外版采用卫星传版技术;洛杉矶的《国际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等实行彩色胶印;大多数报纸为柯式印刷。已运用电脑排版技术。(6)竞争激烈化。在北美地区,华文报刊处于饱和状态,如美国的《时代报》、《北美日报》和《中国时报》等历史较久的报刊也被迫

① 台湾“侨务委员会”编:《台湾侨务五十年》。

② 方积根:《战后海外华文报刊发展变化刍议》,《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停刊,这使华文报刊的发展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迫使它们不断更新观念,变换面孔,以争取读者群。

然而,华文报刊发展的真正压力是来自读者群的缩小,越来越多的华人第二、第三代不谙华文,对华文报刊失去兴趣。不过,由于世界“华文热”的兴起,中国的开放及国际地位的加强,作为维系中华民族传统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的海外华文报刊,仍然有着光明的前景。

第二节 亚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一、新加坡的华文报刊

1833年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广州创办、次年迁至新加坡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新加坡的第一份华文报刊。该刊初署“爱汉者纂”,后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出版,郭实腊主持,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教义,同时报道政治、科学和商业新闻。每册12页,至1838年停刊,共出版了20期。

1881年12月,《叻报》创刊,这是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早出现的华文报纸。创办人为当地殷商薛有礼,以有“南洋第一报人”之称的叶季允为主笔。每日出版8开纸6张,登载本地新闻,转载香港、上海报纸电讯。新闻包括论说(社论)、电音(电讯)和普通新闻。第一版除社论外,还刊登清廷谕旨、公文、奏折等。标题用四字一句,新闻与广告混合编排,无标点符号。1906年始设副刊,每日发表“粤讴”一篇,针砭华人赌博、械斗、吸鸦片等陋俗。1928年12月创办随报每日一大张的副刊《椰林》(后更名《椰林改革号》),由陈练青、潘受、张楚琨等主编,登载了许多反映契约华工生活的作品。该报初期

发行约 350 份,1900 年增至约 500 份。1932 年因经营亏损而停刊。

至 1911 年,新加坡已有 10 家华文日报,如:

《星报》(1890—1898 年),创办人林光铨(衡南),每日出版对开张,标题多用四字一句,立场保守,如反对华人剪辫子,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也关注娼妓、鸦片、赌博等社会问题,吁请改革。初期发行 300 份,后达到 970 份。

《天南新报》(1898—1905 年),由丘菽园主办并任总主笔,徐季钧、王会议任编辑,林文庆为顾问。每日出版 4 小张,单面印刷。该报支持中国君主立宪,拥护维新变法,如发表《太后垂帘不足为喜电辨》、《论维新为国民公事》等文。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新闻选材上十分谨慎。

《日新报》(1899—1903 年),系《星报》由林文庆接办后改称,内容上增加国际新闻和西方科学技术报道。该报同情中国的维新运动,关注中国时局,推崇儒家思想。曾连载林文庆译的科学小说。

《图南日报》(1904—1905 年),由陈楚楠、张永福创办,陈诗仲任主笔。为南洋中国同盟会的喉舌,也是南洋第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因其激进的立场,销路阻滞,报社免费赠送,1905 年附赠读者的日历上录有石达开的名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左右并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南洋总汇报》(1905—1947 年),初名《总汇报》,由许子麟、朱子佩等人创办,后因内部政治主张的分歧,革命党人退出而成为保皇党人的喉舌。1929 年改名《南洋总汇报》,徐勤、欧渠甲、伍宪子先后任主笔。每日出版 8 版,标题用大字,文章用新式标点。报道中国、本埠及世界各地新闻,并派记者驻粤、闽,以及时反映家乡情况。

《中兴日报》(1907—1910 年),由陈楚楠、林义顺、张永福等人创办,为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报。胡汉民撰写发刊词,阐明该报旨在开发民智,“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抨击《南洋总汇报》为

“汉贼”。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撰文宣传革命,驳斥《南洋总汇报》的保皇论。该刊除重大节日、星期日休刊外,日出4张8版,内容包括论说(社论)、中国新闻、外国和本埠新闻、商业新闻和行情,以及副刊《非非》和广告。

《星洲晨报》(1908—1910年),由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周之祯、谢心准创办,每期印600份。

《南侨日报》,由黄吉辰、卢耀堂创办,为革命党人宣传报。

辛亥革命后至1940年,新加坡的华文日报有30余家,期刊在100家以上。这些报刊热衷于反映或讨论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期间主要华文日报有:《振南日报》(1913—1920年)、《国民日报》(1914—1919年)、《新国民日报》(1919—1940年)、《南铎日报》(1923—1925年)、《南洋商报》(1923—1983年)、《星洲日报》(1929—1983年)、《民国日报》(1930—1935年)和《星中日报》(1935—1941年)等。其中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

《南洋商报》,1923年陈嘉庚创办,初期的经理是林青山,首任主笔方怀南,日出16页,主要报道商业动态及南洋、中国等地的消息,“是一份纯粹以商业为主场姿态出现的报纸”^①。1924年改以叶清沙为经理,杨智湘任主编。副刊称《新生活》,1924年称《商余杂志》,1933年称《狮声》。1932年组成独立的南洋商报有限公司,侯西反、林庆年、李光前、叶玉堆等为董事;1937年李光前成为董事会主席。次年收购《新国民日报》,成立南洋报业有限公司,以傅无闷为总编。傅增辟了《南洋周刊》、《南洋文艺》、《漫画》、《戏剧》、《今日文艺》和《南洋研究》等栏。为了及时报道南洋和中国的抗日动态,在每日早版之外另出晚报。1940年胡愈之任编辑主任,言论进步,内容充实。他共

^①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年版,第4页。

写有 400 多篇社论、时评和专论。日军侵占时期停刊，战后复刊。1971 年发行量约 6 万份。1982 年与《星洲日报》合并。

《星洲日报》，1929 年 1 月由胡文虎独资创办，林霭民任经理，傅无闷任编辑主任。1932 年出版早报、晚报和星期天增刊，还有《每周评论》、《经济周刊》、《南洋研究》和《体育周刊》等专刊。1937 年早、午、晚各出版一次。同年关楚璞任总编辑，增辟《南洋经济》、《南洋史地》、《南洋文化》和《南洋问题》等副刊，重视南洋研究。1939 年出版《南洋年鉴》。1940 年又编辑出版《星洲十年》，为研究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历史的重要资料。1939 年郁达夫为副刊主编，出版《星洲文艺》。该报及时报道要闻电讯，辟有每周评论以及经济、妇女、文艺、体育、学生、游艺等专栏。日军侵占新加坡时期，改出《昭南日报》。1945 年恢复。1951 年出版《星洲周刊》。1975 年改组为公共公司。1978 年日发行量约 10 万份。1982 年与《南洋商报》合并，成立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翌年出版《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等。

1945 年以前，华文小报与杂志也较普遍。1929 年约有 89 种^①。自 1925 年新加坡首份小报《消闲钟》出版后，小报与杂志蔚为风尚，有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旬刊、双周刊、月刊与季刊等。小报为 1 小张（两版）到 1 小张半（3 版）。内容多为综合性，也有文学艺术、商业和教育等。初期的小报多为娱乐性的，有电影广告、电影故事、影星轶闻及影评，还有小品和杂文，如《消闲钟》和《曼舞罗》（1926 年）等。有的小报关心国事，如《青天》、《七天》、《心声》、《民众报》等，吁请人们“抗日救亡”。有的报刊标榜无党无派，批评国事和政界、军界人士，无所忌惮，如《天声》旬刊、《天秤》、《白日》和《晓天》等。有的报刊抨击华人社会的消极面，力主移风易俗、改革教化，如《闽侨》、《青年》和《华侨

^① 崔贵强：《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公司 1993 年版，第 38 页。

周报》等。《闽侨》标榜旨在“宣扬文化以改善侨胞之生活”，“本刊自当促进教育的力量，发扬民族精神，使大家往进化途上跑”^①。《青年》半月刊为1929年由青年励志社所办，旨在促进青年德、智、体、群、美五育，该刊出有《青年号》、《妇女号》、《艺术专号》和《曾几生追悼号》四个专号。这些报刊多数刊载小说、杂文、散文、戏剧、新旧体诗和歌谣等。也有报刊大谈风花雪月、鬼怪之事，如《南薰》和《一粲》等。

“二战”后最早出现的华文报纸是1945年9月创刊的《中国日报》。至1959年，华文报刊多达414种，其中报纸96种，期刊259种，余为纪念特刊或专刊。在188种杂志中，综合性杂志85种，学术性杂志计5种，文艺性杂志32种，专业性杂志20种，宗教、消闲性杂志和画报6种^②。《南洋商报》所属《星期六》周刊（1949年创刊）为综合性刊物，登载政治、文学、历史、科学、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内容，1950年该报又出版《南洋月报》。《星洲日报》下属有《星洲周刊》（1951年创刊）。文艺性杂志有《文艺行列》（1950年）、《荒地》（1953年）、《耕耘》和《人间》（1954年）等。在时间上，以1945至1948年间最为兴旺，达140种。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与新加坡都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各派热衷于办报，宣传各自的主张，广大民众则迫切希望了解时局的发展。其次，英国殖民政府对言论的宽容政策，直至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这时的华文日报多数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这种情形到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尤其是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多数华文日报寿命较短，如《华侨日报》（1945—1947年）、《新民主报》（1945—1946年）、《地方日报》（1945年）、《民报》（1946年）、《公报》（1946—1947年）、《中南日报》

① 转引自崔贵强：《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与报人》，第44页。

②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年。

(1946—1947年)、《南侨日报》(1946—1950年)、《星洲晚报》(1947年)、《南侨晚报》(1947年)、《中兴日报》(1947—1957年)、《南方晚报》(1950—1963年)、《益世报》(1952年)、《新时代报》(1955年)、《星马日报》(1957年)、《新生日报》(1961—1966年)、《南洋晚报》(1963年)等。持续较长或仍在出版的华文日报有:《南洋商报》(1945年9月复刊至1983年3月)、《星洲日报》(1945年9月复刊至1983年)、《新明日报》(1967年至今)以及《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1983年至今)。

政治色彩浓厚的华文日报当推《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南侨日报》的创办人和董事会主席为陈嘉庚,社长胡愈之,主笔夏衍,总经理张楚琨。陈嘉庚在创刊号上发表《告读者》一文,阐明该报宗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1949年洪丝丝继为社长。该报实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喉舌报,专注于中国事务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为该报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1950年该报为殖民当局所取缔。《中兴日报》原为《中南日报》,1946年成为国民党党报,与《南侨日报》展开论战,终因销路不通、财政亏损而停业。

华文小报在1954年有40余家。创刊于1945年的有《前锋报》(三日刊)、《娱乐报》(三日刊);1946年有《逍遥》(三日刊)、《国民报》(三日刊)、《笑林报》(三日刊)、《叻报》(三日刊)、《快活周报》(周刊)、《实报》(三日刊)、《星期报》(周刊)、《真报》和《石报》(三日刊)、《琼潮报》(旬刊);1947年有《学生周刊》;1948年有《春光报》(三日刊)、《新闻报》、《新华周报》和《爱华周报》、《娱乐报》;1949年有《热带报》、《欢乐报》、《夜灯报》(三日刊);1950年有《新闻周刊》和《新力报》;1951年有《海报》(周刊);1952年有《香槟报》(三日刊)、《欢乐报》(周

刊)、《新报》(二日刊)、《人人新闻》(周刊)、《小小报》、《锋报》(周刊);1953年有《创造报》、《华声报》和《东方报》(三日刊)、《新生报》(周刊)、《快活报》、《活动报》(周刊);1954年有《正风报》(三日刊)、《时报》(周刊)、《老爷报》等。此类小报多以娱乐消息为主,社会新闻和小说为辅,也有以名人隐私、黄色小说和图片来吸引读者的。少数小报态度严肃,如傅无闷主编的《新报》,对国际和新、马新闻进行综合报道和评析,针砭时弊,销量达2万余份。1959年后这些小报多被政府取缔。

七十年代以来,华文报刊进入统一调整和巩固发展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1982年《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合并,次年《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的出版。《联合早报》为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早报,是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拥有读者最多的华文报纸,日出10—12大张,日销量近20万份,首任总编辑为莫理光和黎德源。该报以精写精编、深入浅出的原则报道国内外新闻,有2版言论版,3版经济新闻版,2版体育新闻版,还有区域新闻版,以及多版副刊,刊载文艺、武侠小说、影视、科技、妇女及其他消闲的内容。《联合晚报》的首任总编辑是陈正,除刊出当天国内外最新消息外,还有十几个副刊,日销量9万份。此外,还有一家日销量近10万份的华文日报《新明日报》,系梁润生和查良镛所办,首任总编辑潘粤生。该报日出20—24版,内容以社会新闻为主,曾独家转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如《笑傲江湖》等以吸引读者。华文报刊逐渐实现电脑化排版与管理。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纸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南洋·星洲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三家,华文期刊有34家。

新加坡已成为东南亚华文报业、出版业最发达的国家,华文日报日发行量达30余万份。报人有“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加坡报林俱乐部”等组织。在新加坡的华文刊物中,有两类引人注意:

(1) 纪念特刊。现存最早的纪念特刊是1921年出版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纪念特刊》。至1988年,约有各类华文纪念特刊466本^①。其中以地缘、血缘和体育文娱性社团的纪念特刊为最多,分别为73本、70本和72本。在时间上,以1975年至1984年间出版量最多,为229本。在地缘性社团的纪念特刊中,福建帮有26本,广肇帮15本,客家帮11本。有的纪念特刊厚达400页以上,如《安溪会馆金禧纪念特刊》(1972年)、《钻禧纪念特刊》(1982年)、《惠安公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74年)、《晋江会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78年)、《南安会馆金禧纪念特刊》(1977年)、《同安会馆庆祝五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86年)。这些特刊几乎是该组织的史书,通常包括对家乡历史、地理、古迹的介绍,该组织史及会务报告、人物志,以及有关邑人移居的历史与现状,甚至还有文学艺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印有《总会三年》(1989年)。出版特刊的姓氏计有白、黄、曹、冯、符、邝、林、李、刘、吕、陆、程、方、傅、洪、赖、梁、马、施、谢、徐、吴、钟、周、彭、苏、翁、萧、颜、姚、杨、陈、庄等。业缘组织纪念特刊有60本,涉及商业、工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如《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1986年)。还有学校的,如《南洋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66年);体育的,如《精武体育会六十周年会庆纪念特刊》(1981年);演艺的,如《六一儒乐社金禧纪念特刊》(1979年)、《陶融儒乐社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88年);校友会的,如《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成立廿三周年纪念特刊》(1987年);联谊社的,如《同德书报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和《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985年);宗教的,如《新加坡基督教卫理公会芽笼堂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年);医药福利的,如《同济医院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67年)、

^① 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1990年,第2页。

《大巴窰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1980年);等等。这些特刊是新加坡华人保存自己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2) 学术期刊。最早的华文学术期刊当推1901年叶季允所创《医学报》。此后至1942年仅见有《养正学报》(1918年)、《南岛医声季刊》(1936年)和《南洋学报》(1940年)等几种。1945—1965年间至少有30种。1965—1990年间有近50种。从内容上来看,有综合性的,如《义安学院院刊》和《南洋大学学报》;有人文科学的,如《东南亚研究》(1965年)、《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1977年)、《中教学报》(1975年)、《报人》(1978年)、《教育学报》(1978年)、《亚洲文化》(1983年)、《华文研究》(1987年)、《儒学学报》(1989年)和《学丛》(1989年)等;有自然科学的,如《数学年刊》(1959年)、《地理集刊》(1968年)、《电脑学会年刊》(1977年)等。

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报刊的发源地。马来半岛最早出版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28年又有《天下新闻》。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了由华侨创办的报纸。

1896年林华谦等维新派华商集资创办了《檳城新报》,旨在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并以登载当地的经济新闻为主,为当时新加坡之外马来亚地区唯一的华文报纸。该报设有《英电译登》、《上谕恭录》、《华书类译》、《各行告白》和《各货行情》等栏目,内容一律用4号楷书体直排。1907年,该报由同盟会“檳城阅书报社”的黄金庆、吴世荣收购,而成为同盟会的一份报纸,直至1930年才并入《光华日报》社经营,仍用原报名继续出版。

辛亥革命前后,马来亚的华文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有:《南洋时报》(1896年);《吉隆坡日报》(1909年),创办人为林道南等;《泗

洲周报》(1910年),创办人为陈占梅等;《光华日报》(1910年);《光华日报檳城新报联合版》(1911年);沙撈越古晋的《新闻启明星期报》(1913年),李东成等人所办,逢周六出版,旨在“传布与报道各种时事,扩大沙撈越人民的视野,鼓励他们成为对祖国有用的公民”。以及月刊《南洋华侨杂志》,1917年创于檳城;1919年林青山创办的《益群报》等。其中影响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报纸当推《光华日报》。

《光华日报》原为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的华文机关报。1910年该报创始人庄银安因避政治陷害而匿居檳城,和陈新政、黄金庆等同盟会员集资复办,成为中国同盟会檳榔屿支部的机关报。林连登为董事主席,王景成为董事经理,编辑部由“檳城阅书报社”骨干雷铁崖、吕志伊、方次名、张杜鹃、李怀霜、施方白和陈宗山等组成。该报取代停刊的《中兴日报》成为反对清朝政府和保皇党的舆论阵地。1911年以后,该报每日增出3—4大张,将4号字改为5号字,并增加了新闻的分量,注重社论与时评,辟有“落花风絮”、“科学常识”、“新智囊”等专栏。二十年代末,傅无闷主持编委时,新辟“燭火”、“帆声”、“灯塔”、“励群”和“一苇”等副刊专栏。

二十年代,马来亚的华文报刊有1920年在檳城创刊的《华侨日报》和《南洋时报》。《南洋时报》以刊登本地新闻为主,辅以国际要闻及南洋消息,其言论政治性较强,一度为英殖民当局所不容。1927年该报创办的副刊《诗》为当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副刊。1930年因出版揭露性的《济南惨案特刊》而惹怒当局,被勒令停刊。其他如1925年刘赞臣创办的《中华商报》(1932年停刊);1926年檳榔屿钟灵中学编的《钟灵中学校刊》;1927年在沙撈越创刊的《新民日报》(1930年停刊);1928年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提倡纯文艺性的刊物《南风》;1928年创于檳城的《南洋日报》等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多种小报,如:《竹报》(1928年创刊,3日刊),《涛声周报》(1928年)和《马来亚周报》(1928年),《南侨日报》(1928年)和《雪兰莪周报》等,偏重

于娱乐性,未几即停刊。

1930—1945年,马来亚的华文报刊先后有20余种,主要集中在西马和沙撈越华人较集中的城市,约有半数因经费问题,仅维持数月或一两年。这些华文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主张华侨团结救国。除《光华日报》外,1930年在檳城出版了《侨声日报》、《民国日报》和《中南晨报》。其中《中南晨报》为老同盟会员丘文绍独资创办,梁若尘为总编辑。1931年还有专门摘登电讯的小报《电讯新闻》和以刊登经济新闻和广告为主的《商业日报》。其他如怡保的《雷报》和《霹雳日报》均为昙花一现。

1936年骆世生、林姗姗集资创办的《现代日报》,是北马地区唯一的小型报纸。首任董事经理为庄明理,总编辑曾圣堤,后由方君北、洪丝丝继任。该报兼办晚报。其宗旨是“讲良心话”和“大众化”。因真实报道中国社会、尤其是抗日军民的消息,深受华侨欢迎,并远销到泰国南部和苏门答腊岛西岸各埠,日销近万份。因言论激进,曾两度为殖民当局所明令停版反省。1939年该报又出版了《现代周刊》,由林姗姗任经理,洪丝丝任编辑主任,每期约3万字,以新闻综述和时评为主,1950年停刊。

1936—1938年间,创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在檳城发行,1939年正式创办《星檳日报》,首任总经理为胡文虎次子胡山,主编初为胡迈,后为钟介民。该报设备完善,编辑力量齐整,日报2大张,晚报1大张,主要刊登与华人有关的政治、经济新闻,同时也报道中国抗日动态,还有文艺、妇女、教育、体育、影剧等副刊和专栏。1941年停刊。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马来亚各地区的华文报刊主要有:怡保的《吡华日报》,1939年创办,社长刘伯群,编辑主任苏颂明,日出早报2张,晚报及星期刊各1张,主要登载本埠新闻及中国和南洋电讯,并反映华侨社会的抗日热情;《中华晨报》,1934年创办,总编辑王宣化;《建国日报》。吉隆坡的《马华日报》,1932年由梁燊南创办,日出

早报4大张,晚刊1张,星期刊增出2大张,总经理陈济谋,主编郑绍崖,以刊登经济新闻为主,1941年停刊;《南洋公论》,1936年黄天石创办,主要登载政治时评和文艺评介,次年停刊;《娱乐周报》(1937年)。诗巫的《诗巫新闻日刊》,1939年由刘子钦和卢义湍等创办,系诗巫的第一份华文报,主要编发电台发播的新闻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日出4开2张,每次印三四百份;同年还出版有《锡江日报》,系魏耐光、黄鼎州等人所办;1940年二报合并为《华侨日报》,日出4开1张,后增至2张,为沙捞越地区第一家铅印的华文日报。古晋的《古晋新闻日刊》,1937年叶瑞岩等创办,根据电台播发的各地消息而编发;《沙捞越日报》,1937年创办,主要刊载中国各地抗日的信息和南洋各地筹赈会的活动情况。上述报刊多数在日军侵占时期停刊,只有日本侵占者的喉舌《兴亚新报》(后改名《马来新报》)、《彼南日报》、《霹雳新报》和《久镇新报》分别在吉隆坡、檳城等地发行。这时,马来亚共产党办的华文小报《战友报》和《民声报》等,成为华侨了解抗战情况、鼓舞华侨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

战后初期,华文报刊纷纷复刊。最先复刊的是檳城的《星檳日报》、《光华日报》和《华侨日报》。接着又兴起了一批华文报刊,如1945年古晋的《中华日报》,庄心言在檳城办的《中华公报》(1946年停刊),曾梦笔等办的《北斗报》(1948年停刊),吉隆坡的《民声报》和《联邦日报》,新山的《新民报》(周刊),芙蓉的《森州民报》(3日刊)和麻坡的《麻坡新报》。1946年吉隆坡的《中国报》和《桂桥旬刊》,檳城的《新生报》、《学报》、《钟灵中学季刊》。1948年创于诗巫的《大同日报》(1962年停刊)和创于吉隆坡的《民主前锋》等。

五十年代马来亚独立前后,许多华文报刊因不合时尚而横遭封闭。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约有华文报纸二三十种。包括1956年创办的《华侨晚报》和《新闻报》,沙巴的《婆罗洲时报》;1960年创刊的《团结报》、《民报》;1961年至1965年间创办的《向导》、《大

众日报》和《婆罗洲日报》、《沙州日报》、《沙撈越快报》等。此外，西马地区还出版了近百种华文刊物，如许云樵主编的《华侨生活》（月刊）、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冯列山主编的《南洋周报》、薛残云主编的《星期天》（周刊）。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华文报业再度兴盛，吉隆坡成为西马华文报业的中心。新创办的华文报刊有三四十种之多，如1966年陈英庚创于马六甲的《华商报》（半月刊），1967年新加坡《新明日报》的马来西亚版，1968年黄文彬创办的《国际时报》，以及《自由日报》和《马来西亚日报》等。此外还有《妇女》、《斗士》、《先生》、《风采》、《商海》、《一友》、《热门》等月刊；《跑道》、《写作人》等季刊。再如在古晋创刊的《沙撈越晚报》、《沙撈越周报》、《人民论坛报》、《人民之声》、《世界特刊》、《学生月刊》，在诗巫创刊的《大众报》、《新华报》和在沙巴创刊的《亚洲时报》等。

进入八十年代，华文报业处于不景气状态，这主要是因为马来语优先的政策下华文读者群的迅速缩小，致使报社广告收入减少，发行量低落。至1988年，马来西亚有华文报纸22家，期刊33家，共55家。这一时期西马的华文报纸主要有：

《星檳日报》，1939年创刊，与《星洲日报》为姐妹报，首任董事长胡文虎。日军侵占时期停刊，战后复刊。1974年该报进行改组，吸收当地资本，但胡氏家族仍有30%的股权。该报宗旨是以“无党无派超然立场，不偏不倚的精神，公正立言，为民众喉舌，为社会服务”。以新闻为主。日出对开5—8张，星期日出9—10张。1986年为马来亚银行所接管。

《建国日报》，1940年创于怡保。1957年前读者多为华侨，报道内容多以中国新闻为主，此后主要报道马来亚政治与社会新闻以及国际新闻。1975年改为全马报纸，由中央印务公司接办，日出对开3张，星期日出5张。1980年为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党所收购，成为

机关报。该报盛时日销 6 万份。1986 年停刊。

《光华日报》，创于 1910 年。二战后复刊。注重当地华侨社会的报道。五十年代呼吁华侨积极入籍当地，与马来族、印度族人民共建国家。1968 年改组董事会，苏承球、骆文秀任正副主席。七十年代初由周明道组织有限公司接办，董事长王富全，总编辑钟城芳。日出对开 4—5 张，星期日出 7—8 张，柯式印刷。以地方新闻为主，国际新闻、赛马、综合副刊约占两版，娱乐、经济、体育、小说和综合新闻等占 1 版，广告约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八十年代中期，该报先后在新加坡以及吉隆坡、怡保、太平、居銮等处设立 10 个办事处，使该报的经营体制不断完善。该报执行“中庸而灵活的方针”，“以不偏不倚的立场为社会与人民作贡献”。

《南洋商报》，1962 年创刊，是全马最大、销量最多的一家华文报纸。该报初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马来亚版，产权归李有成、李茂成所有。1969 年正式与新加坡同名报分离，成为独立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由华裔商家和政府设立的国家企业机构联合拥有。总社设于吉隆坡，在檳城、怡保、马六甲、新山设办事处。日出对开 5—7 张，星期日出 10 张，日发行量逾 12 万份，广告约占整个版幅的 50%，新闻约占 35%，其他专版专栏约占 15%。每天除全国统一发行的版面外，还有各类增版。副刊为《商余》。

《星洲日报》，原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马来西亚版，1965 年改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由星系报业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经营。1975 年把三分之一的版权卖给马来西亚国营企业机构，重组董事会，总编黄宗理，主笔黄和平。1982 年该报脱离星系报业的控制，胡美一任执行董事。该报执行中立立场，“为大马国家和华人社会服务”。一方面淡化其政治倾向，一方面作为保存华族文化的阵地，注意办好副刊。该报自 1975 年起改为横排，日出对开 7—8 张，星期日出 9—10 张。国际国内新闻占有 20% 的篇幅，广告约占 40% 的篇幅。1985 年日销

量达 11.6 万份。

《中国报》，1946 年由李孝式创办，首任主编张冰子。1982 年该报重申旨在支持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促进各民族文化和民族间的亲善，以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日出对开 4—5 张，星期日出 6—7 张，主要行销中马地区，日销量约 3 万份。重视国内外新闻，专版及专栏有：“体育新闻”、“国际通讯”、“万象”、“小天地”、“学生园地”、“古今谈”、“妇女生活”等。1986 年创办姐妹报《新晚报》。

《马来亚通报》，1957 年由三日刊《达报》和《通报》合组而成，1968 年改为日报。社长兼总经理周瑞标，首任总编王仲广。1981 年被马华控股公司收购，并组织新董事会，董事主席黄纪达，董事经理方汉勇，总编辑林通光。日出对开 4 张半至 5 张半，星期天出 9 至 10 张，发行量超过 5 万份。面向下层民众，注重新闻和政治活动的报道，约占总篇幅的 45%。常设专版和专栏有：“经济”、“娱乐”、“今日妇女”、“武侠”、“新少年”、“体育”、“大千世界”、“社会服务”、“武林”、“通报星彩”、“八方”、“健康生活”、“小说”和“文风”等。1982 年起采取横排式，报头套红印刷。

《新明日报》，原为 1967 年创于新加坡的《新明日报》的马来西亚版，1975 年成为马来西亚独立的华文报纸。日出对开 4 张，柯式印刷。在内容上，专栏专版占 40%，新闻占 30%，广告占 30%。该报董事长黄琢齐，总经理冯锦添，总编辑钱博。旨在以公正立场，“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1985 年为英文版《新海峡时报》集团所收购。

西马还有吉隆坡的《学报》(半月刊)、《蕉风》(月刊)、《少年乐园》(半月刊)、《大众报》(每周一、三、五出版)、《银河》(半月刊)和月刊《文道》、《玻璃门》等；槟城的《创业》(双月刊)、《大马青年》(半年刊)、《光华杂志》和《亚洲周刊》、《好读者》(双周刊)等华文报刊。

东马的华文报刊主要有：

古晋的《中华日报》，系1945年由《古晋新闻日刊》改名，1958年日出对开2张，刊登新闻以及有关生活、娱乐和搜奇探秘的文稿。《国际时报》，1968年创刊，1970年增出《国际时报周刊》，1975年又出版《国际晚报》，以报道本地及东马新闻为主，还设有连载小说的专版，社长黄文彬，1988年以副刊名义创办了一份旨在帮助华人子弟学习华文和写作的《学生月刊》。《世界早报》，1976年由《世界特报》季刊改为日报，日出4开6—7张，25%的篇幅为本地和国际新闻，余为专版和广告，主要专版有“小说天地”、“娱乐”、“世界之大”、“时事漫笔”、“妇女”、“学生园地”等。《沙捞越晚报》，1972年创刊，沈来明创办并任总经理，日出3—4大张，除新闻外，还刊登小说、生活知识、奇闻轶事、美容服饰等，强调趣味性。

诗巫的《诗华日报》，创于1952年，是沙捞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读者最多的一份报纸。《马来西亚日报》，1962年创刊，首任董事经理戴承聚，日出4张半，重视国内外新闻报道。《大众报》，1973年创刊。《新华报》，1974年创刊，是逢周日出版的旨在消遣的娱乐报。

美里的《美里日报》，1957年创刊，为该地区唯一的华文报。《沙婆月刊》，1981年创刊，中英文合刊，主要刊载教育方面的报道。

沙巴有《华侨日报》(战后复刊)、《沙巴时报》(1963年创办，由马来人主持)、《亚洲时报》(1970年)、《自由时报》(1968年创办)以及《斗湖日报》(1962年创办)、《山打根日报》(1961年创办)和《晨报》(1981年在斗湖创办)等。这些华文报纸多奉行中立，注重新闻报道和副刊，如《山打根日报》的副刊有“青年文艺”、“妇女世界”、“今日大特写”、“银坛小拼盘”、“智商”、“健康”、“小说”、“大家乐”和“星海”等，以吸引读者。

马来西亚华文报界有“全国新闻从业职工会”、“全国报业职工总会华文报分会”、“壮马记者公会”、“霹雳记者俱乐部”、“檳城报界俱乐部”和“马来西亚编辑人(华文)协会”等组织。它们致力于促进华文

出版事业,1982年组织举行首届研讨会,主题为“维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尊严”。八十年代以来,华文报纸的商业化趋向突出,对于中国的事物,特别是华人文化仍然十分关心;一些主要日报正由家族经营转变为政治集团和财团的喉舌。马来西亚仍不失为海外华文报业的重镇之一。

三、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报刊

1823年英国传教士在爪哇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是印尼第一份华文报刊。该刊日出一期,每期8页,1826年辍版。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华侨革命团体(如同盟会、“书报社”)的建立,华文报刊纷纷问世。

1900—1911年间印尼的土生华人曾创办过马来文报纸,如《理报》、《泗水新闻》、《综合新闻》、《商业新闻》以及中文、马来文混合版周报《译报》、《中爪新闻》、《新报》、《东方之光》和《春秋》周刊。新客华侨则创办华文报刊,以适应不断增多的新客移民的需要。1908年在爪哇泗水发行《泗滨日报》,该报由田桐主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次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创办了《华铎报》,旨在培养华侨“独立、合群、尚武的品德和国家观念”,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最后成为日报。主编初为陈百鹏、朱茂山,1912年由白萍洲、钟公任接任。该报在同盟会骨干的主持下,抨击保皇派,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深受华侨拥护。为了满足土生华人的需要,该报还发行马来文版。

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华侨华人报刊主要有:《爪哇公报》,1909年由马厥如创办;《汉文新报》,1909年在泗水书报社和中华商会的支支持下创办,分中文和马来文;《苏门答腊民报》,1914年由叶燕浅等在棉兰创办,初为周刊,后改为日报,1924年更名《民报》,以报导商业信息为主,发行苏门答腊各埠及邦加、勿里洞等地。加之《中爪哇报》

(1909年)、泗水的《民铎报》和《巴城日报》(1908年)等,都在宣传民主革命,揭露清廷的腐败与暴政,唤醒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年代至太平洋战争前,是印尼华文报业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华文报刊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华侨商人、文化人办的报纸。具有代表性的是《新报》。该报原是1910年由刘玉兰、游新义于雅加达创办的马来文(后印尼文)报,1921年发行华文版。印尼文《新报》初为周刊,1912年改为日报,历任社长侯德广、朱茂山、洪渊源、汤龙贤,历任总编拉苏克·古尔、郭恒节、侯德广、朱茂山、郭克明、吴兆元和柯新苗,该报除报道华人社会的情况外,致力于宣传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提倡华文教育,反对荷兰国籍法,主张土生华人保留中国国籍,主张与新客华人合作参与中国政治以及支援中国抗日等。华文《新报》,总编谢佐舜(1929—1942年),同样宣传爱国主义,提倡中国文化教育,推动华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福利事业。该报大量报道华侨社团、学校、商业等华侨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并通过在中国各大都市和家乡如上海、南京、广州、厦门、梅县等地的特约记者,报道中国特别是侨乡社会的情况。《新报》二战前的发行量为8000至1万份,成为当时印尼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报纸。

此外有:泗水的《大公商报》,1922年由原《大公日报》和《商报》合并而成,社长叶世昌,主要报道当地商情和国际金融动态及中国的消息。以及《工商日报》(1922年创刊)、《南洋日报》(1930年改名《新中华报》)、《日丽晨报》、《苏岛日报》、《三宝垄日报》(1923年创刊,1927年停刊)、《锡江日报》(1925年创刊,1942年停刊)、《全民日报》(1926年创刊)、《爪哇每日电报》(1928年创刊)、《泗滨新报》、《新中华报》、《侨声日报》(1929年创刊)等。二三十年代印尼华人办的马来文报纸有:《亚洲》和《光报》(1921年),《民声》和《华报》(1922年),

《竞报》、《油灯》和《新报周刊》(1923年),《新日报》(1924年),《新民报》(1925年),《新直报》(1929年),以及《南星》、《侨声》、《日报》、《太阳报》、《光华报》、《中华指南》、《公言》、《荃川之声》和《洪报》等。

另一类是国民党各地支部主办的报纸。具有代表性的是1921年由吴公辅等人于巴城创刊的《天声日报》,孙中山为该报题写报名与祝词,因坚守民族立场,言词激烈,曾有两位社长和十几位主笔、编辑被荷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其他有三宝垄国民党支部办的《中南日报》(1926年),孟加锡国民党支部办的《民声报》和《荷属民国日报》(1929年)及《新中华日报》(1928年)。这些报纸都是依照中华民国颁布的党报条例办理。因读者不多,刊行不久即停刊。

三十年代创刊的华文报刊有:《小世界》(巴城,1930年创刊,周刊),《苏东中华总商会月刊》(棉兰,1930年创刊),《玛华》(爪哇,1932年创办,月刊),《泗华校刊》(泗水,1932年创办),《苏华商业月报》(棉兰,1934年创办)等。据统计,至1939年印尼共有7家华文报纸,8家华文周刊,2家华文月刊。日军侵占时期,华文报纸全部被勒令停刊。

二战后至五十年代末期,华文报刊处于“全盛时期”。《新报》、《天声日报》等纷纷复刊,加之新创刊的,华文日报约有40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左派报纸有:(1)《新报》,洪渊源任社长兼总经理,拥护新中国,日出对开1张,第1版以登载中国大陆新闻和国际新闻为主,第2版多登载当地新闻,第3版为副刊,第4版为娱乐版,1955年还发行以文体内容为主的星期天增刊。(2)《生活报》,1945年创刊,初为周刊,后改为3日刊,1946年改为日报,王纪元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日出对开1张,第1版为要闻,第2版为中国大陆地方新闻,第3版为当地新闻,第4版为副刊和服务栏,1960年日销量55000份。1950年该社还创办了《生活周报》,偏重于报道中国风貌、乡土民情、新人新事等。(3)《民主日报》,1945年创刊,社长叶贻

东,总编陈明枫,设有报道中国大陆新闻的专版,副刊多登载反映新中国和侨乡风貌的文章。其他如《大公商报》(坤甸,1949年创刊)、《华侨日报》(棉兰,1954年创刊)等华文报纸,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新中国。

1958年,印尼陆军当局以中文翻译人员不足,不便审查华文报刊为由,将所有华文报纸查封,华文报刊顿遭厄运。同年,左派华文报《新报》和《生活报》合并,恢复出版。1960年,印尼出现排华浪潮,所有左派华文报纸被停刊。1961年棉兰出版的华文报《政治宣言日报》,有四分之一的内容为印尼文,泗水有《红白报》,次年二报休刊。1963年在雅加达创有《首都日报》、《忠诚报》、《火炬报》和《革命火炬报》,泗水有《友谊报》等。这时华文报的办报人都是印尼籍,并以报道印尼的消息为主,多数与印尼民众组织或政党有关系。它们已成为印尼民族报业的一部分。至1965年9月前,印尼政府还批准其他8家华文报纸的出版。

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所有华人的报纸均遭封闭,印尼华文报业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消亡。1966年,官办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在雅加达出版,该报有一半篇幅为印尼文,是现存唯一的华文报。

四、菲律宾的华文报刊

1888年杨怡洪于马尼拉创办的《华报》,是菲律宾最早的华文报纸。该报日出16开2张,登载新闻。因经济困难、发行量少,不到一年即停刊。1890年杨怡洪又创《岷报》,旋又闭刊。1899年粤人潘庶蕃创办《益友新报》,为中国康梁保皇会的喉舌,次年因各种困难改组为《岷益报》,只办了数日。1908年,马尼拉中华商务局出资创办《警铎新闻》,王汉全为总经理,日出对开2张,以上等白纸印刷,刊登本地及中国与世界新闻,较之以前诸报质量有所提高。

1911年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经济的发展,创办华文报刊之风渐盛。1911年设在马尼拉的中国同盟会菲律宾分会创办不定期的机关报《公理报》,以郑汉琪为总理,吴宗明为总编辑,日出对开2张。后来该报转变为中国国民党驻菲支部的机关报。《公理报》创刊后,办报之风渐起,如1914年创办的《中华日报》,中国国民党驻菲二支部创办的《民号报》,以及各种华文期刊:《菲律宾华侨教育丛刊》(1917年创刊),《教育月报》(1917年创刊),《华铎》(周刊,1918年创刊),《教育周报》(1920年创刊),《华潮》(半月刊,1920年创刊),《华侨商报》(月刊,1919年创刊)等。

二三十年代华文报刊日多,影响较大的有:《平民日报》,1919年创刊,由菲律宾中华工党所办,王雨亭、王宣化任总经理,傅无闷任总编辑。该报积极宣传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映当地华工的愿望与要求,批评华侨社会的不良风气,1923年停刊。《华侨商报》,1922年改为日报,坚守报道公正、客观的立场,“以促进华人与菲律宾人社团之间的感情”,为菲华社会服务。该报抨击中国国民政府的违法行为。其负责人于以同在日军侵占时期为日军所杀害,报社关闭,1949年复刊。《新闻日报》,1925年由李清泉出资、吴重生创办,主要读者对象为菲华社会祖籍闽南的商人、店员和学生,重点报道当地经济新闻、各地商社活动和福建家乡的消息。编有适合不同读者的副刊。该报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日销近万份。每年年底编印英文年鉴。其他华文报刊有:《侨声日报》(1930年创刊),《民情日报》(1931年创刊),《新中国报》(1932年创刊),《前驱日报》(1933年创刊),《华侨日报》(1934年创刊,1938年改名《国民日报》),《东方月刊》(1921年创刊),《小吕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报》(1923年创刊),三十年代由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主办的《旗帜》(周刊)和《民众》(周刊),等等。

四十年代华文报业呈繁荣状态。中国抗战及太平洋战争时期,华侨办有多种秘密刊物,都是报道各地反法西斯形势,宣传和组织华侨

进行抗日。如《抗战月刊》,《为公》(1941年创刊),《重庆日报》,《中山日报》(1941年创刊),《华侨导报》(1942年创刊),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创办的《工作与学习》,华侨商人抗日反奸同盟创办的《侨商公报》,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创办的《华侨之光》,南岛抗日游击队的《南岛导报》等。其中的《华侨导报》系在菲律宾华侨劳工团体联合会的支持下,经过林季良、麦慕平等人筹划而创办的,宣传抗日,被誉为“华侨抗日、民主的旗帜”,战后改为日报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陆定一等为该报题词,1947年该报被查封。1945年以后,《大华日报》、《中正日报》、《华侨商报》、《前锋日报》等相继复刊,此外还有1946年创刊的《现代妇女》(月刊)和《大汉魂月刊》,1947年创刊的《中学生》和《民声日报》,1948年创刊的《大中华日报》和《民族日报》等。除《大中华日报》至1972年遭封闭外,余均发行二三年即停刊。

五十年代以来,华文报刊除《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大中华日报》等几份日报外,新出版者甚少,仅有《菲律宾商总月刊》(1956年创刊,后改名为《商总邮报》),《华侨周刊》,《菲律宾商务月报》(1957年创刊),《侨报》(1959年创刊)等,且多以登商业新闻、商品信息和广告为主。1972年,马科斯政府实行军管法,严格控制新闻媒介,以上五六十年代复刊或新出的刊物悉遭封闭。《华侨商报》负责人于长城和于长庚及全体编辑人员以该报“传播反菲亲共思想”的罪名而被逮捕。

菲律宾法律规定,外籍人不得在当地办报,故七十年代以来菲律宾的华文报刊均由菲籍人士主持。这时的华文报刊主要有:(1)《东方日报》,1974年由华侨华人出资,东方传播有限公司主办,总编辑王富民,标榜为“不偏不倚,至公至正”的“菲律宾人报纸”。初期报道中国较为详细,副刊辟有“中国简介”专栏。日出对开二三张,广告多时增至四五张。1981年,前《华侨商报》部分员工联合1978年在马尼拉

创刊的《菲华联谊周刊》，收购《东方日报》的出版执照，创办了《世界日报》。(2)《世界日报》，在《东方日报》的基础上创办，董事长陈永栽，社长陈华岳和吴永源，董事总经理施天津，总编辑陈台民。该报日出对开二三张，发行量达万份。除本地新闻、国际电讯、商情和社团消息外，还以大量篇幅刊登关于中国大陆的通讯报道，内容丰富，报道客观，受到读者欢迎。各类副刊有：“菲律宾之页”、“十方”、“小说”、“诗刊”、“文娱”、“象艺”、“集邮世界”、“文艺副刊”、“华人天地”、“融合”等，还连载与当地关系密切的学术论文。(3)《联合日报》，1973年由《公理报》和《大中华日报》合组而成，董事长高祖儒，总编辑施颖洲。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大陆的客观报道渐多。1989年日出对开五六张，销2万份。该报拥有13个文艺性副刊，如“菲华文艺”、“耕园”、“星座”、“晨光”、“风景线”、“菲华青艺”等，还有“家庭生活”、“青年天地”、“艺海”等特种副刊。每日还有1—3个英文版，以摘译中文版稿件为主，适应不谙华文的读者的需要。(4)《菲华时报》，1983年创刊，系《菲华周刊》的姐妹刊，总编辑叶双珠，旨在为推动菲华融洽、华人团结和菲国繁荣作贡献。日出对开3张，报道菲岛政治、社会、经济、体育及华人社会的动态，副刊内容有武侠、斗智和言情小说，还有国际通讯、医药卫生、家政、艺术、旅游、摄影和青少年园地。

此外，华文报刊还有：《商报》(前身为《华侨商报》，1986年复刊，改为现名)，《菲华周刊》(1982年创刊，中英文双语刊)，《环球日报》(1986年创刊)等。至1988年，有华文日报5家，期刊2家。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报道中国尤其是福建的消息，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更多的是强调华人要融入菲律宾社会并促进其进步。

五、泰国的华文报刊

1903年《汉镜日报》的创刊为泰国华文报业之始。受中国政治斗

争的影响,泰国的华文报刊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

1906年,同盟会会员陈景华、萧佛成创办了《美南日报》,旋因经费困绌,改组为《湄南日报》。该报董事徐勤等人受保皇党影响,于1907年另组《启南日报》,以宣传在中国保皇立宪,直至清朝灭亡。萧佛成等同盟会会员还创办《华暹日报》(1907年创刊,1932年停刊)以鼓吹革命,萧佛成为社长,陈景华为主笔,日出4开两张。该报另有泰文版名《支诺沙炎瓦拉萨》,内容与华文版大致相同。1908年,新加坡革命党人尤列逃亡泰国,在曼谷创办《同侨报》,与《华暹日报》相呼应,成为革命派的舆论阵地。

1911年以后,华文报刊仍然保留有先前革命派与保皇派斗争的痕迹。1912年,中国国民党人蔡俊卿在曼谷创办《天汉公报》。同年,《启南日报》的最大股东郑智勇派人接办该报,改组为《中华民报》(1939年停刊),陈芳草任主笔,起初拥护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继则标榜无党无派,反对中国国民政府。1918年,区灵侠、陈愚侠、马英侠、李少侠四人创办《侠报》,主要刊登社会新闻,1922年停刊。

二三十年代,华文报业走向繁荣。1922年,谭振三在停刊《侠报》的基础上创办《侨声报》,1926年因发表过激言论,被当局取缔,改由励青书报社接办,更名《励青报》。《励青报》因与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展开论战,被迫于1927年停刊。1923年,林铭三创办《暹京日报》。1925年,许超然创办《联侨报》。至1927年,由于中国政局骤变,移入泰国的中国人增多,使华文报业呈现生机,无论在华文报的数量上,还是在编排的质量上,均大为改观。主要有:(1)《国民日报》,1927年由吴碧岩、许超然创办,总编辑蔡学余。率先用白话文。1931年该报被查封后相继改称《民国日报》和《曼谷时报》出版。(2)《华侨日报》,1928年由熊幼霖、张亦锋等人创办,总编辑吴楚声,主笔蔡惠康。初与《中华民报》笔战甚烈。1936年当地侨领陈守明接办,改用卷筒机印刷,出版星期刊,日销量达8000份,曾跃为泰华第一大报。1935年

创办《华星日报》和《华声日报》为其姊妹报。1939年三报均为当局所查封。其他还有《曼谷日报》(1935年创刊),《中民日报》(1935年创刊),《民众日报》(1936年创刊),《中国报》(1938年创刊),《中原报》(1939年创刊),《新时报》(1939年创刊,1943—1946年间更名《泰华商报》)等。1939年銮披汶政府实行排华政策,除《中原报》和《新时报》外,余报一律禁止出版。

二次大战后,侨报恢复,至五十年代初,仅在曼谷就有华文日报近20家,华文报业堪称全盛。诸报立场迥异,壁垒分明。

属于左派的报纸有:《真话报》(1945年公开发行),《全民报》(1945年创刊),《曼谷商报》(1948年创刊),《民主新闻》(中国民主同盟会在泰国的机关报,1947年创刊,1953年停刊)和《南晨报》(1951年创刊)等。以《全民报》历时最长、影响最大。蔡志宏、吴天荣先后任该报总编辑。初创时,以大众文化公司的名义向全国招股,使该报建立了扎实的基础,进入泰华大报之列。在创刊号上提出了“实现民主,惩办汉奸,中暹亲善”的办报方针,宣传华侨华人与当地友好,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建立和平、独立和民主的中国。1949年以后该报扩大版面,报道中国大陆的建设成就,日销量逾万份。1952年终因当局多次刁难而停刊。

与之相对立的报纸主要有:《中国人报》,1945年由兰东海创办,社长陈春发,半年后停刊;《正言日报》,1946年创办,经理李锡麟;《民声日报》,1946年初由罗鸿恩等创办;《曼谷公报》,1948年创刊;《民主日报》,1952年创刊,等等。均由中国国民党人主办,发行量少,不出一二年即停刊。

持中间立场的报纸有《中原报》、《光华报》(1945年创刊)、《华侨日报》和《星暹日报》等。其中《星暹日报》创刊于1950年,系胡氏“星系报业有限公司”的产业,资本雄厚,首任社长兼总经理苏济川,总编辑杨丽生,1971年社长改为李益森,日出对开6—8张,有一半的篇

幅为广告,每天均发表社论和时事分析专栏,国际瞭望及副刊均采自香港报纸。

五六十年代华文报业受到严格管制,銮披汶、沙立、他依军人集团相继执政,封闭华文中学,取缔《中原报》和《光华报》等激进华文报刊,使华文报业一落千丈,仅有《星暹日报》、《京华日报》(1959年创刊)和《中华日报》(1960年创刊)等存在。

七十年代华文报业出现转机。1975年中泰建交,泰政府对华文报刊的控制有所放松。1970年翁见石等创办《东南日报》,注意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1978年停刊。1974年《良友报》(周刊)和《虎报》合并出版《新虎报》,1978年更名《泰中日报》。1974年又有《新中原报》和《华光报》创刊。1976年泰华文化企业公司创办《泰华报》(周刊)。同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华文日报除《世界日报》、《京华日报》和《星暹日报》外均被禁止出版。八十年代初,泰国有华文日报八家,《泰中日报》和《泰商日报》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停刊,其他仍在发行的主要有:(1)《星暹日报》,日销量约2万份,副刊有娱乐和武侠小说等。(2)《世界日报》,1955年创刊,历任社长许敦茂、陈振刚、姚文利、谢起、饶迪华等,日出对开4大张,除当地和世界新闻、经济与行情外,还有各类副刊,如“文艺”、“是乐园”、“小说世界”、“时代青年”、“少年世界”、“青年世界”、“世界漫画”等,1980年又辟有“泰华妇女”(双周刊)和“台大人”(双月刊)。(3)《中华日报》,注意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辟有小说、娱乐、综合、旅游等10多类副刊,日出对开2大张,1970年率先改用新型的彩色柯式印刷机。(4)《新中原报》,1974年由李其雄创刊,日出对开六七张。重视国际要闻和中国新闻,还设有侨乡通讯专栏;当地新闻注意报道华侨华人社会动态、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辟有“乡土”、“文化娱乐”、“大千世界”、“史地”、“大众文艺”等各类副刊,还设有专版,登载泰国华人的小说、散文和小品等。(5)《京华中原联合日报》,1984年由《中原日报》和《京华日报》合组

而成,日出对开8张,国际新闻和当地新闻并重,常登载政府对华人政策动向和华人社会活动的消息。

这些华文报刊多采用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以及中国新华社的通讯,副刊多转载中国台湾和香港报章作品。华文报业主要受泰籍华人集团的支持,办报人为泰籍华人。1980年在泰华实业家陈世贤的倡议下,成立了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旨在加强华文报人之间的团结,相互交流,促进社会公益,谋求华文报人的福利。该基金会得到泰国华人社团、佛教社团和各界名人与侨领的资助,这对于促进泰国华文报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六、缅甸的华文报刊

1903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由徐赞周、庄银安等出资,谢启恩主持创办了《仰江日报》,是为缅甸报业之始。次年,该报改名为《仰光新报》。1905年秦力山加盟该报,著论宣扬革命,在报上刊载《革命箴言》,使“缅侨之知识因之大开”,“缅甸华侨革命运动于此树其基”。该报内部同盟会与保皇会两派斗争加剧,遂致1908年停刊。

庄银安等同盟会人于1906年创办《商务调查会月刊》,仅出两期即告闭刊。1908年《光华日报》创办,为缅甸同盟会机关报,首任经理庄银安,居正、杨秋帆任总主笔。该报力倡革命,反对保皇,号召推翻清朝,为清廷所不容,被强令拍卖,保皇派购得后改为《商务报》。1909年,同盟会会员集资复办《光华日报》,主笔为居正和吕志伊,与《商务报》展开论战,使《商务报》被迫歇业。1910年《光华日报》停刊,同年改为《进化报》出版,仍以吕志伊为主笔,革命锐气不减从前,但遭保皇派与地方当局相勾结进行迫害,创办仅8个月又告停刊。后来徐赞周、张永福等以学务总会的名义承购《进化报》设备,创办《缅甸公报》。

1911年之后缅甸报界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局面。1913年《觉民日报》的创办即是其标志。该报首任主笔梁冰弦,在中国北伐战争前办得有生气,销量居当地侨报之冠,后成为中国国民党仰光支部的机关报,1942年日军侵占时期停刊,1946年复刊,1950年停刊。1921年陈守金、陈允洛、许魔力创办的《仰光日报》,标榜无党无派,与《觉民日报》展开笔战,后由陈兰生主持,吸收王思科等加入编辑部,刊登汤道耕(艾芜)的作品,使缅甸社会呈现新的文化气氛,曾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成为深受华侨欢迎的华文日报,后期的《仰光日报》由郭史翼主持。

二三十年代华文报纸还有:《缅甸晨报》,1923年由胡文虎创办,首任总编辑鲍慧僧;次年该报由杨子贞接办,更名《缅甸新报》,总编辑陈震川;1928年该报由华侨社团“中华工党”接办,1929年停办。《兴商日报》,1930年由华商社团“兴商总会”创办,赖笑亦、李全林先后任主编。《新芽日报》,1930年由缅甸书记公会创办,经理丘筱如,编辑有林环岛、汤道耕(艾芜)等。另有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微光半月刊》(1923年创刊)以及《米港》、《仁声日刊》、《中缅周刊》、《南洋华侨丛刊》、《闽山新闻》、《晦鸣周刊》、《岩石》和《新国》等杂志。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缅甸出版的华文报刊成为鼓舞华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阵地。1938年许魔力、陈兰生、陈允洛创办《中国新报》,仰光一批华人作家和报人参与该报的编辑与撰稿,刊有许多宣传抗日的散文、小品。1939年邓景芬、容希文等创办《曼德勒指南》,次年改为《缅甸日报》,旋又更名《华商报》,经理张良丞,主编刘一溪。此外还有《土瓦导报》(半月刊)、《中缅周刊》、《如是周报》、《新知周刊》等期刊或小报。这些报刊大多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

战后初期华文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45年7月《中国日报》创刊,接着《新仰光报》创办。《新仰光报》首任董事长陈守金,经理徐四民,主编杨水源,该报以“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替侨胞说话”和“坚持

和平、团结、民主”为宗旨,敢于揭露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并推进民主运动。该报后期面向广大华侨,致力于发展中缅友好,“团结广大侨胞,缓和国际形势,促进世界和平,激发侨胞爱国精神,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至1965年停刊。

其他新办的报刊主要有:《先声日报》(1945年创刊,1946年停刊),《人民旬刊》(1946年创刊,1947年改为《人民日报》,后又易名《人民报》,1965年停刊),《中华商报》(1949年创刊),1950年创刊的《生活周报》、《华青周报》、《自由日报》,《中国论坛报》(1951年创刊),《民众呼声报》(1952年创刊),《亚洲日报》(1953年创刊),《时代报》(1960年创刊)和《东南日报》(1961年创刊)等。这些报刊表现出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在它们的发展中较多地受到中国政局变化的影响。

1966年,执政的奈温军人政府取消所有外侨(包括华侨)的报刊出版执照,华文报业均被迫停办,此后缅甸再未出现过华文报刊。

七、印支三国的华文报刊

(一) 越南

1918年由法国人创办的《南圻日报》,是越南的第一份华文报纸。1920年又创刊了《华侨报》,主要作为天主教布道之用,该报后由岑琦波、余奋公等接办,始刊登一些中国和当地华侨社会的政治、经济新闻,1925年余奋公退出该报,另办《群报》,两报时有论战,1928年停刊。

1929年,侨商梁康荣等创办《民国日报》,次年更名《中国日报》,先后聘请老报人朱学瀚、张清泉、陆文英等为主笔,评议时局,革新版面,及时报道中国社会动态,至1940年日发行量达5000份,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报纸。

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华文报刊还有:《南风》、《华商周报》、《民报》、《越南日报》、《全民报》、《侨众报》、《公论报》、《建国报》、《真报》、《中华日报》、《全民日报》、《时报》和《华南报》等。诸报多维持数月即告停刊,其中《侨众报》是一份由工人集资创办的宣传抗日的报刊,《民报》和《全民日报》影响最大。

《民报》是由当时印支最大的抗日团体“越南华侨救国总会”的理事陈炳权、吴敬业、张伟堂等倡议创办的一份日报,作为该组织的喉舌。《全民日报》也是该组织的报纸,该报拥护中国的国共合作,主张抗战,反对投降,每天登载大量有关抗日的消息,日发行量逾5000份,为三十年代印支最大的华侨报纸。1940年该报因中国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而遭封闭,后曾以《华商日报》和《中山晚报》的名义出版。

日军占领越南期间,华文报大多停刊。战后,诸如《越南日报》、《中华日报》、《中国日报》、《远东日报》和《侨众报》等纷纷复刊。1946—1949年间,越南有27家华文报刊,5家在北部,22家在南部,这22家中有15家是日报、晚报和三日刊,集中在西堤。战后至五十年代,华文报刊处于兴盛期。这一阶段相继创办的报刊有:《南亚日报》,1949年创刊,社长郑明,总编辑徐盘石;《东方报》(周刊)和《侨锋》(月刊),1950年由越南南部华侨解放联合总会创办,前者主编袁克辛(丁力),后为张英(张俞),后者主编张弓,1954年停刊;《妇女周刊》,1946年创刊,同年改为《妇女日报》,社长张瑞芸,1952年又改版为《世界日报》;《万国晚报》,1946年创办,以青年人为主要读者对象,五十年代初停刊;《太平洋周刊》和《太平洋日报》,1946年创刊,1954年停刊;1950年创刊的《和平日报》、《新闻日报》,后者1961年增加了国内外新闻电讯,更名为《新闻快报》;《经济周刊》,1951年创刊;1952年创刊的《中南日报》、《西南日报》和《中正日报》;1953年创刊的《大厦日报》和《中山日报》;1954年创刊的《每日论坛报》和《越南日报》;1955年创刊的《群声晚报》、《光华日报》、《亚洲日报》、《越

华晚报》、《自由太平洋通讯社》和《新越华报》；1956年创刊的《新声日报》；1957年创刊的《自由太平洋月刊》等。

六十年代,越南的华文报刊陷入了不景气状态。1964年,有华文日、晚报11家,3日刊、周刊和月刊3家。南越西堤新创刊的华文报刊主要有:《新越晚报》(1960年)、《成功日报》(1961年)、《国际报》(3日刊,1962年)和《越南新报》、《越南快报》(1964年)以及《前锋日报》(1965年)。1965年阮高其执掌政权后,限令华文报进行合并,合并后存有7家华文报,即《远东日报》、《成功日报》、《新论坛报》、《越华报》、《新闻快报》、《亚洲·万国日报》、《建国·国际联合报》等。在北越,多数华文报刊在1954年北越解放后停刊,唯有1955年由越南华侨联合总会筹委会创办的《新越华报》,该报是以刊登各地政治、经济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首任社长王亚夫,旨在宣传新中国和北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中越友好合作,1976年停刊。

七十年代初,南越西堤还有《远东日报》等9家华文报纸,1975年西贡解放,越南北、南方统一,华侨民办的华文报纸悉数停刊,“越南华文记者公会”被迫解散,越南新政府接办了《亚洲日报》,于1975年5月出版《解放日报》,以蚁团为社长,林思光为总编辑,该报成了越南政府向华人宣传有关政策法规的华文报纸,属越南政府办的外文报。至此,越南已没有华人报刊。

(二) 柬埔寨

1938年邝鲁元、叶文长在金边创办小报《播音台》(3日刊),为柬埔寨华文报之始,该报内容主要是当地华侨消息和娱乐性文章。此后又有《大中报》、《华商报》、《中棉报》等小报问世。1945年法军再度占领柬埔寨,此类小报均遭取缔。1945年前流入柬埔寨的华文报纸主要是南越出版的,如《远东日报》和《中国日报》等。

1946年创刊的《现实日报》是柬埔寨第一家华文日报,社长陈继述,副社长洪仲英,总编辑吴健。由于该报竭力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报道中国的消息,受到华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却遭到当局的刁难。如对法军占用金边广肇惠学校发表社论,委婉地要求当局退还,而被令停刊3天。1951年该报因所谓报道内容不利于安定而被法殖民当局查封。

1947年,中国国民党金边支部创办了《公言报》,与《现实日报》相抗衡。1953年更名为《救国日报》,同年停刊。

五十年代开始,华文报刊逐渐增多。主要有:《工商日报》,1950年温光彬等在金边创办,社长温光彬,总编辑邓拔,面向华侨工商界,刊登与当地有关的经济新闻,国际及中国台湾和香港要闻,还有关于中国大陆情况的报道,日销5000份,1967年停刊,为柬埔寨发行量最大、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华文日报。《湄江日报》,1951年由魏志勇、魏志强兄弟创办,黄玉书任社长,一度更名为《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副刊登载有关中国大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史掌故的稿件,辟有小说专栏,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1966年停刊。《金边日报》,1953年郭文川等创办,以文风新颖、言论开放而受到欢迎,1957年改为《金边晚报》,旋停刊。《环球日报》,1955年朱闻义创办,次年报社易主,由林蓬莱任董事长,苏健璋任总编辑,1958年改名为《华声日报》,1961年停刊。《棉华日报》,1956年创刊,名誉董事长陈继述,首任社长黄天成,总编辑潘丙,该报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事业,主张中柬友好,提倡华侨社会互助团结,大量报道中国大陆新闻,对华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每周发表一篇专论,还设有“南越通讯”、“星期专论”等专栏,1967年该报日销量达1.1万份,同年停刊。《生活午报》,1957年创刊,社长刘栋材,主编陈祥发,以刊登当地新闻为主。

此外,1957—1967年间还有一些报纸,如《新报》(1958年创刊,社长张日明,1964年停刊)、《真报》(1959年创刊)、《大华报》(1958年创刊)和《明报》(1961年创刊)等。另有《新生日报》、《华侨报》、《亚

洲日报》、《文潮日报》、《春秋晚报》、《中柬日报》、《柬埔寨日报》、《热风晚报》以及小报期刊《海外周报》、《交通日报》、《亚洲周报》、《人权月刊》和《东华文艺》等,存在时间较短,尤其是一些小报,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力量较差,加之内容猎奇或黄色,往往出版一两个月就停刊。

1967年柬政府封闭所有的华文报刊,仅有官方华文报《柬埔寨日报》(1968年创刊)以及后来的《柬埔寨救国日报》(1970年创刊)。

(三) 老 挝

1959年由何汉光等在万象创办的《寮华日报》,是老挝的第一家华文报纸。社长刁丹,总编辑何汉光,日出4开一张,同年底停刊。

六十年代,当地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主要有:《万众报》,1960年由云昌镑创办,数月后停刊;《虎报》,1960年创刊,半年后停刊;《寮华新闻日报》,1965年由吴国华、朱谋展创办;《永珍日报》,1967年由王任民创办,1972年停刊。

七十年代创办的华文报纸有:《寮声日报》,1971年创刊,社长昭森堪·努堪(国会议员,老挝人),总编辑黄鹤,日出2—3大张,报道本地新闻、国际要闻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闻,1972年被查封。《老华日报》,1976年由万象华侨理事会创办,以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为主,1978年被查封。至此,老挝无华人创办的报纸。老挝华文报刊历时19年,是印支三国中华文报刊历史最短的。

八、日本、朝鲜半岛、蒙古、印度的华文报刊

(一) 日 本

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维新派及大批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丛聚日本,加之旅居那里的留日学生,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兴办报刊,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使得这一阶段成为日本华侨创办华文报刊的最盛时期。

1898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横滨创办《清议报》，为日本侨报之始。该报与《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是在日保皇派的主要阵地，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两份报纸。

《清议报》系逢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的旬刊，每期30至40页，3万余字，销3000余份。梁启超为该报的实际主持，冯镜如为发行兼总编辑，麦孟华和欧榭甲协助编辑。该报除设有“本馆论说”、“时论译录”、“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等固定栏目外，还辟有“政治学谭”、“闻戒录”、“猛省录”、“汗漫录”等栏目。1901年该报为纪念刊行100期，刊有梁启超的纪念性文章《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旋因报社发生火灾而停刊。

《新民丛报》初为半月刊，次年改为不定期，发行人为冯紫珊，梁启超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立足于保皇与改良，主张用教育的手段来改造人民的素质，以达到“新民”的目的。该报每篇文章前都有插图、照片或题头插花，形式新颖。还设有“学术”、“新著介绍”、“饮冰室师友论学笈”等栏目，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学说，揭露以慈禧为首的“逆后贼臣”的卖国活动。

期间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主要有：（1）《开智录》，1899年由中国的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所创，创办人有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等，他们也是撰稿人，其他撰稿人有蔡锷、秦力山、蒋观云和丘菽园等。该刊为半月刊，设有“本会说”、“言论自由录”、“时事笑谈”、“粤讴解心”等八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以“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受到华侨的欢迎。（2）《译书汇编》，月刊，1900年创刊于东京，以“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为宗旨，以译载欧美、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作品为主，第二年第9期起改为“以著述为主，编译为副”，1903年起改名《政治学报》，至第11期停刊。（3）《国民报》，月刊，1901年5月创刊于东京，8月停刊，总编辑秦力山，发行人冯镜如。该报有社说、时论、丛谈、纪事、外论、译编等栏目，首

次在留日学生中宣传排满抗清的思想。(4)《游学译编》，1902年由湖南留日同乡会主办，1903年11月停刊，计12期，主编杨守仁，多译自外报外刊的文章和西方学者的专著。(5)《湖北学生界》，1903年由湖北留日同乡会主办，编辑兼发行人为王璟芳、尹援一、窦燕石，第6期后更名《汉声》，同年9月停刊，共出8期，设“论说”、“政法”、“教育”、“经济”、“留学纪录”等栏。(6)《江苏》，1903年江苏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总编辑为秦毓鎰，该刊以政论为主，发表过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姊妹》和柳亚子的《中国立宪问题》、《台湾之百年史》等。(7)《浙江潮》，1903年由浙江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其编辑和撰稿人多为光复会成员，该刊主要栏目有：“社论”、“政法”、“经济”、“哲学”、“教育”、“军事”、“文学”等，每期约3万字，1904年停刊。此外还有《直说》(1903年创刊)、《白话》(1904年创刊)、《新白话》(1903年创刊)、《日新学报》(1904年创刊)和《学术界》(1903年创刊，1937年停刊)等。

日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则是诸革命刊物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该报前身为宋教仁等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每期约6—8万字，1910年停刊，共出26期，以宣传革命党的三民主义为要旨。该报分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等栏，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初由胡汉民主持编务，执笔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等人，第6期始由章炳麟主持编务。该报的《发刊辞》、《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等，是孙中山的重要论著。《民报》发刊后，即与《新民丛报》进行论战。刊至第24期，被日本政府封禁。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各地会员纷纷创办报刊，彼此呼应，颇见声势。仅在东京创刊的就有：1905年创刊的《醒狮》(1906年停刊)、《新译界》(月刊)、《晨钟》(周刊)、《教育》(月刊)、《第一晋话报》(月刊)，1906年创刊的《法政杂志》、《复报》、《云南》、《洞庭波》、《革

命军报》、《豫报》以及《鹃声》(不定期),1907年创刊的《中国新报》、《汉帜》、《汉风》、《中国新女界杂志》、《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牖报》、《秦陇》、《四川》、《粤西》、《河南》、《大同报》以及《远东闻见录》(旬刊)、《晋乘》(不定期)、《天义报》(半月刊),1908年创刊的《关陇》、《夏声》、《国报》、《学海》、《教育新报》、《滇话报》、《支那革命丛报》、《江西》(不定期)、《梅州》和《日华新报》(五日刊),1909年创刊的《女报》、《湘路警钟》、《中国蚕丝业会报》(双月刊)、《宪政新志》(月刊),1910年创刊的《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教育今语杂志》、《铁路界》和《浙湖工业同志会杂志》,1911年创刊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等。这些报刊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宣传新思想,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

1911年以后,因大批同盟会会员返回中国,繁荣的华文报刊局面随之消失。仅见1913年由国民党驻日各部所创的《国民杂志》(月刊)和1914年由章士钊任主编的《甲寅》(月刊)。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创中华革命党,并创办《民国》杂志。《民国》的总编辑为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参加过编辑工作,以反对袁世凯为中心内容,设有“政论”、“译述”、“文艺”等栏目,1915年停刊。同时创办的还有《国学》和《民声》杂志。

二三十年代华文报刊处于低潮期。三十年代日本出现过一些华文刊物,如《实业杂志》(季刊,1920年创刊)、《三五》(1923年创刊)、《明大学学报》(1924年创刊)、《族》(双月刊,1925年创刊)、《北伐》(1926年创刊)、《时代》(1928年创刊)、《同泽月刊》(1929年创刊)、《学术界》(季刊,1930年创刊)、《海外公论》(月刊,1931年创刊)、《文化之光》(1932年创刊)、《东流》(1934年创刊)、《诗歌》(1935年创刊)、《文海月刊》(1936年创刊)、《文艺科学》(1937年创刊)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文报刊复苏。1952年至1967年日本华侨报刊有41家,其中日报1家,报纸性质的期刊3家,通讯4家,杂志33

家。1952年创刊的《中华周报》，系中、日文合刊；东京华侨总会主办的《华侨报》，初为中、日文对照。五六十年代创办的华文报刊还有：《中华周刊》（1952年创刊）、《大地报》（1953年创刊）、《新亚洲》（1956年创刊）、《东方文摘》（1960年创刊）、《自由中华》（1961年创刊）、《华侨之声》（双周刊，1962年创刊）和《华侨生活》（月刊）、《扬华侨报》（1963年创刊）等。这些报刊受中国海峡两岸政治的影响，态度偏向各异，也有立足于商业角度的。六十年代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学校通》，有反映该校的校园生活、中文写作和中国书法等方面的内容。留日台湾学生创办了《留日学报》。另有《华侨新闻》（中、日文旬刊，1963年创刊）、《华侨天地画报》（半月刊）、《华侨通报》、《世界华侨》、《春秋》、《大同》和《今日之世界》等。

七十年代以来刊印的华文报刊有：《广东同乡会会刊》（季刊）、《台湾大众》（月刊，1982年创刊）以及《亚东新报周刊》、《台生报》、《台湾青年》、《民心》、《台声报》等。还有华侨创办的日文报刊，如横滨华侨总会出版的《横滨华侨通讯》，1973年创刊，以报道会务、华侨动态为主；《台湾省民报》，1973年创刊，较客观地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1973年神户、京都、大阪三市华侨总会联合出版《关西华侨报》月刊，正面宣传社会主义中国，该报主要负责人为神户华侨总会的曾森茂。

（二）朝鲜半岛、蒙古、印度

在朝鲜，1930年有《朝鲜中华民众》半月刊发行。二战后，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在平壤创办《民主华侨》（周刊），主编李奉建，主要向华侨宣传朝鲜的各项政策法规和建设成就，也报道华侨活动情况及中国动态。1951年在平壤还出现过周二刊《战友》和《华讯》。

1946年韩国人办的《汉城日报》附设有《汉城华文版》日刊。次年该《汉城华文版》更名为《中华日报》，独立刊行。1950年韩国华侨朱

协接办,改名为《中华时报》,主笔吴振宇。1957年该报由孙日升等收购,改名《韩华日报》,旋因报社产权问题而停刊,至1960年复刊。1972年该报扩大版面,增朝鲜文版,以崔凤烈为社长,以加强“韩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暨友谊增进”为宗旨,又更名为《韩中日报》。该报为韩国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影响较大的一份华文报纸。

此外,韩国还有过《正声日报》(1960年创刊)、《政法新报》(周刊)、《华侨新报》(周刊,1963年创刊)等。

在蒙古,1929年有《工人之路报》,为该国华文报刊之始。该报在1954年至1964年由中国旅蒙华侨协会主办,后改由蒙古通讯社接办,更名为《蒙古消息报》(周刊)。

印度华文报刊始自《警世月刊》之创,惜其起迄日期不详。有据可查的印度最早的华文报刊是1930年创刊的《革命宣传》(半月刊)。1933年由李渭滨、王志远、黎南兴、张国基等人创办的《印度日报》是印度最早的华文日报。该报日出对开1张4版。五十年代以后日销约1000份。中国抗日战争前后,印度还出版过《新军日报》、《军声报》(周刊)、《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等。

1951年加尔各答华侨创办《中国新闻》,转载中国报道与社论,免费赠阅,1955年该报扩为对开1张半,注重地方工商新闻,副刊丰富多采。1962年停刊。

六十年代以来印度华人创办的报刊有:《中央周报》,藏文版,1963年创刊,每次对开1张,多采用中国台湾报刊文章。《印度商报》,1969年于加尔各答创刊,主要刊登华人生意经、婚丧喜庆的贺词或悼词,还有武侠小说和广告,面向加尔各答和塔坝的中老年华人。八十年代仍刊行的华文报刊有《印度日报》和《印度商报》。

第三节 美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一、美国的华文报刊

美国的华文报刊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形一样历史悠久,是海外华文报刊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854年至1990年间,美国各地出现过的华文报刊约380种^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直接影响到美国华文报刊的兴起和发展。

1854年,美国基督教会在旧金山创办了华文周报《金山日新录》,以宣传宗教为目的,是为美国首份华文报纸,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华文周报^②。该报每期出版4页,刊有中美新闻、货物行情、船期和广告等,系缮写石印,仅存在几个月。

1855年基督教长老会又推出了《东涯新录》华文报,编辑为粤籍华侨李根,初为双日刊,每周二、六出华文版,周四为中、英文对照版,面向美国华人商界,常刊载介绍华人社会风俗的文章,次年停刊。

美国华侨创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1856年由司徒源所创的《沙加缅度新录》,1858年停刊。

十九世纪晚期,随着来美华侨的增多和集聚,华文报刊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提高。这时的华文报刊有:《旧金山唐人新闻纸》(周刊,1874年创刊);《唐番公报》,也称《华记报》,1875年创刊,发行人为黄卓和霍夫曼,后又先后改名为《华番汇报》和《中西汇报》,1903年停

① 王士谷:《美国华文传媒在转型期的十大变化》,香港《华人月刊》1994年第3期。

② 麦礼谦:《19世纪美国华文报业小史》,《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刊,为十九世纪美国华文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者;《文记唐番新报》,1876年在旧金山创刊,系周刊,缮写石印,发行人为霍夫曼和李文廷;《华人记录》,1876年在加州创刊,为中、英文半月刊,创办人为莱里斯;《中外新闻》,1883年在旧金山创刊,1990年改名《翰香捷报》(日报),旋停刊;《檀香新报》,1881年粤籍华侨程蔚南所创,石印周刊,为檀香山地区的第一份华文报纸,1883年改名《隆记报》;《萃记华美新报》,1883年在旧金山出版,1901年停刊;《华美新报》,1883年黄清福在纽约创刊,为当地首份华文报纸;《文宪报》,1891年在旧金山创刊,成为该地保皇会的机关报;《瑞香华洋新报》,1891年在波士顿创刊;《华美字报》,1892年在费城创刊,中、英双文周刊;《华美新报》,1899年伍盘照在洛杉矶创办;《华夏报》,1893年创刊;《丽记报》,1895年在檀香山创刊;等等。

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华文报刊如雨后春笋。十九世纪的少数华文报刊仍在发行,如《华美新报》于1900年改名《中西日报》,以宣扬教义为主,至1951年才停刊;《隆记报》于1903年改名《檀山新报》,1907年又改名《民生日报》,次年再次改名《自由新报》;《文宪报》于1906年改名《世界日报》刊行。同时创办了一批新的报刊,如:《新中国报》,1900年由保皇会创办于檀香山,梁启超任主笔,至1978年才停刊,为该地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大同日报》,1902年由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创办,1951年停刊。《启智报》,1907年由洪门人士邓秀隆、林怀创办于檀香山。《自由新报》,1907年由原《民生日报》主笔卢信创办,为檀香山同盟会机关报,与《新中国报》笔战,1928年停刊。《大声报》,1908年在檀香山创刊,宣传革命,等等。

华侨较多的旧金山和檀香山成为美国华文报纸的两个中心。这些报纸几乎都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的影响。有的报刊延至今日仍在发行,如《少年中国晨报》等。该报初名《美洲少年周刊》,1908年在旧金山创刊,1910年改为日报,以《少年中国晨报》之名出版,黄超五任总

编辑,李是南任新闻和副刊编辑,成为美洲宣扬三民主义的主要阵地。

二十年代还有:纽约中国政学社主编的《政学丛刊》(1927年创刊)。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支部通过留学生组织华侨工会,先后出版过《平等》(月刊)、《侨光》、《互助》和《国民日报》等。“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出版过《先锋》(周刊)和《先锋报》等。1928年中国国民党党员于檀香山创办《中华公报》,该报于1947年改为日报并易名《中华新报》。纽约出版过《中山日报》、《纽约商报》、《五洲公报》、《纽约日报》和《民气日报》等。

三四十年代,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地先后创办过《檀山华侨年报》、《交通》、《世界日报》、《三民晨报》、《三民画报》和芝加哥北美洲中国学生会编的《留美学生月刊》等。在纽约出版的有《救国日报》、《华美日报》、《光华日报》、《联合日报》、《自由世界》(月刊)和不定期刊《大公报》、《华侨文阵》、《学建通讯》等。这些报刊都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较突出的是梅参天、冀贡泉、唐明照等人于1940年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

二战后初期曾出版过《新苗》(月刊)、《光明》、《文荟》(季刊)以及几份周刊,如《新光大报》、《大华周报》、《中美周报》、《美华新报》、《东西报》,还有不定期的《团结报》。这些报纸内容贫乏,编印粗糙。1946年于旧金山创办的《太平洋周报》则与众不同。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美之间的建交,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移居美国人数的增多,华人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华人社团的活跃,华文报刊迅速发展。1988年,有华文日报12家,期刊115家,共127家。有当地办的日报、香港报纸的美洲版和报纸型的多日刊;从分布地区来看,以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的华文报刊为最多。

纽约有:

《美洲华侨日报》，1940年创刊，星期日休刊，因该报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受到美国和中国台湾国民党在美势力的迫害，处境维艰。1972年以后该报加强了编辑力量，发行量大增，1977年其办报方针为：以在美华人的观点，拥护国际上的正义进步事业，忠实地报道中国的消息，支持华侨争取合法正当权益，为侨胞服务，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1980年起日销量约8000份。1984年从日出对开3张增为4张，主要版面有要闻、国际新闻、中国大陆新闻和台湾新闻、香港新闻、体育、中美商业、纽约新闻、侨社新闻、华侨影视、香港影视、小说、欢乐家庭、美洲生活等。社长谭华焕，总主笔郑如耿。1989年停刊。

《联合日报》，1941年创刊，自诩“中立”、“商办”，五十年代曾受到李宗仁的支持，日出对开4张16版，主要内容有美国、侨社、中国台湾、香港新闻，中国大陆研究和大众文坛，其余各版为小说等专刊、副刊。自1987年起每逢周一增辟“国学入门”专刊，包括“自我学习中文”、“锦绣河山”、“先哲教诲”、“励志故事”、“看图识字”和“字谜”等六部分，以让华裔子女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董事长兼总主笔、总编辑为吴敬敷。

《纽约日报》，1972年由梁桢、陈孟照、楼明发和谭勇等人创办，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为福建客属人王桂生，社论以评说华侨华人社会活动为主。该报在美国华文报业同行中首先使用柯式印刷机并以五号字排版。1985年改为中、英文双语日报，旨在使华人报纸进入美国社会，增进美籍华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主要版面有各地新闻以及马经、历史、人物、故事、妇女世界、健与美、食经、世界奇趣、娱乐天地、小说、武林传奇等。社长林缉光，总编辑陈天璇。

《世界日报》，1976年由王惕吾创办，旨在“传播中华文化”，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初有纽约版、旧金山版，1980年增办洛杉矶版，为柯式印刷。在中国台北、香港和多伦多、温哥华、华盛顿、波

士顿、芝加哥、檀香山等地设有办事处。初期日出对开3张,后增至对开12张,内容包括世界各地及华社新闻、体育、经贸、影视、青年、妇女、旅游、小说和副刊等。1982年起逐渐增加中国大陆的新闻报道。

《中报》,系香港《中报》的美洲版,1980年傅朝枢在纽约创办,标榜中间立场,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要闻、中国香港快讯、中国台湾新闻、神州大地、纽约华埠新闻、工商服务和娱乐影艺、武侠小说、健康长寿、文艺副刊和大千世界等。该报在纽约创刊不到3个月,即在旧金山出美西版,后又出洛杉矶版、休斯敦版、芝加哥版和波士顿版,版面分别在纽约、洛杉矶、香港编排,用卫星传送到各埠印刷发行。1982年起重视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支持中国改革事业。1989年停刊。

《侨报》,1990年创刊,社长熊斐文,总编辑郑衣德,由太平洋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初为逢周五出版的周报,旋改为日报,每日刊行28版。该报旨在谋求华人福祉,关心故土和放眼世界。主要刊载要闻、美国及国际新闻、中国大陆和台湾新闻、港澳新闻以及华人社区新闻等。

此外纽约的华文报纸还有:《华美日报》(前身为1939年创办的《光华日报》);《北美日报》,1978年由香港《星岛日报》分离出来的人员所办,旨在为北美洲华人服务,争取华人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1984年日出5张,1986年停刊;《华语快报》,1980年由华语广播公司主办,社长郑心元,日出对开3张半,除新闻外,还有娱乐消息、影视世界、医疗保健、小说和综合服务专栏,在纽约新移民集中的皇后区发行《皇后日报》,1986年二报合并为《华语快报·皇后日报联合报》;《华声日报》(1978年创刊,1980年停刊);《中国时报》(1982年创刊,1984年停刊);以及香港《星岛日报》、《成报》、《明报》、《新报》、《电视报》、《大公报》、《信报》、《文汇报》和《商报》等的纽约版。另有二三十种华文期刊,如:《台湾公论报》(每周出两次),周刊《工人观

点》、《星报》、《美加周报》、《时代周刊》，双周刊《华埠青年人》、《娱乐双周》，半月刊《全美学联通讯》，月刊《自由人》、《新土》、《运河月刊》、《社声》、《香港学生联谊会月报》、《华协月报》，季刊《文荟》，半年刊《秋火》和不定期刊《美洲中华书法学会特刊》、《平等报》等。

旧金山有：

《少年中国》，即原先的《少年中国晨报》，1986年改组后董事长为陈裕清，总编辑马全忠，日出对开3张。主要版面有要闻、美国新闻、中国台湾新闻、娱乐、古今中外、武侠小说、副刊、生活、保健、侨社以及广告。该报是美国华文报刊中历史最久者。

《金山时报》，初为月刊，后改为日报，由同源会主办，日出对开5张，主要刊载国际、本埠、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新闻以及小说、图片和南加州专页。

《时代报》，1972年创刊，初为中、英文合刊的周报，1982年改为双日刊，次年又改为周六刊，旨在及时报道中国大陆的新人新事和美国华人社区的动态，主要刊载美国、中国、华社等新闻以及娱乐、体育、自由谈、万花筒、历史与人物等专栏，广告约占一半。社长黄运基。1986年停刊。

旧金山有香港许多报纸的本地版。华文期刊有《新报双日刊》，半月刊《正言报》、《新星报》，周刊《人报》、《光华报》、《中山报》、《商报》、《东西报》、《天声报》、《星岛周报》、《炮报》和《中南报》，季刊《中华语文月刊》等。旧金山的华文通讯社“金山新闻社”为各报提供专稿通讯。

洛杉矶五十年代仅有一家华文周刊《新光大报》和一家月刊。1973年又有一份宗教性刊物《海外台湾基督教联合通讯》。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来自中国台湾的移民的增多，华文报刊才不断涌现，如《觉华新报》、《觉华报》、《华侨新报》和《立报》等。八十年代有《中国人》、《中国耕报》、《台湾杂志》、《台湾思潮》（双月刊）、《南华时报》（周刊）、

《中美商报》、《亚洲商报》(周刊)、《美丽岛》(周刊)、《加州日报》以及来美印支难民办的《越华报》(周刊)、《越棉寮报》和《新亚洲报》等。其中《新亚洲报》系1987年创刊,每周五出版,每期对开2张,内容有美国新闻及社论、越棉寮新闻、侨社新闻及一周纵横谈等。印支华裔的报刊成为美国华文报刊中颇具特色的一群。

八十年代在洛杉矶较有影响的华文报刊主要有:《国际日报》,是一份实力较强的报纸,董事长陈韬,总经理陈英,总编辑阮次山,初为对开4张,后扩展到对开7张,主要内容除各地新闻之外,还有闲情逸趣、医药保健、艺文天地、人物春秋、小说总汇、金山华人、洛城华人、美南华人等。《新光大报》,1950年由《光大报》改组,董事长朱大为,社长兼总编辑陈威立,以报道侨社新闻和各地要闻简讯为主。《美华新报》(周报),1963年创刊,发行人林阴溥,内容以当地新闻为主。《立报》,1976年创刊,初为3日刊,后为周刊,每期出对开6张,刊载华人社会、美国各地新闻,以及“香港行情”、“台湾与大陆”,还有副刊与广告。《南华时报》,1981年在加州蒙特利市创刊,周刊,内容多与读者日常生活有关。《联合时报》,1980年创刊,周刊。《龙报》,1980年创刊,周刊。《越华报》,1980年创刊,社长李少光,以报道印支情况和印支难民生活为主。《加州论坛报》,周刊,为中国台湾移美文化新闻界人士所办,主要评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以及美国华人。《越棉寮报》,1982年创刊,周刊,以报道印支情况和印支难民生活为主。《南加州报》,以印支华裔难民为读者对象,社长陈嘉礼。《台湾民报》,1985年由《美丽岛》更名,以报道中国台湾社会为主。

上述三城市之外,华盛顿、休斯敦、芝加哥、西雅图、费城、夏威夷、波士顿等地也有华文报刊。如:

华盛顿1970年有《天下事》、《华府春秋》,1973年创办有《乡亲》和《台湾季刊》,1979年创办有《华府新闻报》,1983年创办有《华府邮

报》(周刊)等,偏重于华人社区的新闻。

休斯敦有 1976 年创办的《西南时报》(半月刊),1977 年创刊的《华声导报》(不定期),1979 年创刊的《美南新闻》(初为三日刊,后为日报),《华商报》(周刊),《凯讯》(双月刊),《休斯敦通报》和《望春风》等。

波士顿有《波士顿通讯》、《瑞香华泽新报》;费城有《华美字报》(周刊);衣阿华州有《台中港》;俄亥俄州有《火烧岛》;伊利诺斯州有《大汉风》;匹兹堡有《创意》;芝加哥有《革命工人党》(1976 年由《为民报》和《工人党》合并而成,为美国共产党华人支部党报);西雅图有《西华报》(1982 年创刊);密西根有《密西根简报》;檀香山有《中华新报》(1922 年创刊,初为双日刊,八十年代改为日报);等等。

总之,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华文报刊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如日报新旧交替快,竞争激烈,纽约一地所见华文日报即有 10 种以上,一些历史久而政治倾向性强的报纸纷纷关闭,美国华文报刊已形成《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国际日报》和《侨报》(1990 年创刊)四大报为主体的局面;社区报刊、专业报刊和对象性报刊大批涌现;政治性色彩日趋淡化,持中立态度和立足于美国华人的报刊增多,多数华文报刊力求客观报道,并重视保存、研究和宣扬中华文化及美国华人成就,鼓励美国华人积极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之中;报刊的质量提高,表现在版面扩充,字号缩小,信息量增加,形式多样,信息传输和排印出版现代化,报刊管理现代化。美国华文报刊在多元文化环境下,随着华人新移民的涌入和国际华人之间交流的频繁而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二、加拿大的华文报刊

加拿大最早的华文报刊是 1900 年前后保皇党人创办的《日新

报》。1906年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的《华英日报》创刊，该报后与洪门会成员有联系，常刊登一些提倡革命排满的文章。1907年在孙中山的协助下，加拿大致公堂在温哥华改组《华英日报》，创设《大汉公报》。

《大汉公报》初由原檀香山《隆记报》记者张泽黎任主编，旋聘冯自由主持，与保皇派主持的《日新报》展开论战，成为革命党在加拿大的主要阵地。民国时，该报为中国国民党在加拿大的总宣传机构。直至1970年该报的宣传态度才有所改变，比较注意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子。发行量达3000份，为加拿大最大的华文报纸。

中国辛亥革命后，加拿大又有几份华文报纸问世，如：《新民国报》，1911年孙中山抵达维多利亚，与同盟会会员创办，初为不定期油印刊，次年改为铅印日报，1957年迁往温哥华出版，1985年停刊；《醒华日报》，中国国民党驻多伦多总支部机关报，初为《醒华周报》，一度因言论过激而遭查封，1922年改为日报，著名侨领张子田任社长凡20余年，刘庐隐、黄季陆、程天放等曾任主笔；《洪钟时报》，1927年由加拿大东部致公堂和宪政党人士捐款创刊于多伦多，初以董寿如为董事会主席，叶可璋为主笔，1957年停刊。较之美国，加拿大华文报纸的数量显得极少。

五十年代以来，相继又有一些新的华文报刊创刊。如《侨声日报》，1953年当地华人郑振衡集资创办于温哥华，以宣传中华文化、服务侨社为宗旨，郑去世后改由周干芬任董事长，吴照光任社长，吴立民任总编辑，日出对开2张，刊载各地及华人社区新闻，大多为广告和连载小说、奇谈杂说的副刊，因用较大的正楷体印刷而备受老华侨欢迎。《中兴日报》，1954年由林昭森创办，旋停办。《华侨导报》（月刊），1961年由温哥华中加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期刊，旨在“沟通中西文化，推进华侨商业经济”，内容以报道华人经济，介绍中华文化为主，加籍华人马超林任该刊发行人兼总经理，1987年该刊还出版

了《中加建交十一周年特辑》。《李氏月刊》，是1962年由全加李氏总公所在温哥华创办的宗亲会刊物。《多伦多商报》，1967年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双周刊，8开，1983年改为单周出版，对开5张，报道各地要闻、华人社区动态、体育活动、中国大陆侨乡新闻及台湾的政经动态，增设“海外华人生活故事”等专栏六七个。《快报》，1971年由《醒华日报》分化出来的人所办，客观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动态。《加京华报》，是1977年由林小英、吴经万等在渥太华所办的地区性月报，初为8至12版，1981年增为24至28版，并有英文版，内容以报道加拿大，特别是当地华人社会及当地新闻为主，每期有2版报道中国大陆新闻。《缅省华报》，是1978年在马尼托巴创办的华文月刊，每期对开5张，免费赠阅，内容以加拿大问题为主，还有文艺性、知识性副刊以及报道当地华人社会活动的专版。

八十年代加拿大华人人口由于新移民不断涌入而猛增，华文报刊的数量也相应增加。如1988年有华文日报5家，期刊21家，主要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蒙特利尔、渥太华、温尼伯、埃德蒙顿等地也创办有华文报刊。在多伦多，1984年许丕新创办《加华日报》，日出24版，刊登世界各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华人社区的新闻。该报以“植根本地，服务社会”为宗旨，站在华裔加人的立场上，关注和维护华裔加人的利益，1989年改为周刊。1975年纽约《世界日报》在多伦多投资创办《世界日报》加东版，1976年香港《星岛日报》创办该报加东版，均偏重于报道当地和中国台湾、香港的新闻。另有《城居周刊》、《时代周报》和《越棉寮华报》3家周报，免费赠阅。1980年创刊的《唐人街》双周刊，面向华人社会，主要登载生活趣味、科技趣谈、影视娱乐等知识性和消闲性的副刊稿。还有创刊于六十年代的《多伦多商报》。在温哥华，影响较大的华文日报有《星岛日报》加西版和《大汉公报》、《侨声日报》。其他城市的华文报刊多属面向华人社区的赠阅品。如：温尼伯的《中华日报》（1986年创刊）。蒙特利尔的《华声华

视》年刊和《华声·华视新闻》月刊,1983年创刊,内容除“华侨之声中文电台”和“中华之声华语电视台”的节目介绍外,在副刊选登一些小品、文艺、医药、体育、家政等作品,还有记者采访的新闻和唐人街动态;《满城华报》,1982年由蒙特利尔华埠计划发展委员会主办;《华侨时报》,1981年创办,初为不定期刊,次年改为周报;由蒙特利尔华人协会编印的《华协会通报》;综合性周报《龙报》(1980年创刊)。埃德蒙顿的小报《加中报》、《爱华报》。渥太华的《加京华报》(1977年创刊)和《加华侨报》等。这些报刊的读者对象多半是新移民。它们都逐渐注意经济新闻和华人社区新闻,同时较客观地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闻。政治性倾向较强的报纸已为言论中立、内容丰富、贴近华人社会的报纸所取代。

三、拉美各国的华文报刊

拉美各国家的华文报刊相对来说数量较少,规模较小,这与各国政府对华文报刊的限制政策、懂中文的华侨华人读者和办报人才的缺乏等因素相关。尽管如此,几乎有华人的国家或地区都曾出现过华文报刊。这从下面所述的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巴西有:《巴西华侨日报》,原为《巴西侨报》,1960年由王之一在圣保罗创办,系小型新闻性周刊,1977年改为三日刊,次年改为日报,以报道当地华人社团活动及世界要闻和中国台湾、香港新闻为主,1984年起由巴西华人协会会长杨绍才和秘书李海安接办,并增设两个版面,一为葡萄牙文稿版,转载当地新闻和介绍中国国情,一为副刊及广告版。《美洲华报》,1983年创办,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此外还有过《侨光》(月刊,1968年创刊,由圣保罗华侨天主堂编印),《南美新闻》(1969年创刊,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以及《中巴新闻》和《中华会馆会刊》等。

秘鲁有:《民醒日报》,1911年由华侨梁余永发起,李硕夫、许箬香等人集资创办,为当时中国国民党秘鲁总支部的机关报,以开通民智、宣传革命为宗旨。初为油印周刊,旋因资金短缺而停刊,1915年复刊,以铅字印刷,并渐渐发展为日报,日出对开一张,多采用秘鲁各大报当天国内外要闻译成华文刊出,也用华侨通讯社供应的稿件,为南美历史最久的华文报之一。《公言报》,1930年由谢义友、林永森等于利马创办,为秘鲁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1979年曾停刊改组,1983年复刊,董事长为中华通惠总局常务理事唐庆生,编委主任张耀明。《东方月报》,1931年于利马创刊,负责人为陈汉荣,旨在为广大华人读者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为华人发展作贡献,成为华人社团的喉舌,八十年代仍在刊行。

墨西哥历史上出现过的华文报刊有:《国民日报》(1918年创刊)和《公报》(1929年创刊),为油印刊物,仅见诸史载。《大中晚报》(1948年创刊,1957年停刊),《中华报》和《华侨通报》(均为1961年创刊)。1961年洪门民治党还出过不定期小报《墨国公报》,刊登该党和华人社团的活动,等等。以上诸报刊多属赠阅的非卖品,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人员多为义务性的,现均已停刊,墨西哥已无华文报刊。

苏里南,1816年称荷属圭亚那,1948年改称苏里南,1975年独立,华侨华人仅约4000人,但有华文报纸多家。如:《南风日报》,1943年创刊,为当地唯一的铅印报纸,内容有国际新闻、评论、短文、连载武侠小说等,1978年停刊。《自由日报》,1953年由张茂、李融和创办,1972年停刊。《洵南日报》,1972年创刊,系苏里南广义堂主办的报纸,标榜“做华侨喉舌工具,为祖国文化争光”,首任社长刘毓贤,初为油印小报,1981年改为打字油印报。《华新报》,1974年由原《洵南日报》社长黄东来和一批华商所创,旨在“发扬祖国文化和新闻事业,团结侨胞,忠诚为侨胞服务,推动爱国爱侨工作,遵守当地政府法令。”《苏里南周报》,1977年创刊,曾伟华任总编辑兼经理,每期出4

开1张,1982年改为《海外华侨周报》。《中华日报》,1982年由苏里南中华会馆所办。

阿根廷最早的华文报刊出现在1984年,即由解俊林创办、段建安主编的《阿根廷通讯》,初系手写复印,以刊登当地华人社团新闻为主。1985年阿根廷华侨联合会创办《南疆新闻》,主编陈常裕,次年停刊。同年,《补破网》(月刊)创刊。1986年又有《华侨通讯》(双周刊),以报道华人社会活动为主,旋改名《侨心报》(三日刊)。

古巴的《华文日报》,系华侨易绮茜于1902年创办,首任总编辑李叔腾,易绮茜任主笔,1917年改名《华文商报》,该报是古巴也是拉美国家最早的华文报刊,六十年代才停刊。《民声日报》,1922年创刊,其前身为张梅初、苏莹莹主持的《民声》(周刊),六十年代停刊。《开明公报》,1922年创刊于哈瓦那,为洪门致公堂机关报,日出4开2张,主编为司徒瑞义,除报道致公堂活动和华侨社会新闻外,还刊载介绍当地法令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文章,并倡导古巴华侨联合办学,学习华文和西文。1975年与《光华报》合并,改名为《光华报·开明公报联合刊》,1985年停刊。《光华报》,二战后由吕戈子等人创办于哈瓦那,初为周刊,后改为日报,每期出对开1张,以报道中国新闻为主。

巴拿马最早的华文报为中华民国初年由黎尚武、吴桂彬等人创办的《共和报》(周报),该报初为英文、西班牙文合刊,旨在“宣传革命真谛,驳斥西报的谬论”,1927年改为华文版,手写油印,1946年改为日报。还有《严报》、《大公报》(1952年创刊)和《新华报》(1973年创刊)等,多为油印或影印,报道国际要闻、当地和中国新闻。

在智利,1950年出版过一份小型油印《华侨周刊》,多为赠予当地华侨阅读,现已停刊。在巴拉圭,1978年创办有《南美新闻天地》,初为半月刊,后为旬刊,1983年改为周报,社长卜少夫,刊载世界各地,尤其是拉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地侨社的新闻。在牙买加,1930

年即由华商郑永康创有《中华商报》，旨在提高当地华侨的文化水平，1935年中华会馆接办该报，并改名为《华侨公报》，每周出两期，1956年停刊；还有牙买加洪门民治党办的《民治周刊》，1950年创刊，1956年停刊；《中山报》，1950年创刊，七十年代初停刊。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1940年办的《侨声报》和1958年由陈家贤创办的《正气报》，已停刊。在委内瑞拉，1956年出版过油印的《中华会馆月刊》，已停刊；1987年黄丽宝女士办有《侨鸣》杂志，以促进华侨的相互沟通并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厄瓜多尔，六十年代末出版过《侨事半月刊》。在危地马拉，1956年出版过油印的《华侨周报》；还有当地华人青年办的中西文合刊的《侨青月刊》。

第四节 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一、欧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欧洲的第一份华文刊物是十九世纪由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系学者创办的《日国》，而华文报刊的大量兴起则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并主要集中在法国。

1907年由华商张人杰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是法国最早的中文报刊，1910年停刊。中国辛亥革命后，曾出版过《旅欧杂志》（双月刊，1916年创刊）和《华工杂志》（半月刊，1917年创刊）。中国的五四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留法学生倍受鼓舞，纷纷成立团体，并创办刊物，宣传学说，表明立场，盛极一时。如：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周太玄在巴黎创办《旅欧周刊》。1922年李石曾、吴敬恒等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了《工余》杂志，主张无政府主义，1924年停刊。1922年还有胡国伟、张子柱等

创办的《先声周报》，旋成为中国青年党机关报，宣扬国家主义；与该刊相对的有《华工周报》（1917年由赵世炎、李立三等创刊）和《少年》月刊（1922年创刊，1924年改为《赤光》半月刊，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邓小平曾任编辑）以及《工人旬报》（1922年创刊）。另有《奋斗》（半月刊，1923年创刊）、《国民》和巴黎留欧通讯社编的《留欧通讯》（半月刊，1928年创刊）等。

此外，二十年代在苏联有赤塔华工会编的《华工醒时报》（半月刊，1922年创刊），旅俄华侨协会编的《前进报》（1925年创刊）和莫斯科国立中山大学编的《国际评论》（周刊，1926年创刊）。在德国有《政治周报》（1924年创刊）和《明星》（1925年创刊），均系朱德所编，旨在宣传马列主义。

三十年代，法国和德国都出现过多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华文报刊。如在法国有《三民导报》，1933年创刊，中国国民党旅法总支部的机关报，为二战后唯一复刊的报纸，1966年停刊。《救国报》，1935年由以留法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国会创办，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五日刊、三日刊，廖焕星和李立三先后任主编，年末该刊改为《救国时报》。《救国时报》，吴玉章任主编，辟有时评、社论、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文艺阵地、华侨生活等栏目，该报旨在宣传抗日救（中）国，在欧、美、亚等洲43个国家和地区有订户，发行量一度达到2万份，1939年停刊。《全民月刊》，1936年创刊，设有全民论坛、时事论著、社会写真、华侨论坛、文艺、学艺情报等栏目，陈绍禹、胡秋原、萧三、章乃器、陶行知等人为该刊撰稿，是年停刊。同年，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创办了《联合战线》。1937年又创办有《祖国抗日情报》，1940年停刊，该刊成为当时欧洲最受瞩目的侨报之一。

在德国，1932年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先后出版了《反帝斗争》、《反帝战线》、《尖哨》和《海外论坛》等刊物；1934年成立的抗日同盟会创办了《抗日战线》；1936年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出版《抗联会刊》（月

刊)和《抗战情报》。在苏联,1931年至1933年间出版过《太平洋工人》杂志。在英国,出版过《解放》和《民主阵线》等。

战后二三十年间,华文报刊处于凋敝状态。法国仅有《三民导报》、《华侨时报》和《侨讯》诸报;德国出现过《和平报》、《出谷月报》、《西德侨讯》和《自由亚洲》等,均不多久即告停刊。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台湾、香港留学生和新移民、印支国家华裔难民、中国大陆出国潮的到来,一批新的华文报刊正在兴起,各种华文报刊不下十余家。如:法国的《简讯》(双周刊),1976年由旅法华侨俱乐部在巴黎创办,主要刊登中国和国际时事,介绍法国历史和华人社团情况,初为非卖品,1979年起始收费,1981年该刊第109期有专页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欧洲日报》,1982年由王惕吾创办,逢周二、五出对开3张,周一、六、日合刊出5张,大部分版面取自中国台湾的《联合报》和纽约的《世界日报》。《龙报》,1981年由苑国恩等创办,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报纸,是一份立足于旅法侨胞的中文报刊。《欧洲时报》,1983年由巴黎华文协会主办,创办人均均为印支华裔难民,社长卢家蕃,总编辑梁源法,次年该报转让给光华报业公司,杨永桔为社长,每周一至五日出2大张,周末合刊出3大张,除报道国际要闻外,注重报道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新闻和华人社会动态,每天以半版登载与新移民有关的法律和日常生活常识。《中华周报》,1982年由侯建森创办,每期4开1张,内容以中国台湾和香港要闻、当地华人社团活动和当地新闻为主。《泉源》,1982年由祖籍广东的华裔青年组织法国岭南文娱体育会创办。《欧华学报》,是1983年由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每年一期。此外还有德国的《乡讯》,月刊,1971年在汉堡创办,1974年为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欧洲分会的会刊;《欧洲通讯》,1972年由设在汉堡的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办,旨在关心中国,联络侨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1982年停刊;《西德侨报》,月刊,1973年由原联邦德国华侨协会主

办。英国的《学友》，七十年代由香港留英学生和当地华侨青年组织的学友社创办，为不定期油印刊物；《丝语》，1984年由钟宝铭于曼彻斯特创办，后为中、英文双月刊；《星岛日报》欧洲版，1976年由香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于伦敦创办，注意争取印支华裔难侨读者。荷兰的《华侨通讯》，月刊，1977年由旅荷华侨总会于阿姆斯特丹创办，1983年改为半月刊，次年改为双旬刊，每期销4000份，为荷兰唯一向华侨华人介绍中国和当地情况，推动中荷友好的华文报。1981年，瑞典越华联谊会创办了《劳岭会刊》。奥地利的旅奥中南半岛华裔难友互助会出版了《难友通讯》，等等。这些华文报刊尽管创刊时间不久，但对于联络华侨华人之间的感情，增进对居住国的了解，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新移民显然已成为这些华文报刊争夺的主要读者对象。《星岛日报》欧洲版、《欧洲时报》和《欧洲日报》成为行销欧洲的三家主要华文日报。

二、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1894年创刊的《广益华报》是在澳出版的第一张华文报纸，主要刊载闽粤近事和澳华人社会动态，旨在为当地华裔服务，创办人之一为华侨书商孙俊臣，1923年停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也蔓延到澳大利亚。1902年梁启超在悉尼创办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报》，由唐才质主持编务。1906年，主张革命的华侨青年于墨尔本创办《警东新报》，与《东华报》论战，1912年停刊。1910年，洪门致公堂于悉尼创办《民国报》，旨在宣扬民族主义和支持革命派，1915年停刊。

中华民国建立后，相继问世的华文报刊仅有《平报》（1915年创刊，旋停刊）和《民报》（1920年创刊）等少数几份。《民报》于1922年

从墨尔本迁往悉尼,旨在“鼓吹世界大同,促进人类道德。光复固有人权,排斥专制民贼。灌输侨界智识,铲除迷信积习”,并呼吁华人摒弃宗族、党派和省籍的狭隘观念,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50年该报停刊,成为澳大利亚华文报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

六十年代以来相继创刊的华文报刊有:《侨声月刊》,是1962年由澳侨青社创办的中、英文刊物,旨在增进澳中人民友谊,推动澳中文化交流,促进华侨福利,主要报道侨青社活动和中国大陆的建设成就,1967年至1972年曾停刊,后复刊。《简讯》,是1980年由维多利亚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中、英文不定期刊,报道该会活动和华人商务信息。《海外风》(月刊),八十年代初由来自越南的华裔创办,主要负责人罗崇华,编辑多为原越南文化界华侨。《汉声》(月刊),1985年由印支华人文化社创办,发行人罗崇华,总编辑张涵。《文萃》,是悉尼的印支难民组织华裔相济会出版的不定期会刊。《华声报》(周报),1986年由印支华人移民杨润、杨汉勇及庄文藻发起创办,旨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增进澳中友谊,加强澳大利亚政府与华人之间的联系,反映华人社会民意,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融洽,每期发行量约1.5万份。此外,1982年《星岛日报》澳大利亚版在墨尔本创刊,每月出对开3张,旨在为澳华侨提供最新新闻,协助他们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以及与当地人士的沟通。

澳大利亚之外,新西兰也曾出版过华文报刊,如《民声报》(1921年由中国国民党惠灵顿分部创办,二战前停刊);《侨农》(月刊,1953年由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创办)和《新西兰华侨》(月刊),均于六十年代停刊。

三、非洲国家的华文报刊

非洲的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

非,人数虽少,华文报刊却历史较久。

在毛里求斯,二十世纪初华商雷璧堂创办了两天一期的《华民时报》,1932年改组为《中华日报》,首任社长李伯宇,该报实为中国国民党毛里求斯支部机关报。1954年该报增加资金,更新设备,日出对开1张,第一、二版采用路透社、法新社等的电讯新闻,第三版为副刊,第四版为当地新闻,日销约1600份,还发行至留尼汪等地。1926年创刊的《华侨商报》也是毛里求斯创办较早的华文报纸,社长李禹臣,在路易港出版。二战以后,有《中国时报》,1946年创刊,主编张纲乔。1953年该报与《华侨商报》合并,出版《华侨时报》,社长廖君凯,日出对开1张,刊登世界各地和当地的新闻,第三版为副刊,对中国的报道采用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电讯,经常刊登闽、粤侨乡消息,发行量约2000份。《新商报》,1956年创刊,日出对开1张,首任社长朱维导,以刊登商业新闻为主,1978年停刊。《国民日报》,1958年由梁龙标等创办,首任总编钟猷章,内容多采自英、美和中国台湾电讯,1962年停刊。《中央日报》,1960年由古崇鑫等人创办,六十年代末停刊。可见,五六十年代在毛里求斯有5份华文日报,为一时之盛。1975年在原《新商报》的基础上创办华文周报《镜报》,在《创刊的话》中称,该刊主张“和平、团结、互助、合作,誓以侨胞的公理正义发言”,日出4开1张,内容有要闻、读者来信、生活版、副刊、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通讯和专文,以及以当地华人社会为主的当地新闻,每期销量约3000份,对宣传中国、促进中国统一和毛中两国友谊起过积极作用。《镜报》、《华侨时报》和《中华日报》为迄今仍在发行的华文报刊,这些报纸的副刊常连载武侠小说,并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小品文章以吸引读者。

在南非,有1931年创刊于约翰内斯堡的《侨声报》,逢周一、三、五出版,初为4开1张,后为4开2张,内容有国际及当地新闻和副刊,副刊刊载文艺小品和小说。

在马达加斯加,1930年出版《侨民新报》,3天1期,每期对开1张,以报道时事、传播知识和宣传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1937年停刊。1949年当地华侨办有《民锋》(半月刊),1975年停刊。1952年马达加斯加华侨青年会主办《青年月刊》,1956年停刊。《民锋》是当地发行时间较长的一种,停刊后当地再无华文报刊。

第五节 华语影视与广播

以华语(含闽南语、粤语等中国方言)为媒介的影视与广播,一定时期在一些地区也是华侨华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语影视最主要的市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其次是北美。

一、新加坡的华语视听文化

新加坡是华人最集中的国家之一。据1980年有人对主要家庭用语做的一次调查显示,使用中国方言(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等)者在各阶层中占60%以上,使用普通话者约为7%^①。因此,华语视听节目具有较大的市场。

新加坡广播公司成立于1980年,有4个广播网,分别播出四种官方语言,其中第四广播网播出的华语节目约占30%。华语节目的听众最多。

丽的呼声有线电台成立于1949年,在华人社会中有许多忠实的听众。因费用低廉,节目大众化,故平民化的商家行号多装有该台的收音设备以招揽顾客。该台1982年有订户11万余个。它有两个广

^①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65页。

播网,一个广播普通话和方言节目,一个播出普通话和英语节目,播出总时数中70%为华语,余为英语。其内容大多为娱乐性节目,新闻由新广电台提供,用英语、普通话、福建话、潮州话和广东话播出。

新加坡电视有两个频道,每周播出约116个小时,其中英语节目时间占61%,华语节目时间占26%,但收视率最高的是华语节目。这与推广华语的成功有关。这些华语节目都有英文字幕,所播内容接近生活,受人喜欢,以中国台湾、香港的电视剧为多。新加坡华人自己也制作了许多电视连续剧。

新加坡电影院所放影片以华语片为多,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观众也多。华语片通常附有英文、甚至马来文字幕。

二、北美华语电台与电视

1985年,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有11家华侨华人电台。如用粤语播音的纽约中华商业电台、华语广播电台和旧金山华语广播电台,用普通话和闽南语播音的纽约侨声广播电台,以普通话为主,兼用粤语、闽南语广播的洛杉矶中华之声电台,以及休斯顿的华夏之声电台等。侨声广播电台全天24小时播音。几乎在所有华侨华人较集中的大城市都能听到华语广播。

1974年,美国旧金山38号电视台总裁陈立鸥教授创立美亚电视。这可视为北美华语电视的萌芽。此风一开,受到华语观众的欢迎。华人知识分子纷纷组建华语电视公司,一时有七八家,分别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向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购买时间,每天播出一二小时的华语节目。但因广告寥寥,至七十年代末相继有几家倒闭。

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的“中视”、“华视”、“台视”和“新闻局”在旧金山成立了一家国际视听公司,该公司向北美地区供应华语电视节目,还在美洲发行家用录像带。香港的“无线”和“亚视”均有节目在美

国播出。

八十年代较重要的电视台有：

宏声电视台，1980年开播，为美国东部首家宣传中国的电视台，用中、英语播放。

世华电视台，1983年在洛杉矶开播，系中国台湾洛杉矶世华银行所办。

纽约苹果电视台，1984年末开播，用粤语播放，主要节目有“每日新闻”、“神州点滴”、“华埠广场”等。

中文电视台，1990年开播，旨在弘扬中华文化，客观报道中国，增进中美友好，维护华侨华人权益。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北美华人移民的猛增，华语电视有较快的发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通过卫星向北美等地播出节目，或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播出的内容有中国新闻、专题报导、连续剧、文艺晚会等。在欧洲，有CNE中文电视、时代华人卫星电视、欧洲中文频道等。在澳大利亚，也有华语电视台。

第四章 华文文学与戏剧

第一节 华文文学

一、概 述

华文文学是指用华文作为语言表达媒体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相应地,海外华文文学即是指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此,这种文学作品的作者主要是海外的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侨华人文学中的基本内容。后者通常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用非华文(如英语、印尼语、马来语等)作为表意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大量的海外移民,带去了中华文化观念和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口头传播的民歌民谣,这是华文文学的胚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海外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的兴起与发展,为华文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是附属与华文报章副刊而存在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除了文学创作规律等特有因素的影响之外,与其他华侨华人文化现象一样,还受到中国和当地的政治斗争与

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海外华文报章副刊所登载的多是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此后,用白话文写作并富有反帝反封建时代内涵的新文学作品逐渐取代旧文学而成了文学的主流。东南亚的华侨最早感受到中国文学的这种变革思潮,竞相起而效之。1919年12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即登载具有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此后各地华文报章纷纷刊登此类作品。1927年泰国曼谷的《国民日报》辟有文艺副刊。1934年菲律宾华侨青年林健民创办了《天马》(16开本)和《海风》(16开1张)两种文艺刊物,专门发表新诗、小说和散文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二战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阵地是在东南亚,而且是一种侨民文学。

二战以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仍然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主流。无论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华人作家群体的增大,还是华人文学团体及其活动,华人作品的影响等,都是如此。美国华人作家群的崛起成为近三四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中令人瞩目的现象。随之而存在的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也是值得注意的。在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也有一些有成就的华人作家。海外华文文学已愈益成为各所在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纵观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学始终对海外华文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二战前,中国的历次文学运动,如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争和抗战文学运动等,都对南洋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也对海外华文创作起着引导作用,一些中国文化人甚至直接加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行列中。

第二,海外华文文学本土化色彩不断增强和脱离中国文学的轨

道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1927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者就已指出,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①。1947年在新、马又爆发了“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学”的论争等。二战后作家们更是身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并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其作品大多反映海外华侨华人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遭际和切身感受。

第三,海外华文文学在语言运用上的本地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掺杂了英语和当地民族语言(如马来语、泰语、印尼语)的词汇,还有大量的闽、粤两地的方言,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海外华文文学色彩。

由于华人谙熟华文程度的降低和各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政策,使得华文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危机。然而,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华文热的兴起又为华文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动力。正如日本学者山本哲也教授所言:“我相信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华文文学,只要有会写华文的华人,华文文学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②而且,华文文学在适应各国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寻找发展的道路之时,世界华文作家们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海外华文文学仍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二、新、马华文文学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要代表,包括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简

① 张金燕:《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10卷,第100页。

②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6年8月15日。

称“新华文学”)两部分。据统计,至1990年新、马两地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单行本约有2000余种之多^①。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共10卷约400万字,收集1919年至1942年的华文文学作品;新社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8卷约600万字,收集了1945年至1965年的华文文学作品。仅此足见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之丰富,成绩之巨大。

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战前(1919—1942年);(2)战后至新、马分家前(1945—1965年);(3)新、马分家以后(1965年至今)。

(一) 1919—1942年间的新、马华文文学

1919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为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②。接着,《叻报》的副刊《叻报附张》、《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副刊《新生活》、《商余杂志》,檳城《光华日报》的副刊《光华杂志》等,相继登载新文学作品。不过,这些副刊多属综合性的,及至1924年《新国民日报》才辟有专门性的副刊《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和《诗歌世界》。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侨民意识极为浓厚。从1919年至1925年,新、马华文文坛涌现出一批作者,如陈桂芳、楚卿、郭乐仙、张叔耐、林独步、狄昂人、冼玉贞、李西浪和丘国基等人,其中陈桂芳的小说《人间地狱》和李西浪的中篇小说《蛮花惨果》等为代表,均反映华侨下层民众的痛苦。

1925年7月《新国民日报》纯文艺副刊《南风》的创刊,成为“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③。同年创刊的副刊如《新国民日报》的《妇女世界》、《非旧历》、《银幕世界》、《沙漠田》、《浩泽》、《晨星》、《学

① 陈贤茂等:《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② 采用方修的观点。见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

③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47页。

生文艺丛刊》和《人声》，《叻报》的《星光》等大量涌现。由谭云山主编的《星光》(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对于这时新文学的兴起起了不小的作用。1925年中至1931年末，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形成了第一个高潮。1927年至1931年间出现的马华新文学刊物有四五十种，其中新加坡有《荒岛》、《瀑布》、《洪荒》、《绿漪》、《椰林》、《沙漠田》、《曼陀罗》、《狮声》等约20种，檳城有《绿洲》、《荔》、《椰风》、《南洋的文艺》、《戏剧》等20多种。重要的作者有拓哥、谭云山、陈晴山、曾圣提、曾华丁、吴仲青、陈炼青、张金燕、张楚云、浪花、慧聆、罗伊夫、李梅子等人。主要作品有拓哥的《感冒》，浪花的《生活的锁链》，慧聆的《铁牛》，依夫的《猎狗》，李梅子的《红溪的故事》，海底山的《拉多公公》，寰游的《十字街头》，曾圣提的《生与罪》，曾华丁的《五兄弟墓》、《拉子》、《两般世界》，吴仲青的《梯形》、《辜负你了》，曾玉羊的《生活圈外》，陈旧燕的《往死路上跑》等。1930年谭云山的《河畔》出版，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诗集。

马华新文学运动和“南洋色彩”口号的提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种新兴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当地的社会现实，如胶价、锡价的惨跌，胶工、矿工等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以及劳工运动的兴起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字里行间透着反帝、反封建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精神。1927年张金燕在《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上发表《南洋与文艺》一文，提出了“南洋色彩”的主张，即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①。此后，《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南洋时报》副刊《星火》、《南洋的文艺》，《光华日报》副刊《南国的雨声》和《蜕变》等均提倡南洋色彩。而提倡南洋色彩较有成绩的当推《叻报》副刊《椰林》(1928年2月创刊，1931年2月停刊)。该刊主编陈炼青要求《椰林》“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

^①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82年版，第7页。

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①。

1932—1936年间,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对新文学运动的迫害,多次制造“文字案”,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文艺刊物的停刊,使得马华新文学陷入了低潮时期,不过仍有一些作者值得注意,如丘士珍、蔡增建、枕戈、饶楚瑜、林参天、一村(吴广川)、林棘、许侠夫、李润湖、陈子遗、曾艾狄、辜斧夫、陈自影等。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饶楚瑜的《囚笼》,林参天的《浓烟》,陈子彬的《新年》和一村的《橡林深处》等是较有价值的作品,其中凡20万言的《浓烟》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1934年丘士珍在《狮声》副刊上发表《地方作家谈》一文,由此而引发了“地方作家”与“马来亚文学”的争论,大家认为马华文艺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所谓马华新文学,就是反封建的、民族自力更生的大众文学。

1937年新、马华文文学史步入了它最为激动人心、最为繁荣的时期(1937年至1942年初)。这一时期,本土作者走向成熟,中国文化名流如郁达夫、胡愈之、巴人、杨骚、沈兹九、陈残云等南来对新、马文学潮流的激荡,文艺刊物繁多,作品深见水准,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的多姿多彩,均为极一时之盛。有的作者既是文学家,又是文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如铁抗(郑卓群),先后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总汇报》副刊《世纪风》,并负责《文艺长城》的编务,同时还写有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等多种形式,所著《马华文艺论》对新、马华文文学的性质、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小说、戏剧等各类体裁的写作问题都作了论述,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仅有的一部通论。据统计,这一时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有一百三四十人,多数作品的主题是抗战救亡,其中较著名的小说有乳

^①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第10卷,第125页。

婴的《八九百个》、《弗琅工》，铁抗的《试炼时代》、《白蚁》、《洋玩具》和《女销货手》，老蕾的《新生》、《弃家者》，陈南的《金叶琼思君》，金丁的《旁观者》和《逃难》，李湘的《转变》，萧克的《码头小天使》和上官豸的《非英雄史略》等；诗歌有李蕴郎的《隆帮人的歌唱》，刘思的《致马来亚的殖民们》和《你哭了，伟大的狮子》，思明的《原野》，呢喃的《我们》，静海的《反抗的铁流》，东方丙丁的《一百五十个》，椰青的《没有完成的诗》，张曙生的《烽火篇》和《南海夜座》等；报告文学有叶尼的《秘密的日本》、《一件事的始末》、《胜利》和《卖花队》等，紫焰的《阴影》、《风波》和《热情的女孩子》，艾蒙的《大时代的渣滓》、《小薇的胜利》等。

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新、马文艺界提出了“南洋抗战文艺”、“南洋战时文艺”、“华侨救亡文学”和“战时华侨救亡文学”等口号。诸如叶尼的《论战时文艺》，金丁的《抗战文艺讲座》，丁倩的《抗战艺术的多样性》，小红的《关于南洋的战时文学》，遛聘的《战时文学与救亡文学的探讨》等等，都对此时文学的发展方向等课题进行了探索，有的指出南洋华侨的抗战文学应与中国的战时文学有异。一些作者对当时影响极广的各类报章副刊进行检讨，努力使副刊纳入新、马文学发展方向。而刘宾的《杂评伤兵医院》，林易山的《铁抗的“试炼时代”》，陈紫的《读海外》和谛克的《老蕾的新生》等专题评论，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文艺评论的内容。至于有关“南洋战时文学”、“文人南来问题”、“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郁达夫的几个问题”等的热烈论争，更说明了新、马文学的日益自觉趋势。这时的新、马文学力图从最初强烈的侨民意识中摆脱出来，结合新、马社会的实际，表现出新、马的特色，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本地意识的发展受到挫折而关心中国感情极为高昂的文学时代。”^①

^①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第14页。

(二) 1945—1965 年间的新、马华文文学

二战后,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意识强化起来,这一方面是经过3年8个月沦陷期间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共同浴血奋战,使他们更加热爱所居住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受到东南亚各地民族自决运动浪潮的刺激。然而,认同中国的“侨民文学”仍有较大的市场。1947—1948年间遂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

1947年初,星华文艺协会举行座谈会,有人提出了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此后,诸如《艺术创造的社会基础》(秋枫)、《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漂青)、《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凌佐)等文相继发表,引起轰动。1948年,周容在吉隆坡《战友报》新年刊上登载《谈马华文艺》一文,力主“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必须加以矫正;马华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该文得到了西樵(赵戎)、闻人俊(苗秀)、海郎、光明和铁戈等人的响应,但受到沙平(胡愈之)、李玄和洪丝丝等“侨民作家”的抨击。作者强调侨民文艺的存在并不妨碍马华文艺的发展。这次争论的结果是确立了马华文艺的方向和马来亚意识,认为应抛弃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支流和附庸的地位而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

郭沫若在《当前的文艺诸问题》中对“马华文艺独特性”明确表示支持:“我是赞成‘马华化’的,也就是说赞成马来亚的华侨青年创造‘土生文艺’……马来亚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成为了另一个国家的主人,这犹如英国人航海到新大陆去构成了美国人一样,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美国人去专门关心她的祖国英吉利,同样也没有理由要求马来亚的中国人专门关心她的祖国中国。马华化是绝对正确的路线。”“我相信马来亚的华语文学迟早是要独立的。”^① 这是一种客观而富有远见的论断。

^① 新社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第214页。

二战后初期马华文坛有了某种复兴。首先是诗歌创作的丰收。如铁戈的诗集《在旗下》(1947年),系马华诗坛的第一部诗集;米军的《热带诗抄》(1950年)和丁家瑞的《脚印》(1956年)。其次在小说与散文方面也稍有收获,如林参天的《余哀》、丘天的《复仇》和殷枝阳的《牺牲者的治疗》等,作品多为对沦陷时生活的回忆和战后生活的反映。

1948年马来亚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进步的文学活动受到摧残。1949年新中国成立,许多从中国来的作家纷纷回国,中国来的进步书刊被查禁。以致在数年时间里,充满色情的小说、电影及刊物有如一股浊流泛滥成灾。反对黄色文学一时成为人们呐喊的口号。马华文学进入了短暂的“冬眠期”。1956年初,马来亚趋于独立的事实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月18日,金星文化协会召开响应马来亚独立运动大会,发表题为《当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务》的宣言,号召:“以爱国主义文化压倒殖民地文化,压倒黄色文化,压倒各种殖民地文化的意识和言论。”由此“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口号正式提出,强调文学创作应向马来亚华人灌输国家观念,加强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华文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一阶段新、马华文文学的中心地是在新加坡。据杨松年博士统计,1945—1965年间新加坡和马来亚出版的华文文学书籍数分别为537种和128种^①。仅新加坡出版个人文学专集的作者就有209人,从事文学单行本出版的机构多达115家。其中南洋报社出版的《南洋报社丛书》(113种),青年书局出版的《新马文艺丛书》(3集36种)、《南方文丛》(12种)、《新地文艺丛书》(6种)、《新马戏剧丛书》(6种)以及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新路文艺丛书》、《艺美、维明文艺丛

^①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第25页。

书》、《蕉风丛书》等具有较大的影响。出版个人作品集在5本以上的有连士升、姚紫、殷勤、苗秀、方修、李星可、杏影、威北华、征雁、黛丁和李汝琳等。其中姚紫的小说单行本即有12种之多。

姚紫(1920—1982年),原名郑梦周,另有黄槐、贺斧、欧阳碧等10余个笔名,生于福建泉州。1947年南渡,发表有《秀子姑娘》、《阎王沟》、《窝浪拉里》等反映战时生活的小说和反映都市风情的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成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

苗秀(1920—1980年),原名卢绍权,祖籍广东三水,生于新加坡。发表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等,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等和短篇小说集《旅愁》、《第十六个》、《边鼓》、《红雾》和《人畜之间》等。成为马华文坛最有影响的华文作家之一。

李汝琳(1914—),原名李宏贲,祖籍河南沁阳县。在新加坡文坛有“文艺长跑者”之誉。著有诗集《惜昨集》(1936年)、《再生集》(1956年)、《叩门》(1961年)、《金与沙》(1980年),散文集《艰险的历程》(1956年)、《消夜集》(1956年),小说集《悔》(1957年)、《姊妹俩》(1958年)、《飘浮》和《漩涡》(1962年)、《新贵》(1979年)等。

李过(1929—),原名李今再,祖籍福建,生于柔佛麻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垦地》(1960年)、《浮动地狱》(1961年)、《曲折的路》(1982年),短篇小说集《投资》(1962年)、《白粉佳人》(1983年)等。

韦晕(1913—),原名区文庄,祖籍山东济宁,生于香港,1937年南渡新加坡。为马华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作品甚丰,有短篇小说集《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寄泊站》、《韦晕小说选》、《日安·库斯科》,中篇小说《还乡愿》、《荆棘丛》、《陨石原》,长篇小说《浅滩》,散文集《东海·西海》、《野马随风》、《文苑散叶》等。1991年被授予第二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这一阶段的华文诗歌也颇有收获。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在“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影响下从过去抒发侨民意气转而为“此时此地”的情怀写照。新加坡的第一首华文新诗，是1920年2月18日《新国民杂志》上刊登的《原来学生》，作者嘯崖。原诗这样写道：

头上戴一顶吐舌的操帽，
 身上穿一套称体的白色操衣，
 两脚儿着一双新式时样的皮鞋，
 嘴唇口含一条三寸许的雪茄，
 橐，橐，橐，
 街头巷尾，摇摇摆摆，大大方方，
 足走一步，烟吞一口，
 眼睛儿瞧东瞧西，瞻前顾后。
 那是时髦子吗？不是，
 那是当兵的吗？不是，
 还是社会上的败类吗？也不是。
 呵呵，原来是此地某某学堂的学生。

这首幼稚的讽刺诗却开始了星岛白话诗的历史。之后新加坡报刊上的新诗逐渐增多。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诗歌为抗日救亡的旋律所主导。较有成就的诗人当推“吼社”的刘思和东方丙丁。战后，“侨民文艺”退居次要地位，一批当地派诗人成绩显著。米军的诗集《热带诗抄》是其代表。他的《跳“珑玲”》一诗被选入新加坡的华文课本。进入五十年代，诸如杜红、钟祺、周粲、范北羚、杜诚、原甸、泡蒂、槐华、李贩鱼、严思、山河、苗芒、蔡欣等诗家较有影响。他们大多生长于斯，以马来亚为自己的家乡或祖国，情深意切。原甸的《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脍炙人口，槐华的《昨天，今天》表达了对遥远的先辈们的国度的追思和对马来亚的更深切的爱。

1959年3月6日，白珪在《学生周报》（第137期）上发表的《麻

河静立》，被认为是马华文坛的第一首现代诗。《蕉风》在1959年至1960年间刊载了相当数量的现代诗。1962年《银星》诗刊在檳城创刊。1965年末，《海天》诗刊问世，惜于次年停刊。值得一提的是，六十年代新、马的诗歌深受中国台湾现代诗的影响，涌现了牧羚奴、完颜籍、英培安、零点零、贺兰宁、流川、文恺、南子等众多诗人，一场关于“写实与现代”的论争席卷新、马诗坛，刮起了一股现代主义诗风。这些诗与白话诗不同，广泛采用象征、暗示、联想、通感等手法，使语言的表现力更加丰富，隽永深长，不足之处是过于追求自我感觉、幻觉，修辞奢华，缺乏大众表现力。

（三）1965年以来的新、马华文文学

1965年8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治，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直接影响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1. 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新加坡独立至八十年代末，华文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平稳发展。这一时期新华文艺界主要在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戏剧的演出和评论方面较为活跃。如：1968年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新华文学作品编委会，委员有周燦、孟毅、苗秀、赵戎、钟祺等名作家，专门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分为理论、史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8部，蔚为壮观。1969年，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与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主办“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还出版了《新马文艺创作索引》一书，举办了作家座谈会。教育部成立新华文艺审查组，负责推介本地优秀华文作品编入中学教科书。这时较有影响的作品不是在文学创作方面，而是在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主要有：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国家图书馆的《马华小说书目》，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文学选集》和《马华新文学

大系》，孟毅的《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赵戎的《论马华作家及作品》和《新马华文文学词典》，观止的《文艺杂论》、《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稿》，林万菁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黄孟文的《新加坡文艺谈丛》等。据统计，1965年8月至1974年12月，出版的诗、小说、散文、剧本、评介等文学书籍约300种。

(2) 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为文学创作活跃期。随着新加坡经济起飞，文坛渐趋繁荣，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文学团体相继成立。1970年，著名作家连士升发起组织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易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由孟毅、杜红、王润华分别任正副主席，旨在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研究，联络本国和外国的写作人，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等。该会出版会刊《文艺月报》（后改为《文学》半年刊），与教育出版社、胜友书局等合作出版了小说、散文、诗歌等近40种，与其它团体合办了两届“国际文艺营”等系列活动，还有各种文学讲座与座谈会及文艺创作比赛，成为新加坡最有影响的文学组织。此外还有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五月诗社、岛屿文化社、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金声文艺学会、加东文友俱乐部等。据统计，1975—1979年间，共出版各种华文文学书籍255种。在小说方面，苗秀、姚紫、李汝琳、李过、赵戎、孟毅、孟紫、谢克等均有影响较大的作品。如苗秀的《火浪》、李汝琳的《漩涡》、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等长篇小说。在诗歌方面，有柳北岸、钟祺、周粲、杜红、淡莹等诗人。如周粲的《写给孩子们的诗》、《捕萤人》分别获1967年和1980年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奖”和“诗歌创作奖”，享誉一时；他的成名作《孩子的梦》以及《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和《会飞的玻璃》等也颇获好评。在散文方面，杏影的《读书和写作》、《趁年轻的时候》、《书与人》、《想想写写》、《愚人的世纪》等，连士升的《回首四十年》、《南引集》、《给新青年》、《海滨寄简》，尤今的《沙漠里的小白屋》等都

拥有较多的读者。

(3) 八十年代以来,新华文学在艰难中寻求发展。由于从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规定英语为第一语文,华语为第二语文,使华文华语教育折损,华文创作日趋衰退。1988年8月,“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在新召开,对渐趋弱勢的华文文学现状与前景进行探索。宗亲社团开始介入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通过办刊,举办以表演华文作品为主的青年文艺营,办文学讲习班,出版作品等,支持华文文学的复兴。

2. 1965年以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视华文文学为“移民文学”而不纳入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的发展更显得艰难。六十年代下半期,小说方面有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和《刹那的正午》,黄崖的《烈火》,林鲁的《青年人的锋芒》,梁园的《黄与白》,游牧的《那些过去的》,史雷的《火的道路》,年红的《舞会》等;散文方面有忧草的《大树魂》,杰伦的《园边集》,端木虹的《重亮的燭火》,慧适的《幸福门外》,温任平的《风雨飘摇的路》和洪浪的《轻风细雨集》等;诗歌方面有何乃健的《碎叶》,慧适的《牧歌》,萧艾、忧草的《五月的星光下》,王葛的《雨天的诗》等。《学生周报》属下学友会檳城分会、蕉风出版社、霹雳文艺研究会和南马文艺研究会等组织,努力推动着困境中的马华文学。

七八十年代,马华文学又趋活跃。1978年,拥有300余名会员的马来西亚写作人(华人)协会成立,为马最大的华文作家组织。之外,还有南马文艺研究会、霹雳文艺研究会、天狼星诗社、大马华人文协、戏剧研究会等,致力于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并争取使华文文学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诸文艺团体和华人社团举办文学评奖活动,出版各种文学丛书,如“犀牛丛书”、“大马文丛”、“棕榈丛书”、“人和文艺丛书”、“今天文丛”、“东方文丛”、

“摸象丛书”、“涛声诗丛”、“松柏书系”等，出书近500种。这些文艺团体拥有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如方北方、韦晕、巍萌、黄崖、梦平、甄供、吴岸、韩玉珍、年红、爱薇、温任平、永乐多斯、原上草等。

方北方，原名方作斌，1918年生于广东惠来，为马来西亚最富成就的华文作家。一生创作了小说、散文、评论等26部。其长篇小说“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和“马来亚三部曲”——《树大根深》、《头家门下》和《芸芸众生》等，还有《春天里的故事》、《饥饿的古城》等，从各个侧面，系统而深刻地描绘了马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堪称史诗般的作品。1989年他荣获第一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黄崖，五十年代从香港到马来西亚，属多才多艺多产作家，仅长篇小说就有《山村烟雾》、《吉隆坡风雨季》、《金山沟的哀怨》、《紫藤花》、《红灯》、《一颗星的陨落》、《迷蒙的海峡》、《煤炭山风云》、《雨后斜阳》和《烈火》等；另有短篇小说集《得奖者》、《草原的春天》、《秘密》、《弹琴的人》；散文集《远方》；诗集《敲醒千万年的梦》。其作品着力揭露社会的各种问题，刻画人物入情入理，发人深思。

八十年代以来，在华人宗乡社团组织的大力促进下，马华文学稳步发展。设立出版基金和文学奖，举办文艺营、写作讲习班、文艺讲座、文艺座谈会、专题演讲、文艺创作比赛、诗歌朗诵、文学节和文学史展览等，以此培养文学青年，提高写作水平。以文学奖而言，就有：“马华文学出版基金及马华文学奖”、“杰出潮青文学奖”、“全国大专文学奖”、“全霹雳中学生文学奖”等。马华文学人士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在东南亚乃至世界海外华文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由于华文教育相对保持较好，华文文学必将散发出花季的芬芳。

三、泰国华文文学

1802年，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被译为暹文出版，广为流传。但真正属于创作意义上的泰华文学是二十世纪初始有的，即随着华文报纸的创办而问世的。起初登载的多是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即使是本地作者如子才的小说《拉夫歌声》，无心的诗歌《爱神》、《昨夜的梦》等，也未能摆脱“侨民文学”的范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泰华文学迎来了它的一个热潮。

三十年代，各类文艺社团多达40余个，较有影响的有方柳烟、郑铁马等人的“彷徨学社”和许征鸿、郭枯等人的“椒文学社”。出版的作品有：方柳烟的小说集《回风》，郑铁马的散文集《梅子集》，黄病佛的《死亡集》和《涂鸦集》，小说有林蝶衣的《扁豆花》、谭洪金的《禁果》，诗歌集有陈容子的《蓝天使》、方涛的《水上的家庭》、田江的《路边的人们》、曹圣的《草原》、林蝶衣的《桥上集》和《破梦集》、林秋水的《蔷薇梦》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华文坛还开展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充满了爱国热情的抗战文学空前活跃。

战后至五十年代，泰华文学渐臻全盛期。较有影响的作品，长篇小说方面有陆留的《风雨京华》，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行的《三聘姑娘》，谭真的《座山成之家》和《一个坤盗的故事》，司马凡的《火劫红莲》，倪长游等7人合作的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以及黎毅的短篇小说《鲁哈多与他的老牛》等。这些作品已开始以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为对象进行描写，具有本土色彩。这批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形成了泰华文坛的主力，“这和以前中国南来文化

人怀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①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泰国对华侨华人的限制政策严重制约了泰华文学的发展。只在仅有的几份华文报纸如《中华日报》、《京华日报》等的副刊上,有一些散见的文学作品。1964年《华风日报》发表了方思若等9人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章回体),以生动、风趣的笔调反映了泰华社会底层的生活百态,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如吴继岳、史青、倪长游、巴尔、沈逸文、年腊梅等人的作品也有好评。1960年、1961年《世界日报》两度主办“泰华青年文艺金牌奖”,首届金牌奖作品有曾天的诗歌《黄金半岛赞歌》,田次郎的小说《樱心恋》等。

中泰建交后,泰华文学走上了复苏的道路。泰华写作人协会(1986年成立,现改名泰华作家协会)、《新中原报》社等多次联合组织各种性质的文艺创作比赛。散文、诗歌、小说等新作迭出,如《轻风吹在湄公河上》(合集)、《吴继岳文集》、《烟雨更添一段愁》(梦莉)、《尽在不言中》(合集)、《雨声絮语》(陈博文)、《长青藤》(年腊梅)、《花环的梦》(司马攻)、《瓦罐里开的花》(姚宗伟)、《曾天新诗集》、《泰华短篇小说集》、《泰华散文选》、《泰华新诗选》等。一些泰华文学作品在中国等地发表或出版,如沈逸文的《泰国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澄江白水的长篇小说《新风尘三侠》(广州花城出版社)等。司马攻、梦莉、年腊梅、陈博文、李少儒、岭南人、白翎、征夫、巴尔、饶公桥、范模士、子帆等一批作家承先启后,群星闪耀。泰华文学界通过扎实的笔耕,与各国华文文学界的交流,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华文文学发展之路。

^① 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转引自陈贤茂等《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第344页。

四、菲律宾华文文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杨静堂、王雨亭、卢家沛等人编《洪涛三日刊》,林建民、蔡远鹏等人编《天马》和《海风》杂志,登载了一些具有中国新文学痕迹的文艺作品,标志着菲华文学的诞生。随即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产生了各种体裁的“抗战文学”,如杜埃的长诗《红棉花栗色马》和《远方》,林林的《同志,你攻进城来了》等作品,显得弥足珍贵。1945年马尼拉光复后,几家华文报纸均辟有文学副刊,一时有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分热闹,盛况空前。文学团体有:《公理报》“晨光”副刊的青年作者组成的“晨光之友”,实为一以发表新诗为主的创作群体;日军侵占时期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团体组成的“华侨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为全国性文艺团体。作品有杜埃的《丛林曲》,杜若(柯叔宝)主编的《钩梦集》,李成之的《碧瑶集中营》,李润如的中篇小说《海外》等。

五十年代,菲华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1951年,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文联”)成立,以许芥子、柯叔宝、施颖洲三人为常务理事,骨干成员有蔡景福、林维新、陈明勋、林忠民、林励志等人。“文联”通过举办文艺创作比赛、出版《文联季刊》和举办青年文艺讲习班(后改称暑期文教讲习班、暑期文教研习班)等活动,推动了菲华文坛的繁荣与活跃。一时涌现出“自由诗社”、“耕园”、“辛垦”、“飞云”、“新艺”、“默社”、“星座诗社”、“青年写作协会”、“青年文艺讲习班同学会”、“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等近20个文艺团体。据统计,自此至七十年代初,以单行本形式问世的文艺著作有近百种之多。如在诗歌方面有亚薇的《菲律宾华侨新诗选集》和施颖洲与杜茗合编的《海》等,以云鹤、蓝菱和林泉三人最具代表性。云鹤,原名蓝廷骏,菲律宾土生华文诗人,青少年时即有诗集《忧郁的五线谱》、《秋天里的春

天》、《盗虹的人》和《蓝尘》，后有诗集《野生植物》。蓝菱，原名陈婉芬，祖籍福建晋江，有诗集《第十四的星光》、《露路》和《对答的枝桠》。林泉，有诗集《窗内的建筑》、《心灵的阳光》、《树的信仰》等，曾获中国台湾葡萄园诗奖（1965年）和非华中正文化奖金创作奖。这一时期的菲华文坛，作品风格明显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七十年代，由于菲政局突变，菲华文艺处于冬眠状态，直至八十年代才又苏醒、活跃起来。报纸副刊、文艺杂志和文艺社团是菲华文艺活动的两大阵地。一批纯文艺杂志也在此时诞生，如施颖洲主编的《菲华文艺》、王礼溥主编的《晨光周刊》、林健民主编的《艺文月刊》、黄栋星主编的《耕园周刊》、陈一匡主编的《辛垦周刊》、陈奉辉主编的《千岛诗社》和刘德星等主编的《万象诗刊》等。新成立的文艺社团如“岷江诗社”、“菲华文艺协会”、“菲华艺文联合会”、“青年文艺社”、“新潮文艺社”、“征航文艺社”、“千岛诗社”、“现代诗研究会”等，共同为菲华文坛的振兴而耕耘。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锋芒毕露，如新诗人有谢馨、一乐（李怡乐）、施文志、江一涯、陈一匡、郑承伟、王勇、柬木星（黄栋星）、张灵（张琪）、蔡铭、陈隋、刘氓等人。诗歌成就较大的除蓝菱、林泉、云鹤外，还有庄金明、谢馨、月曲了、陈和权。庄金明是非华第一个重要诗社自由诗社的发起人和社长，在菲华诗坛有“诗王”之誉。正如诗人陈和权所言：“与六十年代比较起来，八十年代的菲华诗人在创作态度上，显得谨慎而认真，并且蜕变风格，力求建立新的诗观，不断在诗的艺术上探讨、实验与创造。”^①

在小说、散文方面，八十年代初以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莎士的《钩梦集》、《小女孩与洋娃娃》，施约翰的《天涯》，庄子明的《出埃及记》，还有亚蓝、夏默、施柳莺等人的作品也被遴选成集。《菲华散文选》反映了菲华作家散文创作上的收获。1984年，菲华儿童文学研究

^① 《菲华诗坛现况》，《玫瑰与坦克》，菲律宾林白出版社1986年版。

会成立,会长林婷婷,举办过儿童作品展览会、儿童写作班,致力于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

菲华文学界日益注重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85年在马尼拉召开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1989年,新潮文艺社、《世界日报》社等联合主办了“社会变革与东南亚华人文学”学术会议。通过菲华作家的努力,菲华文学已被正式列入菲律宾文学的组成部分。菲华诗人云鹤被选为菲律宾作家协会理事。菲华作家提出了“走出王彬街”的口号,努力将笔端伸向日渐融入主流社会的华人社会大趋势。菲华文学仍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前发展。

五、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期,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就已相继传入印尼。印尼华人用马来语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然而,真正的华文文学是二十世纪初随着印尼华文报纸的创办而产生的。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报》(1921年)、《天声日报》(1921年)等报副刊发表了当地作者的一些文学作品。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局出版印尼华侨青年作家郑吐飞的短篇小说集《椰子集》,收入《人头》、《鲨鱼》、《阿速哥》、《橡园之玫瑰》、《你往何处去》、《新犹太人的悲哀》、《狂雨之夜》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了印尼华侨社会的现实生活。

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成了印尼华文文坛的主旋律。战争年代一批从新加坡流亡印尼的中国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如郁达夫、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杨骚、高云览等二三十人,对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影响至大。战后至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华文文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表现在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增多,如雅加达的《天声日报》、《新报》、《生活报》三大报纸的副刊,综合性杂志《生活周报》、《中

学生》月刊、泗水《新侨》月刊等，还有纯文艺杂志《文艺城》、《东印文艺》、《海燕》、《野火》等。产生了一批较有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如黑婴（张又君）的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动》和中篇小说集《红白旗下》，犁青的文艺理论集《新文学讲话》，丹娜、李犁尼（犁青）、罗丁等人的文艺理论文章等。

随着印尼华文教育的迅猛发展，华文文学再趋活跃。各种文艺团体成立并办有刊物，如棉兰华侨青年的“印华文学社”及其《印华文学专刊》，“椰华青年习作社”及其《新绿》，“椰岛文艺社”及其《椰岛文艺专刊》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寓言等都有丰收。短篇小说有《这就是爱情》、《母与女》、《两代》、《猪仔》，中篇小说有《烽火锡河边》；散文随笔有沙里洪的《慕西河水缓缓流》、张秦的《怒吼的梭罗河》、严唯真的《覆舟山短笛》、阿五的《让我们辛勤劳动》；诗歌有犁青的《在印度尼西亚》；剧本有《停电之夜》、《先过大马》等。这些作品从内容上实现了由“面向祖国”到“面向印尼”的转变，都是反映与印尼华侨社会息息相关的生活与事物。由于这时中印（尼）两国关系相当友好，许多印华文学作品明显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然而，民族主义势力泛起，使得华文文学处境日趋艰难。但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中，华文文学的土壤还未被彻底清除，诸如梁披云、林琼光、邹访今、周颖南、黄裕荣等文化人知难而进，奋力抗争，为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贡献力量。《首都日报》的“绿洲”、《忠诚报》的“火花”、《火炬报》的“椰岛”等文艺副刊，成了这时印尼华文文学的主要旗帜。周颖南、林日顺等组织了“翡翠文化基金会”，作为华文文学的常设出版机构。出版有《学生习作选》、《文艺小集》、《翡翠青年文艺专辑》、《印华文艺评论集》、《印华文丛》等书；组织过多次文艺比赛，如“翡翠文艺奖金征文比赛”和全国性的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参加征文比赛的优秀作品均汇编成册，如《翡翠青年文艺专辑》收入作品 36 篇，其中佼佼者有白流、冯世才等人的《盗火者的爱情》，作者有白流、

沈世梅、刘朱和、黄东平、柳青青等；《青春的火焰》收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 30 篇，作者有曾宣、笑春风、廖必梅、黄东平等；《万隆的孩子》收入作品 27 篇；《盼望》收入作品 20 篇。此外还有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春风的波浪》和《印华文艺评论集》（两辑）、莹石的诗集《蓝色的多峇湖》、管天来的中篇小说《飘洋过海》等。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岛国华文文学特色，揭示的社会生活层面十分广泛，艺术形式丰富多采。

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后印尼施行的全面排华政策，使印华文学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华侨社团、华校、华报、华文杂志均被取缔，只有一份官办的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但华文文学以奇特的生命力在夹缝中顽强地挣扎着。至八十年代在印尼仍有一些较具影响的华文作家，如：黄东平，祖籍福建金门，1923 年生于印尼，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作品甚丰，已出版的主要有《侨歌》三部曲中的《七洲洋外》（1973 年）、《赤道线上》（1979 年），中篇小说集《远离故国的人们》（1990 年），散文集《短稿一集》（1984 年），电影文学剧本《老华工》（1974 年）和话剧剧本《红溪》（1984 年）等。还有柔密欧·郑、冯世才、林义彪、严唯真、林万里、白放情、茜茜丽亚、思芳草、明芳、晓彤、袁霓等。一些原侨居印尼多年、后散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也与印尼华文文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如在中国的，内地有蔡其娇、翼沅、邹访今、梅漂等；香港有犁青、陶然、梅子、东瑞、邱虹、黎宗科、纪壁华、南思、千仞、立人、李宿等；澳门有梁披云、胡晓峰等。在新加坡的有周颖南、廖建裕等。诗人犁青发表过多篇关于印尼华文文学的研究文章，还创办有《文学世界》杂志。

由于在印尼禁忌华文，印尼华文作家的作品多在国外发表和出版。如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黄东平的《七洋洲外》，犁青的《千里风流一路歌》、《情深处处》，黄东平、林林、犁青、张昆华合著的《赤道线上的歌唱》，林义彪的《千岛之梦》，黑婴的《三个漂流异国的女性》，巴人

的《印尼散记》和《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在香港出版的有沙里洪编的《印华文学选》和《印尼风光》，苏艺的《印度尼西亚采风录》，礁石的《印度尼西亚的新文学运动》等。在新加坡出版的有柔密欧·郑等人合著的《新荷》、骆起东的《翡翠带上》等。

印尼华文文学虽无惊世之作，多属描写身边琐事、爱情绵意和一己悲观，却多是积极向上的。其意义在于这些作者凭着“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信念，以顽强不屈的精神抗争于世，使华文文学薪火相传，印尼华文文学并未因为华文的遭禁而消失。他们以灵活的方式延续着印尼华文文学的生命之光，促进了印尼华文文学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正如犁青所说：“他们没有宣扬热爱印尼以外的其他政治，有的均是闪烁着热爱印尼、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健康色泽和光彩。就是其中一大部分的‘爱情文学’或‘旅游文学’，也都不下流、不色情、不丑恶。……这些华文文学，已是印尼文化中的一个可贵的组成部分，它丰富了印尼文化、文学。”^① 印尼华文文学的更大发展，将取决于中印(尼)邦交正常化后印尼的华人政策是否有大的松动。不管怎样，它仍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六、美国华文文学

清末，侨居美国的文人或中国国内的作家根据流传的华工故事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黄遵宪的诗《逐客篇》，小说有佚名的《苦社会》，我佛山人的《劫余灰》，吴沃尧的《人镜学社鬼哭篇》，哀华的《侨民泪》，指严的《猪仔还国记》等。

当年华工移美，入境时首先得去旧金山天使岛上接受检疫审查，

^① 犁青：《艰苦成长中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王润华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第102页。

实则拘留,短者几个月,长者一两年。从1910年1月至1940年,共有18万中国新移民被拘于此。许多人不甘受此屈辱,投海而死;有的则用刀叉在木屋上刻下了记述痛苦经历、思乡情愫的诗作。1976年,美华裔史学家麦礼谦与杨碧芳、林小琴将搜集的木屋诗130余首合编成《埃岓诗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年)。这些诗作饱含着悲愤和思念,如:

为也来由要坐监? 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门无消息, 妻儿拥被叹孤单。
纵使批准能上埠, 何日满载返唐山?
自古出门多变贱, 从来征战几人还?
国民不为甘为牛, 意至美洲作营谋。
洋楼高耸无缘住, 谁知楼所是监牢?
今日为冬末, 明朝是春分。
交替两年景, 愁煞木楼人。

谁也不会料到,这些苦诗竟成了美国华文文学的先河,尽管在当时无人知晓。美国是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英语国家,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困难重重。二战期间,成立了一些华文文学团体,还创办了《新苗》月刊,发表文学作品。

战后,美国华人地位有所改善,华文报纸杂志增多,华文文学作品也频频面世。1945年,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借《美洲华侨日报》“绿洲”副刊发表文学作品,后编成文集《呐喊》,由香港《华商报》出版。文艺月刊《新苗》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散文等。《新苗》刊载的小说在美华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上承《金山歌集》,下启六十年代关注文化特性和独立性的第二代美华作家。

五六十年代,来自中国台湾的移民对美国华文文学影响较大。后

来成名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白先勇、张系国、非马等人都是这时赴美的。中西文化的撞击给这批文学作者的体验极深，他们以自己的切肤感受为表现对象，创作了一些风格新颖、笔法浑厚的作品，形成了以於梨华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白先勇的“浪子的悲歌”。以此为基础，至七八十年代形成一个华裔作家群。举其要者，有：

张爱玲，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1920年生于上海，香港大学毕业，五十年代初赴香港定居，后赴美，任职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以《倾城之恋》一举成名，后有长篇小说《赤地之恋》、《半生缘》等，中篇小说《怨女》，短篇小说《传奇小说集》、《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等。

聂华苓，湖北应山人，1926年生于宜昌，1964年由台湾赴美。在台湾时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赴美后有散文集《梦谷集》和长篇小说《桑青和桃红》等。

於梨华，原籍浙江镇海，1931年生于上海，195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56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1962年后始用中文写作，有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变》、《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焰》、《考验》、《傅家的儿女们》，中篇小说《也是秋天》、《三人行》，短篇小说集《归》、《雪地上的星星》、《白驹集》、《会场现形记》等，取材多是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与感受。她被称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

陈若曦，原名陈秀美，1938年生于台北，1961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获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有短篇小说集《尹县长》、《陈若曦自选集》、《老人》、《城里城外》、《贵州女人》，长篇小说《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还有散文集《文革杂忆》、《生活随笔》、《无聊才读书》等。其中《尹县长》被译成英、法、德等8国语

言,被评选为美国 1978 年最佳书籍之一。

白先勇,原籍江苏南京,1937 年生于广西桂林,1952 年赴台湾,1957 年入台大外文系,1965 年获美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为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代表作为《纽约客》和《台北人》等,题材都是反映在美中国台湾留学生的生活遭遇和复杂心态。

其他华文作家和小说有:张系国的短篇小说集《地》和《游子魂组曲》,丛甦的短篇小说集《白色的网》、《秋雾》、《自由人》以及《想飞》、《中国人》、《君王与跳蚤》、《兽与魔》等。

在诗歌方面,如非马有《在凤城》、《美丽岛诗集》,叶维廉有诗集《赋格》、《愁渡》、《醒之边缘》、《野花的故事》、《叶维廉自选集》和《花开的声音》等,张错有诗集《过渡》、《死亡的触角》,王靖宪(笔名杨牧、叶珊)有《船灯》、《水之湄》、《非渡诗》、《花季》等。

在散文方面,如许达然有作品集《土》、《含泪的微笑》、《远方》、《防风林》、《水边》、《人行道》等,叶维廉有《万里风云》,王靖宪有《叶珊散文集》、《年轮》,张错有《第三季》、《从木栅到西雅图》等。

六七十年代以来,常发表文学作品的美国华人作家还有专长中国文学史的夏志清,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周策纵,文学批评家许芥煜,文艺理论家刘绍铭,画家和诗人秦松、林缉光,女作家木令耆、庄因、李黎、吉锋、蒋心等。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大陆旅美新移民的增加,华文文学的作者队伍和读者市场扩大了。美华作家努力探索华文文学的发展方向,1985 年在纽约市立大学召开题为“海外作家的本土性”的座谈会,主讲人有陈若曦、张错、王靖宪、张系国、洪铭水、丛甦、李渝、唐德刚等人。陈若曦说:“我不愿忘怀故土,但是主要多写新土;我愿意记录并反映同胞扎根新土的奋斗,把对故

土的缅怀化为对新土的耕耘。”^① 在保持故土文化根的同时,面向美国华人社会的现实而笔耕,应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华裔作家有不少是用英文写作的,如汤婷婷的《女豪杰》,包柏漪的《春月》,黄玉雪的《第五个华裔女儿》,林露德的《唯一生还者》,赵健秀的《祭品》,谭恩美的《喜福会》等,一些作品颇获美国文学界的好评。这些作品的题材多属华人范围,即描绘美国华人少数民族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华人将自己的文学推向主流社会、推向英语世界的一种努力。它既是华人少数民族的文学,也是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美国华文环境的局限,美华英文文学较之华文文学将有更快的发展。

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

除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华文文学较活跃的国度之外,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也值得一书,如日本、越南、柬埔寨、老挝、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

(一) 越南、柬埔寨、老挝华文文学

越、柬、老三国毗邻中国,统称印度支那半岛,也是华侨华人聚居较多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传》等就被介绍到越南,越南不少作家都用华文写作。至二十世纪中叶,三国的华文文学各呈其特点而发展。

越南的华文文学也是随着华文报刊的产生而逐渐出现的。1938年末,越南华侨救国总会主办的《全民日报》(1940年更名为《华裔日报》)发表了不少歌颂中国抗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海外版,也称“中土文学”。五六十年代,在西贡、堤岸等大

^① 转引自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第196页。

城市,华文作家队伍壮大,如海韵文艺社有村夫、何杰华、黎启铿、子诗、梦玲等近40人。该社出版了文集《序幕》,含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1968年,徐卓英、黎启铿、荷野等作家与“水手诗社”合作出版了《水手诗集》。这些作品立足于越南本土,同时融汇了中国台湾、香港文学的风格。然而,至七十年代,由于越南掀起排华浪潮,华文文学遂一落千丈,几致于湮没。随着近年来中越关系的正常化,情况有所改善。

柬埔寨出现华文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作品除发表在诸华文报纸的副刊上之外,主要园地是《柬华文艺》杂志,主编陈祥发。另有综合性杂志《柬埔寨知识》,主编黄振松系柬作家协会会员。七十年代以后因越南入侵,柬华文学陷入绝境。随着越军撤出柬埔寨以及柬华文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这里的华文文学必将走向复苏。

印支地区的长期动乱,使得许多华文作家漂泊世界。如在美洲定居的有陈大哲(大方)、邝鲁九、黎启铿、沈季夫、冯彩珍、卢祀华、徐卓英、龙震潮、胡月华、黄锦莲、徐蝶文、丹流、吴甫清、文清等;在欧洲定居的有夜心等;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有黎树、黄玉液(心水)等。在中国台湾定居的越、柬、老三国华文作家还成立了“世界越棉寮华人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反映了这些作家的印支情结。

(二) 日本的华文文学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但属旅日华侨的文学则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1982年,留日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刘兴尧、王良为正副会长;1985年该会创办华文杂志《东京》月刊,以发表日华文学作品。八十年代以来,在日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评论与研究的华文作家主要有:王良(笔名王野)、刘兴尧、齐俦、毛袭加、郑宇煌、王璇、蒋濮等。其中蒋濮是一位八十年代才赴日的新移民。发表了中篇小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东京没有爱情》和《东京恋》,1990年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极乐门》。这些反映在日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为日本华文

文学的荒原点缀了几朵鲜花。随着像她这样一批作家的成长,日本的华文文学必定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三) 加拿大、巴西的华文文学

加拿大华人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有文学作品问世。1957年,香港《文艺新潮》杂志发表了冷凝的小说《蒙特利尔之冬》,讲述一个土生土长的华裔投奔中国的经历。这在寂寞的加华文苑是一篇颇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移民的增多,加华文学气氛也渐渐浓郁。华文作家主要有:

卢因,原名卢照灵,祖籍广东番禺,1935年生于香港。1973年移居加拿大之前已发表过《猎与其他》(小说集)等多篇作品,此后仍用业余时间勤于笔耕,发表了一些较有分量的“散文小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卢因短篇小说集》,《香港文学》杂志上登载过他的散文《云山风景眼前来》、《奇遇》和小说《弹筑》等佳作。他还发起组织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并任主席。

袁军,曾在上海当过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后移居加拿大。著有小说《主旋律》、《夜雾》等,诗作有《世博杂咏十二题》、《影子》等。1984年组织白云诗社并任社长。

东方白,原名林文德,1938年生于中国台北。1965年赴加,获工程博士学位。作品有小说散文集《黄金梦》,哲理小品《盘古的脚印》,短篇小说集《东方寓言》和长篇小说《露意湖》等。

此外,还有陈中禧、谢少波、曹小莉、胡意梅、小攸、梁楚、黄子、刘瑞麟、程观俭、徐树道等作家、诗人。白云诗社和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是联系他们的两个主要华人文学团体。加华作家的作品除在北美《华侨日报》上发表外,主要刊登于《香港文学》上。虽然加华作家阵营不及美国那样齐整,也缺乏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作品,但仍不失为海外华文文学队伍中具有自己特色的一支。

巴西华文文学作品较少,刘同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他的“巴

西新闻小说”有特色,如《手》、《一只巴西狮子的嘉年华会》、《鸚鵡及其他》等在《香港文学》上发表后给人以新奇之感。另有泉彭年的散文也引人注目。

(四) 欧洲华文文学

欧洲华文文学分散性强,无统一的格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由于移居欧洲的华人数量增多,特别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者日众,而形成华文作家队伍的。

在法国,有马森的《法国社会素描》、《巴黎的故事》,卢岚的散文集《凡尔赛的喷泉》、《乡眺》,郑宝娟的短篇小说集《一生中的一周时光》,吕大明的散文集《这一代的弘音》、《大地颂》、《英伦随笔》、《写在秋风里》、《来我家喝杯茶》等。黎翠华、郭恩慈、梯亚、阎纯德等人也有小说、诗歌、散文作品,多发表在《香港文学》杂志上。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法国华人的社会生活。

在英国,1988年12月成立了英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陈伯良,旨在交流英国和英国以外的作家、翻译家、诗人、编辑、报刊撰稿人等用华文写作的经验,提高华文写作水平。英国作家中较有名的有叔华、韩素音、史晶等。韩素音是一位著述甚丰、享有国际声誉的华文作家,原籍四川成都,1917年生于河南。处女作为《爱情至上》,出版后轰动一时,后被改编成电影《生死恋》。一生著作计25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主要作品有:自传三部曲《伤残的树》、《花开花落》、《无鸟的夏天》和续集《吾家双门》,以及《早晨的洪流》、《风满楼》、《2001年的中国》、《亚洲的风雷》等。史晶原名薛风旋,1974年赴英留学,期间创作了30余篇反映英国社会、当地华人、留学生生活与心态的散文,1978年结集《英国留学记》出版。

在瑞士,祖籍黑龙江、1931年生于北平的赵淑侠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随着她的《西窗一夜雨》和《当我们年轻时》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以及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在中国台湾连载,台湾及欧美华

人中刮起了一股“赵淑侠旋风”。《我们的歌》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小说创作奖；1990年，赵淑侠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又获台湾中山文艺创作奖。此外，已出版的作品还有17部，主要有：短篇小说集《人的故事》、《湖畔梦痕》；长篇小说《落第》、《春江》、《塞纳河畔》；散文集《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故土与家园》、《翡翠色的梦》、《童年·生活·乡愁》和《雪峰云影》等。由于她的成就，名列英国剑桥《世界妇人名人录》。她的作品渗透着对故土深深的爱：“我们的歌，来自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

瑞士的华文作家还有龙应台、燕云和余心乐等。余心乐以其推理小说在欧洲华文文坛独树一帜。他祖籍广东台山，1948年生于台南，1975年负笈瑞士并留居于此，1988年起展示创作才华，陆续推出“张汉瑞探案系列”长、中、短篇推理小说共5部，即《松鹤楼》、《生死线上》、《异类的接触》、《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和《推理之旅》，其中多篇在中国台湾林佛儿主编的《推理》杂志上获征文首奖。

在荷兰，林湄、池莲子是华文作家中的出类拔萃者。林湄原名林梅，1945年生于福建泉州，七十年代迁居香港，后移居荷兰，作品有散文小说集《诱惑》和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泪洒苦行路》是一部探索现代妇女命运的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池莲子原名池玉燕，浙江温州人，1950年生，1980年移居荷兰。池的诗歌充满怀旧、思乡之情，道出了新移民的真实感受。

在西班牙，林盛彬以其诗作而闻名。林盛彬1957年生于中国台湾，马德里中央大学毕业，作品有诗集《战事》（1988年）、《家谱》（1991年）等。

此外，大洋洲、非洲的华文文学也在顽强地生长着。如澳大利亚的《海外风》（1982年创刊）、《汉声》（1985年创刊）等杂志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或反映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或追忆印支难民经历，

或抒发怀念故国之情,或表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心态等。澳大利亚华文作家队伍处于初建阶段。毛里求斯的华人作家曾繁兴、诗人吴国赞、罗塞打·钟华等在当地颇著名声,罗塞打·钟华的短篇小说《他将是一个站着的人》、《阿妹》、《别处的草更青》等,曾获1979年、1980年该国广播电台举办的“最佳短篇小说奖”。这些用英、法文写作的华人文学具有更宽广的前途。

总之,世界各地华人作家的华文文学组成了一幅独特的文化画卷。它源自中国文化精神,融汇了世界各国的人文精华,用精彩纷呈的笔法描绘了海外华人的酸甜苦辣,这不仅是华人文化的光大,而且是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忽视了它,世界文学史将留下无尽的遗憾。海外华文文学的坎坷历史表明,伴随着中国文化、经济振兴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频繁交流,它会有着更光明的前途。华人文化精神是不朽的。

第二节 东南亚华文戏剧

一、概 述

华文戏剧是指以华文华语为表达工具的戏剧,包括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戏曲、木偶戏和皮影等艺术形式的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其中一些是属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南移与演化,一些则是扎根于华人社会及其所处的大文化氛围的作品与艺术表现,均已成为华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华文戏剧之发展深受中国国内政治和文化艺术活动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马等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戏剧运动,数以千计的戏剧团体纷纷崛起,形成了东南

亚前所未有的华文戏剧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为后来华文戏剧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华文戏剧走的是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东南亚华文戏剧的发展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 强烈地受到中国和当地政治的影响,受到华人群体秉性的制约,发展之路坎坷不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新、马华文戏剧呈现活跃的局面。随着战争的结束与殖民主义统治势力的卷土重来,华文戏剧受到压制。在东南亚各民族国家建立后,华文戏剧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各国不同的对华人政策使华文戏剧的命运各不一样。例如,印尼在“九·三〇”事件后禁止一切具有华文特征的东西,华文戏剧属禁止之列。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稳定而友好的发展,中国戏剧界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频繁,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戏剧在革新中寻求发展。

(2) 突出的地方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海外移民的地域乡帮牵引与集聚的特色,使得地方戏剧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得到了广泛的继承与发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华文戏剧最集中的国家,从祖籍来看,这两国的华侨华人多源自中国的广东、福建,因而在此尤为流行粤剧、潮剧、广东汉剧、闽剧、高甲戏、梨园戏等剧种,新加坡有“粤剧的第二故乡”之誉。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以祖籍福建和广东为多,因而这里较流行闽剧、芗剧、梨园戏、木偶戏和粤剧等。越南的华侨华人多源于广东和广西,因而在此粤剧较流行。他如印尼、缅甸等国都很兴盛粤剧。粤剧与闽剧成为东南亚各国华文戏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此外,话剧、歌舞剧、歌剧以及京剧也都有许多爱好者。

(3) 戏剧团体的业余化和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在当地的剧团中有学校的学生戏剧组织、校友会的戏剧机构、同乡会馆的戏剧社团、职业行会的戏剧组织、教会的演出机构、政党和军队的演出团体等。尤其是华侨华人的传统社团组织热衷于华文地方传统剧种的推广与

弘扬。他们举办各种类型的演出,甚至还举办华文艺术节和戏剧节以及专题晚会,如“六月话剧欣赏会”、“本地剧作欣赏晚会”、“本地独幕剧大汇演”等。同时,还创造条件进行华文戏剧研讨活动。

华侨华人的华文戏剧活动已构成他们特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华文话剧

东南亚华文话剧的主要活动基地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919年前后受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南洋话剧,当时称为新剧或文明戏,以示与中国传统地方戏曲(称“旧剧”)的区别。新剧的特点是题材或主题较新颖,多针砭时弊,台词以对话为主,间或插入歌舞和锣鼓。

是时在新、马演出的话剧主要有三种情形:(1)当地的中国戏曲班演出“新剧”。如新加坡著名的戏曲班——庆维新班演出《就是我》、《河伯娶妻》,大获成功。1919年11月20日的《新国民日报》以《新剧的出现》为题盛赞二剧的上演,认为《河伯娶妻》“尤有特色,其中所演非独破除迷信已也,还能于政治上、风俗上尤有注意焉”。檳城真相剧社的“新剧”演出同样受到欢迎。(2)中国上海的剧团到新、马演出“文明戏”,如上海金星歌舞团和银月歌舞团演出《恶婆凶媳》、《马介甫》、《自由之花》、《破镜重圆》等50余种文明戏剧目。(3)华侨组织话剧团演出新剧,包括从中国引进的文明戏剧目和西洋话剧剧目以及华侨就地取材编写的本地剧本。如1921年新加坡青年励志社组织演出《同恶报》和《谁之咎》等剧目,都切近社会与生活。

1922年以后新、马华侨话剧团体趋于活跃。有近百个业余剧团,如:仁声白话剧社、同德书报社、青年进德会剧务部、南庐学友会、潮州白话剧社、南洋青年励志社、美正校友会白话剧团、吉隆坡仁镜慈

善白话剧社等。道南学校的校友组织南庐学友会于1918年成立,会内设有剧务部,通过演剧以培养青年的高雅情操,曾演过《风劫余生》、《青灯回味》等剧。1919年成立的南洋青年励志学社演出过《谁之咎》、《可怜闺里月》、《复活的玫瑰》和《青春的悲哀》等剧。他如星洲南华女校、南洋女校、爱同学校、养正学校、通德夜校、中华女校等也有较频繁的戏剧活动。上演的剧目约有30余出,如《自由之路》、《富商义侠》、《女豪杰》、《雪桥泪史》、《妇道苦》、《情场毒》、《钱虏鉴》、《英雄与不幸女》、《傻女福》、《孝母少女》、《灾黎泪》、《穷汉》、《风劫余生》、《好儿子》、《轮回》、《沧桑变》、《侠情》、《新芦花》、《村愚笑柄》、《钱与命》、《孔雀东南飞》、《双骗计》、《侠女魂》、《谁之咎》、《畸零人》、《燃犀照》、《模范女子》等。这些演出使用的语言有普通话、广东话、潮州话和闽南话等。演出的地点多在各地戏院,如怡保戏院,芙蓉的陶园剧院,新加坡的梨园春戏院、余东璇街升平园、新街咏乐戏院以及维多利亚戏院等。

新剧的演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二十年代初围绕“男女教员同台演剧”和“剧场女招待生”问题进行过较大的争论。如反对男女同台演戏的人认为,男女同台演戏,特别是扮演男欢女爱的情节,会有伤风化,同时引起学生家长的疑虑,妨碍男女同校,以致影响华文教育的发展前途。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男女同台合演新剧于男女身心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助于启发民智,移风易俗。关于剧场女招待生是否该设也有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通过争论,使人们对新剧有了新的认识,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三十年代,新、马话剧的主题一方面仍然与中国的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与南洋社会相结合的特色也呈现出来。《狮声》等杂志主张发展南洋戏剧。最早发表的富有南洋特色的剧本是林姗姗的《良心之狱》(1927年10月《微光》刊载),1930年发表了陈旧燕的《往死路上跑》,寰游的《十字街头》。1931年7月起《光华日报》“戏剧”专

刊连载马宁的《夫妇》、《女招待的悲哀》和《凄凄惨惨》等，多为反映马来亚下层华侨的遭遇及其抗争精神的作品。1931年在马来亚檳城展开“南洋新兴戏剧运动”。戏剧工作者以《光华日报》“戏剧”版为阵地，发表剧本和评论文章。在《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展开》一文中，作者指出：这种新兴戏剧就是要求创作与演艺人员深入到广大群众的生活里去，去感受群众的实际斗争，把他们的生活编成剧本，真实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他们认为，有益于社会向前的戏剧就叫做新剧运动。他们比较注意舞台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如提倡新型的话剧艺术，重视舞台美术，制造布景等。

新兴戏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新、马戏剧的发展。一批新的戏剧团体成立，如：爱华音乐社，1932年成立，会众为爱同学校的校友以及朱绪等戏剧工作者；萤火剧社，1934年成立，负责人为杨绍基、朱绪、林立裕等。还有青年励志社、同善校友会、南洋女校等纷纷加强戏剧力量。1933年青年励志社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了静倩（即马宁）的四个名剧《芳娘》、《绿林中》、《一侍女》和《兄妹之爱》，引起轰动。爱同校友会也先后上演了一批自编的颇富现实主义精神和南洋地方色彩的剧目，如《社会钟》、《除夕》、《妈妈》、《小学生》、《花弄影》、《呐喊》、《挣扎》、《求生》等。

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对于新、马华文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华戏剧界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亡戏剧运动”，各地华人社团纷纷设立了戏剧工作部门进行演剧活动，以推动华侨筹赈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1月22日的《现代戏剧》刊登了署名“剧界同人”的《马来亚戏剧运动纲领草案》，提出了“戏剧运动”的基本理论是：“（1）为救亡而从事戏剧运动，以话剧为主体，推进其他一切戏剧形式。（2）提高戏剧艺术的水准。（3）以戏剧力量教育大众，组织大众。（4）配合目前抗战形势，从事富有救亡意义及适应当地大众需要的戏剧。”它的行动目标是：“（1）完成华侨救亡统一战线。（2）完成戏剧救

亡统一战线。(3)加强戏剧运动的教育工作。”在救亡戏剧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创作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抗战救亡剧目,话剧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这时较活跃的戏剧作家有:吴天,江苏扬州人,1936年到新、马从事教育工作,次年参加新加坡业余话剧社,以叶尼的笔名发表过《伤兵医院》、《父与子》、《春回来了》、《没有男子的戏剧》,街头剧《同心协力》、《串好的把戏》,多幕剧《海恋》和独幕剧《海外》、《活该》等,在《南洋周刊》上发表《论南洋文艺的大众化运动》和《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等理论性文章。王秋田,1937年到新、马从事戏剧运动,为著名戏剧导演,曾任华侨筹赈会宣传组戏剧股主任。朱绪,约在1932年抵新加坡,1934年入萤火剧社,1937年之后参加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曾导演过多篇剧作,率马华巡回剧团到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改编或创作过《逃难到星洲》、《汪精卫叛国记》、《黄昏时候》、《归国》以及《逃犯一〇三》和《未完成的杰作》等。流冰(即孙孺),参加过雪兰莪、马六甲等地的戏剧活动,编写了《金门岛之夜》、独幕剧《十字街头》、《云翳》和《开不成的欢送会》等剧本。杜边,南岛旅行剧团团长和编导,率团到新、马各地巡回演出《巨魔》等抗日戏剧,还著有《二年》、《反迫迁》和《她疯了》等剧本。他如铁亢的《父》,王家珍的《结局》,莹姿的《虎口中的孩子们》,高云览的《夕影》,殷沫的《父子》,沈阳的《归国之前》和《伟大》,啸声的《救国》等剧作,都是反映新、马华侨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抗战时成立的剧团主要有:

新加坡业余话剧社,1937年成立,旨在以话剧来唤起侨众和组织侨众,先后演出了许多救亡的戏剧,如《美味》、《塞外狂涛》、《警号》、《放下你的鞭子》、《农宝》和《伤兵医院》等。1939年该社因悖于英殖民政府的“现实外交”政策而被迫解散,其成员或与职业剧人臧春风、章曼夫等合组职业剧团“实验小剧场”,或组织马华巡回剧团等

进行抗日救亡演出。

马华巡回剧团,1939年在《星中日报》主编胡守愚的支持下成立,胡守愚、朱绪先后任团长,演出过《回春曲》、《民族公敌》、《放下你的鞭子》等20余个剧目,还与钟灵流动剧团等联合在霹雳等地公演。

加影前卫流动歌剧团,1938年吉隆坡附近的加影华侨中学和育华中学组织了加影华侨学生筹赈服务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加影前卫流动歌剧团,负责人为郭秉箴,后曾惠钦为团长,在加影、吉隆坡、怡保、太平、檳城、芙蓉等地演出。1942年解散。

南岛旅行剧团,为1937年成立的新、马职业性华侨抗日剧团,由华侨青年和文艺工作者组成,主要创始人有杜边、赖丹、戴小郎等。演出的剧目有: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重逢》等;反映中国人抗敌救国和日占区人民悲惨生活的《巨魔》、《爱国心》、《情与法》、《万恶公司》和《战地泪花》等;根据报上最新资料编剧的活报剧;以及《铁蹄下的歌女》之类的歌舞表演。该团深入到马来亚中部和南部市镇、胶林等地进行演出。后来该团被迫解散,余众组织了实验流动剧团和茶花剧团。

其他还有今日剧社、晨钟剧团、爱华音乐戏剧社以及同志白话剧社、晨光社、爱群社、爱华社、工商校友会、爱同校友会、维扬体育会、活声励志社、青年乐心社、国风幻境剧社、吾吾剧社、香祖体育会、虫吟音乐研究社、钟声音乐研究社、吼声音乐话剧社、养正校友会、蚂蚁剧社、蜜蜂剧社、昙花剧社、新生励志社、萌芽剧团、钟灵校友会、怡保洪钟剧团、青年口琴会等30余个。来自中国的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对新、马救亡戏剧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的新中国剧团(1940年成立)初名中国救亡剧团,以著名演员金山和王莹为正副团长,奔赴越南、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演出700余场。

救亡戏剧运动的空前活跃也带来了南洋戏剧理论的发展。戏剧界还围绕“南洋地方性剧本”以及《日出》和《群莺乱飞》的演出展开了

讨论。通过讨论,对于认识马华戏剧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以及戏剧界的团结起了促进作用。戏剧界将舞台表演与戏剧理论相结合,举行戏剧工作座谈会,如1937年以“需要什么剧本,怎样创作剧本”为中心议题举办“业余话剧社第一次社友座谈会”;1938年由叶尼主持“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座谈会;1939年的“第二期抗战与马华剧运”座谈会,等等,对于推动具有南洋特色的戏剧理论之形成与发展以及更好地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具有积极意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戏剧陷入低谷。1945年以后东南亚的华文戏剧才又走向复兴,表现在戏剧团体的纷纷成立与重建,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戏剧活动的活跃和外来戏剧团体的访问演出等。

恢复的戏剧组织有: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改名为星洲实验剧团,董事长胡愈之;爱华社,即原爱华音乐戏剧社,负责人吴盛育;以及铜锣合唱团等。

新成立的戏剧团体有:1945年在马华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和新华戏剧工作者联合会支持下成立的新加坡海鸥剧团,由杜边、萧敏等人负责,该团演出的《升官图》和《岛上夜曲》等颇具影响,还帮助新加坡平民学校的戏剧爱好者们成立了新加坡儿童剧团;1947年成立的中正学校中正戏剧研究会,上演了《裙带风》、《头家哲学》等;1947年成立的民声歌剧社,上演了《宝星》、《王八蛋才疯》、《一袋米》等剧。

1948年新马紧急法令颁布后,多数戏剧团体解体,但学生戏剧活动却得到了发展。除了中正戏剧研究会外,南侨女中、华侨中学、南洋女中、中华女中、爱同、宏文等校的学生也组织戏剧活动,经常进行演出,如南侨女中演出的剧目有《油漆未干》、《水仙花》、《大雷雨》、《晚祷》和《五姐妹》等。1955年中正学校的学生和中正戏剧研究会的一部分会员成立了“新加坡艺术剧场”,对戏剧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每届学生毕业时,演剧活动更为频繁,还有各校校庆、为南洋大学的筹建以及慈善事业的演出,上演剧目有《墙》、《一个房间》、

《苏州夜话》、《湖上悲剧》、《中秋月》、《家庭访问记》、《娜拉》、《家》和《露丝之死》等。1954年,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成立,次年为南大筹款进行义演,演出《南大颂》。1953年至1956年,学生戏剧为配合新、马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演出歌舞短剧《打黄狼》,深受欢迎。

在越南,1945年9月越南华侨青年成立了新侨剧团,团员有20余人,多为中小学教师、手工业者和知识青年,负责人汤明、陈欣之,公演过《裙带风》、《海恋》、《升官图》、《夜店》、《重逢》等20余个节目。尤其是广州锋社话剧团的戏剧家何芷加入该团后,使他们的表演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49年该团被迫解散。

二战后初期,中国歌舞艺剧社到东南亚各地的巡回演出对于推动各地华文话剧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作用。该社是1946年由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五、第七演剧队和中国傀儡剧团、中原剧团在香港合组而成的,社长吴荻舟,后为丁波,成员有40余人,旨在开展海外新兴艺术与青年运动,发掘整理海外民间艺术,用以反映侨胞生活,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1947年该社先到泰国曼谷演出了84场,后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吉隆坡、芙蓉、巴生、加影、怡保、布先、太平和槟榔屿等8个城市演出了10个月。他们还创作了一些当地题材的剧目,如《风雨牛车水》、《风雨三条石》、《新唐夜会》、《海外寻夫》、《流浪到南洋》、《中马票记》、《OFFICE内外》等,台词使用普通话、广州话、闽南话、客家话和马来语、印尼语等。1948年在该社的倡导下,在新加坡还创办了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赵汎,设音乐班和戏剧班。1948年该社被迫返回香港。

五六十年代,随着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戏剧活动趋于平静状态。学校的戏剧组织仍坚持演出,如新加坡中正戏剧研究会1961年演出《桃花扇》,1962年演出《岁寒图》和《名优之死》;华侨中学学生戏剧会1959年演出《阿Q正传》和《心防》,六十年代初又上

演《水产专员》、《狂欢之夜》和《正气歌》等。1957年成立的南洋大学戏剧会也演出过《县官坐堂》、《遭遇》、《爱情》和《小城的故事》等剧目；该会还出版《戏剧研究》杂志，举办戏剧讲座。

除学校戏剧组织之外，较突出的戏剧团体有：新加坡艺术剧团，1954年成立，1957年至1972年间演出的剧目达40余出，如《北京人》、《雷雨》、《芳草天涯》等外国剧目和《风雨牛车水》、《圣诞财神》、《一个有钱人家》等当地题材的剧目。新加坡艺联剧团，1958年成立，用标准普通话演出，剧目有《小心火烛》、《许姐儿》、《情宫怨》等，为教育和慈善事业捐款。新加坡大众剧场，1960年成立。新加坡表演艺术剧院，1965年成立，为演出与培训相结合的团体，1967年办有戏剧训练班，所演本地题材的剧目有《可敬的亲人》、《成长》、《生命的决堤》和《胶林颂》等。新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1968年成立，提供文娱场所，培养文艺人才，设华语戏剧等10余个组。他如新加坡广播电台儿童剧社、吉隆坡剧艺研究社、新加坡人民协会文娱工作团、康乐音乐研究会、电影戏剧研究会等都时有华语戏剧演出。

七十年代新、马新成立的剧团有：生活剧社、南方艺术团、新加坡星海艺术研究会、长风剧社、长堤文娱团、马来西亚新山的海音艺术团以及大路、向阳、实验等剧团。他们经常举行演出，还有各类专题演出、文艺晚会和大汇演或戏剧节等。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在吉隆坡举行了有20个团体参加的“春自人间来”大汇演。1977年剧艺研究会、人镜慈善话剧社等8个团体在吉隆坡联合主办“戏剧节”。在这些演出中，本地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新的提高，如《第二次奔》、《蛆虫》、《阿添叔》、《苦难的航程》、《两姐妹》、《翻身》和《成长》等。引人注目的是教会和政党对话剧活动的重视以及工人社团戏剧活动的活跃。如：叶恩溥在英华堂为教会自编自导演出了《良牧之光》；1965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戏剧组，演出了《生日》、《到底是谁》、《茅屋下》等独幕剧；六十年代初书报印刷

业联合工会较早开展演剧活动，有《八根火柴》、《进步》、《圣诞节前夜》、《雨夜》、《天亮前》等独幕剧。话剧成为一种为大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

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如：李星可，祖籍北京，二战后赴南洋，任南洋大学、新加坡师院训练学院讲师，戏剧作品颇丰，有多幕剧《快艇》、《钓金龟》、《绑票》、《救穷》，独幕剧《鬼》、《桥上》、《月饼》、《荒岛》、《大众顾问》、《绿洲》，历史剧《鹤鹑恨》、《乱世春秋》、《齐宫外史》、《同室操戈》、《东墙祸》，哑剧《赌徒》、《哲学家》、《割胶》、《降头》、《梦》等，戏剧论著《我谈京戏》、《怎样欣赏中国戏》、《南洋与中国戏》等。田流，原名钟文灵，祖籍广东丰顺，为新加坡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剧作有《生活线上》、《一学期》、《思前想后》、《三万元奖金》、《遗产问题》和《田流剧作集》等。史可扬，原名林明洲，祖籍海南，为新加坡著名戏剧作家，作品有多幕剧《生活的旋律》、《真相》，独幕剧《真正的爱人》等。征雁，原名陈达人，原籍福建，为马来西亚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剧作有《夜渡》、《雨夜》、《封锁钱》以及《潮来的时候》、《征雁剧作集》等。宋人，原名戴天送，为马来西亚剧作家，有《打得好》、《长窗外》等10余个剧本。叶苔痕，祖籍福建，为马来西亚戏剧作家，剧作有《第二街》、《乔迁之喜》、《孔雀东南飞》、《叶苔痕剧作选集》等。罗大章，祖籍广东惠阳，为马来西亚剧作家，作品有独幕剧集《新一代》。王里，原名许智荣，祖籍福建，剧本有《悬崖》、《归来》、《巷口》（二幕剧）、《过去的年代》（四幕剧）和《差一点落伍的人》（独幕剧）。关新艺，原名王裕焯，祖籍福建，为新加坡剧作家，著有《滑稽短剧集》、《独幕剧集》、《我是扒手》、《关新艺独幕剧集》、《学店》、《出狱的人》、《短剧精选》、《关新艺电视剧集》等。李廉凤，祖籍湖南，为新加坡女作家，剧作有《晚来风急》等。

新、马华文戏剧活动除了日常演出之外，还包括：（1）举办大型艺术节，如1982年新加坡华文艺术节，有新加坡广播戏剧组、丽的呼声

华语话剧组、人民协会戏剧组、新加坡艺术剧场、新加坡艺联剧团、实践艺术学院、南方艺术研究会、青年剧团、生活剧社、晋江会馆戏剧团、向阳剧社，新加坡大路剧社等 14 个团体联合演出。(2)参加剧作比赛，如 1965 年新加坡文化部举行剧本创作比赛，华文组获首奖(金像奖)的是叶苔痕的《第二街》；同年为鼓励本地题材戏剧创作和演出而举办独幕创作剧比赛，评出《长青草》等 10 个优秀作品；1977 年至 1978 年新加坡又举行剧本创作比赛，李廉凤的五幕剧《晚来风急》获多幕剧冠军。(3)举办戏剧训练班和戏剧营，以培养话剧接班人。如 1983 年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主办写作讲习班；1983 年、1987 年新加坡两次举行华语戏剧营。此外还举行戏剧座谈会，探讨戏剧创作理论与表演等问题，尤其是对于如何推动本地剧作家创作本地题材的作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三、歌舞剧

华文歌舞剧艺术(包括歌剧、舞剧和歌舞剧)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逐步当地化的过程。较早公演的当地创作的歌剧是 1925 年由坤华女校演出的《虚荣累》，该剧描写意大利一个华侨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此后，养心校友会演出了歌舞剧《生命之力》，爱同校友会演出了歌剧《开路先锋》等。

中国歌舞剧的南来对于南洋歌舞剧的兴起与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28 年上海明月歌舞团到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演出，带来了《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和《小小画家》等歌舞剧目，以及《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和《可怜的秋香》等节目，受到华侨社会，特别是华侨学校师生的欢迎。到东南亚演出的中国歌舞剧团还有：上海梅花歌舞剧团(1932 年)、上海明星歌舞团(1935 年)、万花歌舞团、中华歌舞剧团、银月歌舞剧团、蔷薇

歌舞团、月明歌舞剧团、娟娟歌舞剧团和中国旅行歌剧团等。然而，由于歌舞剧团以商业化思想为主导，缺乏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主题未能切近现实与时代，因而华文歌舞剧艺术仍处于低层次阶段。

二战后初期，新加坡爱华社的新秧歌剧表演较为活跃，有《茶馆小调》、《血泪仇》、《小放牛》和《大补缸》等节目。这种新秧歌剧是由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传播到新、马的，它直接源于四十年代中国延安地区的一种群众性新型歌剧即新秧歌或四季秧歌。然而，新、马等地真正掀起歌舞剧的热潮还是1947年中国歌舞剧艺社南来之后的事。

中国歌舞剧艺社是一个擅长演出歌剧、舞剧、歌舞剧、舞蹈和话剧等的艺术团体。1947年该社在泰国曼谷演出了84场，观众达63000人次，其中根据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的《农村曲》而改名的《儿女英雄》舞剧最受欢迎，连演11场，场场爆满。该剧歌颂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农民抗日救亡的英勇斗争与不屈精神。他如表现新疆男女青年纯真爱情的《青春舞曲》，反映黑暗统治下渔民们悲惨生活的《渔光曲》，表现西南边疆地区青年男女爱情的歌舞剧《马车夫之恋》和揭露抓壮丁、反映人民反内战呼声的《五里亭》等也颇获赞誉。该社在曼谷开办歌咏班和舞蹈班，招收华校和华人社团的文艺爱好者进行培训，培训班结业后成立了“华夏合唱团”和“暹华舞蹈研究会”，后来又与当地的海燕剧社成立了“暹华歌舞剧联合委员会”，进行歌舞剧演出。

1947年8月，中国歌舞剧艺社到新、马演出，不仅带去了中国民间舞蹈和经过整理的民歌，而且还创作了许多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的作品，如《风雨牛车水》、《风雨三条石》等。

五十年代新加坡、马来亚的歌台演出多是综合性节目，有歌曲、相声、话剧、歌剧、舞剧和舞蹈等。新加坡的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慈

善歌剧大会串”，由当地艺人马骏、黄苑乔、郑秋子、舒云、冯仲汉、关新艺、白凤、司徒明等人联袂演出的三幕喜剧《空头支票》深受欢迎。永春歌舞剧团到新、马、印尼等地演出，1957年改名为康乐歌舞剧团，并在东南亚国家首次把美国的西部牛仔戏搬上歌剧舞台，后来还到泰国演出。朱俊歌剧团拥有关新艺、冯涛、孟浪等名演员，曾巡回到马来西亚古晋演出，后改名快乐歌剧团。

为了抵制泛滥成灾的色情文化，配合“反黄运动”，学校师生的戏剧活动较为积极，如有《打黄狼》等歌舞短剧。有歌台“七君子”之称的关新艺、王沙、郑秋子、野峰、蔡小龙、宁兴居和窦金怀等人发起组织了春晓剧社，树起反黄旗帜，演出健康剧目，旨在“建立健康文娱，维护正统剧艺”，1955年上演了小歌剧《茶馆小调》，歌剧《异乡寒夜曲》，歌曲《保卫黄河》和《插秧苗》等。

六十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歌舞剧发展道路不尽一致。在印尼排华恶浪来临之前，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文娱部动员了近千人排演大型印尼历史歌舞剧《奋勇前进，绝不能后退》，歌颂了各个历史时期印尼华侨华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事迹。1965年泰国曼谷潮州会馆举办了国乐游艺慈善晚会，上演黄梅调古装歌剧《七仙女》和歌剧《月下》，演出的成功被认为“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陷入冬眠状态的泰华戏剧运动复苏起来。”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歌舞剧演出主要有：(1)职业和业余剧团的演出。剧目有，在吉隆坡上演的舞剧《白蛇传》，吉隆坡戏剧研究会演出的歌剧《汉丽宝》，新加坡制片公司用潮州方言演出的歌舞剧《牛郎织女》，海鸥艺术剧场演出的大型神话舞剧《龙宫仙侣》，新加坡艺术剧场演出的诗歌朗诵舞剧《海的故事》，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和新市音乐会联合演出的歌舞剧《铸钟》等。在所演剧目中，反映当地社会生活的尤为受欢迎，如1965年星岛左翼团体联合举办新春文艺晚会演出的歌舞剧《歌唱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协会文娱工作团表演的歌舞

诗剧《美丽的家园》、歌剧《花为媒》，新加坡电视广播企业演出的歌舞剧《新加坡二十四小时》、三幕舞剧《新加坡史诗》，儿童剧社和青年剧社演出的舞剧《布朗寨的号角》，南方艺术团创作演出的小舞剧《建筑工人》、《胶林里的故事》和《巴刹小唱》等，反映了新加坡下层民众的生活和风土人情。马来西亚怡保清韵合唱团为拉曼学院筹款义演歌剧《淘锡姑娘》，反映了矿山淘锡姑娘的劳动和爱情生活。新加坡凤凰舞蹈团为庆祝该团成立六周年举行“‘群舞争辉’舞蹈晚会”，演出了反映当代新加坡社会生活新貌的舞剧《今日新加坡》。(2)游艺场中歌台职业艺人的演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东南亚华人的歌台演出盛行。如新加坡新世界游艺场的新生歌台、百乐汇歌台、桃花江歌台、夜花园歌台、百乐门歌台、玫瑰林歌台、梅花歌厅等；马来西亚峇株巴辖的梅花厅歌台、檳城的娱乐歌台、维娜歌台、香江歌台和麻坡白鸽歌台等，均由名艺人主持，颇负盛名。关新艺、野峰（即萧添才）、王沙、唐琥（即廖海平）等都是歌台艺人中较有成就者。新、马戏剧团体还赴东南亚其他国家演出，如1971年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歌剧团赴泰国曼谷的天外天戏院和卢沟桥戏院演出了两个星期；1973年新加坡的丽星歌剧团三度赴越南西贡和堤岸演出，还为越南华裔妇女相济联谊会筹款义演；1976年至1978年有10余个剧团赴印尼各地演出。

此外，学校的戏剧活动仍较活跃。如泰国曼谷玫瑰女子中学演出了歌舞剧《凤凰山夜会》，新加坡崇正校友会演出《胶林风云》，马来西亚培风校友会演出了三幕歌剧《小青》，怡保合唱团演出歌剧《月光曲》等。还有中国的东方歌舞团、广东艺术团等到东南亚演出。歌台演出自七十年代中以后趋于衰落。八十年代以后新加坡只有豪华和金国歌台仍在演出。歌舞剧向高档次发展，如新加坡的总统大厦楼上的新大歌厅、珍珠坊楼上的珍珠歌剧院，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新大歌厅、海燕歌剧院、天虹歌剧院等。

四、华文传统戏曲

中国传统戏曲有 360 余种,但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流传较广的主要是来自闽、粤等华南地区的传统戏曲。至迟在十七世纪末,闽、粤两地的地方戏曲和木偶戏就已传入泰国。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郑信祖籍广东潮州,在位时潮剧戏班相继前往演出。1834—1844 年间,福建省的高甲戏金福兴班先后到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尼等地演出;1840—1843 年间又有华侨洪皂、洪天赐、洪慈苗率领的高甲戏三合兴班到马来亚各埠演出。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近代中国海外移民高潮的到来,华侨人数猛增,华文传统戏曲渐渐多了起来,并成为华侨寄托乡思、联络乡谊、消遣闲暇的重要方式。太平天国时,广东粤剧艺人李文茂率领弟子起义失败,被迫逃亡越南、泰国和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并于 1857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戏班行会组织“梨园堂”,杨穆为首任总理。1890 年该堂向政府登记注册,改名八和会馆,类似于广州的粤剧八和会馆。这是新加坡历史上形成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粤剧组织。泰国曼谷则成了潮剧戏班的演出中心。海南岛的琼剧琼顺班也到新加坡和泰国等地演出,如男旦庆寿兰还在新加坡组织星洲剧社,琼剧艺人郭庆生成立南洋琼崖伶人联谊社,以弘扬琼剧艺术。1887 年清朝官员李钟珏到新加坡,在所著《新加坡风土纪》中谈到当时这里“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有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潮剧、闽剧等,唯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在新加坡,粤剧、粤曲清唱、英歌戏、潮剧、闽剧、闽南的“南管”清唱等均较流行。英歌戏来自广东的海丰和陆丰等县,内容多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1900 年新加坡建有华影街的庆维新戏院和庆新平戏院,马真街的怡园戏院和牛车水戏院街的梨春园戏院。上海

的京剧也于此时传入新加坡。他如菲律宾等地同样有粤剧和闽剧的演出,如粤剧“全女班”(演员均为女性)颇负盛名。

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东南亚的华文戏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华文戏曲在自身改革的同时,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了更多的联系。1908年广东振天声班赴南洋各埠演出,有《熊飞起义》、《剃头痛》等新剧目。1919年,革命党人黄大汉在马来亚檳城组织了“南洋华侨真相剧社”。粤剧艺人还编演了反对封建礼教、针砭社会时弊的文明戏,如马师曾在新加坡参加了普长春戏班,演出《洗冤录》、《炸弹迫婚,陈皮下气》、《金钱孽果》和《孤寒种娶观音》等剧目。琼剧艺人郑长和等在新加坡上演《灭种婚姻》、《大义灭亲》等新戏。潮剧除了上演宣扬忠孝节义、表现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还上演一些与时代潮流相合拍的剧目。

中国的一些地方戏班也到东南亚作商业性演出,并创作了适合当地观众口味的剧目。如潮剧戏班在泰国甚为活跃,他们根据泰国华侨社会的新闻或地方风情编成潮剧上演,有《翁万达》、《萧瑞蒙》、《剪月容》、《群芳楼》、《双拖车》和《杏仁茶》等时事剧。广东西秦戏剧顺泰源班、双福和班、赛丰年班、庆春台班到新加坡和印尼爪哇等地演出。粤剧戏班最多,在新、马地区就有20余个,在新加坡的粤剧戏班有普长春、庆维新、新佳祥等,马来亚的吉隆坡、芙蓉、金宝、太平、马六甲等地均有粤剧戏班,此类戏班大者有百余人,小者有30至60人。这些戏班还常从中国聘请名角前往演出。在马来亚还有华侨业余粤剧戏班,如檳城华侨郑太平等组织的广福居俱乐部中的“剧团乐公社”,雪兰莪华商“人镜慈善白话剧社”设有中乐部(后改为粤剧科)。在越南西贡、堤岸、海防等城市有专演粤剧的戏院,如同庆、大同、竞南等。汉剧戏班也接踵前往新加坡、印尼演出,1921年广东汉剧新天彩戏班小生赖宣的《闵子骞》、《云台山》、《斩王莽》、《辕门射戟》和花旦丘赛花的《贵妃醉酒》、《薛蛟吞珠》、《庄子扇坟》等戏在新加坡、印尼华

侨中广为流传。琼剧名艺人郑长和、陈成桂等组成有 140 余名演职员的大型戏班“十四公司”前往泰国演出,主要剧目有:《广东开科》、《林攀桂上金銮》、《嵇文龙》、《三姑爷》、《麻疯仔中状元》、《百鸟盖尸》等。福建高甲戏班福兴荣班、福和兴班、金和兴班先后到东南亚演出,福兴荣班的主要剧目有:《困河东》、《斩黄袍》、《龙虎斗》、《过五关》、《鸿门宴》等,福和兴班和金和兴班的主要剧目有:《白蛇传》、《水淹金山》、《伐子都》、《孟姜女》、《杀郑恩》等。还有陈坪率领福庆兴班赴新加坡、印尼演出,主要剧目有《荔枝记》、《打铁记》、《铁弓缘》、《玉环记》、《李翠莲》等。1927 年,闽剧新赛乐班一行 30 余人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吉隆坡、槟榔屿,印尼的泗水、三宝壟等地演出,历时三年之久。这些中国地方戏班的演出,受到了各地华侨的欢迎。

1921 年至 1937 年间,东南亚的华文传统戏曲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主要表现为:

(1) 华文戏曲的演出场所多、实力厚。东南亚的多数国家都有由华侨经营的专供演出华文戏曲或兼演华文戏曲的戏院、游艺场,如新加坡有普长春、梨园春、新佳祥 3 个戏院和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 3 个游艺场,其中新世界、大世界游艺场由邵立人、邵邨人、邵逸夫的邵氏兄弟娱乐公司经营,在这种游艺场里可演出粤剧、闽剧、潮剧、琼剧、京戏等华文戏曲,或歌舞剧、杂技、话剧、电影等,还设有歌台、舞厅、溜冰场以及酒楼、菜馆和商店等,后来该公司还在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太平、怡保等地开设中华游艺场、安乐世界游艺场、新世界游艺场、大世界游艺场、极乐园游艺场、加冕游艺场和银禧游艺场等。邵氏公司属下有 20 多个华文戏曲戏班和电影机构。马来亚槟城有粤剧等华文戏院,如万景戏院、新戏院、万安台戏院等。越南有演出粤剧的戏院如竞南戏院、中央戏院、同乐戏院和大同戏院等。泰国曼谷有多家潮剧戏院,有五个潮剧大戏班常驻演出。菲律宾马尼拉有新升堂大戏院、福升大舞台、福华大舞台、阿实乾拉架戏院等。其他如缅甸仰

光、印尼的泗水和雅加达、柬埔寨的金边等地都有此类华文戏曲的室内剧院和露天舞台，不断有中国侨乡的地方剧种前往演出。

(2) 各华文剧种在东南亚舞台频频亮相，形成一股华文戏曲冲击波。在二三十年代，粤剧到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尼、印度、菲律宾等国演出；潮剧到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亚演出；琼剧到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演出；广东和闽西的汉剧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演出；福建的南管戏和莆仙戏到新加坡、马来亚演出；广东的正字戏到泰国、越南、柬埔寨演出；福建的高甲戏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演出；闽剧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演出；梨园戏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演出；桂剧和采茶戏到越南演出；台湾歌仔戏到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演出；京剧到新加坡、马来亚演出。共有 11 个剧种到过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等 8 个国家演出。^①

以泰国为例，潮剧艺人多达数万人。在曼谷耀华力路，华文戏院即有十余家，老赛宝丰、中一枝香、老怡梨春、老梅正兴和老宝顺兴等五大名班常驻戏院演出。诸戏班各有绝活吸引观众，如中一枝香戏班服饰新颖，剧目有长连戏《七侠五义》等；赛宝丰戏班的唱曲和曲板优美动听，剧目有《赵少卿》和《双白燕》，所灌制的唱片《扫纱窗》、《秦雪梅吊孝》、《包公会李后》、《蓝翠英问土地》等为潮剧观众所珍爱；怡梨春戏班的鼓点威武、气派；梅正兴戏班的女角出类拔萃，乌衫美来、老生赛凤、小生柳莺、花旦金凤等技艺精湛，有《大难陈三》、《庄子破棺》、《刺阎惜姣》等剧目。此外，还有梅正天香、新万年、顺天乐、老保和等名气稍次的潮戏班数十个，以及近百个“走唱班”到泰国城镇乡村演出“站脚戏”和“神诞戏”。

他如 1925 年荣福班赴曼谷演出正字戏，主要剧目有《三战吕布》、《赵云救主》、《凤仪亭》、《辕门射戟》、《白门楼》、《翠屏山》、《武松

^① 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6 页。

杀嫂》等,该班艺人后多留居泰国。1923年高甲戏吕宋班赴菲律宾马尼拉演出《孟丽君》等100多出戏;大福兴班于1924至1927年赴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地18个城市演出《龙潭寺》、《田螺记》等剧;1924—1925年间梨园戏双凤珠班赴印尼、菲律宾演出《陈三五娘》、《雪梅教子》等剧目;1928年闽剧新富乐班赴东南亚演出,先后在新、马、印尼的11个城市演出了3年,共930余场,有《王子哭墓》、《燕兰梦》、《灵芝草》和《陈杏元和番》等20余个剧目。在新加坡赵黄永春经营的京剧戏班闻名遐迩,她多次组织京剧团到新、马、缅甸等地演出,她的京剧清唱班忠顺社(后改组为同乐大京班)拥有聘自北京、上海的名角,实力雄厚。中国的名艺人如粤剧演员马师曾、薛觉先、白玉堂、靓元亨、新珠、靓少佳,高甲戏演员董义芳,琼剧演员郑长和、陈成桂、王玉刚、李积锦,潮剧演员林如烈、黄锦英、方尼姑,闽西汉剧演员林南辉、蔡迈三,广东汉剧演员赖宣、丘赛花,莆仙戏演员黄文狄等在东南亚的一系列戏剧活动,推动了东南亚华文戏曲的发展。

(3) 华文戏曲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1925年陈景川、陈铁汉等在泰国组织的青年觉悟社参照电影艺术特点改编出新潮剧《大义灭亲》、《好妹妹》等剧目,还将传统剧目如《蝴蝶杯》、《五子泪》改成时装潮剧,甚至将外国题材的戏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为时装剧。1927年琼剧二南剧团在新加坡和泰国演出了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运动》、《社会第一钟声》以及《省港大罢工》、《秋瑾殉国》等剧目,触及当地社会生活及时代脉搏,拥有较多的观众。在舞台表演上借鉴了电影和话剧的艺术手法,新颖活泼,唱腔优美轻快,有的还采用了西洋音乐作伴奏。舞台美术趋于现代、写实,使情景逼真,生活气息浓郁。

为了促进华文传统戏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各种戏曲组织竞相成立,有行会性机构如马来亚梨园公会、新马八和会馆、琼崖优伶公会等,有戏班性团体如泰国的青年觉悟社、马来亚雪兰莪人镜慈善白

话剧社和新加坡客属总会的戏剧团体等。新加坡的广东汉剧(外江戏)和潮剧的业余戏班组织有:1921年祖籍广东潮州的陈子栗等十余人组织余娱儒乐社,旨在提倡汉剧,研究音乐,发展文娱,联络感情;1929年成立六一儒乐社;1932年成立陶融儒乐社;1935年成立星华儒乐社,等等。马来亚有麻埠业余汉剧社,吉隆坡潮属京果商公会儒乐部,怡保霹雳国乐社等。这些团体录制戏曲唱片、出版特刊,还延请职业演员任教以培训业余演员,进行演出,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或中国的社会福利和赈济灾民等。

二战后,华文传统戏曲的发展步履艰难。四十年代末潮剧在泰国走向衰落,新、马的粤剧戏院观众寥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剧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陈旧而缺乏新意,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观众的需要;经济危机也使人们缺乏财力和心境去支持华文戏曲。面对现实,新、马、泰等国的华文戏曲界着力于改良革新,包括缩编戏班,增强剧目的社会意义,净化舞台表演等。拥有3000多会员的泰国潮剧艺员协会组织会员进行改革。至1956年,新加坡共有3个粤剧团:飞鹰粤剧团,班主陆飞鸿;国风粤剧团,班主邵伯君;大鸿运粤剧团,班主冯痴哇。在马来亚有燕新、振寰、秀英、辉宙、月团圆、大光明和新同庆等7个粤剧团。新、马的琼剧艺人重组星洲友联剧社、霹雳琼声社和巴生乐群剧社等。关新艺和王沙组织了潮语实验剧团,专演时装新剧,旋又成立厦语实验剧团。1957年新加坡的新麒麟闽剧团赴菲律宾演出,剧目有《梁红玉鸣鼓战金兵》、《万成嫂万里寻夫》和《风雨牛车水》等。

六十年代以后,电影、电视的发展对华文戏曲形成了冲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少数戏剧团体只是到了节日、喜庆或神诞时才演出,如新加坡的余娱儒乐剧社、六一儒乐剧社以及新、马的粤剧团等。但实际上,来自中国香港的粤剧团和中国大陆的粤剧团、潮剧团在这时的东南亚舞台上演出仍十分频繁。如1950年香港粤剧团丑生李超

凡赴越南演出,至1963年才离越返港;1963年广东粤剧学校湛江分校帮助越南广宁省成立了广宁省青少年粤剧团,并排演了《柜中缘》、《茶瓶计》、《断桥会》、《审椅子》等剧目。许多戏曲界人士知难而进,探索着地方戏曲的改革之路。如福禄寿闽剧团于1975年推出了“改良型闽剧”,包括演员从数十人减至七人,演出时间从每场戏三四个小时减为每次半小时,演出地点从戏院的舞台迁至酒店的小剧台,演出前先用英语介绍剧情梗概。新加坡冈州会馆的粤剧团、敦煌剧团等也在进行粤剧创新的尝试。1969年新加坡“牛车水人民艺术舞台”易名为“牛车水人民剧场”,成为推动华文戏剧发展的重要据点;1972年在该剧场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地方戏剧观摩大会”,有粤剧、潮剧、闽剧、京剧、汉剧、琼剧等剧种参加了演出。至八十年代,华文戏曲剧团仍在艰难中求得发展。

在新加坡,潮剧团有老赛桃源、新荣和、老三正顺、新天一彩、老一枝香、老玉楼春、织云剧团、桃红剧团、新艺剧团、新潮艺剧团和中一枝香剧团等。闽剧团有新赛凤、筱凤、南艺、新麒麟、新庆和、新美凤、双飞燕、快乐、莺燕、华代、新燕玲等。粤剧团有凤来仪、金龙、艳阳天、光辉等。京剧团有平社京剧团。还有许多业余戏曲剧社组织,多附设在同乡会组织内并为该同乡会服务,如新加坡的冈州会馆、南顺会馆、东安会馆、番禺会馆、海天游艺会、昙花镜影、慈善剧社、西樵同乡互助会、钟声音乐研究社、幽谷音乐社、国声音乐剧社、星华音乐剧社、碧山亭公所、牛车水粤曲歌剧团等都设有粤剧俱乐部。琼剧业余剧社有二南琼剧社、琼联友剧社、新联声剧社、艺光琼剧社、琼光琼剧社、联花琼剧社、明天琼剧社、琼州青年会戏剧组等。广东汉剧和潮剧业余剧社有余儒乐社、六一儒乐社、星华儒乐社、陶融儒乐社、南华儒剧社等。这些剧社的演出多是为社会福利、公共事业效劳的,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如成立于1963年的南华儒剧社为筹募各种社会福利基金,在国家剧场、维多利亚纪念会堂、百老汇戏台多次举行义演,

主要潮剧剧目有《三哭殿》、《包公三勘蝴蝶梦》、《南山会》、《串戏定亲》、《潇湘秋雨》、《百花赠剑》、《苏六娘》、《陈三五娘》、《辞郎洲》、《白兔记》、《义民册》、《梅亭雪》、《龙井渡头》、《刘智远斩子》、《王老虎抢亲》、《一门三进士》、《玉鸳鸯》等,均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马来西亚华人会馆属下的粤剧团数目也不少,如八和会馆属下的职业粤剧团就有艳阳天、新丽声、嘉乐、大罗天等近20个。1982年泰国的职业潮剧团有14个:泰中潮剧团、老万年春班、老赛宝丰班、赛宝丰潮剧团、赛荣丰潮剧团、正顺香班、新玉楼春班、老玉楼春班、青囊玉楼春班、老赛桃源班、新怡梨香兴班、老怡梨香兴班、怡梨兴潮剧团、中怡梨香班等。还有季节性演出的半职业潮剧团约18个。这些潮剧团多是受神庙、善堂、佛教社、华侨华人社团等之邀,在中国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等)、神诞(关羽生辰等)、婚嫁、忌辰、乔迁、社团活动等之时进行演出。在印尼,洪顺文、碧风社以及蕉岭同乡会、大埔同乡会、松口同乡会的业余汉剧汉乐组织较为活跃,八十年代还成立了新棠音乐会。

正当东南亚华人本土戏剧活动呈萎靡之际,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戏剧组织频频登陆南洋诸国,这对东南亚华文戏曲从困境中奋起与振兴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如广东的广东粤剧团、广州粤剧团、佛山粤剧团、深圳粤剧团、广东汉剧院到新加坡演出;广东潮剧院、广东琼剧院到新加坡和泰国演出;福建的漳州芗剧团和厦门歌仔戏剧团、泉州梨园剧团到菲律宾演出;广西的彩绸剧团到新加坡演出,等等。高水平的表演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并使当地的华文戏曲团体深受启迪和促进,人们看到华文戏曲在东南亚仍有存在与发展的深厚土壤。一方面华文戏曲本身走向现代化和本土化,即华文戏曲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发挥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吸收现代艺术和科技成就,并逐步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感、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相结合;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华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政府、社团和观众

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华文戏曲的发展就会有一个好的前景。现代泰语潮剧、英语粤剧等戏曲形式的兴起,也为华文戏曲的延续和华人戏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形式。

五、木偶戏、影戏和祭祀戏剧

木偶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形式。1685年,暹罗国王设宴招待法国国王使节时演出了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地方戏和木偶戏,木偶戏成为中国较早随着海外移民的发展而流传于国外,为华侨华人所拥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十九世纪,福建泉州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家蔡庆元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地演出,载誉而归。二十世纪初,广东湛江的名艺人郑万楷率领木偶戏班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演出。万楷之子友华有“木偶戏状元”之誉,在南洋演出达18年之久。四十年代,福建晋江李荣宗率金永成班在菲律宾演出布袋木偶戏,备受欢迎。然而,中国木偶戏真正给东南亚华人带来艺术震撼还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事。1983年,福建泉州木偶剧团到菲律宾演出,计73场次,观众8万余人,剧目有神话剧《火焰山》、《水漫金山》,儿童剧《庆丰收》,童话剧《千桃岩》,古典戏曲传统剧目《智取大名府》、《观音接五百罗汉》、《包公铡驸马》、《宝莲灯》和《郭子仪祝寿》等。他们还在菲律宾文化中心开办了“泉州木偶表演艺术培训班”。这些对于菲律宾华文业余木偶戏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影戏同样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一。潮语皮(纸)影戏较早就传入泰国、柬埔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潮州影戏有活灯(走马灯)、白竹纸影、阳窗纸影等三种。所谓活灯,即以竹为圆框,糊以纸皮,构成中空有顶的圆柱,内装一纸轮,粘纸剪的人马在轮的周围,点烛起焰后,煽轮自转,纸剪之人马便旋转如飞。白竹纸影即由艺人在室内持

人形皮影,灯光照影投于白纸幕上。1926年广东潮州纸影班到泰国演出,后来又有张氏兄弟率领新天彩影戏班到泰国演出。

木偶戏、影戏通常是在民间红白喜事、乡社迎神赛会时受邀进行演出。祭祀戏剧也是民间最常见的一种俗文化。如在新加坡,隶属于南洋莆(田)仙同乡会的莆仙业余剧团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九日都要在兴安天后宫演出提线傀儡“目连戏”。这种目连戏不同于木偶戏,而是由人扮演的“大戏”,也是由“鬼神”演出、针对鬼神的“鬼戏”。建醮莆仙大戏分为:日场目连戏,每天演15—20场,三天演出近100场;夜场彩戏。在建醮活动结束后,又于九鲤洞搭起第二座戏台,向九鲤洞诸神献演三天酬恩戏,男女演员均可。祭祀戏剧的目的是强调以宗族为中心的忠孝节义观念。据《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馆八十周年纪念特刊》(1953年)和《八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58年)、《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73年)的记载,每年古城会馆要进行两次戏剧演出活动,一次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创立纪念日,另一次是六月廿四日关帝诞辰日,如古城会馆创立77周年纪念时演出的戏剧有《华容道》、《桂阳城》等,创立80周年纪念时演出的剧目有《碧天庆寿》、《过江招亲》、《单刀赴会》和《祭水班师》等。

第五章 唐人街街区文化

第一节 概述

一、唐人街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华人被称为“唐人”的习惯，由来已久，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中古时代的阿拉伯人，将中国称为“Tamghai”，即为“唐家”的译音。北宋末期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一云：“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明史》卷三二四“真腊国”条说：“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可见约自唐宋以后，中国人已被称为“唐人”了。其原因在于：第一，唐代时国势强盛，威震中亚、西亚及南海诸国；第二，唐代时中外之间的通商及交往空前频繁；第三，唐宋以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从此以后，“唐人”一词成为对华人的通称，宋时仍沿袭之，且在公文中正式应用，到明代时依然如此。后世即将海外华侨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中国移民为生活所迫，辞妻别子，经受千辛万苦来到异邦后，由于人地两生，找不到栖身之所，又不谙当地语言，难免处处受人歧视

欺侮。出于防御和保护自己的本能以及联络乡亲感情和沟通家乡信息的需要,他们从一开始便集结一处,相聚而居,休戚与共。在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日久便形成了最初的居民点——唐人街。唐人街又称中华街、中国城、华人区或华埠。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观察,凡是一个民族的形成必须具备下面四个要素:(1)共同的历史渊源;(2)共同的语言;(3)共同的文化;(4)共同的民族意识。这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唐人街的形成以及能够长期存在,也是这四要素在起作用之故。无论从心理、社会或经济上的需要出发,唐人街以合作、互助和自卫为主,其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出于生活上和管理上的需要,还出现了氏族公所、同乡会馆、秘密会社、祠堂寺庙、私塾和侨校等,唐人街就成为一个集生产(商业活动)、生活和社交为一体的重要活动中心。华侨一开始就避居一隅,自成一个特殊集团,在外部种族歧视的压力之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便模仿国内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成立许多社团组织,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

唐人街形成至今的历史,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粗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唐人街的形成——发展——动荡时期。唐人街居民以较早的商业移民和稍后的劳工移民为主。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得知,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唐人街是在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十五世纪时爪哇岛北岸的一些市镇也有广东、福建人聚居的记载。十六世纪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十七世纪末越南会安和日本长崎等地的唐人街也是早期唐人街。由于在地理上相距较近,交通工具不发达,前期唐人街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如印尼、越南、柬埔寨、马来亚、泰国、日本等。唐人街的形成是和平经商的产物,其成员以商人为主,经商流动性很大,聚散频繁,唐人街并非是华商永久的聚居地。西方列强的侵入,使许多东方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华侨的命运更加悲惨,唐人街亦处于动荡之中。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华工出国地域的广泛,唐人街亦随之遍布全世界。这时唐人街居民的

组成除了少数商人外,更多的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亦有少量知识分子。无论是去种植园、开矿、修铁路还是“淘金”,都以谋生为第一需要。后来便以“三把刀”打天下,开辟出事业的新天地。后期是唐人街蜕变、整合和新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华人移民方式、人口结构、知识水平、国籍观念、职业分布等发生巨大变化,唐人街亦经历了巨大变革,突出的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例如街区人口普遍土生化,知识水准提高,在职业结构上一改以前中介商的角色,而趋于多元化、高层次。

唐人街的形成过程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作为华侨聚居和联络而存在的唐人街是自然形成的,而且规模大小不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天性常常驱使那些处在陌生环境里的人,去竭力寻找和自己语言相同,观点、习惯、信仰和生活习俗相近的人交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唐人街与其说是居民点,倒不如说是生活方式比较确切。因此唐人街不是一城一地的独有现象,而是海外华人聚居的一个普遍特征。今日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之所以称为“唐人街”,又在于它具有城市街区的特点,而不只是一种聚居。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大的可占好几条街道,包括许多横街小巷;小的只有一条街或一条街的其中某一段,只有几家餐馆和杂货店等。

其二,华侨来到外国谋生,赤手空拳,通常只能就近择地而居,渐成街市。所以唐人街形成过程的另一个特点为多半靠近车站、码头、港口或离城市中心较近的旧商业区。例如美国的沙加缅度(Sacramento)、洛杉矶、波特兰、圣路易、匹兹堡、波士顿的华埠皆靠近车站,而旧金山和纽约华埠则靠近码头。欧洲各国的唐人街也大抵如此。为了生存下去和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华侨便在唐人街开设餐馆、洗衣铺、小客栈和杂货铺等。无论是设摊或开店,都讲究理想的街市地段,上述位于车站、码头、港口一隅的唐人街,其

地理位置对于经商均是非常有利的。

其三,唐人街与其他族裔居民点不同。聚族而居的并非只有华人移民,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有这种习惯。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里,除了华侨的聚居区唐人街外,还有诸如小意大利、小东京、犹太居民区、希腊城、墨西哥区、韩国区等,他们也在那里建立起易被人辨认的、保持自己文化和种族特色的民族聚居区,统称为城市中心的民族“岛屿”。但是,华侨聚居区的发展趋势不同于意大利人、犹太人或波兰人的移民聚居区,后者在各个人群与美国社会融为一体后就消失了。如从意大利到美国的移民,最先住在“小意大利”,但在学会了英文和找到职业后就搬出去了,成为美国社会公众中的一部分。相反,唐人街却成了一块“少数民族的飞地”^①,不但不分散,反而滚雪球般继续集中,作为一个聚居点而长期存在下去。

二、唐人街的结构与功能

唐人街的形成和存在,也是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的产物。中国人到国外谋生,在别人的土地上与人争饭吃,权利和自由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在陌生而不友好的环境里,华侨聚居的唐人街有两种功能:一是自我保护,寻求安全感,共同来应付外面的大社会;二是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面对种族主义势力的污辱、攻击,唐人街是华侨在危难时刻唯一能够找到援助的地方。华侨常常以唐人街为据点,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例如,1852年在印尼三宝垄市爆发了由蒂博尼哥罗领导的抗荷起义,由于不明真相,加上各种谣言,使三宝垄唐人街的华侨处于极度的惊慌不安之中。于是,在

^① 邝治中:《新唐人街》,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后,集资在华侨社区的四个进出路口修建四个异常坚固的大门,每晚必关上大门,并由华侨轮流巡逻,直至早上6点才打开大门。

在排华法案阴影下的加拿大和美国华侨,处境窘迫。如在加拿大,“白人拉我们的辫子戏弄我们,他们向我们扔石头。那个时候(1907年)日子可真是难过,我们吓得要死,不敢出门”。在美国的旧金山,“中年的华人仍然记得,那时因为怕受侮辱而不敢逾越唐人街范围的情形”。由此可见,当时与外界隔离的唐人街,“它是一个堡垒、避难所和贫民区的混合体”,自我保护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华人新移民来到国外后,置身于一个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也开始了如何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为了生存和尽快站稳脚跟,他们选择了唐人街,与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支配下,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和同一文化氛围中,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尽管唐人街环境挤迫,住房狭小,设备简陋,但房租便宜,探听寻找工作的消息也较方便,遇到困难时语言相通,可以及时得到帮助。新移民在落脚唐人街后,唐人街就帮助这些“新客”适应环境,最终过渡到居留国的主体社会中去。

唐人街在华人移民的生活中,不仅可供休息、娱乐,是个与国内维持联系的纽带,而且也代替了家庭、宗族和村里的寺庙,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样样都管,确实能给人以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的慰藉。饮食习惯也是民族传统习惯的组成部分,故海外华人保持饮食习惯无异于与中华文化保持了联系。唐人街上林林总总的餐馆迎合了华人的口味,而唐人街上商业之所以兴旺发达,也是因为能够使移民过较为舒服的生活。对于那些行装甫下的新移民来说,来到唐人街以后的感受更加不同。他们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寂寞孤苦,只要到唐人街上走

走,多看几眼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听几句乡音,闻一下唐人街上的“中华气味”,便能排解些许寂寞和乡愁,减轻因文化背景差异太大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有位新移民曾经回忆说:“记得初到巴黎,听不懂一句法语,认不得一个单词,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有一天终于找到十三区‘中国城’,两个月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同胞,那一份亲切与激动,简直无法形容。从此,每当思念亲人,乡情难禁时,就乘一小时地铁到‘中国城’去,走进中国商场,在一排排货架前,细细端详那些熟悉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商标,泪水禁不住扑簌簌落向衣襟。我几乎不加选择,倾囊中所有,买回一大堆中国东西。”^①

新移民经过相当时间的拼搏后,有些人的境况开始好转,少数人开始“出头”,于是就把自己原先收入微薄的工作和低劣的住房转让给初来乍到者,自己则到郊外去寻求生活质量更高、环境设施更幽雅的居所。例如在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华人中的中产阶级开始迁出唐人街。许多人尽管离开了唐人街,子女也不再在唐人街受教育,但他们的事业、办事处、公司和写字楼还在唐人街,唐人街仍然是他们经济、生活和社交的活动中心,在感情上难以割断。许多第二、第三代华人承认,如果在靠近唐人街处有更好的住房和学校,他们仍然想搬回去住。不去唐人街常常觉得若有所失,因此每隔十天半月,往往就开车去一趟唐人街,喝喝茶,吃顿中国餐,采购一批中国食物,看一场中国电影。每逢过节时,华人也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唐人街看舞狮舞龙,听听熟悉的鞭炮声,会一会同乡亲友,有时也许还带上几个白人朋友一起来“寻找旧唐人街的气氛”^②。每当离开唐人街时,仿佛是经受了一次洗礼,觉得通体舒畅。总之,在异邦挣扎谋生而不得不分得很散的中国移民,基于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始终把唐人街当成是精神

① 晓笠:《巴黎不是梦——中国人在巴黎》,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79页。

②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Chinese Migrants in Hawaii*, p. 143.

和物质的营养站。^①

唐人街是早期华人移民的历史产物,其形成、存在和发展与移民一样也是不断在变化着的。随着各国移民政策宽严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起落、市政建设的发展,华人社区的分化组合和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资料,1940年时美国28个城市中有类似唐人街的社区存在,但到1955年时只有16个,而到1980年时只有10个。然而,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不时涌现出新的华埠。例如在美国洛杉矶郊区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华人城”蒙特利尔公园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也正在耗巨资修建“中国城”;随着新移民的增加,纽约已扩展出三座“中国城”。又如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由于大量印支难民的拥入而在郊区卡拉玛打市形成了第二华埠,首都堪培拉也在加紧建造唐人街。一方面,历史悠久的老华埠日长夜大,突破原有地域范围拓展成第二、第三华埠;另一方面,原先华人寥寥无几的地方,骤然间也会冒出新的唐人街。例如位于多瑙河之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的科班亚区,出现了东欧第一个“小唐人街”。

总之,在一定的时期内,受各国移民政策的制约,唐人街可能会消亡、衰落一部分,也会新产生、扩展一部分。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是唐人街发展的动力,只要得到华人居留国主流社会的宽容和支持,唐人街在几代人之间就不可能消失。

如今,世界各国唐人街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是日益“旅游化”。许多国家的政府视唐人街为重要的旅游资源,相继进行开发,对唐人街的环境设施不惜巨额投资进行改造、更新和美化,使之成为闻名的旅游区,以吸引更多游客。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英国的伦敦,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日本的横滨、长崎、神户的唐人街等,经过精心改造

^① [加]《大汉公报》1989年5月26日。

美化后,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文化色彩更加浓烈,对游客更有吸引力。近几年来,随着新移民所带去的大量“人才”和“钱财”,为唐人街的发展和更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推动了西欧、北美华人社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正在迅猛发展之中。

如果说唐人街一直是华人集居住、商业、社交、文化娱乐活动为一体的社区中心的话,那末,唐人街发展中的另一种趋势是唐人街的地理位置和功能作用将发生改变,即由原来的社区中心逐渐演变为地价昂贵的商业区和兴旺发达的旅游区。随着种族隔离压力的减轻和社会所有行业(包括房地产)向华人开放,随着华人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公民权的解决,受老唐人街环境嘈杂挤迫、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地价和房价居高不下困扰的华人,开始迁出唐人街,选择在交通方便、空气清新、环境幽雅的郊区安家。他们的知识水平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属中产阶级的比较多,学有专长,没有语言障碍。美国、加拿大近年拓展出来的一些新华埠,都是多族裔混居的国际区,属华人拥有的商行企业只有20%左右,而且他们另有住宅,很少有人居住在华埠。原有的一些华人社团也很难代表人口更加异质化的全体华人的利益,那种具有广泛社区基础的新型华人社团正在形成。华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华人迁出唐人街成为可能,由此,使当今的一些唐人街成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推销少数民族产品和服务性的商业区”,“而不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①。

世界各国唐人街的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下面主要介绍30个唐人街的情形。

^① 李胜生:《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8、140页。

第二节 亚洲的唐人街

一、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越南全国华人最集中之地。1975年4月越南南北方统一后,将西贡、堤岸和嘉定合并为胡志明市。今日的胡志明市共划分为11个郡,其中五、六、八、十、十一这几个郡是堤岸区的组成部分,而第五、六这两个郡为华人聚居区,即堤岸唐人街。堤岸唐人街历史悠久。早在1679年时,明朝将领杨彦迪、副将黄进等拒绝向清兵投降,于是率众前往越南。稍后广东雷州人莫玖亦率领一批华人移居越南,并在那里开垦荒地,建立村社,在城市建设、水陆交通、工商贸易和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堤岸,古称柴棍,经过华侨不断开发建设,到十九世纪初时,已经成为一座充满中国风情的典型“华人城”了。法国人统治时期,虽然堤岸所有的街道名称均以法文为主,但街牌和路牌都有中文译名,所有工厂、学校、商店和社团的招牌,也大都用中文,如水兵街、广东街、梅山街、塔梅街、福建街、大市街等。堤岸唐人街还有佛寺、关帝庙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堂等十余座。寺庙和侨校多而紧密相挨,也是堤岸唐人街的特色之一。在横贯市区的梅山街上,还有广肇公所、潮州公所、客帮公所、五帮公所、广东会馆(今改名为穗城会馆)、遏云音乐研究社等许多华人社团。

越南南北统一后不久,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将华人的工商企业没收,许多华人先后失去工作,并被强制遣送到“新经济区”去开荒。华文报纸和学校相继关闭。币制改变时,人们的积蓄化为乌有,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偷渡到第三国去谋生。八十年代后,越南实行

经济改革,亦调整了对华人的政策,开始利用华人的技术,恢复原先关闭的企业。劫后余生的华人,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从头做起,开设店铺和加工厂等,胡志明市华人的经济活动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由于华人信心的恢复以及家庭纽带的作用,在越南的海外投资中,中国台湾已上升为第一位。“堤岸唐人街又已成为对外贸易的新焦点,其地位日益重要”。^①

梅山街、塔梅街等处已逐渐成为购物中心,潮州风味的饭店生意兴隆,广州面食店内张贴有“恭喜发财”、“招财进宝”等条幅。尽管堤岸百废待举,并期待着越南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但从行业、商店、广告、招牌、礼仪、居民语言的声调等方面来看,堤岸唐人街仍然充溢着中华文化气氛。

二、曼 谷

广东潮汕一带人民,早在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便从澄海县樟林港坐红头船赴泰国,拉玛五世国王(1853—1910年)实行改革后,华人移居泰国的人数增加。和东南亚诸国一样,曼谷唐人街历史悠久,其中闻名遐迩的三聘街从早先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逐渐建设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居民点,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曼谷唐人街由“三路一街”即耀华力路、石龙军路(西段)、嵩越路及三聘街组成,面积很大,约占曼谷市区的五分之一。

华人善于经商,曼谷唐人街是泰国进出口贸易的发源地。在狭窄而人口稠密的三聘街上,两边店铺林立,价廉物美的商品琳琅满目。店招和广告都是中文,潮州语在这里畅通无阻,华人的店铺、住宅厅堂里常设有神龛,春节时放鞭炮、贴春联,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

^① 美国《世界日报》1991年4月23日。

三聘街成为泰国华人社会的缩影。嵩越路是三聘街的扩大和延伸,如今那里是进出口物资商行的密集之地。石龙军路是一条有名的古道,且是曼谷市区最长的马路之一,但路面较窄,故交通阻塞状况较严重。介于石龙军路和三聘街之间的耀华力路,为拉玛五世国王所建。这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街上店铺除饭店食肆多外,金行、杂货店、中药店、书店、影剧院紧密相连,充满潮汕侨乡市镇的风情。

泰国是佛教国家,华人入乡随俗,大多笃信佛教,由此曼谷唐人街上寺庙多。据粗略估计,在唐人街区内有大小寺庙佛堂数十座,其中石龙军路上的龙莲禅院是曼谷唐人街最大的中国寺庙,终年香火鼎盛。泰国华人在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融合泰国生活方式的同时,仍希望保存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习俗。

泰国华人大部分是潮州人,故他们过春节时仍保存着浓厚的家乡习俗。例如,过年前家家忙着做年糕,除夕举行祭祖仪式,以前是早上祭神佛,中午祭亡故父母,下午祭亡故亲友,现在往往是在中午一起祭。春节期间熟人和亲朋见面,拱手合十,互祝“新年如意”、“新年发财”。亲友间还要互相拜年和请吃饭,拜年时都喜欢带鸡去,遇到孩子则要赠送红纸包好的压岁钱。最重要而有趣的习俗是亲友之间要互送四只橙色的潮州蜜柑,取大吉之意,并预祝来年四季平安,万事如意。有趣的是,曼谷唐人街除了有舞龙、舞狮的节目外,还举行“曼谷中国城小姐”选美会,由泰华各界联合会举办,给节日的唐人街增添不少欢乐气氛。

八十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发展很快,曼谷市政建设加快,市区不断扩大,新建筑物、新马路和新商业区不断涌现。历史悠久的曼谷唐人街日益老化和挤迫。为此,曼谷市政府决定在市区交通方便的地带兴建新的唐人街,将集旅游、商业、银行、教育设施等为一体。

三、马尼拉

华人移居菲律宾谋生的时间很早,据统计,十六世纪末时,马尼拉的华人总数已超过1万。1582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巴石河沼泽地一带围栏建起4个建筑群供华人居住,名为巴里昂(Parian)。华侨用智慧、辛勤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管理,创造出一个生气勃勃的巴里昂。先有巴里昂的存在,然后才有马尼拉的发展和繁荣,巴里昂是菲律宾华侨社会的发祥地、马尼拉唐人街的前身。今日马尼拉的华人区,位于巴石河北岸、市中心的岷仑洛区,由以王彬街、知彬街、后街仔、洲仔岸大街为主的许多街道、街巷组成。

王彬街为华人区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王彬为菲籍华人,因他在反对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中有功,受到菲、中两国人民的尊敬,此街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马尼拉唐人街的主要标志是耸立在王彬街的几座中国式大牌楼,如“中菲友谊门”、“亲善门”、“团结门”、“王彬南桥”、“王彬北桥”等。这几座牌楼均为红砖建筑、绿琉璃瓦和嵌青石字匾,给人一种宏伟壮观和古色古香之感。牌楼的拱门上均用菲、中、英三种文字书写。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和对唐人街进行美化,1975年2月在王彬街中央广场上树立起一座纪念碑,碑顶为王彬铜像。进入牌楼,两边店铺林立,满眼中文广告和店招,去商店购物,如能用闽南语交谈,便会感到特别亲切。王彬街原来是一条比较肮脏和零乱的街道,经装修美化后,面貌焕然一新,每当华灯初放,王彬街的饭店、茶楼、百货店、成衣店、照相馆、金店、糕饼店等一派兴旺景象。王彬街还有“新疆书店”、“龙记书报社”等10多家书店和报摊,随时都能买到各种中文报刊。

菲律宾华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靠近王彬街的自由大厦几乎成了菲华艺术活动的大本营,这里曾举办过旨在弘扬中

华文化的各种活动。菲律宾的武术在东南亚国家中闻名遐迩,大都由华人开馆任教。有家菲华光汉国术馆,历史悠久,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曾为该馆题词:“希望该团的菲华成员能够成为亲善大使,尽力加强和促进菲中两国人民的认识和友谊。”有些武术馆还从中国聘请教练执教,因而在历次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

除此以外,菲律宾有一支人数可观、相当活跃的华人文艺队伍,他们所开展的活动既丰富了华人的文娱生活,也推动了中菲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菲华众多的文娱团体中,菲律宾中华艺术舞蹈研究所(简称华艺)每年都要推出一台新节目,在菲律宾民间舞蹈节上所演出的节目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节目。菲律宾中国艺术中心致力于教授中国绘画,前来报名学画的学生先后达 1000 多人,且多次举办中国画画展,获得好评。

四、新加坡牛车水

华工是新加坡华人的先驱。1819年1月29日,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后,为了开发沼泽地和原始森林,便招募华工,到1840年时,新加坡总人口为3.5万人,华侨即有1.7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根据英国殖民当局所划定的民族聚居区,新加坡华人的最初聚居点在新加坡河南岸爱仁桥至河口一带,即今日的勿基和甘榜格南一带。1822—1823年间迁移到新加坡河的西南部,介于直落亚逸和珍珠山之间,即今日牛车水一带。

关于牛车水的来历,据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新加坡岛内的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牛车水地区的街道经常尘土飞扬,于是天天用牛车拉水来冲洗,时间一长,这一地点便被称作牛车水。新加坡的牛车水就是唐人街,唐人街就是牛车水,其名家喻户晓,并逐渐成为新加坡甚至南洋的代名词。

牛车水是个人口密集的华人社区,在那狭窄的街区和陋巷里,是一排排二到三层、砖木结构的老式骑楼,其建筑风格和中国广东侨乡镇的建筑十分相似。牛车水为市中心的闹市区和商业区,街道两旁布满了老式的店铺,如中药店、当铺、理发店、纸扎店、铺垫藤席店、小百货店等,其商品几乎全是中国货。有些街道还形成了某一商品的专门市场,如菜市、水果市、熟食中心和百货集市等。牛车水一带食肆林立,各种风味如广东、潮州、福州、闽南、客家、北方和印度、马来、印尼菜等都有,食品种类更是不计其数,有首民谣云:“潮州粿条福建面,广府叉烧海南鸡,北方水饺湖南辣,客家狗肉上海糕”,十分生动形象。只要到牛车水走一次,无论是吃、穿还是用的,都能买到。牛车水一直以那神秘古朴的传统风貌、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终年吸引着游客,成为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

每年春节,牛车水都有“迎春年市”的庆祝活动,使牛车水这个具有华人文化传统的古老街区,洋溢着无限春意和更具诱人的魅力。在由几百个摊档组成的年货展销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特别是在迎春花市上,摆满了水仙、银柳、茶花等鲜花和大量的中国盆景以及象征吉祥富贵的四季桔、红桔等,人们竞相购买,其盛况有点像广州的迎春花市。

在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日”活动中,25名骑士身着中国古代将士服装,骑上25匹骏马,在一名手持新加坡共和国国旗的将领率领下,从政府大厦走到充满新春欢乐气氛的新加坡河北岸,由此象征新加坡“马到成功”。一条250英尺长的巨龙在人群中翻滚,人们欢呼雀跃,使迎春活动达到高潮。一到年初十,牛车水大街小巷又成为灯笼、彩带的海洋,人们又在等待元宵节的来临。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剥蚀,牛车水一带的建筑物日显陈旧,而且早已被周围的银行、商业大厦包围,与整个城市的建筑群不大协调,改造和改建已势在必行。自1975年起,牛车水街区的一些旧楼被

拆除,代之以两座风姿绰约的牛车水大厦。1983年10月,牛车水大厦落成,所有摊档和小贩均搬入大厦,昔日杂乱喧闹的街景不见了,街道更宽阔、清洁和宁静。被保留的旧建筑整旧如新,并已成为展示新加坡早期城市风貌的旅游区,对世界各地的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五、加尔各答

聚居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华侨,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迁徙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缅甸来的,华侨人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曾达到4万人,唐人街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此后受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变化的影响,华侨人数开始减少,但近几年增长较快,目前约有1.5万人左右。印度华侨大多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职业以木工、修理汽车和从事皮革业为主。位于加城西北部郊区的塔坝镇,以华侨制革厂多而出名,人丁兴旺,逐渐也形成了一条唐人街,人称“中国镇”和“客家镇”。镇上设有制鞋厂200多家,其皮革制品产量占印度的五分之一。

镇上的中国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大街小巷交错,不时能见到中国式的小门楼,门上贴有“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等对联。镇上有华文报社、餐馆、百货店、杂货店等,还有两座中国寺庙,其中的“玄奘寺”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耗资上千万卢比。大多数华侨都能讲当地语言。办有侨校,于二十年代创办的培梅学校,八十年代时学生不多,也缺乏师资。

加城华侨仍然保存着中华文化和传统的客家生活习俗,例如每年春节时隆重庆祝,清明祭祖扫墓,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等代代相传。加城华侨还于1983年创建了“印华诗文研究社”。

加城华侨社会是一个被封闭的社区,被排斥在印度社会之外,大

部分人难以取得印度国籍,许多人陆续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①

六、日本的三大唐人街

(一) 横 滨

尽管早在1854年初就有华人去横滨的文字记载,但是到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在横滨设立领事馆后,聚居横滨的华侨才越来越多,在小田原町(今中华街大道)、丰后町、前桥町、加贺町、木村通等地居住,日久便形成了以小田原町为中心的中华街。1884年唐人街区首次出现在《横滨指南》里。1880年时横滨华侨计有2172人,甲午战争时华侨人数急剧减少,但在辛亥革命前夕又达4000人。二次大战后,横滨华侨人数增加,1984年时已达6737人。横滨中华街为日本最大的唐人街,横滨的华侨华人以经营商业为主,特别是饮食业非常发达,故中华街也就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

七十年代时,“中华街发展委员会”决定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对唐人街进行统一管理和美化,并重建牌楼。如今位于东、西、南、北门及善邻门(中央门)的五座雕花牌楼,雕龙画凤,色彩斑斓,牌楼上均书写着“中华街”匾额,十足的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进入牌楼,街道两边商店、饭店鳞次栉比,从中国产的茶叶、绸缎、家具、瓷器、名酒到松花蛋、腐乳、辣白菜等都能买到。在中华街上的400多家商店中,餐馆约占一半,这些餐馆的门面装璜和室内布置相当讲究,追求中国化,以黄瓦红檐、古董、宫灯、屏风、壁画等来装饰,或者以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作为点缀,竭力营造中国文化氛围,藉此吸引顾客。在

^① 如从印度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就有千余,还成立了多伦多印度华侨联谊会。香港《华人》月刊1993年9月号,第30页。

大街小巷中，到处散发着中华料理(中国菜)令人垂涎欲滴的独特香味。

横滨中华街上有一座关帝庙，始建于1874年，庙中所供奉的三国名将关云长，被视为中华街的保护神，并成为横滨华侨异国他乡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很多日本人也相信关帝的灵验，庙中香火鼎盛，每年除夕之夜竟有数万名男女前来膜拜^①。横滨华侨总会也设在中华街。每逢元旦和春节，中华街必举办庆祝活动。

经横滨中华街父老共同商定，自1986年起，在每年中国春节的前后举办“横滨华侨春节祭”活动，藉此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日交流，推动中华街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这一传统庆典在于使当地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共享中国春节的热闹与欢愉。例如，第二届横滨华侨春节祭活动于1987年2月1日举行，临时搭建的漂亮彩棚两边挂着红春联：“花开富贵，竹报平安”；“厚德载福，和气致祥”。舞台上“鲤鱼跳龙门”的冰灯闪闪发光。步入中华街善邻门，但见满街飘舞着民族风格的彩旗，锣鼓鞭炮齐鸣，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不同风味的中华料理店里挤满了食客，在卖汤圆和年糕的店铺前排起了长队。“春节祭”有奖抽签活动处也是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中午，在一阵锣鼓和鞭炮声中，一对斑斓的雄狮起舞，揭开了“春节祭”的序幕。在横滨市长向华侨们祝贺“恭喜发财”后，中国东方歌舞团小乐队和几位在日本进修的戏剧演员登台表演了中国民乐、中国民歌大合唱、剑舞和民族舞蹈。京剧演员邢曼玲拿手的《猪八戒背媳妇》赢得了不息的掌声。6位身穿中国式袍衫的华侨青年操起二胡、笛子，和东方歌舞团的乐队一起，演奏了《白毛女》中的“北风吹”。东京、神奈川的许多华侨也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凑热闹。

八十年代，横滨中华街几乎已成为世界上气派最大、最安全和游

^① 泰国《星暹日报》1989年3月14日。

客最多的唐人街。作为日本著名的旅游观光点,世界各国游客去中华街,一来是饱览横滨景色,二来是品尝可口美味的中国餐,每年前去中华街的游客多达1500—2000万人次,已超过了东京迪斯尼乐园的年游人流量。

(二) 长崎新地中华街

长崎由于离中国最近,故很早就有华人坐船去那里经商,这些商船被日本人称为“唐船”,与中国的贸易被称为“唐船贸易”。十七世纪末,日本在长崎市郊的十善寺乡建造“唐人屋敷”(或称唐人坊、唐人馆),分散在长崎的华人全部迁居于此,这就是在日本幕府监督下的华侨聚居地,也就是日本最早的华埠或唐人街。十八世纪末时,唐人坊被烧毁,如今“旧唐人屋敷门”已被当作历史文物保存。

今日长崎华人的聚居区中华街在新地町,离昔日的唐人坊不远,是战后填海造地建设起来的新中华街。长崎的华人大部分为福清县人,故说福州话。唐人街为十字形街道,1986年3月在四个街口建造了金碧辉煌的中华门牌楼,并根据中国神话故事用花岗石雕成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分别安装在四个门楼上。门楼上的巨幅匾额“长崎新地中华街”由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题写。

中华街既是具有浓厚中华气氛的商业街,又是长崎华侨的核心团体“长崎华侨总会”的所在地。长崎华人的职业,除了开设商行,从事贸易活动外,主要是开设餐馆。中华街上的中华料理,总数有五六百家,集中了中国南北的各大菜系。许多游客慕名而去中华街游览,品尝中国茶和饭菜,购买各种华夏土特产,为中华文化所陶醉而流连忘返。

长崎的大浦町因建有孔庙而出名。孔庙始建于1893年,后于1967年和1980年重建,作为展示中华文化的橱窗,孔庙也是长崎的重要景观之一。当1983年孔庙创建90周年纪念时,还在庙内新建了一座“中国历史博物馆”。1993年孔子诞辰2544年,长崎各界华侨

600 余人参加了孔庙建造 100 周年暨中国历史博物馆 10 周年盛大庆典。祭孔大典在孔庙内举行,由鼓初严、迎神、进饌、上香、恭读祝文、送神至礼成等 24 种仪式组成,气氛庄严肃穆。引人注目的是游行,游行队伍由 120 多名身穿中国古典服装的青年男女组成,他们以孔子塑像为先导,有的擎旗,有的捧香,也有的手持中国古代兵器,令人目不暇接。队伍在行进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途吸引了众多市民。旅日华侨东京、横滨、函馆、神户、长崎、福冈、鹿儿岛等华侨总会的会长或副会长参加了庆典活动,中国驻长崎总领事亦到会祝贺。^①

(三) 神户南京町

神户的华侨史始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 年),与神户开港同期。神户华侨的祖籍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市,其中广东商人最活跃。日本侵华战争给神户华侨带来很大灾难,许多社团解散,华侨人数锐减。1945 年后,旅日华侨开始增加,到五十年代时,神户华侨已有 8000 多人,其职业以从事进出口贸易为主,华人所开设的贸易公司,其数量之多仅次于东京,这是神户华人的一大特色。

神户中华街位于元町通一丁目和二丁目之间,离神户港不远,又名南京町,是一条东西 160 米、南北 110 米的商业街。一走近中华街,便可看到一座中国式牌楼(南门楼)耸立在中华街入口处,使人感到亲切。为了振兴和繁荣中华街,后来又在南京町的街东兴建另一座中国式牌楼“长安门”。楼顶分上下两层,牌楼正面上层的“敦睦”和下层的“长安门”这五个金色大字,出自赵朴初的手笔;牌楼反面上层的“友爱”两字由兵库县知事坂井时忠题书,下层的“长安门”三字由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题写。

神户中华街上的中华料理店一家家紧密相连,生意兴隆,特别是周末和假日,排队等候吃中华料理的日本人不计其数。除餐馆外,还

^① 中国香港《华人》月刊 1993 年第 12 期,第 29 页。

有不少行销中国杂货、手工艺品、食品和中药的商店,生意也不错。神户著名的侨校中华同文学校创建于1899年,1913年3月孙中山曾到校参观,并向全校师生和神户华侨发表演说。在神户中华总商会大厦二楼设有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总商会会长陈德仁亲任第一任馆长,馆内藏有很多文物、图片、图表、证件等珍贵史料。

第三节 欧洲的唐人街

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唐人街

(一) 利物浦

1866年时,英国利物浦黄烟囱公司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到欧洲的直航线,定期航行于上海、香港等地,有不少华人受雇于英国船只当海员,故利物浦是华人最先涉足的英国城市。有些华人海员到了利物浦后便上岸定居,一批又一批海员上岸,加入先期在利物浦港口附近落脚谋生的华人行列,日久便形成了唐人街,这是英国最早的唐人街。

起初,唐人街位于利物浦市区的上皮特街(Pitt St.)一带,华人在那里开设了许多餐馆、杂货铺和洗衣店,二次大战时,唐人街不时遭德军飞机轰炸,于是华人便移居到市中心的纳尔逊街和贝里街一带,这就是后来利城华埠的所在地。由于作为利城经济命脉的海上航运业受到很大打击,不光是华人离去,许多英国人也纷纷转移到别处,唐人街冷落萧条。唐人街上主要有餐馆、杂货店等,还有两家书店。

利城是华人最早在欧洲落脚的地方之一,故有些华人社团历史悠久。致公堂于1890年由一些反清人士发起成立,孙中山先生十九

世纪末赴英国寻找革命真理时,曾到过利物浦,还受到过华人的保护。四邑会馆于1906年由旅英四邑侨胞创建,抗日战争时,该会馆曾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发动大家募捐抗日经费。老一辈华人为使子女不忘自己的根,便自置会所,设立中文班,每逢周末和周日让孩子免费接受中文教育。每逢春节,华人社团便发起组织庆祝活动,唐人街到处是爆竹声,还有舞龙、舞狮等街头文艺演出活动。唐人街光明书店门前的舞狮采青活动,吸引很多人观看,到处喜气洋洋。

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利物浦的一些华侨华人陆续转移到其他国家或伦敦和曼彻斯特,使唐人街因人口减少而冷落萧条。不过,作为集东方建筑、文化、风情于一体的唐人街仍有发展的前景。

(二) 曼彻斯特

华人移居曼城始于十九世纪末,大多数系从利物浦转移过来。据英国官方1890年的统计,由利物浦移居曼城的华人每年为20人,大多以开洗衣店谋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些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在曼城定居。七十年代时,利物浦华人不断移居曼城。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曼城华埠开始形成且发展很快。华埠位于市中心的公主街、皮德兰街和莫利斯特一带,地方虽不大,却商店林立,人丁兴旺。唐人街有食肆酒吧、中式茶楼、超级市场、工艺品商店等,华人社团办公机构、中文学校和文化中心也在华埠,街上人群川流不息,中国乡音不绝于耳,一派繁荣兴旺景象。

作为唐人街的象征,在华埠中心福克纳街上有座中式牌楼,高11.5米,三重飞檐,琉璃瓦顶,朱红漆柱,金碧辉煌,上面分别用中、英文书写:“曼彻斯特中国城”。1987年4月17日举行牌楼落成典礼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为新牌楼落成剪彩。

曼城华埠办有中、英文的双语刊物《丝语》杂志,原来读者对象为华人,现已向整个英国社会发行。一个专为华人服务的商业社区广播

电台——新声广播电台于1989年10月29日首播。《丝语》杂志的出版发行和新声台的播出,有助于中华文化在华埠的延续,也大大丰富了曼城华人的文化生活。

(三) 伦敦

最早到伦敦的华人是海员,时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被英国商船廉价雇用后,就飘洋过海来到了大不列颠,有些人就在伦敦和利物浦定居。早期的伦敦华人居住在东伦敦的莱姆豪丝区,以开设洗衣店和餐馆(经营杂碎)谋生,至今人们仍可在那里见到几条老旧的中国街道。1940年8、9月间,德军飞机对伦敦狂轰滥炸,码头区损失惨重。战后,码头区日见萧条,华人便逐渐迁往市中心的苏豪区开业。香港新界农民战后赤贫如洗,加上农业歉收,于是自1952年起数万农民去英国谋生,与原有的华人一起在苏豪区立足,以开设餐馆谋生。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以爵禄街为中心的新唐人街。

唐人街位于市中心,由爵禄街及其附近的莎士巴利街、华都街、新港坊、俪人街等一些街区组成。英国华人90%以上经营餐馆或外卖店,唐人街上规模大小不等的餐馆一家紧挨一家,大都经营中国各地风味的美食,其中广东餐馆最多,风味正宗,大师傅来自香港。有些稍具规模的酒楼、茶室、饭店装饰豪华,室内摆放着花瓶、山水画、条幅、对联、镜屏,以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来吸引游客。唐人街上的店铺一般均用中、英文书写店招和广告,有的店铺门前还挂有中国式宫灯,门柜上贴着财神,两旁配有中文对联。满街的广东话以及满眼的“醉琼楼”、“翠园”、“新龙凤”、“万富官”等酒家大字招牌,使人宛如置身于东方文化的国度里。唐人街上有几家书店,其中以邓稼祥的光华书店最有名。香港多家畅销的华文报纸以及娱乐性的画报,唐人街上俯拾皆是,香港新出版的录像带和影碟,过不多久也会在唐人街商店里出售。

1985年经过整修和美化后的唐人街焕然一新,特别是在爵禄街中段的东、西入口处,修建了两座仿古的中国式大牌楼。牌楼高10余米,红柱绿瓦,飞龙走檐,气势雄伟。牌楼顶部正面“伦敦华埠”四个大字金光闪闪,背面的金字横额为“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两边支柱上的两副金漆楹联为:“伦肆遥临英帝苑,敦谊克绍汉天威”和“华堂肯构陶公业,埠物康民敏寺钟”。其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给参观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86年春节期间,中国驻英大使馆赠送了一对石狮,安放在爵禄街中心,给伦敦华埠更添几分古朴幽雅的东方风情。

1987年在与爵禄街相交的麦高田街区又建立起一座中式大牌楼,这样唐人街一共有了三座牌楼。1988年2月,还在唐人街西侧的三角地带建造了一座中国式凉亭。这座由中国古建筑公司派专人施工的凉亭为红色柱子,深黄色琉璃瓦,白色台阶和桌椅,柱子上还刻有清代诗人袁枚的一副对联:

月映竹成千个字
霜高梅孕一身花

经过英国华人多年的开拓和建设,昔日这条残旧破落的小街,如今已成为清洁整齐、环境宜人的旅游区。石狮、牌楼和凉亭被称为伦敦的“华埠三景”,对游客具有很大吸引力。据统计,每100个游览伦敦的游客中,有65人要去唐人街一游。确如英国朋友所称道的那样,伦敦唐人街是“繁华都市与中华文化结合的产物”。

每年举办春节庆祝活动,伦敦唐人街张灯结彩,鞭炮锣鼓声齐鸣,一派喜气洋洋。伦敦华埠街坊会、英国华侨协会等华人社团常发起组织庆祝大会。沿爵禄街、新港坊、麦高田街一带临时设置许多摊位,出售的年货有食品、书画、工艺品和玩具等。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悬挂着“恭贺新禧”四个金色大字。唐人街所在地的伦敦西敏市市长、中国驻英大使、侨团领袖等,均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后举行舞龙表演,

以及音乐、舞蹈、武术、戏曲等精彩的文娱节目,令人眼花缭乱。庆祝大会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夜幕垂临。伦敦华人艺术节的举办,也给伦敦华侨华人带来极大的欢乐,华人艺术家的古筝独奏、琵琶演奏、广东音乐、粤剧折子戏等精采纷呈,华人子女表演的灯笼舞、羽扇舞极富中国民族舞韵味,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二、巴黎的三个中国城

早在十七八世纪就有中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去欧洲经商,但人数很少。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后,有15万华工被招募去法国工作,这批“参战华工”后来有很多人牺牲,大部分人被遣送回国,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娶妻生子,兴家立业。勤工俭学学生为旅法华人的另一来源。早期法国华人祖籍以浙江青田、温州和湖北天门等地人为多,以开设皮革厂、家具厂和当流动小贩为职业。巴黎12区里昂火车站周围的一些陋街小巷,为法国华人早期的聚居区。

因人口不多,居住分散、职业流动性极大,故仅造成了几个唐人街的雏形。促成巴黎13区唐人街的主力是印度支那难民。曾是印支三国宗主国的法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大量接纳印支难民。那些历尽千难万险,冒着九死一生来到巴黎的印支难民,赤手空拳重建家园,13区唐人街由此孕育而生。13区唐人街介于意大利广场和伊芙利门之间,为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原来房屋陈旧,店铺稀少,市面冷落。如今那里已聚居着三四万华人,高楼大厦林立,街道两边布满了商店,据估计唐人街上有上百家中餐馆、12家超级市场、数十家成衣加工厂、12家金银首饰店以及银行、保险公司、律师楼等。几家电影院如豪华戏院、丽都戏院等,主要上演香港片。满街都是华人,到处散发着华人的生活气息。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和海报招贴,均是中、法文对照。那中国传统建筑的屋檐门楼,悦耳动听的华夏之音,使人倍感亲

切,为此有“塞纳河畔的香港”之称。^①

法国华人在入地生根、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亦保留着中华习俗,如烧香拜佛。在唐人街印支华人所开设的餐馆和店堂里,大多供奉着“红脸关公像”,他们认为“出门靠朋友”,在社会上闯荡,需要朋友的支持、关心和照顾,刘关张义结金兰、患难与共的精神不能丢。春节期间,很多法国人常带着几分好奇,步入法国华裔互助会与潮州会馆的佛堂,观看华人上香祈祷、求签问卜的热闹情景,有几位还拿起二三炷香下跪,藉此送上对华人节日的良好祝愿。

法国华人尽管身居欧洲,接触西方文化,平时又忙于生计,但新年一到,均情不自禁返回传统,使过新年的习俗在每个华人家庭里世代相传。拜年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年初一清早,华人社区内到处可闻“恭喜发财”之声,朋友或同乡在街上见面,总是双手抱拳,互祝新岁。小孩子们身着中国式棉袄,跟着大人们出门拜年。位于巴黎郊区94区的灵山寺和观音庙,年初一一大早便人山人海,华人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地涌向寺庙,怀着虔诚的心点烛上香,匍匐下跪,手摇签筒,口中念念有词,希望能求得一支上上签,给全家带来好运。寺庙内还有专为大家解签的人,但均免费。

巴黎13区唐人街发展到八十年代已处于饱和状态,有些华人便开始向其他区迁移,由此便形成另一处巴黎唐人街——美丽城唐人街,人们称之为巴黎的第二座“中国城”。美丽城位于巴黎19区和20区,形成的时间约在1984—1988年间,发展速度很快,到1989年时已有2万多华侨华人聚居在那里。在以美丽城十字路口为中心的各条大小街道上,开设有150多家餐馆和店铺。华人的店铺种类齐全,特别是中国餐馆布满了大街小巷,以至街上整日弥漫着中华食物的香味。华人的店铺都美轮美奂,在用大号中文字书写的招牌和广告

^① [马]《星洲日报》1989年3月9日。

上,还标上了法、越、泰、柬等文字,具有印度支那的特色。

美丽城唐人街带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原先这一冷落萧条的地方日见繁荣兴旺。1986年8月开设的美丽城牛车水饮食中心,为集团式大型中国餐馆,设有能同时容纳500人的大型餐厅,菜色风味多、质量佳,服务一流,每逢周末常见法国人在餐馆门口耐心等待座位,有时竟等上个把小时。1987年1月开张的“华丽都”大酒楼,庄重秀丽的“华丽都”三字出于刘海粟先生手笔。由于移居美丽城的华人日多,那里的地价开始上涨,有人认为这一新的华人社区还在发展之中,其发展潜力可能比13区更大。

继13区和美丽城唐人街之后,巴黎出现了第三座中国城建筑群。该中国城位于巴黎东南郊塞纳河与马恩河交汇处的阿尔福维尔市。总建筑面积4.7万多平方米,包括双立柱石雕牌坊、展览中心、船舫式饭店、12层旅店、购物中心、钟楼、苏州式庭院花园、食街、联廊、地下停车场等建筑。所有建筑物均采用中式古建筑,那琉璃瓦屋顶、亭台楼阁、雕廊水榭、草坪喷泉、游艇荡舟,处处呈现浓郁的东方文化风情。以完整的中国仿古建筑群来表现中国建筑风格、文化形式的中国城,不但是中华文化在法国的卓越体现,也是中、法两国友好合作的成果。

三、阿姆斯特丹

华人移居荷兰已有100多年历史,主要是海员、浙江来的生意人、印尼来的华人和苏里南华人。1912年在阿姆斯特丹班达姆街成立的水手馆,专为来往过路的华人海员提供食宿的方便,也可以说是唐人街的雏形。到1922年时,在班达姆街及其相邻的一些街区,已有大小不等10余家水手馆,在水手馆周围中国餐馆、小吃店、洗衣店、杂货铺、理发店等便应运而生,阿姆斯特丹唐人街业已形成,且粗具

规模。

阿姆斯特丹唐人街位于老城区的主干道班达姆街上,那里排列着多家中国餐馆,店屋较陈旧,内部装修和设施也较差,但菜式繁多,味道鲜美,价钱低廉。到五十年代时,班达姆街上终于形成“中华餐馆一条街”。自七十年代后期起,唐人街上又先后开设了许多旅行社、珠宝行、工艺品商店、装璜公司、中文书局等。由旅荷华侨总会于1977年创办的会刊《华侨通讯》,坚持免费向华人赠阅,不时刊登介绍中国历史、地理、艺术、医学等的文章,使广大华人身居异国他乡而能亲近中华文化。除此以外,荷兰华人还订阅在伦敦发行的香港《星岛日报》(欧航版)。

发起并组织广大华侨华人隆重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社团的一大任务。每逢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必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中华气氛浓厚,节目丰富多采。

随着华人的不断增加,阿姆斯特丹唐人街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如今在海岸街、西蒂街、风车巷等街区呈繁荣兴旺的景象,阿姆斯特丹唐人街已成为荷兰华人参与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第四节 大洋洲的唐人街

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有四个唐人街。

(一) 悉尼

悉尼唐人街历史悠久,迄今已逾一个多世纪。1901年前后,那些因遭受排斥或者是矿区解体而逐渐流向悉尼的华侨增加了。据统计,当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11263名华人中,悉尼及其郊区有3500人。悉尼华侨的职业,除矿工外,还有种植蔬菜、充当厨师和制造家具等。其中种植蔬菜是悉尼华人的传统职业,与唐人街的形

成大有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各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几乎全部操在华人之手，以至悉尼和墨尔本等地的蔬菜市场内全是华人摊店。^①

悉尼早期的唐人街位于坎贝尔街、古尔本街和韦克斯福街之间的一个区域内。在那里华侨开设有各种各样的店铺等，如进出口商行、蔬菜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饮食店和社团会所、俱乐部等，也有鸦片烟馆和赌场。在澳大利亚唐人街的形成过程中，很早便有了商人阶层，进出口贸易业成为华侨的一门新兴行业。例如悉尼的一些大水果公司，包括永生果栏、泰生果栏和永安果栏在内，都是在北昆士兰香蕉种植业兴旺发达时期开张的。后来这几家公司于二十世纪初相继在上海、广州和香港创立了先施有限公司、永安有限公司和新新有限公司，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仿效外国新型经营方式的百货商店，也是华侨资本投资中国、振兴民族商业的成功范例。

悉尼唐人街形成之后，几度兴衰交替，饱经沧桑。后来的悉尼唐人街是由原来的一条小街——德信街逐渐发展起来的。位于悉尼市中心的德信街，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时仅有几家小型餐馆、工厂和货仓，全是泥土路，建筑也大多是旧式房屋。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悉尼唐人街开始更新和重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八十年代时，唐人街的面貌焕然一新，由原先的一条穷街陋巷，扩建改造成为闻名遐迩的悉尼中国城。

1979年，悉尼华人在约10米宽、150米长的德信街南北两端各树立起一座中国式大牌楼，以此作为中国城的里程碑。以水泥、铁架构成主干的牌楼，宫殿式的顶部覆盖着绿瓦，两边为镶砌红色花岗石的石柱，雄伟壮观，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富丽色彩。南端牌楼

^①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话》，台湾海外文库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外面的横额为“通德履信”，对联为“德业维新万国衣冠行大道，信孚卓著中华文化冠全球”；里面的横额为“继往开来”，对联为“继往上国文章维护自由正义，开来大同世界发扬民主精神”。北端牌楼外面的横额为“四海一家”，对联为“四海种族同仁修睦合拜为兄弟，一家金兰结义精诚博爱贯澳中”；里面的横额为“澳中友善”，对联为“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中原气象德门义路揖让仁风”。

德信街的路面均用瓷砖铺砌，路面干净整洁，路旁是彩灯花坛，亭台坐椅，繁花绿树，一派恬静祥和气氛。唐人街两旁的店铺均挂汉字招牌，店主和顾客用广东话讨价还价。许多专卖中国土特产品如糖果糕点、药材、烟酒、书籍文具、海味腌腊、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的商店，装饰得古朴典雅，藉此吸引顾客。凡到澳大利亚观光旅游的客人，都以到唐人街饮茶和品尝中国餐馆的美食为时尚。唐人街的中国式酒家、茶楼、餐馆有数十家，其店招都是中文繁体字，而且多用中国地名来命名，如长安酒家、长城酒楼、西湖酒家、广州酒楼、东江饭店、四邑餐馆和潮州城等。每逢周末和假日，在唐人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乎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粤语、潮语、普通话和沪语不绝于耳。随着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移民日多，悉尼唐人街“香港化”的色彩也日渐浓厚起来。

悉尼华人对自己的传统节日非常重视，每次均以各种形式热烈庆祝。悉尼华人的文化活动丰富多采。一年一度的新南威尔士州嘉华年会，是由各民族团体参加的一项重要活动，华人常在德信街街头搭起临时舞台，表演中国的粤剧、民歌、魔术杂技、民族舞蹈、武术气功等，藉此展示丰富多采的中国传统文化。除此以外，悉尼话剧社、悉尼华人艺术团的演出活动，也为繁荣华人社区文化作出贡献。华人社区文化活动之一的澳大利亚国际龙舟大赛，影响日益增大，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比赛。

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华人人口不断增多以及亚洲商人不断向唐

人街投资，悉尼华埠的范围亦不断扩大，已经从德信街逐渐扩大到叻基街、莎琴街、哈巴街、高宾街、喜市场和乔治大街等邻近街区。悉尼市政厅还将拨款作扩建唐人街之用，将唐人街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花园式商业游览区，并与毗邻的达令港游览区连成一片。

在移居悉尼的华人中，上海籍人增长很快，以至在悉尼唐人街及周围市郊的城镇，上海话随处可闻。特别是在被称为“小上海”的悉尼西区爱西菲尔(Ashfield)市镇上，随便拉住街上两三个行人，其中必有上海人。甚至还有一家叫作“夜上海”的点心店，店主也是上海人。在爱西菲尔镇中心的利物浦大街上，有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电脑零售业、T恤制衣厂、餐馆、时装店、小百货店、小五金店等，清一色出售中国货。有人说这是悉尼第三个唐人街的雏形。^①

(二) 卡拉玛打

位于悉尼西南方康利谷和卡巴拉谷附近的卡拉玛打(Cabramatta)市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开始发展起来的，此前是个偏僻的小镇。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澳大利亚政府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印支难民，卡市成为一个很大的难民落脚点。这些难民大部分是潮州籍华人，劫后余生，身无分文，开始时处境异常艰难，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卓然有成，使这个过去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的小集市日益繁荣，终于形成一个新的华人社区——悉尼第二个唐人街。

卡市的市容美化工程于1989年3月动工，修建了中国式牌楼、茶亭和孔子像等。街上商店鳞次栉比，车来人往，一派兴旺景象。商店的招牌和广告都用三种文字书写：中国字最大，其次是越文，最后是英文。所有的店铺都是华人开的，街道整洁繁荣，常飘溢着一股潮州小吃的香味，普通话、广州话和潮州话在这里通用无阻。有人说在

^① 参见1992年12月8日《新民晚报》。

卡市唐人街行走,好像置身于越南堤岸华人区一样,一点不觉得陌生,由此卡市又有澳大利亚“小西贡”之称。如今,卡市唐人街亦已成为旅游者竞相光顾的新的旅游观光点。

八十年代卡市有几个华人社团,如新南威尔士州越棉寮华人联谊会、澳洲华裔相济会、中华佛学会、澳洲潮州同乡会等。这些社团共同致力于慈善福利事业、弘扬中华文化,受到当地各政党和社会的肯定、支持。卡市新修建的一座华人寺庙名叫“明月居士林”,大殿里不但供奉释迦牟尼,还有道教的元始天尊、孔子、八仙、妈祖、岳飞、关羽等,甚至还有诗人李白。各取所需、诸神并立,济济一堂而相安无事,反映出海外华人宗教信仰的一个侧面。华人社团每年都组织春节庆祝活动,游行队伍中彩旗招展,高奏潮州传统的大锣鼓音乐,人们载歌载舞,充满着潮汕的地方色彩。华人社团还出版一些华文刊物如《海外风》、《汉声》、《文萃》等,都是为了使年轻一代不忘自己的根,深受当地华人的欢迎。

(三) 墨尔本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和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市内树林葱郁,花木扶疏,空气清新。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已有100多年历史,其形成过程与维多利亚金矿的发现有关。在维多利亚淘金时代,金矿场华人移民增加较快,例如1854年时有华人2341人,1857年已增至3万以上,1858—1859年时已达42000人。如今华人将美国的San Francisco称为“旧金山”,将墨尔本(Melbourne)称为“新金山”,就是在这—时期大量华人涌向美、澳淘金而沿袭下来的。但是“新金山”并非如人们传说中的那样遍地都是黄金,只有几十年时间,淘金事业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就开始衰落,且各矿区时有排华事件发生,于是华人从原先分得很散的各矿区流向城市。1901年时,维多利亚州的华人总数为7349人,但在墨尔本市及其郊区的华人已有2200人。出于合作、互助和自卫的目的,华人集结一处,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小伯克街

一带居住下来,并发展成为唐人街。唐人街在小伯克街和朗斯代尔街之间,东西全长约1.5公里,两旁布满了店铺。开设餐馆、干细木工活和种植菜园是早期墨尔本华人的主要职业。

唐人街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不仅符合澳籍华人的利益,也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相一致。1975年墨尔本市市长决定把唐人街划为旅游区,并拨专款美化街道,对菜市巷进行改建。在史旺顿街、展览街和其它几个街段的头尾之间建造起四座名为“棧星门”的中国式牌楼,这是江苏省作为礼物赠送给维多利亚州的。在牌楼的两侧安放着一对高2.5米、重约7吨的石狮子,产地为中国历史名城苏州市。在唐人街范围内还换上了宫灯式的玻璃街灯。

一到夜晚,墨尔本唐人街上人、车川流不息,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街上的饭店、酒楼和茶楼特别多。茶楼里的点心品种,凡广州能吃到的,这里几乎一应俱全,连叫卖声、小车推送至桌边和记帐方式也和广州的茶楼差不多。作为饮食文化,中国菜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作为澳大利亚食谱融入当地社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上墨尔本唐人街游览、购物和就餐,也是非华人居民文化生活的内容之一。在唐人街上的京华戏院和百老汇戏院里,能看到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许多影片。唐人街上商店、公司、银行的招牌和广告都用中文书写。有一家宝康公司经营中文杂志、报纸、画报、书籍、录音带和唱片,还经营烫金和印刷业务。处处可见苍劲有力、笔致洒脱的中文店招和广告,使墨尔本唐人街的中华文化氛围更加浓郁。

四邑华文学校、中华文化学院等也在唐人街上。此外,还有著名的“澳华历史博物馆”,这是全澳大利亚唯一的华人历史博物馆,馆内展出许多拓荒时代华侨先民的照片、图片、民族服饰等,充分反映出华侨在维多利亚州各矿区采矿以及其后又在其它行业中所作出的贡献,这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中留有光辉的一页。该馆自1985年开馆后,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有到了唐人街不去参观博物馆,等于没

去唐人街的说法。

(四) 布里斯班

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Brisbane)也有唐人街。布里斯班市是一座红花绿树掩映下的海滨城市,在全市110万人口中,华人约1万多。与悉尼、墨尔本等市相比,布里斯班市的唐人街还很年轻。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增加的华人移民,在该市市中心的华利区开设餐馆、酒楼和各种商店,这里成为华人的活动中心。为此,市政府酝酿将华利区逐渐开发建设成为一座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城。

1987年1月29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布里斯班中国城举行落成典礼,全城充满欢乐气氛。整个中国城是仿照中国古都长安的建筑设计建造的。在入口处一座10米高的红色牌楼上,镌刻着“中国城”三个大字,牌楼的两侧安放着一对大石狮,这是中国政府赠送的。走进牌楼,在红砖铺地的街道上人群川流不息,这是一条不准汽车通行的步行街。街道两边的餐馆、店铺都是仿唐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街上古色古香的亭台、错落有致的楼阁、高低不一的假山、潺潺而下的流水以及孔子壁像等,展现了灵秀的江南园林景观,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中国城内的店铺和商场也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如“翠园”、“帝国”、“金皇宫”等茶楼,均装饰得富丽堂皇,在大众化的食街上,广东、四川、上海风味的菜馆受到欢迎。除商店、食肆林立外,中国城内还有大小戏院五六家,其中城东的华声戏院不时上映中国大陆、港台的影片。一些华人社团创办的中文班,为华人子弟学习中文提供了良好条件。

随着华人社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美化,布里斯班市的唐人街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第五节 拉丁美洲的唐人街

一、圣保罗市

巴西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华人最多的国家,八十年代末有华侨华人 12 万,其中 8 万人居住在圣保罗市及其近郊,其余散居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等地。尽管有十九世纪末华工去巴西的记录,但人数不多。本世纪七十年代时大批中国台湾人移居巴西,使巴西的华人人数大大增加。巴西华人职业多样化,工、农、牧、商、贸俱全,但以商业为主,华人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者不乏其人。圣保罗市华人虽很多,但居住分散,故唐人街的特色和中华文化气息等相对较淡。

圣保罗市唐人街俗称日本街,位于市中心的东方区,那里是日本、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侨民的集中之地。街上既有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旅行社、食品店、百货店、珠宝首饰店等,也有不少华人开设的店铺,日文、中文和朝鲜文并用的店招到处可见。人行道多用青石板铺砌,东方式的庭院、假山和盆景触目皆是,极富东方色彩。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华人人数的激增,东方街的地盘有了很大扩展,华人商店越来越多。华人店铺门前的廊柱上都雕龙刻凤,室内天花板上挂有中国宫灯,柜台上摆放着关老爷、老寿星等。圣保罗市华人开有几百家中餐馆,其中颐和味饭店的菜式是正宗的上海风味,中国台湾移民林四洲开设的“皇星”中餐馆成为该市 6 家五星级顶尖餐馆之一。

圣保罗市也成立有许多华人社团,常举行文化娱乐活动。圣保罗市的几份侨报如《巴西华侨日报》、《美洲华报》等,尽管历史不长,但

办得很好。此外,还有《侨光》和《南美新闻》两本杂志。作为华人社区文化的组成部分,唐人街上还有一家中文书店——光明公司,这是南美洲唯一出售华文书籍的书店。

二、东方市

东方市为南美国家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该市原来叫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总统市,华人嫌这名字太长且拗口,干脆称为桥头市。1989年2月2日军人发动政变后,斯特罗斯纳总统被推翻,于是该市改称东方市,但华人仍称为桥头市。桥头市与巴西的福士市和阿根廷的伊瓜苏市隔着巴拉那河相望,友谊大桥横跨河上,将三市联结起来。桥头市作为边界城市,由于征税低,限制又少,故许多跑单帮的人都去组织货源,因此商旅络绎不绝,市场繁荣兴旺。边境上的伊瓜苏大瀑布和伊泰普发电站,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桥头市成为游客歇脚和购物的理想场所。

华人在桥头市拓展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时摆摊做小生意,后来才开店,而且越开越多,日久逐渐形成唐人街。唐人街上华人开设的店铺有500多家,以百货店为最多,著名的“美洲百货公司”、“中国公司”等规模不小。唐人街繁荣之后,也把服务性行业带动起来,华人开设的餐馆、旅行社、报关行、建筑公司、钱庄、理发店等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比比皆是。除中文店招和广告外,还有朝鲜文和日文招牌和广告,处处显示出东方风情。

桥头市的华人中,以来自中国台湾的为多,普通话在此通用无阻。从美国和巴西圣保罗来的中文报纸有一定销路。台湾的电视新闻,在一周后也会有录像带到此。桥头市的经济命脉以批发、走私和旅游业为主,因此,一遇到阿根廷和巴西经济不景气,华人经济立即会受到影响。

三、利 马

1849—1874年间,先后大约有20余万契约华工前往秘鲁,大部分华工被安排在田庄和种植园里工作,过着非人的生活,死亡率很高,能活到契约期满的人不到1/3。从二十世纪开始,秘鲁限制华工输入,华人人数不断减少。八十年代秘鲁的华人约有22000人左右,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利马。契约华工中的幸存者,后来来到利马演变为自由雇工和商贩,并在与秘鲁社会同化和适应的过程中,为秘鲁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

华人在利马市的一隅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在加邦街、爱育街和巴鲁卢街一带形成唐人街,其中加邦街为华人区中心。据史料记载,早在十九世纪末,唐人街已初具规模,中华色彩很浓厚。许多原是苦力的秘鲁华人,在商业活动中显示出经营上的才能,获得成功者不乏其人。在秘鲁华人商店中,除杂货店外,要数中国餐馆最多,仅利马一地就有500多家。许多餐馆都悬着醒目的霓虹灯招牌,并以大号繁体汉字书写店号。唐人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川流不息,由于秘鲁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四邑以及中山、宝安等地,故在唐人街通用粤语。位于加邦街及巴鲁卢街的许多华人酒家,其共同的特点为黄墙绿瓦、曲径回栏,花园里假山喷泉、小桥流水,餐厅的装饰也是龙凤缠柱、雕梁画栋、书法条幅,营造着中华文化氛围。饮食文化已成为利马唐人街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秘鲁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还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时代,秘鲁华人便开创自己的文化娱乐事业,例如在1878年时已有几家华人剧院,1911年3月10日创办华文报纸《民醒日报》等。二十年代时秘鲁办有4所中文学校,八十年代尚有2所。

设于唐人街中心爱育街81号的通惠总局,成立于1886年,为秘

鲁华人社团的最高组织,下辖利马的八大会馆,外埠的 13 个会馆也隶属总局。总局自成立之日起,在赈济灾民、抗日战争中募款筹饷,资助难胞返回祖国,促进中秘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等方面,均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巴拿马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就有许多华工参加巴拿马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的重大工程。由于气候炎热、工作繁重、待遇不良和瘟疫流行,一部分华工死亡,一部分契约期满后返回中国,也有一部分留下来定居,并改行从事农牧业和小商贩谋生。到 1968 年时巴拿马共有华侨 3000 多人,另有土生华裔 4000 多人。巴拿马华人的祖籍大部分是广东,尤以中山、花县、鹤山、宝安、清远等县为多。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以旅游、探亲、婚姻、投资等形式来此定居的人激增,1980 年已达 32000 多人,大部分是已经入籍的华裔^①,中文已成为除西班牙文、英文外的第三大语系。巴拿马的国民经济为服务型经济,商业和劳务收入占重要地位,华人的职业和经济形态以开办商店、商场、工厂、果菜庄园、贸易公司、银行等为主。

巴拿马的唐人街位于巴拿马市中心一块三角巷的巷口,原先只有一家老字号杂货铺萧德庆公司,后来很多港资、台资以及巴拿马的一些侨资参与竞争,使那里的商业兴旺起来。唐人街的商店里,经销中国土特产和各种工艺品,来自中国的商品琳琅满目。整个巴拿马城开设有 200 多家中国菜馆,其风味保持着正宗的广东特色,如有家广州酒楼,专门经营粤式茶点,当地华人和巴拿马人到此饮早晚茶,供

^① 香港《华人》1984 年第 6 期,第 34 页。

应的点心有虾饺、糯米蒸鸡、豉汁排骨、春卷、叉烧包、鱼粥、炒河粉等 10 多种,风味纯正,味道鲜美。由华人和巴国政府合资兴建的玛格利特出口加工区和旅游住宅区,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巴国的华人经济已有了稳固的根基。

随着巴拿马市政建设的发展、现代化建筑群的兴起以及新型商业区的开发,数十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唐人街显得破落残旧,与现代化的都市建设格格不入,唐人街的更新和重建摆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市政府的规划,改建和美化后的唐人街将成为市中心主要商业区的旅游景点之一。在今唐人街的东面将填海造地,向堤外发展,据估计光填海这一工程就需 1200 万美元。在填海区内将兴建公园、商业区、旅游码头以及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群。

巴拿马有两家中文报纸《共和报》和《新华报》,发行量不大。巴拿马城已建立起中文图书馆。1986 年创办中山学校,设中学部、小学部和幼儿园,教授中文和英文,还开设有客家话和广州话班。年轻一代华人均受过高等教育,且享有公民权,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均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如出任教授、会计师、律师、工程师、电脑专家、广告设计员等。巴拿马华人打破了历来不问政治的框框,积极参政,不但人数很多,而且职位也高,从大法官、总统特别助理到国会副议长,从移民局长、住房部长到首都市长等,都有华人任职。

五、哈瓦那

古巴曾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华侨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且移民历史悠久,早在 1847 年初就有华工从厦门被发运去古巴。以后逐年增加,到 1874 年时,大约有 16 万人以契约华工身份前往古巴。华工来到古巴后,在刀枪和皮鞭下从事奴隶劳动,死亡率很高。1884 年,经

中国驻哈瓦那总领馆注册登记的华工为 43298 人,一律发给行街纸,以此作为华工人身自由和享受合法权利的证明。许多幸存下来并从奴隶和苦力变为“自由人”的华人,陆续从古巴各地汇聚到哈瓦那,以种蔬菜、推车摆摊做小生意作为谋生手段,经过多年积累,有了一定资金后便开设商店,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数的增加,终于形成唐人街。在古巴,无论是城镇还是大小村庄,都有华人居住。

哈瓦那唐人街位于离市中心不远的桑哈街、拉约街的交合处,由 9 个街区组成。早在十九世纪中期,那里已经是华人商贩云集,后来更是餐馆林立,店铺云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古巴约有华人 3 万,大部分是广东人,而且 55% 以上聚集在哈瓦那。唐人街路面狭窄,建筑物均为二三层高,店面前有走廊作为人行道,一如中国华南城镇的建筑风格。街上店铺紧密相连,杂货铺、中药店、食品店、酒楼、饭店、洗衣店、理发店、咖啡店、首饰店、游乐场等应有尽有,许多华人社团也在这里。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前,唐人街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故曾有“哈瓦那的小香港”之称。

古巴华人依然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生活习俗,每逢中国传统节日,特别是过春节时,以各侨团为单位热烈庆祝,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穿上新衣服,并有舞狮子、耍龙灯、放鞭炮等活动。华文报纸《光华—开明公报联合刊》创刊于 1976 年 5 月,发行量不很大。古巴中华总会馆办有一个业余的普通话学习班,由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提供课本和影片等。哈瓦那华人还于 1985 年成立了一个舞狮、武术队。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实行国有化政策,1962 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又将外国和本国私人经营的工商业收归国有,华侨经商和就业等也受各种限制,于是许多人便向欧美国家再移民,使华人人数急剧减少。昔日繁荣兴旺的哈瓦那唐人街,如今寂静冷落,房屋、街道因年久失修,也陈旧不堪。

在世界各国唐人街日趋旅游化的趋势下,哈瓦那唐人街也有振兴和修复之势。

六、墨西哥

首批赴墨西哥的华工为1864年应召去修筑铁路的工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墨建交后,赴墨西哥的华人人数增加,1904年时增至8000人,1910年时不下1.3万人,三十年代时约有4万人。在墨西哥华人中,以广东四邑、中山和南海人为多。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中国台湾、香港人前去经商和办厂,故人数有很大增加,1988年时约有10700人,大多已加入当地国籍。

墨西哥城有1860余万人口,为拉美最大城市。那里有一条窄小的街区多洛雷斯街(Dolores St.),为墨西哥唐人街,或称墨西哥的“东方世界”。相传本世纪三十年代时,有两位中国老板来此开设了两家中国餐馆,继之又迁来了三家菜馆和一家百货店,从而开始了墨西哥唐人街的历史。整个唐人街只占此街中间约30—40米一段,街区内有一家百货店、五家中餐馆和三四家杂货店,店主为广东人,门口的装饰、店招和广告都是中、文和西班牙文并列。有家“好景楼”餐馆,墙壁上挂有金粉浮雕“福禄寿图”、“百鸟朝凤”以及织锦中国画“醒狮图”等,朱红色的圆柱上悬挂着玲珑别致的宫灯,充满了东方情调。

每逢春节,墨西哥唐人街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墨西哥的华裔社团以及墨中文化交流协会等常在唐人街举行迎春集会。例如1990年春节时,除按照中国民间习俗扎起巨大的骏马以迎接马年外,华裔青年还舞龙舞狮,并表演精采的武术和中国民间舞蹈。一些墨西哥人也赶来唐人街,与华裔社团共庆佳节。

第六节 北美洲的唐人街

一、美国

(一) 旧金山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前往美国加州淘金,他们来到矿区,或支起帐篷,集体采掘;或受雇于白人,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那时的旧金山,是个只有 800 多居民、200 多间简陋房舍的小村镇。后来黄金淘尽,矿业衰退,铁路修成,经济不景气,许多华工就离开矿区,在旧金山住下来谋生。1852 年时,旧金山已有华人 3000 人。1849 年,华人先在萨克拉门托街搭建简易房舍,后来又从广州运来木材,制成房梁等搭建房舍,该地成为旧金山最古老的唐人街。1852 年华人又进占都板街和朴茨茅斯广场北面的几个街位,1853 年华人已在南起萨克拉门托街、北至昃臣街、东自坚尼街、西至市作顿街的范围内,逐渐拓展成集居住、经商为一体的活动中心,时人称“小广州”(Little Canton)或“小中国”(Little China)。1853 年,在旧金山的报纸上已以“唐人街”来称呼这一地区了。

1865 年,旧金山唐人街的人口已增加到 1 万,范围也有所扩大。到 1877 年,旧金山华埠的范围基本上已定,包括东西向的加里福尼亚街、商业街、企李街、华盛顿街、昃臣街、太平洋街、百老汇街 7 个街位和西北、东南向的坚尼街、都板街、市德顺街 3 个街位。华人的职业领域比较狭窄,以开设洗衣店、餐馆和杂货店为主。1906 年 4 月 18 日凌晨,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下午 6 时起又因爆炸而引起大火,旧金山华埠毁于一旦,荡然无存。灾后华人重建华埠,到 1908 年时,华埠

恢复的商店已达 193 家。一次大战后,旧金山华埠又有发展,到三四十年代时,旧金山华埠的范围计有 21 条街区。

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唐人街的发祥地。在华埠内有条都板街(Grand St.),这是旧金山唐人街的主街,整个唐人街就是以此街为中心展开的。该街现已改名为格兰特街(Grant Avenue),但华人仍喜欢沿用旧名。都板街的南端以布什大街为界,在街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翠绿色琉璃瓦和朱红大柱的中国式牌楼,是在 1970 年 10 月落成揭幕的。牌楼高 15 米,宽约 20 米左右,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牌楼顶端的中央还有一颗光彩夺目的大明珠,两侧有金龙护卫着。这牌楼不但是旧金山华埠的象征,也使唐人街的中华风情更加浓郁。

都板街上的建筑式样,从外型到内部装饰都具有中国特色,雕梁画栋、飞檐起脊的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的屋宇,路牌、店招、广告都是中、英文对照,满眼是中文字,路上行人也大部分是中国人,随时可听到中国话。在几十年前流行的是台山话,如今则已让位于广州话,普通话仍然占主导地位。若在唐人街开店经商,那么,不管你是东北人、北京人,还是上海人、四川人,都必须学会广州话。许多老一辈华侨,就是一句英文也听不懂,只要不走出唐人街,照样能几十年生活下去。在这里,警察的岗亭也是中国式的亭子,路旁的大红街灯也是宫灯式的,标上了中文“公用电话”的亭子随处可见。不过,旧金山的唐人街位于旧区,建筑物较旧,道路狭窄,街上给人以杂乱之感。

唐人街发展的经济动力来自餐馆和缝衣业。华人餐馆多集中于东西走向的华盛顿街和企李街,其数量之多几乎到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都板街上也有几家餐馆,如装璜古朴幽雅的杏花楼,豪华而富于现代气息的国华酒家等。在这些餐馆里时有海参、鱼翅、对虾等海鲜供应,也可吃到乳猪、烧鸡、烧鹅和烧鸭。港式茶楼里的虾饺、烧卖、叉烧包、粉果、蛋挞、糯米鸡等点心也颇有特色,吃早茶和一盅两件的

习惯一如在香港和广州。唐人街的车衣厂大部分散布于华埠的太平洋街、吕宋街等窄巷之中,车衣工人工作时间过长,工资较低,劳动环境也较差,而且始终未改变以加工为主的小作坊式经营手法。

早期的美国华人,大多来自广州,故华埠很早就有了专演粤剧的戏院,后来的华埠戏院实际上是影剧院,既能演戏,也能放映电影。香港拍摄的较好的粤语片,在这里卖座率很高,国语片(普通话)大家固然也喜欢看,但如能配上粤语,则更受欢迎。八十年代,旧金山华埠尚有大明星(前身为大中华)、大观、世界、新声、华声等5家戏院,建筑老旧,设备简陋,但仍不失为华人娱乐消遣的场所。

华人来到美国,尽管异域羁旅,却继续保持原先的生活习俗,神权思想的流露自不能例外。例如,华人居民家中均供奉祖先神龛,遵守祭祀习惯,凡初一、十五,必点烛上香祭拜。凡有华人的地方,必有寺庙。旧金山华人社会也是佛、道并存,土地庙、老君庙、天后庙、关帝庙、孔庙、和尚佛堂、尼姑庵等一应俱全。春秋两祭,各种庙会,婚娶喜筵,用马车迎送宾客,嫁女有礼金、礼饼,生子满月派送红蛋,丧葬时办水陆道场和请道士打醮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种种习俗,在此一一保存无遗。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唐人街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例如,华人对中秋佳节非常重视,其庆祝的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一连数天举行庆祝活动。唐人街杂货店里的月饼生意相当兴旺,烧腊店和鸡鸭店也顾客盈门,节日气氛相当浓厚。华人的艺术团体还表演舞蹈、舞狮、魔术、杂技、歌唱及演出舞台剧《嫦娥奔月》等节目。春节期间,旧金山唐人街经常人山人海。从除夕起,一连好几天,唐人街锣鼓声、爆竹声不绝于耳,在花园角一带临时搭建的摊位,都用红纸、红布装点,上面摆满了儿童的新年玩具。唐人街货摊上也摆放着各种花卉和金桔,犹如广州的花市,姹紫嫣红,美不胜收,逛街人总要买几束带回去,以图个吉利。

旧金山华人春节庆祝活动的高潮为一年一度的新春大游行,这是一个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官民同乐的最吸引人的盛会,邻近几个州的华人也常赶来观看。大游行一般在晚上举行,有上百个华人社团参加,加州和旧金山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华人社区知名人士、侨团领袖等参加盛会。历时两小时的游行多姿多彩,中文学校的男女学生均身穿民族服装,头戴花环。游行队伍中有中乐队、舞蹈队以及表演中国民间故事的花车。其实,华人社团队伍、华文学校学生等只是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许多美国人的机构、社团和学校亦派人一起参加大游行,例如有一支由少女组成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仪仗队,沿途表演精采的舞蹈节目;另有一支由美国学校组成的管乐队,步伐整齐,一路上吹奏进行曲。大游行的压轴戏为一条长达150英尺的金龙,龙身披鳞挂彩、闪闪发光,金龙劲舞,颇为壮观。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华人新移民及其资金的大量涌入,美国各城市的唐人街人满为患,唐人街在向外拓展。旧金山的旧华埠,特别是都板街一带,由于地区狭小、租金昂贵,已难以适应华人居住、经商、交通等方面发展的需求。位于金门公园西面的列治文区及东面的日落区,环境清幽,交通便利,吸引了大量华人迁入,逐渐变成两个新的华人聚居区。列治文区的企李文街上,建筑全是新的,街道宽敞,各类店铺林立,中、英文对照的招牌相当醒目,大部分由华人经营,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去购物消闲,车水马龙,相当兴旺,初具“华埠”气息。

列治文区发展到近于饱和时,华人又开始转移到日落区聚居。由于那里的铺位租金比旧华埠甚至比列治文区还低,故吸引了不少华裔前去开店。日落区500多家商店中,约有四成是亚裔人经营的。那里的餐馆、诊所、会计师事务所、珠宝店、电器行、银行、地产公司等鳞次栉比,也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区了。

有胆有识、通外语、有公民权的专业人士迁移到郊区新华埠去发展,这是旧金山唐人街的发展趋向之一。只有那些不懂英语、无一技之长的新移民,才选择老华埠落脚。华埠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供移民适应新环境,然后继续向前迈进的地方。

(二) 洛 杉 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太平洋铁路修建完工后,洛杉矶开始进入发展阶段,华人的人口也有所增加。1870年时,洛杉矶全市居民近万人,华人只有172人,占全市人口的3%。华人刚抵洛杉矶时,大都从事修建铁路的工作,或者从事农业、充当家庭仆役以及开设洗衣店、餐馆、杂货店、旅馆等。

洛杉矶的唐人街是在一条名叫黑人巷(1877年改名为洛杉矶街)的短街上逐渐发展起来的。1880年时,华人人口增至605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8%,其中约有300人住在唐人街,经营洗衣业和卖菜两种行业。在洛杉矶全市居民中,90%以上的家庭依靠华人供应新鲜瓜果。1887年7月的一场大火,使唐人街化为灰烬。后在火车站附近重建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华人聚居在亚密打街、洛杉矶街、士披令街、亚布拉沙街及麻且秀街一带。1935年,在倡建新的联合火车站时,华埠被拆除,只留下北士披令街一段商业区,并在北百老汇街一带新建了一批房舍作为新华埠。1949年5月,洛杉矶因市政建设和美化环境需要,再次将旧华埠的一些楼宇拆除。

人口的增长是华埠发展的主要因素。1960年之前,洛杉矶华埠的人口不多,大约只有3000人左右。七八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大批中国台湾人、香港人和印度支那难民涌向南加州,那里的华人从1970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15.3万人,居于唐人街的华人居民不到20%。

洛杉矶华埠位于市中心的晓街、百老汇街、希尔街、春日街和竹巷一带,那里店铺林立,市面繁荣,店铺的装璜和陈设相当讲究,建筑

日趋现代化。华埠还专门设置了中、英文路标,这是继旧金山和纽约之后第三个这样做的城市,意义重大。北百老汇街是华埠的中心,街道两旁的房舍一般以二三层为多,也出现了一些高楼大厦,其店铺有餐馆、酒吧、银行、古玩礼品店、中西杂货店、药材店、珠宝首饰店、理发店、洗烫店、咖啡店、娱乐场、中国书店、旅行社、工艺品陈列馆和照相馆等。从大范围看,洛杉矶唐人街位于南加州的中心地带,平时华人分散在各县、小城镇,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涌向唐人街饮茶、会客和购物,故街上人如潮涌,其热闹程度,有人戏称为“香港的另一条弥敦道”^①。唐人街上有些街段的建筑物红绿相间,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使唐人街的中华文化风情更为浓郁。

街上所有商店的招牌和广告都用中、英文书写,中国饭店和酒店相当集中,总共有 20 多家,天天座无虚席。其中有三家较为有名,其一为文记餐厅,以海鲜类菜肴闻名遐迩,食客在点菜之前,可看到活蹦乱跳的海鲜在大型水槽里游动的情景;其二为老周饺子馆,同时供应小菜及特殊的蒙古口味的食物;其三为美丽华餐厅,以星期日早晨供应各种美味点心而闻名。洛杉矶唐人街的特色之一是干净整洁,不准将货物摆放在人行道上,卖水产、蔬菜等湿货的店铺全部集中在超市内,故街道比其他城市的唐人街清洁。新华埠的店铺大都设在商场内,外貌更加美观整洁。

印支难民中的越南华人,在洛杉矶的发展速度惊人,1979 年时越南华人开设的商店只有几十家,到 1985 年时已发展到 700 多家,几乎占华人商店的一半。满街是潮州话,其店招除中文外,又标上了越南文,那么多越南式的中文报纸,使人仿佛置身于堤岸。在唐人街原先的中华文化色彩中,又增添了不少越南色彩,这是洛杉矶华埠的一大特色。

^① 美国《世界日报》1988 年 1 月 22 日。

在从中国台湾移居美国的热潮中,洛杉矶是台湾移民较集中的城市。八十年代后半期赴美的台湾移民,四分之一在洛杉矶周围落脚。台湾人的增加,使洛杉矶郡属下 80 多个市镇之一的蒙特利尔公园市发展成为另一新华埠。走在圣盖博山谷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中文商业招牌,中国台湾移民开设的豪华餐馆、大型超市和连锁商店越来越多,台湾糕点、风味小吃应有尽有。走在街上,普通话和台湾话随处可闻,来自台湾或在美国出版的台湾报纸也很多。洛杉矶有三家中文电视台,晚上可直接收看台湾电视台的新闻,台湾的歌星也经常到此演出。台湾色彩浓厚,这是洛杉矶周围华人社区的另一特色。

洛杉矶华人把过春节叫作“过唐人年”,且相当重视。洛杉矶有许多华文学校,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老师就会出作文题目,让学生谈谈对新春佳节的感想以及打算如何过好春节。唐人街各商店不仅在门上贴上用红纸写的春联,有时还在商店的椅子上摆上古色古香的红色垫子,在桌子上也常放一两盆桔子或表示“吉祥富贵”的花,花瓶和花盆都用红纸包上,并写上“花开富贵”等词。华人小孩子在春节期间常穿上漂亮的新衣,并在市政当局允许的时间内燃放烟花爆竹。唐人街还设有神坛,在农历除夕和大年初一,许多人前去祭拜,神坛上香烟缭绕,烛光明亮,并吸引了不少西方游客。

和旧金山一样,洛杉矶华人也有春节大游行,例如 1988 年(龙年)时,华人社团发起组织以“金龙大游行”参加第 33 届嘉年华会,并由华裔联邦大法官刘成威担任大游行总指挥。加州的亚洲文化交流协会特制了一条金龙,在州府会议厅展览,吸引了大批观龙者。

老一辈华人在叶落归根思想支配下,在国外谋生都作临时打算,并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固有习俗,即使客死他邦,也不能成为“异国野鬼”,定要拾骨回乡安葬,华人组织白骨会,就是负责将同胞骸骨移葬中华故土。新一代华人四海为家,树立起落地生根观念,去世后大多就地安葬,遍布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华人公墓(或称华侨义

山),其多姿多彩的丧葬文化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的一部分。洛杉矶华人社区建设朝气蓬勃,在诸如文教、福利、服务业等方面全面发展,成就卓著。象征慎终追远、孝思不匮的华人公墓亦已建成。

位于洛杉矶郊外的“洛杉矶华人玫瑰岗公墓”,落成后于1988年5月开启使用,这一由孙逸仙中文学校校长、校董和养生协会会长等共同筹划创建的公墓,为一个面向华人的服务性、非赢利性事业,其穴位均按照玫瑰岗公墓订的价格出售。该墓一共有5000个墓穴,地势高旷,视野广阔,风景优美。园内遍种世界各地的玫瑰,品种达1000多种。墓园幽香扑鼻,绿草如茵,不失为一个静穆人生的理想归宿之所。坟地均匀平整,泥土不准隆起成堆,下放一块铁碑,刻上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等,旁有插花小洞。每坟编号,执有证件。如夫妻俩一人先去,旁边可为生者预留空地。公墓先期开放“长生”、“长存”两块福地,如若经营情况良好,略有结余,准备为一些孤苦无依靠的华侨老人免费提供慈善墓地。

一些洛杉矶华人家庭的葬礼在玫瑰岗公墓举行,亲朋好友赴吊者均十分重视,穿上整齐的西服,佩戴黑纱黄花,肃穆地行礼如仪,并在棺材上献上红玫瑰,与死者告别。最后人们用绳子将棺材系牢,抬起后徐徐向坟坑下葬,哀乐阵阵,抽泣声响成一片,祈祷死者永得安息。

(三) 蒙特利尔公园市

蒙特利尔公园市(以下简称蒙市)华埠的形成,也是由于老华埠人满为患,发展受到限制而突破原有地界向四周扩展的结果,因此人们说它是洛杉矶的“新华埠”,或者说是洛杉矶的郊区华埠。在行政区划上蒙市为洛杉矶郡属下80多个市镇之一。该市位于洛杉矶以东5公里处,面积只有约8平方公里,三面有高速公路,交通十分方便。1985年时全市共有6万多人,其中亚裔占40%,西班牙语裔和英语裔各占30%。其中华人最多,共有2万多人,占全市的1/3以上,由

于华人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台湾,于是“新华埠”和“小台北”之名不胫而走。

作为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小镇,蒙市之所以会在美国各族裔中突然出名,恐怕与1983年冬华裔妇女陈李婉若宣誓就任蒙市副市长一职有关。由于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华人妇女出任副市长,故传媒争相报道,成为一条举国上下皆知的新闻,蒙市也由此而广为人知,连地图上也开始标上了地名。

蒙市的繁荣兴旺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并与许多来自中国台湾、留学美国、最后定居下来的教授、工程师、医生等科技工作者前往那里定居有关。后来又有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工商企业界人士携资前往,在那里经营房地产或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些人中间有些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们雄心勃勃,带来的资金动辄几百、几千万,将那里的地价和房价抬高了好几倍。1989年时,在蒙市的21家银行中,华人占14家,有四分之三的超级市场是华人开的。

蒙市华埠不像旧金山、纽约那么紧密、拥挤,大家分散在全市的好几处,彼此间有一定距离,每一处的街上都有华人经营的购物中心和超级市场,住在城外的亚裔人士也来街上购货、上银行和会亲友。城内有条名叫加维尔的大街,当地人都称它为南京路,此名反而比原名更响亮和广为人知。街上大饭店、酒吧、书店、电影院等一字排开,大部分由华人经营,中文招牌和广告随处可见。市内一共有60家中国餐馆和数家华人经营的夜总会。由美籍华人诸兆钧开设的“华冠阁”为蒙市最大的华人酒家。

台湾文化色彩浓厚为蒙市华埠的特色之一。在街上行走,处处能听到台湾话,台北一些著名餐馆的名称,在蒙市不时可发现,台北几家糕饼店的店名在此也能见到,台湾三家电视台的节目在蒙市也能看到,台湾的一些影视明星和歌星也常来蒙市演出。英语和华语为该市的日常用语,作为中国的一种方言——台湾话也是流行用语。

大量亚洲移民到蒙市来发展,给那里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失业率很低,家庭收入增加,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陈李婉若、赵美心等人相继出任蒙市副市长或市长,即是蒙市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个反映。

(四) 纽约

1869年横贯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修成后,许多华人陆续从西海岸来到纽约。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排华浪潮中,旧金山很多华人纷纷逃至纽约,因为当时位于东海岸的纽约其种族偏见要小一些。纽约的华人人口增加较快,例如1870年为120人,1880年达853人,1890年有2559人,1900年时已达6321人。以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主的移民队伍争相在勿街落脚,那里房租低廉,又靠近食物批发市场,副食品比较便宜。随着华人移民的越来越多,“自然形成了一个介于意大利、犹太两大社区之间的华人生活区域”^①,后来逐步拓展成“中国城”,或称为华埠和唐人街。

纽约早期的唐人街位于曼哈顿岛南端和百老汇东端,离著名的华尔街、世界贸易中心、炮台公园等观光点不远,由几条街巷组成。十九世纪末,华埠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勿街、披露街和摆也街一带。唐人街居民大都来自广东,故“广”字当头的商号特别多,如“广祥兴”、“广源盛”、“广生隆”、“广荣盛”、“广合利”等,从中显示出唐人街商业文化中的地缘特色以及讲究讨口彩、图吉利的习俗。在1900年美国市场出售的由艺术家设计、为华埠作宣传的名信片上,就有以勿街为背景的图案,可见那时华埠已成为供人们参观游览的旅游区了。

纽约华人最初由于缺乏资金,语言不通,故大都以经营餐馆、洗衣馆为业,开杂货店也是华人早期谋生的重要职业。自从1943年度

^① 郭征之:《华埠沧桑——纽约唐人街史话》,香港博益出版集团公司1985年版,第25页。

除排华法案后,唐人街的人口开始增加,华人社区开始复苏。二战以后,美国华人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1965年实施新的移民条例后,随着新移民的大量增加,华埠的范围逐步向四周扩展。八十年代,纽约唐人街位于曼哈顿区的下东城,包括以东西向的勿街、南北向的坚尼路两条交叉街道为中心的方圆约20多公里的范围,纵横大小32条街区,覆盖了按邮政编码的三个邮递区域,确实是一座城中之城。

纽约华埠商业发达,百业俱全,吃的、穿的、用的和玩的,应有尽有。繁华已逾百年的坚尼路,现正从过去的电器、家具、油漆和五金等批发商店演变为零售购物中心,狭长的、多门面的百货商场鳞次栉比,从包厘街到百老汇大道的东段街面,几乎全是珠宝行。纽约唐人街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各店铺都伸搭出摊档来,其利用“寸金寸土”设摊的本事,令人叹为观止!在街边、门口、拐角处商场摊档出售的商品,品种有水果、鲜花、饮料、海鲜、食品、衣物、手表和书报等,连油条、煎包、粥、肠粉、烧鸡烤鸭等也有售。纽约华埠小商贩的崛起,正在演变成华人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商业形态。

唐人街白天熙熙攘攘,人群川流不息,每逢周末或假日,茶楼、酒家全部客满,坚尼路、勿街、包厘街一带,行人摩肩接踵。商店门前五颜六色的店招、广告均用中、英文书写,许多商店里还播放着广东音乐或香港流行歌曲,店员不时用广东话吆喝着。人们日常交往,都用广州话、台山话,少数人用普通话、潮汕话或闽南话,若不是遵行美国法律的话,生活在这里,跟广州、香港无多大差别。

银行多亦是纽约唐人街的一大特色,华埠黄金地段的每一个角落和交叉路口,几乎全被银行占领,如今在纽约华埠共有30多家银行,由此人们戏称这是纽约“下东城华尔街”。纽约唐人街还以中国寺庙多而闻名于世,和尚庙、尼姑庵、道观等都有。香港名噪一时的黄大仙,也作为“侨仙”移居纽约唐人街,且仙寺有三处之多,吸引了不少

善男信女,香火鼎盛。八十年代以来,纽约华人的旅游业欣欣向荣,旅行社已发展到 200 多家,每天报纸上的招揽广告比比皆是。华人旅游业的发展,与纽约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加,不少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形成旅游风气有关。

在二战以前,纽约唐人街主要经营餐馆和洗衣店。此后,餐馆和制衣业成为纽约唐人街经济的两大支柱。早在十九世纪末李鸿章访问纽约华埠时,就有杂碎馆三四百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纽约华埠有餐馆 1500 多家,在勿街百米长的地方,就有华人餐馆 30 多家。位于包厘街的银宫酒楼是纽约华埠最大的酒楼,凡纽约华人社会有重大的宴请活动,常假银宫或金丰酒楼举行。人们只要从醒目的中文店招上,便可略知酒家的风味特色,如粤城海鲜酒家、浙宁嘉福楼、湖南园酒家、新成都等。有些较大的酒家,外面的装饰豪华别致,室内着意营造艺术氛围,藉此吸引顾客。为适应顾客快节奏的生活和车衣厂工人的需要,外卖和廉价快餐业也相当发达。唐人街餐馆的风味和品种丰富多采,从川菜、湘菜到北京烤鸭、台湾式蒙古牛羊肉火锅,从香港云吞、广东面条到上海小笼包子等,应有尽有。

曼哈顿唐人街始终是所有纽约华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游人进入华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方圆 100 多平方米的孔子广场。广场前面屹立着一座 6 米高的孔子青铜塑像,在大理石的基座上刻有金字“礼运大同篇”。孔子广场的背后是一幢 44 层高的孔子大厦。孔子广场民铁吾大街有著名的容闳小学,纽约华人社团如有重大的活动,如演讲会、讨论会、欢迎会、纪念性集会、庆祝活动等,常假座容闳小学大礼堂举行。纽约唐人街以独特的中华文化色彩,终年吸引着大量游客,成为纽约市旅游观光的热点。

纽约华文报刊之多,与华埠人口所形成的比例,常使西方社会惊讶和自叹不如。早期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有《美洲华侨日报》、《华美新报》等。在纽约唐人街书店的架子上和地摊上,摆满了各种华文报

纸和杂志。除了在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还有许多香港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报纸。这些报刊既是慰藉新老华人移民的精神食粮,也是唐人街文化的组成部分。纽约华埠主要的中文书店有三家:一家是以销售中国大陆图书为主的东方文化事业公司;一家是以销售香港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文具公司;一家是以销售台湾图书为主的世界书局。其中以东方文化事业公司最为著名,除销售图书外,兼营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和唱片、录像带等。

纽约唐人街很早就有了戏院,如“大中华戏院”和“中国戏院”等,常演出大戏(即广东粤剧)以满足居民的需要。自从电影和电视占领市场后,唐人街上开设了很多电影院,如新都、金都、华声、璇宫、新声等。

位于华埠包厘街 246 号的“纽约中国历史博物馆”,楼高 5 层,专门展览中国历代文物精品,有周代陶器、秦始皇陵兵马俑复制品、铜车马、诸葛亮七擒孟获战鼓、明清名画和瓷器等 200 余件。先前外籍人士来华埠参观时享受饮食文化——吃中国餐;如今吃饱喝足后再引导他们去看文物展览,俾使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更多认识。

自七十年代起,随着大批华人自中国台湾、香港移居美国,加上印支难民的涌入,使美国华人人数激增。据统计,1970 年时纽约有华人 69324 人,到八十年代末已近 30 万人。纽约唐人街已成为美国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华人社区。人口一多,唐人街就不断向外围拓展,形成如人们所说的“新华埠”。如果以上面所论及的曼哈顿区下东城为第一华埠的话,纽约还有三个新的华埠。第二华埠位于皇后区(当地华人叫昆士区)的法拉盛,在以缅街和罗斯福大道交叉处为中心的五六条街区内,以从中国台湾来的富裕华人移民为主,为此有“小台北”之称。两份华文大报《世界日报》和《侨报》的总部都设在那里,还有华侨文教中心。第三华埠位于布

鲁克林区第八大道中段的日落公园、羊头湾及卡纳西。这里的居民以近几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及东南亚来的华人移民为主。第四华埠位于皇后区的艾姆赫斯特地段，近年来聚居那里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并冒出不少餐馆和超级市场，由此正在形成一个新华埠。纽约新华埠是随着新移民大量增加，原有华埠无法适应商业、居住、政治、交通及文化娱乐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些华埠均出现于城市边缘地区，故新华埠又名“郊区华埠”。

（五）费城

费城是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历史名城，也是美国历史上的文化古城。200多年前美国脱离殖民统治时，就是在费城的商业中心敲响独立钟声的，至今那里还陈列着一座“独立大钟”供人参观。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西部不时发生歧视、驱赶华人的暴行，于是华人纷纷从西海岸转移到纽约，亦有一部分人来到马萨诸塞州、新泽西、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及华盛顿等地居住。

华人来到费城后，几乎全部从事洗衣业，开设的洗衣店规模很小，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新兴工业区，后来才逐渐分散。华人开设的洗衣店很多，1880年为29家，1891年为341家，1900年已达552家。费城唐人街约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位于累市街以及第九、第十街一带，此时已经是各类商店林立，市场一片兴旺了。

早期的费城唐人街风气十分闭塞，直至二次大战后，随着中国留学生、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多，华人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才渐次展开。战后，唐人街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在累市街、第九街、第十街和其他一些街区，不但商店林立，还有很多侨团。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费城的华侨华人人数不断增加，到1972年已有1万多人。新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也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唐人街居民原来以广东省籍为多数，后来变成多元化，例如有潮州人、客家人、台湾人、福建人、浙江人、上海人等。许多华人家庭分散居住在郊区，

在唐人街居住的华人并不多。但是华埠商业发展较快，马路两旁的商店也有特色，大型餐馆和超级市场以及密密麻麻的大小商店都竖立着中文招牌，书店、旅行社、银行、律师楼、美容院等应有尽有，店内商品门类很齐，琳琅满目。

六十年代初期，费城华埠面临因城市改造而能否生存的关键，“费城华埠发展公司”作为费城全体华人的代表出面交涉，据理力争，唐人街得以保住。但后来在市政工程施工中，占用了华人聚居区的一条主要大道和一部分唐人街，使华人聚居区的人口大大减少。

1980年中国天津和美国费城结为友好城市，为了纪念两市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费城华埠发展公司和天津市商定，在费城唐人街中心地带的第十街街口建造一座中式大牌楼。大牌楼由美籍华人设计师宋钱惠明女士提供设计方案，北京市古建筑工程公司协助施工。牌楼的主体结构为二柱三楼，高12.7米，跨度9.7米，气势雄伟。牌楼上苍劲有力的“费城华埠”四个大字，出自名家之手。1984年10月22日举行牌楼落成典礼时，费城市市长高迪和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出席仪式，并有舞狮表演，唐人街一派喜气洋洋。

在费城华埠中心有个消防站，其外貌也显现出中华风情。那里停放着数辆消防车，消防站正面的墙上书写着“防火保家”四个中文大字，大字上面还刻着一条五彩的龙。费城唐人街除那座中式大牌楼驰名以外，还有一座四层楼的宫殿式建筑——费城中华文化中心。这是一个旨在介绍中华文化、为费城华侨华人谋福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促进中美人民文化交流的机构。大楼的一层为大型餐厅，每年春节举行大型宴会时，常烹调中国的名菜佳肴。二楼为展览厅，三楼为图书馆，四楼为中国式舞台模型。大楼地下室特设置老人餐厅，凡费城的华侨老人，每天均可来此享用一顿免费中餐，有时还有老师专门辅导老人学英语、教授武术等。

二、加拿大

(一) 温哥华

温哥华,当地华人称云高华、云哥华,或简称为云埠。华人移居温哥华与修筑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1880—1885年)有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华人陆续前往加拿大,但当1887年2月23日火车修到终点站温哥华时,24日即发生排华暴乱,于是华人的聚居点不敢过于分散。温哥华唐人街随即形成,其商店集中于杜邦街两侧,介于今卡拉尔街与威斯特大道(今缅街)之间的一段尤其繁荣。1900年后的唐人街仍以彭德街(今奇化街)和卡拉尔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为中心,但华人店铺和社团已布满上海街与广东街,并向东、西伸展。

1947年5月排华法案废除后,移居加拿大的华人开始增加,特别是八十年代大批华人由中国香港移居加拿大,使温哥华唐人街地域不断扩大,人丁日益兴旺。例如1971年温哥华华人只有3万多人,1980年已有8万人,1986年已有14万人。温哥华唐人街位于市中心东侧,占地12个街区,其中片打东街和缅街十字交叉处为唐人街中心区,一直是汽车塞道,人如潮涌,一派繁华兴旺景象。

1986年上半年,唐人街街道和店铺进行了美化,新换上去的橙黄色街灯,亮度增加一倍,灯栏上挂起了有象征中华文化图案的旗帜。街上所有店招全是繁体汉字,电话亭也是屋檐飞翘,古色古香,用中文标出。唐人街上以广东话为通用语言。1986年5月世博会在温哥华举行,中国馆门口搭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华门牌楼,事后中国政府将其赠给卑诗省政府,安置在温哥华华埠入口处的中华文化中心门前。中华门不但成为温哥华华埠的象征和标志,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和中加人民友谊的标志。

当初从广东四邑、三邑来温哥华的移民,经过一个世纪艰苦卓绝

的开发建设,才有今日唐人街繁荣兴旺的局面。温哥华唐人街有以下几多:餐馆多、冷气巴刹多^①、银行多和医务所多。在缅街与片打东街交叉处的一些街道上,商店鳞次栉比,既有中国式服装鞋帽、中药、土特产、家具、手工艺品,也有空运去的鲜藕、广东鲜荔枝、四川榨菜和湖南辣酱等。在唐人街上,走不多远就能见到一家银行,粗略统计,唐人街共有 13 家银行,每到中午,是各银行最繁忙的时候。医务所多,是为了病家看病方便,里面设有许多专科门诊,医生中有土生土长的华裔,也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随着新移民的增多,唐人街上新开的茶楼、酒家和饮食店越来越多,如在登打士街上,人们可看到新光酒楼、龙凤茶楼、吉祥酒楼、国都酒楼等。唐人街的茶楼餐馆中也时常有当地人和西方游客光临,他们对中餐的点和菜肴均赞不绝口。

温哥华有多家中文报刊,美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在温哥华也颇流行,唐人街的许多商店里摆放着多种中文报刊,华人在购物时顺便买几份带回去阅读,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成立于 1973 年的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在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中加文化交流方面相当活跃。在该中心大会堂内,经常举办艺术展览,或者邀请各艺术团体演出。例如在一个名为“东西方文化对艺术家作品发展影响”的展览中,有篆刻、图画和现代雕塑等 100 多件参展作品,许多史家在参观后评论说,这些参展作品是唐人街文化的精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延续。

“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粤剧”,此话不无道理。成立于 1988 年 10 月的温哥华悦声广东曲艺粤剧研究学院,不时在文化中心演出。该院进行 4 周年院庆演出活动时,先后登台的演员共有 51 人,演出 3 个

^① bazaar,意为东方式集市,既有摊位、排档,又有商店、商场,类似今日中国大陆城市的集市贸易市场。

折子戏和7个粤曲独唱、清唱和小组唱。演员扮相俊俏,行腔婉转,表演细腻,韵味浓厚,观众反响热烈。粤剧在华侨华人中广为普及,粤剧之花盛开在温哥华唐人街。

每年春节期间,温哥华唐人街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充分显示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特点。在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的“花市”,群芳吐艳,美不胜收。其品种有玉兰花、桂花、桔子花、茶花等,每盆约50加元左右,购者踊跃。门外还有冰雕装饰,因气温很低,故冰雕保持得很好。各个年货市场都有娱乐节目演出,边买年货,边看节目。中华文化中心除举办各种展览会外,有时还在电视台举办大抽奖活动。由体育、舞蹈、舞狮等队伍组成的大游行,在街上沿门采青贺岁,以示吉祥,观者人山人海。游行队伍中卑诗大学中国音乐团用二胡、扬琴、箫、笛等乐器演奏的节目悦耳动听。士达孔拿中华舞蹈团、士达孔拿公立学校、桑尼斯小学等常在中山公园内表演精彩的节目。许多华人社团和家庭常假座唐人街各大酒楼举行春节联欢或春宴,到处喜气洋洋,其节日气氛之浓厚有如香港,为此温哥华唐人街又有“小香港”之称。

原是中国端午节传统节日的龙舟赛,也已落户加拿大,加拿大国际龙舟节已成为体现温哥华多元文化的重要节目。

八十年代,大量香港移民涌进温哥华唐人街,使那里人满为患,发展饱和。于是,许多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在温哥华郊区的列治文(又译里士满)发展,不少农田如今已变成了新的建筑群。由于那里的商场、购物中心多,中国式茶楼、餐馆多,熟人和朋友多,故新移民可保持香港式的生活习惯。人们将香港新移民的这一聚居点称为“里士满新唐人街”。^①

^① 黎全恩:《加拿大华埠发展史》,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164页。

(二) 维多利亚

华人来到维多利亚(华人称为域多利、百子利)后,以开采金矿、修筑公路和太平洋铁路、上罐头工厂或船坞做工为业。“淘金热”冷却和铁路修成后,一些无钱回国的人便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维多利亚,以小本或合伙经营,开设洗衣店、餐馆、杂货店和客棧等谋生。维多利亚唐人街形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加拿大最早形成的唐人街之一。维多利亚原是相当荒凉的地区,大量华工的涌入后才开始热闹起来。1881年时维多利亚市的总人口只有6000人,而唐人街上就有华人2000人。

维多利亚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口岸,很多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侨皆由此过境,差不多等于美国的“金山大埠”,当时有商店百余家,还有三家演出粤剧的公司以及一些娱乐场所。当时维多利亚唐人街是加拿大“最发达的唐人街”^①。维多利亚唐人街由纵横十来条街巷组成,东西向横街有女王大道、公主大道、彭布罗克街、发现街、查塔姆街、先驱街、菲斯加德街、科莫兰特街、约翰逊街等,南北向直街有斯托尔街、政府街和道格里斯街等。在菲斯加德街南端有华侨医院、人和堂、谭公庙、中华会馆和华侨学校等。在科莫兰特街与菲斯加德街之间,有番摊巷与戏院巷相通,那里是华人的娱乐场所。

谭公庙内奉祀谭公爷爷神像。相传此像于同治年间(1862—1874年)由一客家侨胞从祖国带来,至光绪初年才由华侨魏四设庙奉安于唐人街。1885年,中华会馆在先驱街建立起一座“太平房”,供生病的华侨疗养,相传这是加拿大华侨社会有中华医院的肇始,1982年改建为疗养院。该院的建立为那些年老有病而又无人照顾的华侨老人提供了一个家。

^① 李胜生:《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2页。

从1979年起,维多利亚政府投资上百万元,对这一古老的华埠及其周围环境进行改建和美化,使之焕然一新。1980年在唐人街建造了一座设计新颖、古色古香的大牌楼“同济门”。“同济门”两旁的横额为“同心”、“协力”,其意为整个华人社区和睦相处,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牌楼两旁的一对石狮是苏州市赠送的。牌楼高大雄伟,朱红的柱子、古色古香的街灯、飞檐画栋的楼宇,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放射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光芒,从而为这座素有“花园之城”称号的滨海城市增添了几分古朴幽雅的美感。历史悠久的番摊巷也进行了改造和美化,1984年安上了番摊的路标,那里开设了一些画廊和艺术工作室,日后将逐渐形成一个艺术区。唐人街上一些餐馆、酒楼、杂货店、绸布店和工艺品商店的布置和装饰,都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由于工业不发达,旅游便成为维多利亚维持经济繁荣的重要行业,唐人街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观光点。

(三) 多 伦 多

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完工后,许多华工开始失业,维多利亚街头充塞着大量失业华工,有些人就在铁路沿线城市谋生,更多的人向东部迁移,来到蒙特利尔和多伦多。1911年时多伦多有华人1099人,1921年为2134人,1931年时为2633人。多伦多唐人街形成于1900—1910年间,具体方位在约克街、皇帝街和皇后街一带。1947年5月排华法案废除后,一些入籍华人的妻儿获准赴加与亲人团聚,衰落的华人社区开始复兴。在六十年代的多伦多城市改建中,老唐人街被拆除,1971年新的唐人街向北迁至登打士街和伊丽莎白街一带,具体方位为西靠大学街,北面为爱德华街,登打士街和伊丽莎白街在华埠中心交叉。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八十年代,大量香港移民涌入,多伦多唐人街又有新的发展,即逐步沿着登打士街越过大学街向西发展,登打士西街与士丹巴拿街形成新的华埠中心。那一带唐人街的风情,

颇像香港新界的市镇,港味十足。在习惯上,人们常将1971年迁到登打士街和伊丽莎白街一带,后来又越过大学街在登打士西街与士丹巴拿街形成的唐人街称为老唐人街。

在这纵横交叉的几条大街上,有传统的二三层高的旧式楼宇,间有七八层高的新型商业大厦。在那五光十色的中文广告和店招下,餐馆、酒楼、银行、旅行社、电影院、贸易行、金银首饰店、海鲜产品店、录像带出租公司等一字排开,生意兴隆。在唐人街的杂货铺、食品店中,广东的生抽王,桂林的腐乳,湖南的辣椒酱,山东的泡菜,香港的蚝油,台湾的大米、木耳、香菇和菜心、芥蓝等蔬菜,应有尽有。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人,家乡的食品,时时浮现在华人心中,他们去唐人街购物,一买数件,或者成箱成批买回家,慢慢品尝,藉此聊慰思乡之情。

自八十年代起,多伦多逐渐成为加拿大人口最多、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亦成为加拿大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一些来自香港的华人携带巨资而来,他们购土地,建新居,从而又冒出一个新的唐人街,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奇。新唐人街在多伦多市东区的士卡波洛区(又译为士卡堡),这里满眼是新型的商业大楼,有餐馆酒楼、食品杂货店、超级市场、发廊、房地产代理商行、旅行社、面包房、牙医所、中医针灸所等。马路开阔,两旁店铺比较西化,装饰豪华。有些香港移民还买下整座商场或购物中心,据店主说,他们的顾客中70%是华人,25%是菲律宾人,其余5%为其他族裔^①。唐人街店铺的招牌都是中文,连路牌、政府银行、电话亭以及附近一个警察局都在英文旁加上了中文,令人一目了然。宽阔的马路上车流滚滚,人行道上行人摩肩接踵,一片嘈杂的粤语声,新移民见此景象不由慨叹,称这里为“小旺角”。

^① 黎全恩:《加拿大华埠发展史》。

随着新移民的增多,多伦多唐人街的中文书店也越开越多,这些书店经销来自香港的画报、杂志、言情小说、武打小说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章回小说。有些书店也经销来自中国大陆的娱乐性期刊,如电影、体育、旅游、医药卫生、烹饪等杂志。本着为当地侨胞提供文化服务,为华人社区多元文化作出贡献的目标,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附属企业世界书局于1987年4月18日在多伦多开张营业。该书局设在闹市区中心的唐人街士巴丹拿街305号,揭幕仪式极其隆重。在唐人街的天主教华侨中心大礼堂里,还举办过几次规模盛大的多伦多中文书展。

多伦多的30余万华侨华人,在和当地民族共庆圣诞不久,又迎来传统的新春佳节。多伦多华商会常在市政府大厅举行新年演出和游艺晚会,表演舞狮、中国功夫、中国民族舞蹈等。演出结束离开会场时,每人都可获得印有“吉祥”字样的小红口袋,里面装有一些硬币,藉此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发财交好运。华人社团和华人家庭常在唐人街著名的酒楼举行聚餐活动,大家围桌畅饮,共享节日欢乐。香港文化色彩在这里十分明显。在唐人街有时还举行“财神”巡游,队伍向各大商店送“财神”贺岁,以图吉利。因这位中国式“财神爷”的形象与圣诞老人相似,洋人也能理解和接受。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华人的文化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多伦多有华语广播电台和华语电视台,其中华声电视台于1984年9月正式开播,以“服务华人社区,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办得很有特色。一个多世纪以前,广大华工流血流汗修建太平洋铁路,为加拿大在政治和地理上联成一片作出贡献,其不朽业绩已受到加国政府和人民的肯定,多伦多铁路华工纪念碑的建立即是最好的说明。在多伦多士巴丹拿街市立公园的入口处,如今矗立着一座高35英尺的铁路华工纪念碑。纪念碑耗资加币20万元建成,由两座架柱桥组成,顶座为铁路轨道,两座真人一样大小的华

工铜像分别站立在桥脚和铁轨上，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华工修筑铁路时的情景。

多伦多唐人街为北美新型的唐人街，平时人头涌动，熙熙攘攘，既是多伦多市充满生机的地区之一，又是一个富有东方文化魅力的旅游观光点。

（四）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华侨叫满地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汇合处，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华人来到魁北克省谋生的时间较加拿大其他省略晚，据资料统计，1881年时蒙特利尔才有华人居住，到1901年全省有华人1037名。由于缺乏资金，加上语言不通，只能做些小生意，开设洗衣店成为主要职业。相传蒙特利尔的第一家华人餐馆于1900年在圣洛伦区开张营业，此后发展较快，1915年有25家，1921年时达55家，1925年时已有81家。

蒙特利尔唐人街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位于旧蒙特利尔之北，即在拉哥舍蒂埃西街和克拉克街一带，刚好处于今天蒙特利尔市区通往游览区之间，都是些破旧的住房，砖铺的马路高低不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移居加拿大的华人增加速度很快，大批印支难民的移入，使那里的华人人数猛增。八十年代时，大批来自香港的华人移居加拿大，他们到了魁北克省后，十有八九去蒙特利尔定居。1986年时全市有华人2万余人。

尽管1986年通过的加拿大《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在蒙特利尔华人社区中，常面临着语言“抉择方向”——说法语还是说英语问题的困惑，大多数华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特别是设法让自己的孩子进英语学校上学。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华人尤其是如此。在语言派别之争中，当魁北克派规定法语为该省唯一语言时，1975—1977年间，大约有1000多个华人家

庭因这一语言法案而离开了蒙特利尔市。^①

蒙特利尔是个以法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其建筑物和街景都充满法国情调,既富艺术性,又富浪漫气息。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唐人街逐渐兴旺起来。唐人街毗邻市商业中心,尽管唐人街在市内所占的面积不大,但街上店铺林立,颇为热闹。街上酒家、茶楼、杂货店、百货店、贸易公司、超级市场、工艺品商店、书店、戏院、针灸医务所等一字排开,生意兴隆。商店以经营餐饮业者最多,如畔溪、凤城、醉琼楼、西贡水晶餐厅等。其中的金丰酒家相当出名,华人社区凡逢规模较大的喜庆活动,常在该酒家举行。蒙特利尔市议会于1988年1月宣布华埠为旅游区,因此华埠内的商店在星期日照样能开门营业。沿着华埠一条名为古支提多街的街道向前走,但见街道两旁布满了商店,街上行人川流不息,街道的头尾建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满地可华埠”牌楼,许多观光客在此摄影留念。在克拉克街西北拐角处有一个宝塔公园,内有凉亭。蒙特利尔华埠有一座中国隋唐风格的宝塔,塔高五层,尽管塔身结构简单,却是北美最早、为数极少的佛塔之一,亦是蒙特利尔华埠的标志之一。

蒙特利尔市有两座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一是由蒙特利尔市和上海市合作兴建的中国式园林“梦湖园”,位于奥林匹克中心对面的植物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景色秀丽迷人。一是位于唐人街的“假日枫华苑酒店”,其地基由蒙特利尔市市政府以最低价格出售,那金黄色的琉璃瓦,衬托出屋顶上的一座方亭和一座八角亭;顶层的高级客房外面,有汉白玉栏杆的阳台;大堂内的装饰为中国江南园林风格。

^① 黎全恩:《加拿大华埠发展史》,第150—151页。

第六章 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

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华侨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一节 宗教信仰

华侨华人社会流行的宗教主要有四种,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而作为信仰则远不止于此。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特点在于:首先,是诸神合崇,多神敬仰。其次,将自己的传统信仰宗教化,如在东南亚华人中有三教(孔教、佛教、道教合祀)。再次,民间信仰名目繁多,诸如妈祖、天地鬼神和列祖列宗等都是崇祀的对象。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已成为华人文化衍传的重要内容。

一、对世界三大宗教和道教的信仰

由于华侨华人所处国家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他们信奉的宗教门类也各有侧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都为华侨华人在各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信奉着。

（一）对佛教的信仰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西汉时传入中国，至唐代而极盛。经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碰撞，佛教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出国，在所在国形成佛教信仰群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泰国华侨信奉的是大乘佛教，也称华宗佛教，是随着华侨传入泰国的。续行法师开山龙莲寺，成为泰国华宗僧众的开宗祖师，受拉玛五世御封为首任泰国华宗大尊长，隆极一时。第三、四、五代大尊长时，教务冷落，地位日降，至第六代华宗大尊长普净法师始兴教扬宗，建寺修刹。1947年，开山普仁寺成为泰国依律剃度受戒的第一座合法华僧寺院。由于华宗僧侣门派不同，1954年，泰国僧侣委员会任命华宗长老比丘组成华宗僧务委员会，统管在泰华僧和大乘佛教寺院，普净法师为首任主席。并恢复供养迦缁那衣礼。历代华宗尊长均由泰国僧王御封，国王赐封华宗僧爵和法扇。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泰国华宗属下有佛寺21座，其中曼谷即有13座。华宗僧众与泰国的小乘佛教僧众共尊泰国僧王为泰佛教界最高领袖。

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曾为英、荷、西班牙殖民地，受欧式宗教影响的国家，华侨华人也多沐佛教之风。在新加坡，1926年由太虚法师倡议成立新加坡中华佛教会，1950年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取代前者在佛教界的领导地位。1956年设佛教冢山。1969年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并建立了佛教施诊所，免收医药费。还办有菩提学校、文殊中学等华文学校。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仍作为华人重要的佛教团体而存在，1981年拥有团体会员131个，内设福利会，并于每年阴历七月十一、十二日举行盂兰盆会。

马来亚正规的华人佛教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1904年檳城占地9英亩的极乐寺落成是其标志。该寺开山祖为1887年来马来亚的妙莲法师。不久，本忠法师组织南洋佛教会，作为中国佛教会的一个支部，并创立了“念佛莲社”，1922年另建观音寺，作为极乐寺的分

院。此后,马来半岛庙宇蓬勃兴起,较有名的如洪福寺、慈航阁、妙香林、香山寺等,均有一些高僧于此讲经。1939年创办菩提学院,1946年、1954年先后设立菩提小学和菩提中学。1959年,马来亚佛教总会(即后来的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为全马佛教界最高组织,后发展有团体会员300余个,代表佛教徒10余万。1970年在檳城设立佛学院,专门培养佛教僧尼和弘法人材。同年,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成立,成为佛教界的生力军^①。据1970年人口普查时对西马华人宗教信仰的调查,信佛教的占78.9%,信伊斯兰教、兴都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分别为0.2%、0.1%、3.5%、12.4%,另有无信仰的占4.9%^②。这表明马来西亚华人佛教土壤的厚实。这种情形到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不过,马来西亚的佛教庙宇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在早期的青云亭、三宝洞中就有众多神灵合祀。如青云亭,1673年建于马六甲,几个世纪来多次整修扩建,以奉祀观音为主,兼祀大伯公、土地神、三保公、关公、孔夫子等,还供奉大量的华人先民牌位,主要活动是办理华人丧葬和清明祭祀,创办义学和慈善机构等。青云亭这一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庙宇,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最好见证。

青云亭之外,西马最富历史意义的观音庙是檳城的“广福宫”,系1800年由粤籍、闽籍侨商出资兴建。宫里主祀观音,配祀的神灵有道教的天后圣母、注生娘娘和金花夫人,以及大伯公和关圣帝等,左廊另有三宝殿。富商巨贾每逢作出决策之前,都要来此掷签问卜。神诞之日,更是当地华侨演戏、狂欢的地方。多神敬奉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一大特色。

先天教是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主流。这种宗教是佛教的一个异

① 八十年代,该会拥有团体会员80余个,代表约2.5万名年轻的佛教徒。

② 骆静山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第410页。

端。先天教创于中国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0年),原叫“罗教”或“罗祖教”,祖师系山东人罗清,徒众多为水手和运输工人。该教奉禅宗始祖达摩为正宗,尊奉六祖慧能,主张“不住斋,不住戒;逢世救劫,因时变迁”。明、清时该教被目为“邪教”。约1860年先天教传入西马。由于它不注重仪式,不受戒礼,故很快受到欢迎。檳城的“善化堂”、“大生佛堂”、“大圆佛堂”等较为有名。斋堂有男、女之分,通常是按地缘、方言群体而建立的。先天教流行的经卷是佛、道参半,包括佛教的“寿生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以及道教的“南斗经”、“关圣帝真经”和“玉皇真经”等。

在印尼,华侨建立的庙宇甚为普遍。1958年5月,在三宝垄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佛教协会,会众多为华人,1970年与印尼清信士女联谊会、印尼青年佛教徒运动协会等合组印度尼西亚佛法协会。

在菲律宾,佛教随中国闽、粤一带移民传入菲岛。1931年华侨佛教徒成立旅菲中华佛学会是一发展契机。1936年在马尼拉市那拉街兴建大乘信愿寺,开菲律宾正统佛教之先河。次年,闽南性愿法师赴菲弘扬佛理,领众玄修,使信愿寺香火旺盛。1948年瑞公法师继任主持,寺务迅猛发展,使之成为全菲佛教的领导核心,附设有信愿合唱团、青年佛学社等。至1987年,全菲计有佛寺27所,较著名的有马尼拉的信愿寺、华藏寺、普陀寺、宿燕寺、宝藏寺、莲花寺和观音寺;碧瑶市的普陀寺;宿务市的佛光寺、普贤寺;达沃市的龙华寺;三宝颜的福泉寺等。诸寺除举行诵经、拜忏、念佛等传统仪式之外,还举办佛法讲座、精进音乐团、青年活动中心、信愿合唱团、青年佛学社等。佛寺捐办的学校有马尼拉的普贤学校、能仁中学、乘愿学校,宿务市的普贤中学分校,三宝颜市的观音学校等。《甘露双周刊》、《慈航》是两份较有影响的佛教杂志。通过举办佛教岁暮慈赠会(始于1956年)、华藏寺佛教乘愿安老院、文莲施诊所、观音寺星期日义诊、菩提福利会以及利用佛教传统节日举行

的各种活动，在华侨华人中树立了良好的教派形象，是非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之一。《文莲施诊所歌》云：“人生在世，多灾多难，又为病死，时时相随。本慈圣意，行菩萨行，离身心苦使安乐。报佛深恩，报众生恩，不怕苦来不怕难，精进不退，牺牲小我，献身佛教，任劳任怨。文莲施诊，造福群生。”菲华佛教徒的最高组织是1953年成立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菲律宾分会。

在东亚，朝、韩、日等国佛教盛行，华人信佛更成自然。唐朝鉴真和尚东渡，至明清时名僧纷纷落居东瀛，使日本佛教迅速发展，自成特色。十七世纪日本长崎形成了“唐四福寺”，即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等，成为苏、皖、浙、赣等省籍华侨组成的三江帮和福建的泉漳帮、福州帮以及广东帮的一种社会组织。这种寺名义上是佛庙，实际上供奉的除观音外，还有天后圣母妈祖、关帝圣君等诸神。长崎最古老的净土宗寺院是1598年建的悟真寺，1602年中国漳州籍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奉该寺为华侨共祀之菩提寺，并置义庄于寺畔，“为旅崎乡人身故后，一时不能归梓里，暂时寄葬之所”。宗教场所往往是华侨华人社会活动的中心，是维系社群内联系的重要机制。

美洲等地华人对佛教的信奉更说明佛教特别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华人精神生活的特色之一。美国华人佛教之兴是战后的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相继有华人佛教徒结社，试图形成声势。1958年女居士果正、果式在旧金山创办三藩市佛教讲堂，宣讲大乘教义；1963年三藩市佛禅堂落成，有5层楼高，名噪一时。1959年成立的美洲佛教会是美国华人的最高佛教组织。信佛之外，供祀诸神也为美国华人所遵循。1956年道长伍佩琳于旧金山创建了集佛、道、儒于一体的正善佛道研究会，供吕纯阳祖师、道家老子和观世音菩萨，以忠孝廉节义信惠礼仁为道规。通常赠送劝人行善尽孝等佛书；逢初一、十五集会宣扬教义；捐款救助受灾及困苦民众。

1980年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华佛学会,旨在“发扬中华文化艺术道德传统,协助各民族融合于澳大利亚社会,弘扬佛学慈悲乐善无我精神,争取同胞福利事业团结大同”。初时会员仅22人,后有500余人,并拥有1.6万平方米的大佛堂。

总之,华侨华人群体中的各种佛教会、念佛社、佛学会、弥陀法会和佛教联合会等,构成了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对基督教的信仰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也是华侨华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分为新旧两派。旧派即天主教,新派即今之基督教。七世纪时,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后中断。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时,天主教传入中国,其后匿迹,迨至明朝神宗时(1573—1619年),天主教传教士挟西洋科技文明流入中原,天主教再次传入。1807年今之基督教传入中国,1929年基督教各派在中国成立基督教协进会,大倡“中华归主”运动,并波及海外华侨社会。此实为影响华侨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一大动力。

华侨住在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则是他们进行宗教选择的又一重要动力。这点在西方如欧美国家或有殖民地史的国家表现尤为突出。

在东南亚,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华人以菲律宾为最多,其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这是西班牙人自十六世纪以来对菲律宾进行长达300余年殖民统治的结果。这里的华人也难免受天主教文化的熏陶及其势力的影响。有趣的是,华人天主教较之传统天主教已有较大的变异,即它披上了华人宗教信仰文化的外衣,具有多重性。如在马尼拉敦洛区的千佛寺中,排放着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大小1000尊各类神像。华人办事时要看生辰八字,日子的吉凶;孩子必须进教堂受洗礼,结婚须进教堂由天主教神父主持;盖房建厂要看风水,落成时要请天主教神父来祝福。纯

粹的华人天主教徒同样保留有华人的传统信仰。

新、马华人中信仰基督教者颇众。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六甲就有一些华人改信基督教,随着讲英语的侨生群体增强,入教者也趋众多。1833年马六甲就有4所招收华人子弟的教会学校,到1956年,由卫理公会主持的英文学校有50余所是由华人任校长。华人在教会学校受教育,自然多为教徒。1979年西马有华人基督教会227个单位,徒众177800余人。新加坡华人在1889年即成立了基督教团体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首届主席为宋旺相。该会1908年还成立了读书俱乐部。二战后,新、马基督教各宗派尝试进行合作,成立了三一神学院,为新教的圣公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等训练牧师;后又成立了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据华人学者邱新民先生的统计,至七十年代末新加坡的基督教会及教堂主要有:圣公会、神的聚会、兄弟会、浸礼会、圣经教会、基督团传道会、基督教堂、自由传道教堂、东方正教、路德教堂、美以美会、长老会、笃信圣经长老会等近20种,教堂186所,教徒113657人^①。基督教与华人传统宗教在华人社会和睦相处,并日渐走向对话与沟通。

华人基督教徒倡导以善为本,善以待人,热衷于华人社会的慈善事业。如创办医院、学校、红十字会和救世军等,尤以办救济院、医院、孤儿院、青年会等造福华社之举为多。

至于欧美等地的华侨华人,信奉主流社会的基督教更是平常之事。

(三) 对伊斯兰教的信仰

伊斯兰教约在七世纪传入中国广东,再传至西北。后广东、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伊斯兰教徒甚众,中国海外移民中有许多就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多定居在中亚、西亚以及马来西

^① 邱新民:《新加坡宗教文化》,1982年,第416—423页。

亚、印尼等地。

在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华侨华人多数受主体宗教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等地,约有7万余回族华侨华人即东干人。其先人主要是在清后期从中国西北部迁入。二战后,回族华人中涌现一批汉学家、语言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日常用语基本上是汉语方言;他们所修建的礼拜寺也带有中国建筑艺术风格。另外,中国的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多信奉伊斯兰教。依规,新疆每年都有许多穆斯林到麦加朝觐,部分朝觐者滞留不归,这是沙特阿拉伯4万余华侨华人形成的主要原因。^①

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间有华人受其影响而信奉者,异族通婚、与马来人毗邻等是华人改变信仰的重要原因。1931年至1971年间,华人穆斯林主要是在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等州。1970年西马有5342名华人穆斯林^②。七十年代以来,马来人优先政策使许多华人改信伊斯兰教,其他原因有跟随朋友入教、敬仰伊斯兰教价值、方便做生意、受马来朋友影响和住家靠近伊斯兰教堂等。八十年代后,全马伊斯兰福利机构和中华伊斯兰协会竭力向华人宣传其教义。

在印尼,十八世纪即有许多华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受到荷印政府的禁止。1965年“九·三〇”事件之后,当局试图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以在文化上同化华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其实,二战前印尼华人伊斯兰教协会就已成立,此后日趋活跃。该组织致力于劝导中产阶级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刘泉道较为突出,他所成立的伊斯兰教兄弟基金会曾与穆罕默德迪亚大学联合主办伊斯兰

^① 《新疆通志·侨务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② 林水榛等:《马来西亚华人史》,第443页。

教与民族融合研讨会。1970年,印度尼西亚中华伊斯兰教协会在全印尼设省级地区理事会11个、支部22个;1972年该会解散,成立伊斯兰神人合一信仰建设者协会,在华人社会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

(四) 对道教的信仰

道教是一种源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继承了这种文化。东南亚华人在受道教文化影响方面较之其他地区为深。

新、马地区的道教与中国正统道教已有很大不同。一些地方的道士除了在旧式华人葬礼上超度亡魂之外,对于道教内涵几无所知。道教的典型场所为道观,祀奉太上老君、太乙天尊、玉皇上帝等神灵。如二十世纪初有槟城垅尾的“自由观”和海客园的“成化堂”等。七十年代,陈方在《成为我异象》一书中估计,新加坡道教徒占华人总数的38.2%。1974年,福建、广东及海南籍道士创立了新加坡三清道教会,首届主席陈国显,每年庆祝教祖圣诞,中元节等也有活动,但祭拜的对象逐渐演变为祖先及鬼神。1989年,马来西亚中华道教道学研究会成立,旨在发扬道教的传统,提倡与友族和平共处,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建立一个安乐、稳定、强盛的马来西亚。华人道教活动已有明显的当地化特点。

二、德教、孔教与三教

(一) 德教

英文名为 Moral Uplifting Society,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慈善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见于中国广东潮汕地区,二战以后传至东南亚地区。该教自诩崇奉“世界五大宗教”教义,即儒教的忠恕,道教的崇德,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慈恕。主张用实际行动来发扬德教和积德扬善的精神,宣扬华族十大美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还有八大良规,即不欺、不伪、不

贪、不妄、不骄、不怠、不怨、不恶。

德教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是与道教的衰微相联的。主要从事慈善和福利事业,如开设免费诊所,救济穷人,设孤儿院等。起初,德教尊奉太上老君为始祖,后来才倾向佛教,乃至扩大至“五教同源”。第一个德教的道场“紫香阁”(创于潮阳县),所奉师尊有三个,即道士杨筠松、柳春芳和宋大峰。后逐渐引入诸佛仙尊,包括观音菩萨、济公、九皇大帝、土地神、黄大仙、天后圣母、齐天大圣、华佗、鬼谷子、岳飞、关羽以及八仙等。1944年,德教会将《老子》八十一章改编成五卷的《道德意识》,视为经卷。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德教会称为“阁”,成员多是潮州籍人,会内潮州话通行无阻。1952年,马来亚怡保市成立第一个德教会,称为济德阁。1954年,新加坡华人成立紫新阁。其后德教会均分别冠以“紫”字或“济”字,并据此分为紫系和济系两大派。1956年,紫系8个德教会在怡保集会,决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德教总会。该会在马来亚联邦的注册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德教联合会。1972年,马来西亚社团(修订)法令规定,本国社团职员必须为马来西亚公民,马来西亚德教联合会遂脱离南洋德教总会。后来,又出现两个较小的派系,即赞化系和振系。这时,马来西亚40余个市镇设立有德教道场,其中紫系占63所,崇祀济公的济系占9所,振系占9所。

1985年,马来西亚德教联合会会长为黄锦添。时年马来西亚有德教会61个,新加坡有5个。

(二) 孔 教

孔教即儒教,是印尼等地华人以孔子及其学说为信奉对象的宗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孔教思想已在印尼传播。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南洋,对于孔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会馆致力于改革印尼土生华人风俗习惯,大力提倡孔子学说。后来因中华会馆主要致力于创办华文学校,有志于传播孔教者遂成立孔

教会。

1903年,中华会馆宗教组负责人李金福发表长文《华人的宗教》,认为:“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华人文化存在于四书与孝经,即孔子的学说。”“孔教是华人文化中最主要的成份。所以,在荷属印尼的华人有义务遵循孔子的教义”。“孔子并没有为人类创立自己的条规,但是他引用了古代圣贤的学说,才创出了许多教条。凡是孔教的信徒,都要遵守这些教条”^①。中华会馆已把孔教作为一种宗教,这为孔教会的分立奠定了组织、要义的基础。

孔教会以孔子为圣人,视四书五经为孔教的圣经。诸如《大学》、《中庸》、《孝经》被译成马来语。

1955年,作为孔教团体联合会的孔教总会在雅加达成立。诸如梭罗、泗水、万隆、玛琅、井里汶、茂物等地的孔教会相继成为会员。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称印度尼西亚孔教中央理事会,同年在梭罗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了孔教信徒在“礼堂”祈祷时的各种仪式,仪式由孔教教士主持。教士有三等,即学师、文士和教生。以四书为圣经。

孔教是印尼政府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孔教徒们努力使孔教演化成一种相当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至1972年,全印尼有26个孔教会。孔教徒原多为土生华人,但随着同化政策的推行,土生华人越来越对孔教不感兴趣,使该教的发展前景暗淡。

(三) 三教

三教是印尼华人孔教(儒教)、佛教与道教的三合一组织。1934年5月,由郭德怀创立于巴达维亚。该教旨在统一、弘扬和信奉孔教、佛教和道教,将孔教的虔诚、佛教的超凡以及道教的养性分别或结合起来加以倡导。旋又创办《三教月报》作为机关刊物,以宣扬三教。同

^① 转引自廖建裕:《孔教在印尼》,《亚洲文化》第6期。

年,谏义里成立三教第一分会。

1935年,万鸦老、直落勿洞、巨港、三马林达、乌戎潘当、锦石、芝特乌鲁普、坦佩等地建立分会。

1952年,印度尼西亚三教联合会成立。1953—1970年,该会主席为丘恩谦。1955年,该会在全印尼有33个分会。同年还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三教男女青年会。出版《三种文化》月刊,以宣扬三教教义,交流信息。1982年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民间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是世界上最复杂、最丰富的,中国民间信奉神灵之多是绝无仅有的,这些神灵包括亡魂、精灵、鬼怪等。海外华人民间神祇崇拜主要有亡灵崇拜,如中国历史上有名而功在社稷的先王、先公、先师、功臣、名将及有特殊德性的人,包括关公、包公、鲁班、神农大帝、轩辕老祖、水仙尊王、至圣先师、赵子龙、孔明先生、妈祖、保生大帝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郑和(三保公)、叶德来、曾其禄、郑芳扬、李君常、张理等。祖先幽魂等也属崇拜之列。

通常华侨华人奉祀神明的情况如下:

农历正月一日天神下降;正月九日天公;正月十五日三官大帝;二月二日顺德正神;二月三日文昌帝君;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三山国王;三月三日元天上帝;三月十九日太阳神;三月二十三日天后圣母和大道公;四月八日哪吒太子;四月十四日孚佑帝君;四月二十五日注生娘娘;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五月十一日城隍爷;五月十三日关圣帝君;五月十八日张天师;六月六日三山国王夫人;六月十九日观世音;六月二十三日灵官大帝;六月二十九日土地爷;七月七日七圣夫人、花公花妈和魁星爷;七月二十三日招财爷;七月二十四日司令

帝君；八月五日老郎先师；八月八日八仙过海；八月十五日月神；九月三日华佗；九月九日仙公、元天上帝飞升；九月十五日火帝夫人、韩文公；九月十九日元师老爷；十月二十七日南斗北斗星君；十一月十四日五谷老爷；十二月二十日鲁班先师；十二月三十日诸神上天。

其中，崇祀较多的当推这样几种：

大伯公，也称土地爷、土地神或土地公。泰国与越南的华侨称之为本头公，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侨称之为大伯公。关于其来历，有四种说法：一说原系会党人物。一说为吴太伯，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一些吴国人南渡至南洋各地，建立大伯公庙祭祀其远祖，以示不忘其本。一说为都公、船主都纲或擘公，即水神。一说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马来亚流行疾疫，病死者甚众，唯铁匠丘某、烧炭工人马某和塾师张某未染病症，后世称为神奇，尊此三人为“开山大伯”，又称“大伯公”，并立庙祭祀。东南亚华侨聚居处多有大伯公庙、福德祠、先锋庙、本头公庙等，供奉大伯公或福德正神等。华侨祭祀大伯公，含有对先驱者们创业的崇敬、追思之意。十八世纪末，马来亚檳城就有海珠屿大伯公庙，奉祀土地神。

天后圣母，系中国海神或护航女神。民间俗称海姑、圣母、神女、龙女、通玄灵女、娘娘、海神娘娘、阿妈、妈祖婆、姑婆、娘妈、湄州妈等。被中国君王封为天妃、圣妃、天后、南海女神、泉州神女、灵惠夫人等。最常用的称呼是妈祖。相传妈祖于中国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岛上，原名林默娘。自幼习水性，善观天象，能预测海上的风云变化，并多次出海救助遇难船只；还精通医术和道典，为乡人治病而无不愈。妈祖羽化，后世奉为神，建庙祭祀。相传人们只要虔诚供奉，出海即会逢凶化吉、一路平安。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把信奉妈祖推向高潮。中国移民出洋奉之为保护神，华侨华人散布之处都有妈祖信仰，名称不一，如林夫人庙、妈祖庙、天后庙、天妃庙、天妃宫、灵女庙、顺济神祠、圣妃庙、灵慈庙等。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世

界约有千余座妈祖庙。人们不仅相信妈祖能保航海吉祥,而且每逢水旱、瘟疫、战争、盗贼乃至不孕,也求之保佑。马来西亚最早崇祀妈祖的场所是设于琼州会馆中的天后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宫中香火兴盛,但此后因移民渐减,除沿海华人渔民外,祭祀者渐少。这也反映了妈祖信仰发展的历程。妈祖信仰是海外华侨华人民间信仰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关帝,也称关公、关帝圣君。关公原名关羽,东汉末年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同患难共生死,生平事迹以忠义见称。华侨在异域谋生,相互咸赖忠义精神维系,故对关公尤为推崇。关帝庙在东南亚一带随处可见。泰国苏梅岛的关帝庙建于1872年,庙中关帝像及神龛等均从中国海南岛运来。越南堤岸关帝庙(也称借富庙)系由潮州帮和客家帮共同兴建,又称义安会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关帝庙创于1889年,附于广肇会馆中。大洋洲、美洲、非洲、欧洲等地,凡有华侨华人之处,几乎都有关帝庙。日本的函馆、神户、横滨、长崎、大阪、札幌等地均有关帝庙,其中神户关帝庙有近百年的历史,庙门两旁有于右任书写的对联:“精忠扶汉业,德泽荫侨民”,大殿正中供关圣大帝,左为天后圣母,右为观世音菩萨,每年8月中还举行盂兰盆会(即普渡盛会),届时华侨云集,热闹非凡。庙宇之外,许多华人的店铺、酒楼、饭店、公司、银行等也供奉关帝像。“义薄云天”的关公被华侨华人视为保护神,有的关帝庙还成为华侨社区的一个联络中心。

三保公,即三保太监郑和。明朝永乐时,郑和下西洋,历30余国,使中国声威远播,南洋华侨引以为自豪。今马六甲、三宝垄等地仍留有郑和遗迹。1931年,在印尼三宝垄,华人为纪念郑和建有三保公庙,附近有一天然石洞,又称三保洞。洞口刻有对联:“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踪石洞庇人家”。据传农历六月三十日为郑和抵爪哇纪念日,每逢此庆日,三宝垄大觉寺三保大人神像出巡。沿途舞狮,到三保洞后返回,不少善男信女前来进香,留宿求福。泰国湄南河东岸有保山亭,

初建于 1324 年,郑和访问过此地,十六世纪当地的华侨为纪念他而改称三宝公庙,今庙门两侧有华文对联:“三宝灵应风调雨顺,佛公显赫国泰民安”,“七度使异邦有明盛记传异域,三宝驾慈航万国衣冠拜故乡”。

此外还有天公、拿督公等神受到东南亚华人的供奉。

以家族为中心的祭祀有堂祭、祠祭、墓祭等。奉祀的祖先限于高、曾、祖、考四代。其祭法与中国相似。族根意识是华侨华人传统文化观念维系的重要基石。祭祖包括家族之祖和行业祖师。敬祖、尊天是华人最重视的两种信仰。宗族对始祖举行集体祭祀,各类姓氏组织负责此事。延陵吴、江夏黄、颍川陈、陇西李、荥阳郑、太原王、扶风苏、济阳蔡、河南邱、九龙堂林、古城刘关张等被视为各该姓共同始祖,受后世祭祀,设祭追思,以达长幼有序、敬宗睦邻、家和万事成的宏旨。所谓本于仁,承于孝,成于礼乐,即是祭祖的真实含义。另外,百业均有其祖师,如木、瓦、石、建筑等业祭公输子鲁班;陶业、扇子业祭和合二仙;油漆业祭吴道子、葛洪、俞伯牙和普庵;成衣、丝线、帽等业祭轩辕黄帝;棉布业祭黄道婆;靴鞋业祭孙膑;玉石工祭白衣观音和六和;酒业祭杜康、司马相如;纸业祭蔡伦;杂货店祭关帝圣君、赵玄坛、增福财神、火神、造酒仙翁、福德正神;医生祭华佗等十大名医、三皇和保生大帝;当铺祭三皇;银号、钱庄祭赵玄坛;命相家祭鬼谷子、麻衣;屠户祭樊哙、张飞,等等。这些受祭之祖中,许多实为活生生的人物而登上神圣祭坛,构成华人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民俗文化

这里所言的民俗文化主要是指华侨华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表现,如节令、饮食、婚嫁、服饰、丧葬等。从这种文化形式的根上来说,

它同样是中华民俗文化在海外的移植与变异。民俗文化是凝聚华侨华人群体乃至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一、节 令

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历史孕育了丰富的节令文化。农民依时令而作息,以节令而聚合。华侨华人在海外也深深保留着本民族的节令文化。

(一) 春 节

即农历新年,这是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通过这个节日的庆祝仪式,能加强家庭联系与亲情。这些仪式主要有:贴春联,写上诸如“财源广进”、“步步高升”、“富贵满堂”等语,以求好运,也有只写象征吉利的“春”、“福”等字,当作装饰品挂在门上或墙上;吃团年饭;祭祖;迎春;拜年;过元宵节等。拜年时,要送礼、回礼,新、马等地华人过年时送柑(与“金”谐音),长辈对儿辈往往赏以红包。华侨社区常有杂耍诸戏,以娱游客;或舞龙舞狮,鞭炮锣鼓,欢天喜地。元宵节,也称灯节,华人观赏花灯,猜灯谜,新加坡华人还在这天举办灯笼制作比赛。

(二) 清 明 节

也称民族扫墓节。在此节前后,华侨必奉祀祖先,祭扫坟墓,名曰拜山,与中国风尚无异。在东南亚,华人墓葬常有集中之所,如新加坡的恒山亭、双口鼎、咖啡山为福建帮公墓;碧山亭、绿野亭为粤帮公墓;泰山亭、广义山为潮州帮公墓;双龙山、三邑祠、公司山为客家帮公墓。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所辖华侨义山,安葬侨胞,每逢清明祭扫,均由公所主持公祭。到坟前、骨灰放置处或灵位前祭扫,追念祖先,是常见的几种清明祭祖的方式。慎终追远、敦亲睦族以及行孝是华人清明节活动的目的。

(三)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也称端阳节、端五节或重五节,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主要形式是吃粽子和赛龙船。这天,华人经营的餐馆多制作精美的粽子以招徕食客,或顾客买去馈赠亲友、祭祀祖先。新加坡还借此纪念所有的爱国者,以向年轻一代灌输忠于国家和献身社会的精神。^①

(四)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称“鬼节”,亦称盂兰节。纪念祖先,普渡亡灵,是其活动目的。佛教徒用盂兰盆盛珍果素斋供奉祖先,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道教徒设中元普渡,供奉食品、焚烧冥纸以安抚那些无主孤魂。如新加坡华人组织中元会,相邻居民每年推选一位炉主,主持中元会务,向会员收取月捐以购买祭品,祭毕分给会员,每人一份;中元节宴会上还投标“福物”,所得费用补贴次年购买祭品,并选出新的炉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还于路房和组屋楼下设金银纸焚烧炉。

(五)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吃月饼和提灯笼是该节的特色。节前数周即有月饼、灯笼上市。月饼用来祭祖拜月,馈赠亲友。年轻人喜欢各式制作精美的灯笼,做成果品、鸟兽、鱼虫,或飞机、战车、兵舰等形。华人宗乡组织主办中秋晚会、花灯展览会。家人一起赏月,享受同乐之美。

以上是农历中五大节日。此外,农历中还有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冬至节等,也颇受华人重视。4月8日的“浴佛节”以及12月25日的圣诞节,同样受到华人的欢迎。

^①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华人礼俗节日手册》,第54页。

二、婚嫁、丧葬及其他

日常生活中,婚丧庆吊、生儿祝寿、送礼请客、揭幕剪彩、探访亲友以及探病、聚餐、献花、颁奖等,都是华人礼俗中的重要活动,也是华侨华人聚会、联络感情的常见方式。

(一) 婚 礼

因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旧时在缔结婚约之前须配对“八字”,请媒人代为提亲或安排婚礼。后来趋于简化,男方多送礼物给女方家长以代替聘金,或在婚宴上特为女方设几桌酒席。婚礼一般有迎娶、新娘向男方长辈“敬茶”、举行婚宴、闹新房等仪式。信基督教的青年男女结婚,常到教堂举行婚礼。

(二) 丧 礼

这是华人社会伦理的一部分。不同方言群移民的丧礼有较大不同,但一般要遵循如下程序,如送终、服孝、安魂、守丧、土葬或火化以及安置神位等。送终时,如系长辈临终,全体家庭成员必须集合在床前,即“亲视含殓”;如有子孙在外,也须回家“奔丧”,全家人要“哭丧”。服孝时穿白色或黑色孝服,衣袖上戴一小块“孝”布,一般为49天或100天。安魂时,要买水洗遗体、穿寿衣。守丧通常是3至7天,期间亲友陆续前来吊祭以表最后的敬意,如敬送花圈或帛金(赙仪)。出殡时,要送葬,然后进行火化或土葬。葬毕,子孙便把死者遗像和灵牌带回家,安置在祖先神坛上,也有人花钱安放在寺庙。以此,让后人寄托对祖先的尊敬和怀念之情。富有者常大讲排场。一般则葬于华人坟场^①。

^① 华人墓地多有集中之所。如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义山闻名遐迩,该山占地面积52.67万平方米,山中有单层、双层或三层墓屋,水泥路纵横交错,有“市中之市”之称。每逢十一月一日万圣节,人们扶老携幼汇集于此,扫墓祭祀。

间有贫困者,多集众募捐,或由慈善社团出资处理,施棺赠地,抚孤恤寡,体现华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三) 其他

生礼和寿礼。遇生儿、寿辰,华侨华人视为大事,必设宴庆贺。生儿后,取名、查生辰八字、满月等是必有的仪式。满月时,主家送红鸡蛋,设宴招待亲友,亲友们则赠“红包”,祖父母送金饰。庆寿是家庭中的大喜事,一般华人要到60岁才“做寿”,60岁生日是大寿。做寿时常食寿桃和寿面,以祝贺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传统的生日礼物是鸡蛋、寿面、寿桃、酒及“红包”。

这些大多是以家庭为中心而衍生出的许多礼俗,反映了华侨华人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其他还有许多礼俗如开业志庆等,是华人维系自己族群文化的方式。

作为传统礼俗文化,随着年轻一代华人的日渐当地化和西方化,有着淡化或简化的趋向。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鉴于这一情况,为了发扬华人传统文化价值观,编有《华人礼俗节日手册》,希望通过介绍华人的主要传统节日与习俗,“能使我国年轻一代重新对传统礼俗发生兴趣,我们认为传统礼俗的保留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加强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传统礼俗包含了华族忠孝仁义的美德,这些道德价值观使国家紧密团结,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安宁。”^①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魅力和现代价值,华人传统礼俗仍将世代不断更新,相袭下去;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使华人成其为华人,作为特色鲜明的一群而在世界各地生存、繁衍与发展。

^① 《华人礼俗节日手册·序》。

第七章 华侨华人文献与研究

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而广泛的意义,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学者在潜心、细致地进行研究,并积累了丰厚的著述。官方的、民间的机构或团体在组织着这种研究。在华侨华人中间,更有一批人摈弃了生意场上的热闹,甘愿寂寞,去苦心搜寻、梳理着他们远祖以来的历史。他们努力使华侨华人的历史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杂乱变得有序,由扭曲变得真善,让人们看到华人先辈的磨难与艰辛、创业与成就。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荷兰等许多国家,华人建立了追溯先辈移民与创业功绩的博物馆。华人史学得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第一节 华侨华人历史与社会的研究

一、二战前的华侨研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关于海外华侨的研究。从地区来看,主要偏重于华侨移居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东南亚。最初对华侨

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三群人,即:中国人;西方殖民官员、汉学家或传教士;土生华人。

(一) 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作为华侨的祖籍地,自然对于华侨有较多的注意^①。但真正引起人们对华侨重视的还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侨的能量被发现和中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晚清政府一改先前的“弃侨”劣政而采取“护侨”措施,并制定办法吸引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革命党与保皇党为了各自的政治需要,在海外华侨社会大造舆论,争取支持力量。孙中山先生在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的实践中,提出了“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赞誉。这些无疑为了解侨情、研究侨史,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动力。近现代中国史上的多灾多难,引发了华侨强烈的民族热情。当时的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加紧研究华侨。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开学者关注海外华侨问题之先河。《民报》1910年第25—26期登载了署名“羲皇正胤”所撰的《南洋华侨史略》,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②。1920年,湖南人何海鸣等创办了《侨务旬刊》,这是中国民间首份介绍侨情、研讨侨务的杂志,共刊出141期,内容涵盖东南亚和美洲的侨情。

1928年,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上海暨南大学设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后曾改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以华侨历史作为该部的重点课题,出版有《南洋研究》、《南洋情报》和《南洋丛书》,刊载了一系列华侨史方面的论(译)著。在该部,云集了当时中国有关这方

① 近代以前,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海外中国移民的种种记述,特别是一些中西交通史史籍反映更多,如宋朝朱彧《岭南问答》,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明朝张燮《东西洋考》、马欢《瀛涯胜览》,清朝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谢清高《海录》和魏源《海国图志》等。但这些都谈不上真正的华侨研究。

② 朱杰勤教授称此书为“关于华侨史的第一部作品”。参见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第1页。

面研究的专家,有一批颇有分量的拓荒性之作。如该部第一任主任刘士木、《南洋研究》主编李长傅,都值得一说。

刘士木在供职暨南大学之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位华侨。1929年他与钱鹤合编了《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此外还著有《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1931年)、《南洋荷属群岛之教育》(出版时间不详)以及《华侨概观》(1931年)。在组织与推动对南洋华侨史的研究方面,其功尤大。

李长傅对海外华人的情形颇有研究,先后出版了《华侨》(1926年)、《南洋华侨史》(1929年,1937年修订为《中国殖民史》)和《南洋华侨概况》(1930年)等。其作品资料丰富,考核精到,文笔简洁。他还力图从世界范围来叙述华侨的活动情况。

此外,还有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0年)。该书系温在暨大任教期间,根据自己在南洋搜集的有关华侨史的资料而撰成,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张相时的《华侨中心之南洋》(1927年);刘继宣、束世澄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年)等。这些作品纵论古今南洋华侨的变迁,参阅甚富,又多得社会调查资料,不仅予南洋华侨史以详尽的梳辫,而且由于作者是以学术、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对象,使得他们的著作成为后来人们重温这段历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二战前中国学者关于华侨问题的研究,最值得推崇之作是清华大学陈达教授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38年)。他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华侨社会的本质;第二部分论述移民问题。他以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创新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闽粤社会与南洋华侨形成和发展的种种关系,使之成为华侨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一批学术性著作之外,二三十年代中国侨史研究的发展还表现在:(1)侨史论述与侨情调查报告的增多。创于1904年的《东方杂

志》不断登载有关华侨问题的文章,如何海鸣的《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李长傅的《世界的华侨》和《中国殖民南洋小史》,程天放的《加拿大华侨概况》等。这部分研究注重华侨的实际处境,包括如何改善华侨的地位,从法律上护侨,保障华侨的经济,争取华侨教育的权利等方面。1923年,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华侨学校创办《南大与华侨》杂志,刊行10余年。1937年罗香林在《禹贡》上发表了名作《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他如何汉文的《华侨概况》、丘汉平的《华侨问题》、朱化雨的《华侨社会生活与教育》、黄警顽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钱鹤编《南洋华侨学校的调查与统计》、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林珠光与朱化雨合编《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等均可资参考。(2)华侨研究机构、团体、刊物的增多。在《东方杂志》、《南洋研究》之外,当时兴盛的《新青年》、《民铎》、《民心》、《边事研究》、《申报月刊》、《民族杂志》、《新亚细亚》和《燕京学报》等刊物也不时有关于华侨历史与现状的报道与论述。由刘士木、顾因明等人在上海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引起人们对华侨问题的注意。(3)华侨史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初步得到人们的认可。二十年代,何海鸣在北京大学、张星烺在厦门大学不约而同地开设了南洋华侨史的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侨史研究陷入低潮。不过,也有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如刘征明的《南洋华侨问题》(1944年),姚楠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1943年)和《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等。1942年,重庆南洋研究所成立,并创办《新南洋》季刊。1939年复刊的《南洋研究》(该刊出至1944年,共11卷61期),中正大学华侨同学会编印的《南洋》,李清悚主办的《侨民教育》,郭威白主编的《侨务十年》等,都是关注华侨问题的刊物。

二战前中国学者的华侨史研究偏重于中国海外移民史、华侨教育、华侨概貌、华侨与中国革命以及华侨的政治、法律地位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多趋于从文化与种族的海外移殖角度去分析，强调华侨的中国属性；也有不少作品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华侨史迹进行考辨，或运用社会调查方法掌握第一手材料，后加条析与理论。因而，尽管总体来说，该研究并未摆脱时代的局限，以及最初发掘中的某种粗糙，但它为以后华侨史的进一步开拓与发展奠定了学术传统的基础。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二战前，西方学者的华侨研究主要在于东南亚地区，这是因为东南亚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如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等的殖民地。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在东南亚经济、尤其是在流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侨的情况。而且，他们往往以比较的手法来看清楚华侨与土著、华侨与殖民势力以及不同地区华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更深层地掌握华侨经济、文化与组织的状况及其特质。西方学者或传教士无不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感染。

较为有名的作者如：

麦克奈尔，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与政治教授，著有《海外华人》，初版于1924年。这是第一部由西方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系统考察华侨问题的作品。^①

沃汉，是英国的文官，他在英属马来半岛供职。1879年，沃汉出版了《海峡华人的行为与习俗》一书。尽管他把华人看成是“同质的一群”，但是他对华侨风俗文化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德·格鲁特，系荷兰的汉学家和文官，1870年出版有反映西婆罗洲华人秘密社会的专著。费列明，为荷印政府税务局局长，1926年编辑了一部详尽叙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印华人经济活动的书，即

^① 参见廖建裕编：《东盟国家华人研究评论集》。

《荷印华人的经济生活》。

（三）土生华人学者的研究

在近代移民苦苦地适应当地社会之时，早期移民的后裔即土生华人已逐渐摆脱贫困的纠缠，他们中的一些社会活动家、记者、编辑、宗教领袖和学者开始关心与探讨族群的命运。通过整理与描绘华族的移民史，他们试图回答华族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较为有名的作者如：

宋旺相，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1923年出版了《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该书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部叙述1919年前新加坡华人的较完整历史的著作。

刘焕然，新加坡华文报的记者，1939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概览》一书收录了丰富的荷属东印度华侨名人的传记，也是了解当时荷印华文报刊等的重要参考书。

林天佑，记者兼历史学家，受过中华会馆学校和荷兰文学校教育。根据三宝垄华人会馆所藏华人社会的档案史料，用马来文编写了《三宝垄的历史》一书，记载了1416—1931年间印尼华人、特别是三宝垄华人的历史。后来他还编有《三宝垄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册（1907—1937）》、《华人的遗产》和《建源（公司）简史》等书。

梁友兰，一位出色的记者与作家，出生于印尼雅加达，受荷兰学校教育，自学华文。二战前先后在《竞报》和《新报》工作。编有《巴城中华会馆四十年史（1900—1939年）》，详载爪哇第一个纯华人组织——巴城中华会馆的历史。

郭德怀，一位杰出的作家、出版家、宗教领袖和现代华族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出生于西爪哇茂物一个土生华人小商人家庭，幼年受过马来文与华文教育，也通荷文与英文。青年时期从事文学创作，并出任茂物中华会馆主席十余年。1926年起任《全景》周刊社长兼主编。在该刊物上，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尼华人教育和华族运动的文章。

后在《小说宝物》上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华族组织、中华会馆、华人习俗、宗教与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他的这些作品切中时弊,剖析深刻,独树一帜。郭德怀涉及到华人社会、政治的论著值得深入研究。

王永利,一位土生华人社会学家。1943年,他的关于荷属东印度华人的荷文博士论文《荷属东印度华人》出版,内容涉及到华人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和文化等多方面。

这些学者属于土生华人中的知识层,他们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其作品描述、记载的成份多于学术探讨。他们关心华族的历史是因为他们自己即是其中的一员。不管怎样,这毕竟表明华族在注意自己的历史。

二、二战后的华族研究

(一) 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形势、华侨社会以及中国政局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此而使华族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

在地区上,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间,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做了一些侨情、归侨、华侨国内投资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外,很少有机构注重这一领域的研究,“文革”期间(1966—1976年)更是处于瘫痪状态。1979年之后才得以恢复并日趋繁荣。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学者比较重视华族研究;印尼、泰国、印支国家则较弱。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有一批学者在进行华族研究,其中不少是非华裔。相比之下,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南亚等地的学者则较少涉足于此。

在领域上,华人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性等问题研究较多。这是因为,随着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政治认同就成为决定他们发展前途的一件大事。从华侨社

会到华人社会的过渡,实际上反映了华侨纷纷入籍当地,并努力摆脱中国政治归属感,代之以当地政治归属感。然而,究竟如何实现这种政治认同的转变、华人如何与当地社会相融合,这不是件简单的事。这牵涉到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与当地其它民族的关系、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很自然,大量的作品都是分析或试图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华人经济力量的膨胀,探讨华人经济的作品日益增多。

在方法上,在注重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同时,许多学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乃至医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多角度来解剖各国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使得这一研究从表层走向深入,从罗列走向分析与思辨,成果不断翻新。

在队伍上,除了出于官方需要而卷入华人研究行列之外,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已在这一领域中尽领风骚。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培养了许多后来颇有成就的华人问题研究专家。

(二) 区域与国别华人研究

1. 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的华族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关于美国本土华人的研究和关于美国之外华人的研究。

关于美国华人历史与社会的研究是二战以来的事。这时华人免除了歧视性法令的迫害,赢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落地生根”心态日趋强烈。1952年,吴尚鹰在《金山时报》上连载《美国华侨百年纪实》,是最早以中文发表的美籍华人史。1962年,孙甄陶又发表了《美国华侨史略》。此后华人史学界沉寂了十多年。至1974年才有区宠赐等编撰的《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这是迄今唯一结合会馆历史文献与现代史学成果编撰而成的一部史书。此后两年内有朱夏的《美国华侨概史》、刘伯骥的《美国华侨史》二书相继问世,加之1981年刘伯骥的

《美国华侨史续编》，构成了一套较为详尽地叙述美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史乘。

刘伯骥系从中国台湾移居美国的文人，在旧金山报界和华人社团较为活跃。所撰二书结构严谨，取材广泛，凡百余万言，为人所称道。《美国华侨史》叙述 1848 年至 1911 年美国华侨艰苦创业的历程，对美国发展的贡献以及遭受种族歧视的逆境，如早期移民；华侨人口的分布与发展；华埠的创立与演变；华侨社团组织；华侨经济生活；华侨文教传布；华侨宗教信仰；华侨政治活动；美国人对华侨的态度、排华立法等。《美国华侨史续编》叙述美国华侨华人自辛亥革命至七十年代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尤以有关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部分记载精详，史料价值较高。1984 年，作者将两书编余的早期华侨材料辑合而为《美国华侨逸史》出版。

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是一位勤于笔耕、著作丰富的学者。麦氏祖籍广东南海，生于旧金山，专业为高级机械工程师，青年时代起就对美国华人的历史兴趣浓厚，一直广集资料，耕耘不已。他曾与人合编《加州华人简史》和《美国华人史纲》，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华人历史课程的教材。1980 年在旧金山《时代报》上连载《美国华侨简史》，计 20 余万字，引起学术界重视。七十年代起任美国华人侨美历史学会会长，并主持反映美国华人历史的大型文物展——“甘苦沧桑两百年”。

在这些以中文叙述美国华侨华人历史的著作中，通常都是长于详细阐述史实，而忽略理论分析。

由于传统华人社会对美国华人史的研究并不重视，使得这些研究缺乏交流，时兴时辍。真正推动华人史研究的力量是来自于大学的社科专门人士和土生华人。他（她）们的作品都是以英文发表的。在这股力量的背后，是以黑人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深入；华人研究是纳入到美国亚裔研究的序列中而得到发展的。1957

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学系研究生莱曼在旧金山的加大附设科讲授华、日、菲裔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课程,成为当时的一个创新。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有关美国华人社会及历史的学术著作有:李谭金美的《百卅年来华侨在美国》;孔士谔的《美国社会的华人》;邱炳的《加州华工》;巴思的《苦力:1850—1870年美国华人史》。

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华人历史研究活动主要是由三方面组成的:华社的民间学术团体与社区人士的重点是收集史料,保存历史文物遗址,宣传华人业绩等;学院的传统系别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新成立的美国亚裔研究系的分析与研究。其成果从下面可见一斑:

(1) 编目与资料整理。有汉森和海因茨编的《关于加州华人历史的书目提要》(1970年出版);杨南茜的《夏威夷华人研究书目提要》(1973年出版);麦礼谦的《关于美国华人的中文资料提要》(1986年)。在资料收集上,既注意国家档案文书,也注意口述历史、传记与出土文物。倪伟德夫妇的《长久在加州》(1972年出版)是首次结合口述资料与文献来描述旧金山华埠数十年变迁的作品。之后有林小琴、麦礼谦、杨碧芳的《埃峇诗集》(1980年);麦美玲、迟进之的《金山路漫漫》(1982年);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中心编的《我们的共同点:洛杉矶的华人妇女》(1984年出版)等一系列口述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的作品。

(2) 论著与专题研究。早在1903年出版的柯立芝的《华人移民》于1968年重版,这是美国作者研究在美中国移民的较早著作。柯立芝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哲学博士,供职母校。在该书中,她把华人与在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希腊人相比,认为华人并非不可同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迅速当地化,并可成为较好的居民,这在二十世纪初排华正盛的美国是十分难得的。几十年来,美国大学中以华人为题的硕士或博士论文纷纷问世,如莱曼的《华埠与小东京》(1961

年完成,1986年出版);萨克斯顿的《不可缺少的敌人:加州劳工与反华运动》(1971年出版);邝治中的《纽约唐人街》(1979年出版);格利克的《侨居者与定居者:夏威夷华人移民》(1980年出版);冯天赐的《不可感化的民族:百年来旧金山华人争取就学权利的经过》(1982年出版);马嘉倩的《革命党、保皇党与华人社区:中国政治在美洲与辛亥革命》(1990年出版),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大学亚裔研究系的华人问题研究引人注目。他们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而细致,如社区的华人、唐人街的变迁、新移民、劳工与组织等,已从聚居的华人伸展到散居各小城的华人。有几位华人学者需特别一提:

陈素贞,1941年生于上海,在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等地受过教育。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并任奥克斯学院院长。她始终致力于亚裔少数民族的研究。1986年出版的《这苦中有甜的泥土》是加州农业史研究中的一项新成果,首次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高度评价了华人对加州农业发展的贡献。

王灵智,1935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迁居美国后接受高等教育,专业为音乐、中东语言。六十年代毅然加入到争取华人少数民族权力运动的行列,此后为从学术上加强对亚裔少数民族,特别是华人族群的研究而不懈努力。他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亚美人研究中心开设亚裔美国人史、华裔美国人史等课程。1981年升任少数族裔研究系主任。先后发表过关于美国华人历史与现状、现代华人新移民、华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划分与框架等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并出版《美国华人史》一书。他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华人问题专家之一。

宋李瑞芳,生于华盛顿的一个工人家庭,获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士学位,精通英语、华语及多种中国方言如厦门话、广州

话和台山话。1967年写成《金山：美国华人的故事》一书，讲述了华人在美国奋斗与发展的历程，引起了学界的注目。1969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专事美国亚裔移民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从此著述一发不可收，关于美国华人的作品就有近10部。如：《美国华人人力与就业问题》（1976年出版）；《美国华人统计概要》（1976年出版）；《美国华人的历史与现状》，是书已有中译本。

此外，1980年陈依范的《美国华人发展史》^①，1982年华美协进社与费斯勒编的《美国华人：公式化形象的去，变化中的今天》，1986年蔡石山的《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等叙述美国华人的过去与现在的通史性作品也值得一读。还有一些作品把华人纳入到美国少数民族裔的总体研究之中，或在更大的范围之中比较，如成露西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移民》。

这些学者的华人研究在美国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他（她）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华人的历史发展，之所以如此执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她）们身为华族的一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去发掘祖辈们真正的历史，去分析华族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去以此维护华人的尊严，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从迄今为止的研究来看，初期较集中于华工对美国西部建设的贡献，排华运动对华人的迫害，美国社会对华人形象的定式认识等课题。后来较多注意十九世纪下半叶华人与白人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历史。诸如人口较少的华人社区、夏威夷华人的历史、华人新移民形成的社区、土生华裔社会等问题却较少研究。不过，对于美国华人研究的前景是应该乐观的，势必在多元文化

^① 是书有三种中文译本，即韩有毅等译《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郁怡民等译《美国华人》，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美国华人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是书可以称为流行最广的美国华人史著作。

社会环境的完善中不断获得发展。

在研究美国华人之外,美国学者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的研究也是颇具影响的。如俄亥俄州赖特大学袁清教授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胡其瑜教授对拉丁美洲华侨的研究;夏威夷大学吴燕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1880—1980年)》;吴元黎对美国华人经济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等等,表明美国华人学者有能力将学术领域伸展到美国之外的华人社会。不过,在这方面最有建树的还是当推非华裔学者,如:

阿米欧,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母校人类学研究员、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等职,阅历丰富,著述颇丰,尤其对菲律宾华人的研究最有成就。先后出版了《从社会学看马尼拉华人社会家族观念的深浅》(1959年);《马尼拉华人:华人家庭观念对菲律宾环境适应之研究》(1960年);《马尼拉的华人》(1973年)等作品。尽管他的著作在具体数据的运用上有欠精确之处,但是他以社会学方法对菲律宾华人所进行的解释具有新意。

李·威廉,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执教布朗大学,六十年代曾在新加坡大学任客座教授。著有《华侨民族主义:1900—1916年印尼泛华运动的起源》(1960年出版),这是第一部有关印尼华人史的英文专著,系根据荷兰档案撰成;《东南亚华人的未来》(1966年出版)。在这二书中,作者所提出的解决东南亚华人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从“华侨民族主义”到“华侨政治同化”的转变。在此,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华侨的差异。

斯金纳,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先后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是国际上东南亚华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三方面:(1)“华人同化论”的鼻祖。他以泰国华人为例,认为东南亚华人同化于当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解决华侨(华人)问题最理想的办法,也是华人的唯一出路。这种理论符

合了许多人的心理或需要。(2) 关于泰国华人的研究, 1957 年出版了《泰国华人社会: 一个历史的分析》; 1958 年又出版了《泰国华人社会的领袖与权力》, 运用各种语言材料对泰国华人进行详尽的分析, 并认为由于泰国华人与泰族的高通婚率, 一般至第四代已成为泰人。此二书无疑是泰国华人研究的经典之作。(3) 关于印尼(爪哇) 华人的研究, 发表过《爪哇华人》(1958 年)、《海外华人文化的变迁与持续: 泰国与爪哇华人的比较》(1960 年) 以及《(印尼) 华人少数民族》(1963 年) 等论文, 以丰富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知识阐述爪哇华人内部的复杂性, 予人以启发。斯金纳的著作多成于五十年代, 此后无论是泰国还是印尼的华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是他始料所不及的。王赓武教授称斯金纳与弗里曼是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西方学者的杰出代表。^①

在这三位学者之外, 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十分出色, 如高国麟关于泰国华人“双重认同”的研究, 1960 年出版有《双重认同: 现代泰国的华人》; 麦克比思、蒂尔曼关于菲律宾华人的研究; 斯图尔特关于秘鲁华工史的研究, 等等。

2. 加拿大学者的研究

关于加拿大华人的研究, 主要是由本土华人学者来完成的。他们中许多人受美式高等教育与美式治学风格的影响。这些有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学者, 从事加拿大华人移民、社区、种族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研究表现不俗。

如在通史方面有:(1) 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李东海祖籍广东台山, 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五十年代移居加国, 供职维多利亚华侨学校和中华会馆。是书系根据会馆资料、省府档案及各类中、英文文献, 耗时 10 年而成, 涉及到移民、劳工、华侨社团、排华运动、

^① 《海外华人研究概况》,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编《亚洲文化》第 17 期。

文教、二战后华侨人口的分布与变化等有关华侨社会的各个方面。作者强调中国政治对加拿大华侨的影响,如李鸿章、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加拿大的活动以及华侨对加拿大和祖国的贡献。是书为研究加拿大华侨所必读。(2)李胜生的《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1988年出版,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出中文版)。李胜生生于中国香港,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加拿大华人与加拿大的民族与种族关系。是书分三篇叙述1858—1988年间加拿大华人史,即“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发展”、“排外时代的华人社区”、“战后华人社区的形成”,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加华社会的经济变动、婚姻与家庭、社区组织、社会流动、种族与文化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作者认为反对华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是一种结构迫力,它与文化误解和个人体质没有多大的关系;加拿大的排华政策给华人社会带来了种种后果,以致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离异于加拿大社会的主流之外的。”^① (3)另一部通史性的作品是由魏安国、威尔莫特等合著的《从中国到加拿大》(1982年出版,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是书分4编叙述了加国华人百余年的历史,集合了多位专家和各方面的成果,使之通俗之中见功力。

在社区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分析唐人街的作品当推黎全恩的《加拿大华埠发展史》(1988年出版)。黎全恩,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68年起受聘执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他长期坚持从事北美华埠历史、地理与社会状况的研究与调查。是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早期移民到排华时期加拿大华埠的变迁,以及二战后的新移民与华埠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维多利亚华埠的变迁;第三部分为结束语。内有55幅有关加拿大华埠的插图,40份有关加拿大华人人口的各种表格,40幅有关不同时期加拿大华埠的照片;另附详细

^① 《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前言”,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的参考书目。

一些作品对个别唐人街进行了专门研究或对几个华人社区进行比较研究。何万成,祖籍广东,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先后求学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美国范德比特大学,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加拿大国家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员,著有《加拿大阿尔伯塔两个华人社会结构性变化》。前面介绍的李胜生的作品同样是社区研究的力作。另有汤姆逊的《多伦多的唐人街》(1989年出版)。

加拿大华人的发展史可以1947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于早期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在于加太平洋铁路的建造、劳工问题和种族歧视等。历史学家芒罗分析了法语加拿大人对华人移民法案的态度,纠正了以前人们多注意英语加拿大人态度的毛病^①。安东尼·陈著有《金山》(1983年出版),对于华人的“迁客”形象作了研究,他认为:大多数华人移民最后还是定居加拿大,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忍受所有那些对他们加以否定的种种势力的潜力所在,“如果他们真的有这种‘迁客’心理,那早已在这样的种族主义的压力下崩溃无存。”^②李东海对1901年至1923年期间维多利亚地区的教育所反映的对华人的歧视作了研究^③。人类学家周永森专门探讨了1947年前后不同时期华人社区的变化。^④

关于后期华人社区的研究,偏重于同化问题。七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加拿大社会流行的准则。学者们建议用民族镶嵌式模式来取代熔炉模式。他们认为,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非只有“同化”这一条路可走。李胜生就曾强烈地批评那些反

① 《1985年华人移民法案》,《加拿大种族研究》,1987年版。

② 安东尼·陈:《东方主义和形象构成》,《种族研究杂志》,1981年版。

③ 黎全恩:《1901—1923年维多利亚的教育歧视》,《加拿大种族研究》,1987年版。

④ 弗朗西斯·亨利:《美洲的种族》,1976年版。

映白人偏见的关于少数民族家庭的研究。^①

然而,总体来说,研究1947年前华人的作品要多于此后的作品,原因之一即在于这种研究过多地依靠文献资料,而忽略社会调查。

加拿大学者对于本土之外华人的研究也毫不逊色,其中较突出的有:

魏安国,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965年出版,吴文焕译成中文出版)。是书充分利用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原始史料,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菲华社会的历史演变。其中对于菲律宾华人混血种的研究尤为独到。同时还注意到菲华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和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他认为,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华人都是朝着融合于他们所在社会的方向发展。后来,他又对二十世纪的菲律宾华人做了一些研究。他的著作被誉为关于菲律宾华人的经典之作。

云达乐,生于中国四川仁寿,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先后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大学、多伦多约克大学等执教,是公认的印尼华人研究专家。著有《三宝垄的华人:印尼变化中的少数民族》(1960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地位:1900—1958年》等。其中他对于华人商业活动及宗教生活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十分精彩。他的著述无疑是关于1955年以前三宝垄华人历史的全面而权威之作。

云达忠,系云达乐之弟,生于中国成都,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执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后移居新西兰,任坎特布雷大学教授。他是公认的柬埔寨华人研究权威,主要著作有:《柬埔寨的华人》(1967年)、《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政治结构》(1970

^① 《移民法与家庭类型:1885—1971年加拿大华人家庭生态的某些变化》,《加拿大种族研究》,1980年版。

年)。作者的论述引人入胜,细致严密,内容包括柬埔寨华人的种族、经济与法律地位、社区组织等方面。后来他还发表过关于柬埔寨华人的“降神”活动等论文^①。九十年代开始,他转向对南太平洋华人的研究。

此外,朱迪博士关于马来西亚下层华人组织与生活的研究也颇有深度。^②

3. 荷兰学者的研究

荷兰从事华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从印尼移居荷兰的华裔;荷兰白人学者。

关于荷兰华人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华裔学者鲜有涉足于此者。荷兰学者的研究多属调查报告性质,如早在1937年就出版的阿姆斯特丹大学黑克教授所著的《荷兰的华人移民》,1988年出版的莱顿大学汉学院彭轲先生的《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均系受政府部门委托所作社会调查的作品,具有资料翔实,反映当地华人最新动态的特点。由格里哥和俄妙伦二位教授编的《华人》(1987年),是关于荷兰华人文化、经济、移民方式与种族属性等专题的论文集。此外还有赫夫的《荷兰华人海员与卖花生糖者》(1984年)等。

关于荷兰本土之外华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达数百年之久的印尼群岛地区。其作品多出自优秀的汉学家之手。不过在这方面战前的学者多于战后,这不仅是因为战后的学者对独立后的印尼兴趣大减,而且还在于真正有扎实汉学基础的人实在少见。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家魏尔典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布雷曼和莱顿大学历史系包乐史博士。

魏尔典是一位对种族主义、亚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颇感兴趣

① 《1963年柬埔寨华人的降神运动》,新加坡《亚洲文化》第14期。

② 朱迪:《马来亚华人乡村政治》,1981年版。

的学者,对于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有独到的研究,他倾向于从经济角度来诠释种族问题,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布雷曼从事近现代亚洲劳工问题的研究已 30 余年,硕果累累。关于契约华工的研究有《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荷属东印度日里地区种植园政治剖析》(1989 年)和《殖民地时期亚洲的劳工移民与农村变迁》(1990 年)二书。作者依据实地调查和大量档案资料,去粗取精,条分缕析,功夫扎实。前书英文版编辑称是书“充满义愤,并具有坚实学术基础”。

包乐史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汉学家,主要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和东南亚华侨史,著述甚丰。他的作品多是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量档案写成的,具有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风格。1986 年出版的《奇异的伙伴》,被誉为“研究荷印华人的上乘佳作,其分量与研究深度可与前人相比”。^①

4. 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对于华人的研究是较有影响的,他们多是受过专业训练并长期执教学院的专家。华裔学者有王赓武、颜清湟、杨进发、刘渭平、纪宝坤等;西裔学者有费芝尔、费思莱、库柏、林宁达等,阵营之齐整,不亚于美国。

关于澳大利亚华人的研究,历史性的著述有杨进发的《新金山:1901 至 1921 年澳大利亚华人》(1977 年版),刘渭平的《澳洲华侨史话》(1956 年版)和蔡的《澳大利亚华人的迁移与居留》(1975 年)等。如果说刘渭平的作品介绍色彩较浓的话,那么,杨、蔡二人之作则系纯学术性著述。

杨进发,祖籍广东大埔,生于马来西亚巴生市,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地系学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国立

^① 庄国土:《略评荷兰学者对海外华人的研究》,台湾《海外华人研究》第二期。

大学、南澳弗林德斯大学。是书系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参阅了大量政府档案、中英文报刊、会馆史料等,详细论述了1901—1921年间澳大利亚华人、特别是维多利亚及新南威尔士州华人社会演变的状况,如移民、经济、社团、文教、政治生活等,为研究澳大利亚华人断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专题研究则在于华人移民、同化与经济等方面。

在移民研究方面,一些论述澳大利亚外来移民,尤其是亚裔移民的著作常常谈及华人的移入,如肯尼思的《澳大利亚与非白人移民》(1975年),专论有万新武的《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组织》(1969年)。纪宝坤博士的《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一书是研究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力作。高兰根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的情况所作的比较研究也富有启发性。^①

在“同化”研究方面,赫克的研究具有代表性。1968年他出版有《澳大利亚的华人》。1970年他发表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同化》。在该书中,他首先简略地回顾了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接着分析了华人人口从矿区向城市的移动及其职业分布,他发现华人多从事低层次的商业经营,在经济上不构成威胁,并认为华人是否同化于当地社会主要取决于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的多少以及与当地人通婚的程度。由于华人多反对异族通婚,因而民族融合的进程会十分缓慢。当然,赫克不可能预料到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深入人心,同化论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亚太地区华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同样引起了澳大利亚学者的兴趣。

相对于对澳大利亚华人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对本土之外华人

^① 《澳洲非土生华人社会的比较分析》,台湾《海外华人研究》第二期。

的研究更有成绩。兹择其要者作一介绍：

费芝尔教授的《第三中国：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1965年)和《中国人的南进》(1972年)，是试图从整体上分析东南亚华人的特点与变化的有影响之作。

由经济学家林宁达和地理学家戈斯林编的《东南亚的华人》(1983年)两卷，卷一为《种族与经济活动》，卷二为《认同、文化与政治》，和由库斯曼博士、王赓武教授编的《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人认同的变化》(1988年)，二书均系论文汇编，但都有研究东南亚华人认同的重要篇章。戈斯林把华人认同分为作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和作为“中国系”华人的认同两种，并认为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华人的种族特性会消失。这个论断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库斯曼等编的文集汇集了有关二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研究的重要成果。

对于东南亚华人的宏观研究，王赓武教授似乎更胜一筹。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县，生于印尼泗水，幼年移居马来亚，曾求学于南京中央大学，伦敦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并任该校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起任香港大学校长。还兼各种国际学术组织职务，如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学会会长、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学会会长等职。以其精湛的史学造诣，成为国际知名的华人历史学家。起初，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和马来亚华人研究，之后兴趣由此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华人。其著述主要有：1958年的《南海贸易》；1959年的《南洋华人简史》；1977年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1981年的《社会与国家：关于东南亚与华人论文集》(新版时副标题改为“中国、东南亚和澳大利亚”)；1987年的《东南亚与华人》；1988年的《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1991年的《中国与海外华人》(1992年、1993年再版)等。他的著作是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研究影响最广的作品之一。

王赓武教授对于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贡献有这样几方面：

(1) 关于中西交通史上华人的研究。他运用丰富的中国历史与南洋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知识,研究古代中国南海贸易与中国海外移民等课题。他认为,从古至今,中国海外移民经历了华商形态、华工形态、华侨形态和华裔形态等四个阶段和形式,并强调其中只有华商形态才是持续永久的,只有理解了它才会明白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含义。^①

(2) 关于马来亚华人的研究。他分析了历史上华人移居马来亚的模式、马来亚华人政治等问题。他后来提出的一些关于华人移民、华人政治等的理论模式,都是源自于他对马来亚华人的研究。

(3) 关于海外华人研究的理论问题。他力图对海外华人社会进行类型分析。1970年他就指出:“无论何时,海外华人都可以依据其政治利益与活动情况分为三个主要集团,即A集团,他们对中华民族政治及其国际事务绝对关心;B集团,他们如有可能,主要关心的是华社政治;C集团,他们参加非华人阶层的政治,不管它是土著的、殖民的或是民族主义者的。”^② 并且,三个集团之间是经常转换的,B集团人数最多。然而有哪些因素促成不同集团之间的转换,他并未交待。1985年,他又提出了一个分析东南亚华人认同的模式^③,即认为东南亚华人具有种族、国家、阶级或经济和文化等四种认同,还有一种是理想中的认同,那就是“最终的多重认同”。这种理论探讨无疑是极富意义的。

(4)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华人关系的研究。这是他八十年代以来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的《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是讲

① 《华人移民类型的历史观察》,《中国和海外华人》,1993年版。

② 《华人政治》,《中国和海外华人》,1993年版。

③ 《东南亚华人认同研究》。

述这个问题的。

在王赓武之外,对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的还有费思棻教授,他撰著的《中国与海外华人》(1972年),是一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政策的力作,他力图把华侨政策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视野中去观察,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颜清湟博士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华人历史学家,生于福建永春,曾求学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执教于南澳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他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有中文译本,如《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76年)、《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985年)、《新马华人社会史》(1986年)等。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就的关于新、马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详尽而严谨,被誉为“全面的、权威性的研究”(王赓武语)、“一项至今仍未有人超越的经典性研究”(廖建裕语)。在《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一书中,他所讨论的问题并不限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涉及到美洲华侨,成为第一部关于清朝政府华侨政策的详尽著作,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与华侨史的一项空白。该书除了材料丰富之外,鲜明的观点也独树一帜。他认为,晚清政府采取了保护海外华侨的政策,只不过由于清朝脆弱的国际地位,使得这种保护并不成功。此外,他还发表过关于华侨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方面的文章。他的研究成果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曾任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王省吾也有过关于清末华工的论述,如《华人移民的组织》(1978年)。

在关于东南亚国别华人的研究方面,主要有:

杨进发博士关于新、马华人的研究。他著有:《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年)、《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1980年)、《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1987年)、《英属马来亚的国民党运动(1912—1949)》(1990年)等。他运用大量档案、报章和口述资料

写成的陈嘉庚传所反映出的学术价值,至今无出其右者。此后,为了深入研究新、马华人领导层,他着力探讨了英属马来亚的右翼与左翼运动。这是一项复杂、敏感而富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梅吉关于印尼华人、东南亚华人经济的研究。他主编有《印度尼西亚华人:五篇论文》(1976年);发表过关于东南亚华人经济地位与民族认同、华人大企业家类型等方面研究的系列论文。

库柏关于印尼华人的研究。他著有《危机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人》(1983年)以及论文10余篇,颇具实力。是书分析了六十年代印尼华人的政治处境。他认为,印尼华人处于不能解决自己命运的地位;印尼的华人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华人参政或参加政治活动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5. 英国学者的研究

英国是最早进行华侨研究的国家,尽管英国境内也有不少华人聚居,但是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都在东南亚。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在东南亚有几百年的殖民史,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希望通过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以增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他们的研究尽管人数不多,却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东南亚华人的整个研究风格与进程。

巴素博士是对东南亚华人作出重要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所著《东南亚的华人》,1951年初版,长达800余页,1965年第2版,1966年、1980年两次重印,成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影响最广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是书在于给人提供一个关于东南亚华人基本形象的认识,文献征引至为翔实,只是所引中国史籍多据外文译本。他作为一个英国的殖民官员,最初的兴趣在于中国和马来亚,1948年他还出版过《马来亚华人史》,因而在这部鸿制中有关马来亚华人部分明显多于其他内容。在结论中,他的最大败笔在于以马来亚华人作为套用于整个东南亚华人的模式。

人类学家弗雷德曼教授关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也是具有权威性的。他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此。他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偏重于家庭、婚姻、宗教、种族关系等方面,并力图与对南部中国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著有《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1957年)。他过世后,斯金纳教授为他选编了论文集《华人社会研究》(1979年)。文集共分五部分:东南亚华人;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香港新界的社会变化;中国的亲属关系与宗教;华人社会研究等,涉及有关华人的所有重要内容。

约翰·克拉默博士关于新、马华人的研究也有深度。1980年他出版了《海峡华人社会》一书,其中对“再华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还有戈德利的《来自南洋的华人资本家》(1981年),专门研究华侨在中国经济近代化中的作用。

6. 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包括两部分人:(1)日本本土学者;(2)华裔学者。研究的内容也有两类:一是对在日华人的研究;二是对日本之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研究。

二战前日本的华侨研究主要是为了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而做的一些东南亚侨情调查。但有些著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小林新作的《支那民族之海外发展:华侨的研究》(1929年);福田省三的《华侨经济论》(1939年);内阁企画院编的《华侨的研究》(1939年);成田节男的《华侨史》(1941年);满铁东亚调查局编的《南洋华侨丛书》(全6卷,1939—1941年)等。

二战后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① 参考丘立本:《战后日本对华侨问题的研究》,《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年第2期;李国梁:《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述评(1980—1990)》,《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第一阶段,1945年至五十年代末,研究处于零星状态。主要有:内田直作的《日本华侨社会之研究》(1949年)、《留日华侨经济分析》(合编,1950年)、《本邦华侨经济》(1953年)以及《华侨问题文献目录与题解》(1959年);须山卓的《华侨社会:势力和生活状态》(1955年),对华侨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吴主惠的《华侨的本质:其社会学的研究》(1944年);等。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注重研究基础的建设,包括进行实地调查,重新搜集基本资料,选编文献目录,扩大基本队伍。主要成果有:冈田芳政的《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华侨》(1960年);河部利夫的《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和质变》(1969年);游仲勋的《华侨经济的研究》(1969年);杜驹的《日本华侨的政治态度》(1966年);松尾弘的《马来亚的华侨和归侨》(1961年);等。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至今,研究走向深入,成果增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以华侨社会、华侨经济为重点,其次是华侨政策和华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从研究的地区来看,首先是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华侨华人综合研究,其次是日本华侨的研究,再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关于华侨华人经济,主要有须山卓的《华侨经济论》(1970年)、《华侨经济史》(1972年);内田直作的《东南亚华侨社会与经济》(1982年);李国卿的《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1980年);游仲勋的《华侨政治经济论》(1976年)、《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1990年);日本贸易振兴会编的《菲律宾民族企业的兴起和华人资本》(1975年)、《印度尼西亚民族企业的兴起和华人资本》(1975年)、《泰国民族企业的兴起和华人资本》(1975年);岩崎育夫的《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1990年);等。还有大量的关于华侨经济的文章。从微观到宏观对华侨经济作了充分的研究,如华侨经济的类型、性质与特点,华侨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条件与过程,华侨企业与社会经济组

织,华侨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居住国对华侨经济的政策及其后果,侨汇与华侨的国内投资,华侨经济的国际流动和日本华侨经济的特殊问题等。八十年代以来,他们关于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的研究颇具影响。

关于华人社会如华人人口、唐人街、华人宗教与信仰、华人社团等的研究,主要有须山卓、市川信爱的《华侨社会的特点与帮派》(1976年);戴国辉的《华侨: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与矛盾》(1980年)和他编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1974年);太田勇等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貌》(1982年);河部利夫的《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变动》(1972年);今崛诚二的《马来亚的华侨社会》(1973年);中村孝志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都市与村落》(1981年);山下清海的《东南亚的唐人街》(1987年)、《新加坡的华人社会》(1988年)。还有管原一孝、管原幸助等关于日本横滨中华街的研究,陈正雄对旅日华侨人口的研究。戴国辉认为,应该将华侨华人作为当地的少数民族来研究,多数民族应当尊重华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在平等的立场上共同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山下清海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华人社区(中华街)进行了系列研究,还分方言集团(如海南帮、潮州帮、福清帮)考察了华人社会以及侨乡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特色,颇见功力。

日本学者比较注意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政策,华侨对中国的态度变化。1981年日本外务省编印有《华侨的动向:东南亚华侨状况和各国的华侨政策》。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了有关移民(如中国移民及日本、印度、朝鲜、犹太等移民)的比较研究,如重松伸司编的《现代亚洲移民》(1986年)。旅日华侨虽然只有7万人,但日本学界始终关注对他们的研究。如山田信夫编的《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1983年),涉及到近百年来日本华侨的社会经济、教育、社团、侨领、风俗、文化、

宗教信仰、归化等多种问题,集合了有关日本华侨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关神户著名侨商吴锦堂的研究、长崎华侨“泰益号”资料文书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显然,日本学者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华侨华人研究,其中华裔学者如吴主惠、游仲勋、戴国辉、李国卿以及陈正雄、陈德仁等的参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东南亚国家华裔学者的研究

东南亚是世界上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二战后,一批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新一代华裔学者,正作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华人研究,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不过,泰国的华人研究似乎无多大的举动,做得较好的依次为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

新加坡 华人学者众多,水平却参差不齐,其作品或用英文、或用华文,一般都能使用双语。学者们各有所专,讲究严谨的学术传统。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领域在于新加坡华人。

在通史方面,早期有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年版,1967年重版),以编年史体例叙述1919年以前新加坡华人的历史,卷帙浩繁,但缺乏系统。崔贵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发表过多部专著与学术论文,如《星马史论丛》(1977年),《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合编,1978年),《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90年)等,颇获好评。他分战前、日军侵占时期(1942—1945年)和战后三大阶段来划分新加坡华人的历史。

在专题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如:

文学、报刊:有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3卷(1962—1965年间出版),《马华新文学大系》10卷;杨松年的《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侨生活》(1986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评析》(1986年);李廷

辉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卷；郑文辉的《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1973年）；王慷鼎的《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1987年）等。

文化教育：有陈育崧的《椰荫馆文存》（1984年）；郑良树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1982年）、卷二（1986年）；王秀南的《新马教育泛论》（1970年）、《新马教育研究集》（1974年）；邱新民的《新加坡宗教文化》（1982年）和《东南亚文化交通史》（1984年）；郭振羽的《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1985年）。

社团与政治：有吴华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3册，1975年）；李保平的《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社会》（1978年）；麦留芳的《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1981年）和《方言群认同》（1985年）；黄枝连的《马华社会史导论》（1971年）。

人物、史证及其他：有柯木林、林孝胜的《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1986年）；林孝胜的《石叻古迹》（合著，1975年），《义顺社区发展史》（1987年），《潘家村史》（1991年）；邱新民的《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一、二、三辑，1982—1983年）；李元瑾的《林文庆的思想》（1990年）；庄钦永的《新加坡华人史论丛》（1986年）和《新呷华人史新考》（1990年），等等。

这些作品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突破。以邱新民为代表的健在的第一代学者仍在不停地笔耕；以廖建裕、崔贵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写史论事，作品迭出；以麦留芳、李元瑾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脱颖而出，言论不凡。麦留芳关于方言群认同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李元瑾关于林文庆的论述引人注目。而且，新加坡的学者在专题研究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史料的搜集，如关于新华文学、人物传记、碑铭、会馆档案、口述等方面的材料。

对新加坡本土之外华人的研究，最有成绩的当推廖建裕博士。廖生于印尼雅加达，先后求学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澳

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等,专业由文史转向国际政治,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政治系。通中、英、印(尼)三种语言。著述甚丰,主要有:《爪哇土生华人政治》(1976年),《印尼华人少数民族:七篇论文集》(1978年),《著名印尼华人传略》(1978年),《印尼原住民、华人少数民族与中国:概念与政策研究》(1978年),《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1978年),《1900—1977年印尼华人的政治思想》(197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华人方面》(1985年),《印尼华族文化》(1988年),《军人政权与政治文化:印尼专业集团研究》(1989年),《东盟华人研究论文集》(1989年),《寻求民族认同》(1990年)等有关印尼华人的著述近20种,对印尼华人的政治活动与地位、与原住民的关系、文化与社会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成为公认的印尼华人问题专家。在《爪哇土生华人政治》一书中,他认为,印尼华人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来自中国、以讲华语或中国方言为主的新客华人和在印尼出生、以讲印尼话为主的土生华人,在1917至1942年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爪哇土生华人逐渐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倾向中国的新报集团、倾向荷兰人的中华会和倾向印尼的中华党。《印尼原住民、华人少数民族与中国》一书则系统地叙述了印尼独立后印尼主要政党、军人领袖及国家领导人对华人的看法,历届政府的华人政策,华人的现状与前景等。他研究印尼华人的方法、理论框架、所阐述的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方法等都具有启发性。

印度尼西亚 这里的华人由于政府采取的强烈同化政策,其发展道路、所处的环境显然颇具特殊性,使关于本土华人的学术研究困难重重。与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新加坡和中国等对印尼华人的研究相比,印尼华人学者对自己族群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二战后初期,土生华人经济学家林端裕和印度尼西亚大学教授曾祖森对印尼华人的经济与文化问题作过研究,其中林著有《爪哇华人中介商》(1947年),他认为华人在印尼的经济生活中应起更广泛的作用。另

外值得一述的土生华人学者还有六十年代以来的中青年学者,如吴银传、郑绍侠、陈玉兰和李德清等。吴的《殊途同归:印尼一乡村研究》(1966年),对西瓜哇一个村庄的华人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这里的华人在文化与体质上已完全与土著融合在一起了。陈的《苏甲武眉的华人》(1963年)等,对西瓜哇一个市镇的华人社会作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李的《印尼公民问题及华侨问题》(1970年),也对印尼华人所遭遇的矛盾提出了试图解决的办法。^①

菲律宾^② 从事华人研究的主要有三类人:(1)老一代华侨;(2)学院专家;(3)关心华社的人士。

在第一类作者中,以刘芝田、陈烈甫、陈台民为代表,他们几乎都是用中文写作。刘芝田,1904年生于广东台山,幼年移居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中学毕业后赴杭州求学,接着又到菲律宾从事教职、编辑,著有《华侨与菲律宾》(1955年)、《菲律宾华侨史话》(1958年)、《菲律宾华侨报业史》等,其中对于华侨与菲律宾民族的关系问题有独到见解。陈烈甫,1909年生于福建厦门,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1950年后一直侨居菲律宾,是一位多产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专家,著有《菲律宾华侨教育》(1958年)、《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1968年)、《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1968年)、《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1979年)、《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1987年)等。他的主要研究是在菲律宾华人方面,力图从中菲关系、菲律宾历史中寻找华侨史的基本线索,对华侨同化问题作过专门的探讨。七十年代以来,他致力于使华侨华人问题成为一门较有

^① 关于印尼华人研究的详细介绍,可参考吴迪摩:《印尼华人》;布朗:《印尼华人宗教》;廖建裕:《印尼华人问题研究之回顾》。

^② 可参考洪玉华编:《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1992年版,第66—90页。

系统的专门学问的尝试,提出了“华侨学与华人学”的概念,虽然未见有完整的理论构架,但值得深思。陈台民是一位祖籍福建、生于马尼拉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中菲关系史和菲华社会问题的研究,著有《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1961年)和《菲律宾华侨史话》(1961年),为了解菲律宾华侨史的入门书。

在第二类作者中,以施振民、陈守国为代表。施振民生于福建,4岁时就到菲律宾宿务,先后求学于中国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后执教于菲律宾大学和拉刹大学,从事菲律宾华人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中、英文作品都收集在洪玉华编的《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之中。其中如《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祭祀圈与社会组织》、《旧金山湾区华人》等不少篇章是颇见功力之作。他特别强调和积极促进华菲之间的融合。陈守国博士同样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的《菲律宾华人的民族觉醒研究》(1972年)和《日统时期的菲律宾华人》(1981年)二书,被视为填补了菲华研究的一项空白,而最有意义的是他在《华人混血儿与菲律宾民族的形成》中所做的关于华菲混血儿与菲律宾社会之关系的研究。此外,如张素玉等人的著述也值得注意。

第三类作者,可以洪玉华和吴文焕为代表。他们把对菲华人的研究与华人关心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作品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吴文焕在菲《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作品,强调菲华人的前途在于菲律宾,主张华菲融合。洪玉华主要编著有《十字街头:菲华社会文集》(1988年)等书,任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董事长、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学者的华人研究相对较少,而且未能形成一个学术阵营,也无强有力的组织予以支持与推动。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组织,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沙撈越华人文化协会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等,开展过一些学术活动。值得一提的有:沙撈越华人史学家刘

子政,生于福建闽清,著有沙捞越历史、地理、掌故等方面的作品 10 余种,以《黄乃裳与新福州》(1979 年)一书为代表作。社会人类学家陈志明,祖籍福建闽南,生于马来亚,通晓华语(闽南话、普通话)、马来语和英语,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他在关于马来亚华人宗教、马六甲土生华人社会等方面的研究颇有成绩,著有《峇峇与娘惹:马六甲土生华人种族认同研究》(1979 年),《新马德教会的发展与分布》(1985 年)。此外,由骆静山、林水椽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 年)是迄今为止较权威的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著作。除编者外,是书还集合了颜清湟、崔贵强、陈志明、饶尚东、杨松年、陈绿漪等一批专家的撰稿。田农的《沙捞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1977 年)等有关沙捞越华人的著作也可资参考。

执教于文莱大学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系的饶尚东博士关于文莱华人的研究不能忽视。他毕业于伦敦大学,主修人口地理。他趋向于从地理上把沙捞越、文莱、沙巴结合起来研究,撰有文莱华族会馆以及文莱人口、地理、经济等方面的著述多种,成为文莱华人史研究的权威。

8. 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学者的研究

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1949—1979 年 30 年间,海外华人研究有较大的局限,尤其是“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种情形在 1979 年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据统计,1981—1990 年间出版有关华侨历史与现状的各类著述、资料近 140 种。编著有各类华侨史,如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1989 年);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1990 年);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1990 年);温广益、蔡仁龙等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1985 年);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1987 年);黄滋生、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1989

年);李白茵的《越南华侨与华人》(1990年)等。然而从整体上来说,比较能反映中国学者研究华侨华人问题水平的是他们关于华侨与中国关系方面的研究,如关于华侨与国内企业、华侨与抗日战争、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的研究。一些史料的编纂也极富意义,如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1980—1985年出版),林金枝等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编》,福建省档案馆编的《福建华侨档案史料》(1990年),蔡仁龙、李国梁编的《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等。还有各省、市、县“华侨志”的编纂。

海外华人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如朱杰勤、韩振华;一是国别华人史的研究。田汝康的《沙捞越华侨的社会结构》(1953年),被视为早期有关华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后来他又发表了关于近30年来沙捞越华人变迁的研究成果。

中国台湾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由于一批学者的参与,使得这一研究日益学术化。所编《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南洋研究史料丛刊》、《海外华人经济丛书》、《华侨志》丛书、《华侨经济年鉴》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批从台湾移居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学者的华人研究,也影响到台湾的华人研究。台湾学者的研究比较突出的当推李亦园、杨建成和陈怀东。李、杨二人都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而著称。李亦园的《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1970年),以马来西亚麻坡镇为个案,通过社会调查,以方言群为线索,分析了移民的职业、经济结构、社团组织、家庭生活,被视为有关华人社会的人类学经典之作。杨建成则偏重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方面的研究,如《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1982年)等。《海外华人经济丛书》中刘文荣的《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1988年)、李国卿的《泰国华人经济的演变与前瞻》(1988年)、曾庆辉的《海外华商银行之经营及其发展》(1987年)、陈怀东

的《海外华人经济概论》(1956年)等,反映了台湾对海外华人经济的研究水平。

在香港,华人研究也为学者们所热衷,但可观的成果并不多。值得一述的有宋哲美的《北婆罗洲、婆罗乃、沙撈越华侨经济》(1957年)、《英属婆罗洲的华侨教育》(1959年)、《马来西亚华人史》(1964年)等。

在上述之外,其他还有一些零星的但同样很重要的研究。如古巴历史学家帕斯特拉那等对古巴华工的研究^①。法国苏尔梦关于印尼华人文化的研究,著有《雅加达的华人》(1977年)、《印尼华人的马来语文学》(1981年)。廖遇常关于法国华人移民史的研究。美国旅德学者萨默士关于印尼华人的研究,著有《印尼土生华人政治》(1964年)和《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1974年)。毛里求斯学者的《西印度洋的华人聚居区》(1981年)。新西兰叶宋曼英的《从过客到公民》。陈儒性关于缅甸华人的研究。

第二节 华人历史博物馆、史学团体及其他

一、博物馆及其他纪念物址

华侨出国谋生、创业、求发展的历史悲壮惨烈而又可歌可泣。在东南亚,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几百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期间,华侨被殖民者所控制与欺压,菲律宾、印尼的华侨都有过惨遭杀戮、血流成河的辛酸史。在美国,中国移民的“淘金梦”破灭,受到的是长达60余年的排华法的折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侨移民也无例外。在

^① 帕斯特拉那:《1847—1930年古巴华工发展史》,1963年版。

中南美洲、南非洲的种植园或金矿,华工的命运更是有如“猪仔”。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夺去这群硬汉求生存的信念与勇气,他们不屈地适应,不懈地斗争,终于走出了黑暗的岁月,迎来了光明。他们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于是,为了纪念先辈们的创业史、斗争史,人们树碑立传,甚至建馆志其业绩。

(一) 纪念碑

它们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1. 纪念华侨抗敌斗争碑

华侨在海外发展,始终关心着所在国的命运。每当外敌入侵或反动势力横行之时,他们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的英雄事迹不仅是华侨华人的骄傲,也为当地人民或政府所钦佩。

古巴哈瓦那维达多广场的华工纪功碑上刻有铭文:“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此碑纪念在古巴30年解放战争(1868—1898年)中华人战士为古巴的独立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菲律宾,王彬纪念铜像、纪念碑和刘亨贖纪念碑是华侨为菲律宾独立而斗争的象征。罗曼·王彬(1847—1912年),祖籍福建晋江,是中菲混血儿,马尼拉有名的殷商。他以菲律宾为自己的家园,充满着炽热的爱。在1896年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菲美(国)战争中,倾其家产以支援革命,一度入狱,出狱后依然如故,受到菲律宾人民的尊敬。1915年,马尼拉市议会通过决议,将聚居着较多华侨的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并在街口建立纪念牌坊“中菲友谊门”。1973年,在友谊门附近建立王彬的铜像和纪念碑,供人瞻仰。刘亨贖(1872—1926年),生于福建南安,菲律宾革命时期的华侨将军。1988年刘亨贖诞辰116周年时,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发起筹建两座刘亨贖纪念碑,第一座设于甲米地省卡维特市阿奎纳多纪念馆内;第二

座设于甲米地省西朗。

抗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英勇抵抗,许多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先后进行大小 260 余次战斗,歼敌 2000 余人,牺牲队员 77 人。1979 年“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建成,碑高 13 米,底层有两层,竖有四方形、宽 1.2 米的擎天长柱。碑旁建有烈士纪念馆,四周环以松柏,碑前蹲着两只石狮。每年清明节和万圣节,人们纷纷前往献花凭吊。1948 年菲华社会还在义山建有“杨光洸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以纪念抗日战争时期杨光洸等 8 位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外交官。同年又建有“华侨抗敌后援会暨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另有“四抗抗日纪念碑”,以纪念菲律宾战地民主血干团、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等四个抗日团体的烈士。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建有华侨殉难纪念碑,该碑建于 1947 年,以让后人不忘日军 1942 年占领新山时逾万名遇害的华侨。在马六甲三保山,1948 年建有“马六甲抗日烈士纪念碑”。沙巴州有“山打根中国烈士纪念碑”,建于 1947 年,以纪念 1944 年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等。在新加坡,1967 年建有“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李光耀总理亲自主持揭幕仪式,此后每年 2 月 15 日为日占时期新加坡死难人民纪念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华侨还参加了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1950 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中华运动场内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裔将士纪念碑”,以纪念牺牲的陈炳沛、陈浣葵等烈士。1954 年,由美国华裔退伍军人会等发起筹建“华裔阵亡军人纪念碑”,碑址在旧金山圣玛丽公园,上面刻有 91 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华裔英烈。

2. 纪念华工业绩碑

华工披荆斩棘,创造了奇迹,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作出了贡

献。1986年,圭亚那总理汉密尔顿·格林亲自出席“首批华人抵达圭亚那纪念碑”落成仪式,该碑纪念1853年1月12日首批抵达圭亚那的华人。

华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央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贡献更是彪炳史册。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1863—1869年),数以万计的华工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才赢得了成功。这些华工被誉为“美国之真实开路先锋”。1964年,内华达州举行建州100周年纪念,州政府决定以10月24日为向华人先驱致敬日,并在斯柏克斯和弗吉尼亚市设立丰功碑,以表彰华工的不朽功绩。1969年,美国华人在东西太平洋铁路接轨处建立了一座铜碑。1976年,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建立南太平洋铁路与圣费尔南多大隧道华工纪念碑,碑上的华文题词为:“加州铁路,南北贯通,华裔精神,血肉献功”。英文题词为:“值此路百年纪念之际,谨以此碑敬献给曾参加修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圣费尔南多大隧道的3000名华工。他们的劳动使加利福尼亚州有了第一条南北大铁道,并改变了加州的历史。”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拱顶运动场入口处,1989年建有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碑,安大略省省督出席了揭幕式,碑文称:“1880年至1885年,17000名中国广东省的男工来到加拿大西部,参加穿越落基山危险地段铁路的建筑……筑路过程中4000多人丧失了生命,另有数千人在完工后漂泊异乡无法回国。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籍籍无名,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3. 纪念有突出贡献者或先辈事迹碑

在东南亚,曾有学者专门搜集此类碑铭,拓印汇萃成册,进行研究。如陈铁凡和傅吾康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共三卷,分别于1982年、1985年和1987年出版。陈育崧、陈荆和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年出版)。由傅吾康教授牵头,在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71年开始网罗一批学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泰国等地收集铭刻资料。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四公纪念碑,建于1932年,以纪念开发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叶亚来、叶致英、叶观盛和陈秀莲。在泰国,1954年由政府出面在吞武里市区为郑信建立大型纪念碑,碑的上端为郑信骑马戎装塑像,碑文为:“此碑为纪念达信皇大帝和增进他的荣誉而建。他是泰国的好男儿。生于佛历2277年(1734年),卒于佛历2325年(1782年)。泰国政府和人民于佛历2497年(1954年)4月17日敬立此碑,以便提醒泰国人民牢记他抵御外敌,恢复泰国独立和自由的恩德。”

在日本鹿儿岛,1966年建有“鉴真大和尚凌沧海遥来之地碑”。1979年,在当年拘押中国移民的美国旧金山天使岛残存的木屋内建有纪念碑,碑文为:“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这些碑并不是刻意歌功颂德,而是当地人民与政府对华侨先辈业绩的一种承认,是华人牢记自己历史、不忘创业艰难的一种方式,这是一部不倒的活生生的历史。

(二) 博物馆

纪念华侨移民历史、纪念杰出人物事迹、纪念历史事件等的馆堂,在海外华人较多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见。较著名的有:

美国:华人历史展览馆,1965年由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创办。但较活跃的还是纽约华埠历史博物馆,其前身为纽约华埠历史研究社,收藏有关图片3500余张,有关华裔的书籍1200本,等等。该馆推出了永久性的“纽约唐人街沧桑”展览,以三位华裔老人的回忆为主线,详细介绍了160余年来华人移民在纽约的历史。金华昌博物馆,又名约翰迪市华人博物馆,1974年建于俄勒冈州。馆址原为经销杂货与中药的商店——金华昌公司。该馆展览各种珍贵文物,如各种淘金工具、中草药、书信、帐目、订单以及其它文字资料。该馆是联邦政府和俄勒冈州重点保护单位。编有《约翰迪市的中国医生》和大型文献纪

录片《金山》。1985年规定每年6月举行一次中国节,以纪念华人开发之功。

澳大利亚:澳华历史博物馆,即墨尔本华人历史博物馆。由旅游局、华人团体、墨尔本大学等筹建,1985年开幕,为正方形5层建筑物。地下室陈列着各种龙的形态。二、三、四楼为展厅,陈列着当年华人开采金矿的照片、图片,澳大利亚华人大事记,澳大利亚华人会馆、同乡会的锦旗与活动照片,还有中国历史文物的复制品,等等。

新加坡:李光前艺术博物馆,保存中国文物,分书函、玉器、铜器、陶瓷器四大类,计有文物3123件。现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马来西亚:诗巫华族历史文化馆,1988年成立,收集并展览华族历史文物。

日本: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1979年设于神户中华总商会大厦二楼,展示神户开港(1867年)以来的华侨文物、资料、图片等,曾搜集过孙中山在日本时的遗物、文书等。在神户还有孙中山纪念馆,展示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和物品。

另外,中国厦门华侨博物院系中国第一个专门收集并展出有关华侨历史资料、图片、纪念物等的博物院,由陈嘉庚先生倡办。1959年5月正式开放。陈列部展出面积有2400平方米,有陈列品6000余件。其中的“华侨历史简介馆”为博物院的主体部分,分“华侨的产生和发展”、“华侨的悲惨遭遇”、“华侨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华侨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侨务政策回顾”等6部分介绍华侨的历史。此外,中国还有广东开平华侨博物馆(1985年)。

二、史学团体

华人史学的发展与渐趋成熟还反映在旨在探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团体或组织的成立与壮大之上。这类团体或组织的名称很多,

如“文化协会”、“历史学会”、“研究社”、“文化中心”等,但其活动的内容、性质大体一致。专门性的史学团体如:

在美国有:(1)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初为华人侨美历史学会,1963年成立,会址在旧金山,创办人为陈参盛、黄定国、李华清、郭长城、伍卫信等。该会的宗旨是通过各种活动,介绍和研究美国华人史,使人们认识到华人历史也是美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出版年刊《美国华人:历史与观点》,刊载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论文、访问录、资料等;出版资料集、回忆录、自传等;举办经常性的会员集会、专题演讲;组织学术性和历史性纪念活动。如1969年学会竖碑纪念华工参加修筑横贯大陆铁路百周年,出版《加州华侨史大纲》,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首次讲授美国华人历史课程。1975年,举办首次全美华裔研究专题讨论会。(2)夏威夷华人历史研究中心,宋谭秀红等于1970年成立,旨在寻根、开展家史与地方史的研究。1985年举办了华人谱系研讨会;1988年举办夏威夷华人历史讨论会。出版有杨的《夏威夷华人:文献索引》(1973年);谢廷玉的《檀香山先辈华人史》(1975年);谢廷玉等的《檀香山道咸岛华人史迹》(1979年)和《檀香山夏威夷岛华人史迹》(1983年);格里克的《过客与居民:夏威夷华人移民》(1980年)。(3)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雷纯光等于1975年成立,旨在记载、研究南加州华人的历史。出版半年期刊《金山学报》,组织学术活动,如1987年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合作进行华人口述历史项目,展览华裔历史,1984年还出版有《洛杉矶华人妇女史》。(4)纽约华埠历史研究社,陈国雄、黎重旺等人于1980年成立,旨在收集与研究纽约华人历史及其文献,以展览、幻灯片、广播、出版小册子及季刊(《布告板》)等形式推动人们了解华人历史。由于该社的出色工作,1984年获纽约市美术协会奖,后改名为纽约华埠博物馆,获得政府补贴。此外还有1980年成立的美国西北华人历史学会等。这些学会积极推动了解

与研究华人历史及保存遗迹。它们一方面与高等学校亚裔研究系合作,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度,一方面与其它学术团体联手进行各种宣传或学术活动。如1980年,美国华人历史学会、中华文化基金会与伯克莱加州大学亚裔系主办第二次全国性的华侨历史讨论会。旧金山的中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机构,它通过展览及其他文化活动来发扬中国及华裔文化,如1974年展出《三代华人在美国》,1980年展出《埃仑:1910年至1940年的华人移民历史图片展览》和《甘苦沧桑两百年(1785—1980年)》(美国华人历史图片),1982年展出《美国华裔妇女的今昔(1934—1982年)》(图片)。

东南亚国家成立的华人研究学术组织显然不如美国的多。菲律宾的拉刹大学中国研究所、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中资源发展中心等机构或组织参与菲华研究活动,有的出版丛书。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社团或文化协会也介入华社的研究。如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85年成立),旨在收集、整理政府出版物及报纸、杂志中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史料,着重研究华人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同时研究华人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中医药学等,出版了系列学术著作,如《宗教与礼俗论集》、《文教事业论集》等。诗巫华族历史文物委员会(1987年成立)也在积极搜集华族历史文物,包括早期移民资料,宗教发展史,刘钦侯医院史,经济、政治与教育史等。新加坡的南洋学会、亚洲研究学会是推动华人历史与社会研究的两大学术组织。新加坡南洋学会于1940年3月17日成立,原名中国南洋学会,1958年改现名,发起人为姚楠、关楚璞、张礼千、郁达夫、许云樵、韩槐准等。出版有《南洋学报》(半年刊),许云樵任主编,1985年停刊。该会组织过多次学术演讲及研讨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于1982年成立,主要活动为举办演讲会、研讨会、座谈会、论文报告会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以

促进对亚洲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特别是华人问题的研究。1983年始出版《亚洲文化》(半年刊)等。

此外,日本有长崎华侨研究会(1984年成立)、神户华侨研究会(1987年成立)、九州华侨华人研究会(1988年成立)。

中国大陆有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1年成立),许多省、市、县(如广东、福建、上海等)也有华侨历史学会;台湾有海外华人研究会;香港中文大学有海外华人研究社。

随着华侨华人研究的深入,国际性的华侨华人研究学术活动频繁起来。自1988年在中国厦门召开以“战后海外华人变化”为题的世界性学术会议以来,相继在世界各地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如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研讨会等。

参 考 文 献

中文部分

-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海中华书局 1946 年版。
- 华侨志编委会：《华侨志·总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64 年。
- 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张泉林主编：《当代中国华侨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 沈立新：《世界各国唐人街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吴景超著，筑生译：《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邝治中：《新唐人街》，香港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朱敬先：《华侨教育》，台北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百年史》，香港，1992 年。
- 戴子安：《华侨文教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1963 年版。
- 周胜皋：《海外华文学学校教育》，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室，1969 年。
-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新社香港分社编：《海外华文报刊概况》，1991 年。
- 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 陈贤茂等：《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3 年版。
- 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台湾编译馆，1966 年。
-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 1929 年版。
- 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上海国立编译所，1934 年。
-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国立暨大南洋文化事业部，1933 年。
-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王赓武：《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 1969 年版。
-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 1979 年版。
- 张正藩：《近六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史》，台北文物供应社 1956 年版。
- 刘士木等编：《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上海国立暨大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 年。
- 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
-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
- 陈润棠：《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香港基道书楼有限公司 1989 年版。
- 杨松年、王慷鼎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等，1995 年。
- 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下)，台北正中书局 1985 年版。
- 林水椽、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 年。
- 林水椽主编：《文教事业论集》，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 年。
- 唐苏民：《马来亚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59 年。
- 宋哲美：《马来亚来华人史》，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4 年。
- 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 年。
- 田农：《沙捞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新加坡联合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 骆静山主编：《宗教与礼俗论集》，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 年。
- 柏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华社资料中心，1991 年。
-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之三。
-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年。
-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 年。
- 崔贵强：《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公司，1993 年。
- 王秀南：《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0 年。
- 唐志光：《新加坡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50 年。
- 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南洋书局 1950 年版。

-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 1985 年版。
-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台北，1985 年。
-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共三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1977 年。
- 林孝胜等编：《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 1986 年版。
- 颜清湟著，粟明鲜译：《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冯爱群：《华侨报业史》，台北学生书局 1967 年版。
-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 1973 年版。
- 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评》，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 年。
-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 年。
-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 年。
- 邱新民：《新加坡宗教文化》，南洋商报知识丛书，1982 年。
- 弗里曼著，郭振羽、罗伊菲译：《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之十一。
- 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共 2 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1986 年。
-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共 3 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 年。
- 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新加坡南洋学会，1962 年。
- 朱绪：《新马话剧活动四十五年》，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 年。
- 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 陈烈甫：《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台北正中书局 1968 年版。
- 洪玉华编：《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和拉刹大学，1992 年。
- 魏安国著，吴文焕译：《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世界日报社和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9 年。
-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编：《融合：菲律宾华人》，1990 年。
- 洪玉华、蔡丽丽编：《十字街头：菲华社会文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88 年。
- 周南京：《菲律宾与华人》，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93 年。
- 廖建裕：《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3 年。
- 杨少珍：《印尼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61 年。

-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 许友年：《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2 年版。
- 梁子衡：《泰国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60 年。
- 卢伟林：《缅甸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67 年。
- 陈文亭、卢伟林：《缅甸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9 年版。
- 陈以令：《越南华侨志》，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8 年版。
- 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饶尚东：《汶莱华族会馆史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 年。
- 周胜皋：《越南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 1961 年版。
- 陈固亭：《日本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 1965 年版。
- 何瑞藤：《日本华侨社会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80 年版。
- 臧广恩、蒋永敬：《日本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9 年版。
- 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的华侨》，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王治民：《韩国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委会，1958 年。
- 张兆理：《韩国华侨教育》，台北华侨出版社 1957 年版。
- 辛祖康：《寮国华侨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9 年版。
-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 李胜生：《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香港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加拿大自由出版社 1967 年版。
-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话》，台湾海外文库出版社 1956 年版。
- 邝治中著，杨万译：《纽约唐人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
- 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 宋李瑞芳著，朱永涛译：《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 陈依范著，韩有毅等译：《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 魏安国等著，许步增译：《从中国到加拿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 年；台北“侨务委员会”，1980 年。
-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 年。

外文部分

- William G. Skinne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s Freedman*. Stanford Univ, 1979.
- Wang Gung 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imes Academic, Singapore, 1991.
- Leo Suryadinata,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Singapore, 1989.
- George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 New York, 1957.
- W.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1967.
- Jacques Amyot, *The Manila Chinese*. Atenso de Manila Univ, Philippines, 1973.
- Teresita Ang See,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KAISA, 1990.
- John Clammer, *The Society of Singapore Religion: Study i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Chopmen Publishers, 1981.
- Tan Chee — Beng, *The Preser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 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1990.
-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xford Univ, Singapore, 1992.
- J. A. C. Mackie,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Univ of Hawaii Honolulu, 1976.
- Wang Sing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Australia Univ, Canberra, 1969.
- James L. Watson,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Univ of Calif, 1975.
- David ChuenYan Lai, *China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1988.
- Jennifer W. Cushman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 Hong Kong Univ, 1988.

Tan Giok—Lan, *The Chinese of Sukabumi: A Stud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ccommodation*. Cornell Univ, 1963.

Ng Bickleen Fong,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 study in Assimilation*. Hong Kong, 1959.

Arthur Huck,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Canberra, 1970.

译名对照

B

巴素	Purcell Victor
包乐史	Blusse, Leonard
布莱特·威尔弗来德	Blythe Wilfred

C

陈志明	Tan Chee Beng
陈玉兰	Tan ,Mely G.
陈育崧	Tan Yeok Seong
陈依范	Chen, Jack
成露西	Cheng, Lucie
崔贵强	Choi Kwai Keong

D

戴闻达	Jan Julius Lodewik Duyvendak
德教会	Moral Uplifting Society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医药学术大会	ASEAN Symposium on Chinese Medicine

F

方修	Fang Hsiu
费芝尔, C. P.	Fitzgerald, C. P.
费思莱	Fitzgerald, Stephen A.
弗里德曼·莫里斯	Freedman Maurice

G

高国麟

Coughlin, Richard J.

H

荷华学校

Hoflandsch - chineesche Shool

荷兰中国饮业者协会

Horeca Nederland Secti Chinees - Indische
Bedrijven

洪玉华

Teresita Ang See

华侨报德善堂

The Hua Kiaw Poh Teak Tung Foundation

J

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

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San Francisco

K

科比特·杜冯·克拉夫

Corbitt Duvon Clough

科珀尔·查尔斯

Copel Charles A.

柯立芝

Coolidge, Mary Roberts

克劳婷·苏尔梦

Salmon, Claudine Marie Helene

孔教总会

Khong Kauw Tjong Hwee

库斯曼·杰尼弗

Cushman Jennifer W.

L

叻报

Lat Pau

李瑞芳

Lee, Betty

李东海

Lee, David T. H.

李全寿

Lee, Tjwan Sioe

李金福

Lee, Kim Hok

李胜生

Lee, Peters

黎全恩

Lai, David Chuenyan

利·威廉斯

Williams, Lea E.

梁友兰	Nio Joe Lan
廖建裕	Liauw Kian - djoe
林天佑	Liem Thian Joe
林·林达	Lim, Linda Y. C.
刘子政	Liu Tze Cheng
伦敦华埠街坊会	London China Town Chinese Association

M

马六甲	The Baba of Melaka
麦凯·杰米	Mackie, J. A. C.
麦留芳	Mak Lau Fong
麦礼谦	Him Mark Lai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N

南洋孔教会	Nanyang Confucian Association
纽约华埠历史研究社	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

Q

青云亭	Cheng Hoon Teng
-----	-----------------

S

三宝垄	Semarang
三教会	Sam Kauw Hwee
斯金纳	Skinner, George William
施振民	Chinben See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	Chinese Language Press Institute
双林寺	Siong Lim See Monastery

T

泰国华宗僧务委员会	Khana Kammakan Songchin Nikai
-----------	-------------------------------

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	Chinese Journalists Welfare Association
汤婷婷	Maxim Hong Kingston
同源会	The Chinese -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W

王赓武	Wang, Gungwu
王灵智	Wang, Ling - chi
王省吾	Wang, Sidney
王秀南	Wang, Shiow Nan
吴燕和	Wu, David Y. H.
吴文焕	Go Bon Juan

X

许云樵	Hsu, Yun Tsiao
-----	----------------

Y

亚裔文化中心	Asian American Resouce Workshop
亚洲华文作家会议	Conference of Chinese Writers from Asia
雅克·阿米欧	Amyot, Jacques
颜清湟	Yen, Ching Hwang
杨进发	Yong, Chin Fatt
印度尼西亚中华伊斯兰教协会	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中华教会理事会	Dewan Gereja Tionghoa di Indonesia
游仲勋	Yu, Chu Kun
云达乐	Willmott, Donald Earl
云达忠	Willmott, William E.

Z

中美文化协会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中华协会	Peratuan Tionghoa

后 记

承蒙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是本书得以面世的重要原因。沈立新研究员是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专家,特邀其撰写的第五章《唐人街街区文化》颇具特色。新加坡国立大学廖建裕博士、崔贵强先生、宗联总会潘明智先生,香港大学历史系钱江博士,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周永森教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陆华志博士,美国华人史学家麦礼谦先生,澳大利亚莫倚梅博士等,或为笔者搜集资料提供方便,或以著述相赠,令人感怀。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梁英明教授和厦门大学李国梁教授多次相聚探讨,启益良多。黄浪华先生、方雄普先生、陈兄文寿硕士等的诸多鼓励和督促,实为拙作顺产不可少之环节。恕不一一列名,对诸位的关怀和鼓励,在此深表谢意。

谭天星

1995年岁末于北京亚运村